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荷] 扬·卢滕·范赞登 著

隋福民 译



proculit terra herbā virentē ⁊ faciente
 sanē iuxta genus suū: lignūq; facies
 fructū ⁊ habēs unūq;q; semenē sedm
 specē suā. Et vidit deus qd esset bonū:
 et factū est vesp̄e et mane dies tertius.
 Dixitq; autē deus. fiant luminaria
 in firmamēto celi: ⁊ dividāt diem ac
 noctem: ⁊ sint in signa ⁊ tempora et dies ⁊
 annos. ut luceāt in firmamēto celi et
 illuminēt terrā. Et factū ē ita. Facitq;
 deus duo luminaria magna: lumīare
 maius ut p̄sser diē et lumīare min⁹
 ut p̄sser noctē ⁊ stellas: ⁊ posuit eas in
 firmamēto celi ut luceant sup̄ terrā: et

caeli ⁊ firmamēto creavit eos. Benedixit
 q; illis deus: ⁊ ait. Crescite ⁊ multiplicā
 mini ⁊ replere terrā. et sibiāte eā. et dātā
 mini piscib; maris. et volatilib; celi.
 et uniuersis animātib; que mouent̄
 sup̄ terrā. Dixitq; de⁹. Ecce dedi vobis
 omnē herbā afferentē semenē sup̄ terrā.
 et uniuersa ligna que hnt̄ in semine
 semenē generis sui. ut sint vobis i escā
 ⁊ cunctis aīanib; terre. Quib; volucri
 celi ⁊ uniuersis q; mouēt̄ in terra: ⁊ i
 quib; est anima viuent̄. ut habeāt ad
 vescendū. Et factū est ita. Viditq; deus
 cūda que fecerat. ⁊ erat valde bona.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荷] 扬·卢滕·范赞登 著

隋福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
1000—1800年/（荷）范赞登著；隋福民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ISBN 978-7-308-15524-3

I.①通… II.①范… ②隋… III.①欧洲经济—经
济史—1000~1800 IV.①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406号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荷]扬·卢滕·范赞登著 隋福民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军

责任校对 周元君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965mm 1/16

印张 28

字数 338千

版印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5524-3

定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社会经济史译丛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

李伯重 清华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包弼德 (Peter Bol) 哈佛大学讲席教授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讲席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春声 中山大学教授

陈争平 清华大学教授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何明 云南大学教授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刘兰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马德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韦森 复旦大学教授

吴松弟 复旦大学教授

萧国亮 北京大学教授

张国刚 清华大学教授

周绍明 (Joseph McDermott) 剑桥大学教授

主 编

龙登高 清华大学教授



总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显得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与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

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中文版序

范赞登 (Jan Luiten van Zanden) 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 1981 年毕业于荷兰自由大学 (the 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 1985 在瓦格宁根农业大学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Wageningen) 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先在伊拉斯谟大学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和自由大学任教, 1992 年移帐乌得勒支大学 (University of Utrecht), 直至今日。他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史研究,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 在欧洲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 先后出版了 *The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 The Dutch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1913* 等专著 (合著) 以及 “Rich and Poor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Jav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On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Rice pr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in 19th century Java” 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由于其成就, 他于 1997 年当选为荷兰皇家科学

院院士，2003年荣获荷兰全国的最高科研奖——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颁发的斯宾诺莎奖（the Spinoza premium）。他还于2009—2012年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会长。

范赞登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著者，是他创造性地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方法对历史上的GDP进行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研究近代以前的GDP并不始于他。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就是一部综合了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著作，他对中国历史上的GDP的研究成果《中国的长期经济表现，960—2030年》（*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也是开拓性的成果。但是就深入的区域研究而言，做得最出色的当数范赞登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的方法，对近代早期荷兰的GDP进行了开拓性的和深入的研究^{〔1〕}。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国际学界在此领域中的最新进展，为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近代早期的GDP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范赞登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这个非常专门的经济史研究领域。在进行这种研究的同时，他时时关注更大的历史进程，力图更全面地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

经济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早已指出：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

〔1〕 其主要成果见：Jan Luiten van Zanden, “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for Holland in 1510/14”, 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 2002, pp. 131–163; Jan-Pieter Smits, Edwin Holings & Jan Luiten van Zanden, *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1913*,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Monograph Series 5, 2000。

部分分离出来”^[2]。同时，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索洛（Robert Solow）对西方一些只是简单地使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做法做了强烈的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3]。除此之外，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经济史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以往在西方中心论的支配下，西方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欧经济的历史变化上。而对西欧经济史在近代早期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研究，又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西欧模式”，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近年来，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西欧经验”，成为晚近兴起的“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面对上述挑战，经济史学者应当如何办呢？首先，要改变上面这些情况，谈何容易！多年前，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为该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撰写了历史学卷^[4]，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在该书结语“当前的趋势和问题”中，他写道：“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5页。

[3] Robert M.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4] 该卷后来以《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为题出版了中译本，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7年。

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5]。因此，不是每位学者都能正视这些挑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解决这些挑战所提出的问题的。而在能够这样做的学者中，范赞登是一位佼佼者。

面对上述挑战，范赞登调整了自己的研究重点，研究地域从西欧（特别是荷兰）转向了全球，研究对象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而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本书——《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本书英文版于2009年由 Brill 出版社推出后，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范赞登选择了工业革命的起因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工业革命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6]。经过这个伟大变革，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这种“头等的重要性”^[7]，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占有特殊地位。

[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

[6]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158.

[7]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工业革命发生起就已开始。在较早的研究中，工业革命被视为一个18世纪突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但到20世纪后期，此看法已逐渐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抛弃。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一个局限于某一时期中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现象^[8]，正如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9]换言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工业革命绝不可能突然出现。在欧洲，按照奇波拉（Carlo M. Cipolla）的看法，工业革命乃是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10]。而依照其他许多学者的看法，在这7个世纪中，欧洲已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工业革命”^[11]。因此可以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很久，欧洲的经济已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相对而言，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12]。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革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法、德等国也不例

[8] 卡罗·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页。

[9]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p.162.

[10] 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xiii.

[11] 例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西欧出现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于11—13世纪，最主要的地方是意大利；第二次发生于16—17世纪，主要在英国；第三次则发生于18世纪中叶以后，主要地点仍在英国。参阅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630—644页。

[12] 参见大河入晓南：《英国的工业革命》，见周宪文编：《西洋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银行，1984年。

外^[13]。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工业革命的起因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学者们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世界的变化（特别是殖民地的开发）等方面，找出了众多工业革命赖以出现的必要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对工业革命的起因做出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都认为：只有英国以及西欧（还有西欧的衍生物——北美）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英国，之后只有西欧和北美可以迅速跟进，而其他地区则否。

然而，以往研究中得出的各种结论，仍然不能够完美地解释工业革命何以发生，以及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西欧发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往工业革命研究中发现了各种导致工业革命的因素，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多年前，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

[13] 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特定条件时，法国经济史学家克劳德·福伦说：“法国不是这一革命的原发地，按照一个普遍发生于西欧的过程，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输入并向英国仿效的结果。”德国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也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引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1章《1700—1914年法国的工业革命》（福伦执笔）和第2章《1700—1914年德国的工业革命》（博查特执笔），第2、66页。

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14]。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是怎么变化和怎样相互联结的，对工业革命起源的研究来说，可能与发现这些因素同样重要。

其次，以往对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对象仅只限于英国和西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工业革命确实起源于英国以及西欧。然而，正如巴勒克拉夫早就呼吁的那样，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他强调：“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就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观念。”^[15] 晚近霍布森（John M. Hobson）更强调：“这种常见但却富有欺骗性的欧洲中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东西方从公元 500 年开始就通过全球化一直联系在一起。”“东方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高度的缄默，因为它掩盖了三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东方在约公元 500 年后开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其次，东方在公元 500 年后积极创造并维持着全球经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恢复东方经济活力以及东方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16] 近年来兴起的加州学派更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迫使学界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欧洲的发展轨迹，并将这一地区的表现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加以比较，并导致了如何为这种比较提供基础支撑的问题。对于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也应当如此。

[14]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70页。

[1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8页。

[16]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范赞登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来重新探讨工业革命的起因。他在本书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研究工业革命“深层次的”（或者说最根本）的起因，旨在说明：第一，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他指出，中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比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富有活力。这个观点解决了有关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起源的三种不同争论，即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争论、人力资本形成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所起的作用的争论，以及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第二，以往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主要突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以解释1800年左右发生的增长模式的激烈变革。但迄今为止，经济史学家们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发生于1800年前几个世纪中的人口结构变化。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发生了。第三，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经济腾飞，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和理解长期经济绩效是很有帮助的。经济史学家可以将此方法加以发展，用于研究工业革命。

基于以上认识，范赞登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把西欧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

本书另一大特点是走出欧洲，将西欧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之中，以观察西欧究竟是否真正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如果确实不同，那么在何时才出现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首先要对制度效率、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的各种指标体系进行详尽的定量比较，以弄清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以及人力资

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北海地区（即英国和低地国家）在三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然而，北海地区经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所取得的成功，都深深根植于中世纪鼎盛时期形成的制度之中。

本书还有一大亮点，即知识经济的问题。作者认为：知识经济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实用性”知识，进而引发近代经济增长。但是，哪些长期过程和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思想的积累，以使西欧确实能够经历这种向知识经济，进而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转变呢？过去的研究并不多。在本书中，作者长期地追溯这段历史过程，指出：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公元900—1300年，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出现了重要变化。在这段时期，欧洲发生了一场遍及全欧的经济扩张，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1300—1600年），北海地区仍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却经历了经济增长减缓。他把这个现象称为欧洲经济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并通过对婚姻模式、家庭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的研究，来解释这种“小分流”。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1400—1800年间知识经济在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独有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知识积累过程，并构成了北海地区在18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具有的强大经济表现的历史背景。随后，他将这段历史过程延续到了18世纪晚期西欧的“双革命”^[17]，并继续对制度（如公民身份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精确地确定近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以及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变的人均收入持

[17] “双革命”（dual revolution）一词，系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提出，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

续增长的进程始于何时。同时，基于他对荷兰共和国进行的案例研究，研究近代早期的市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中世纪制度下的村社“公民”与1789年后形成的现代公民之间的联系。最后，将西欧的发展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以确定西方的崛起究竟有多么“特殊”。

通过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本书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例如，作者考察了那些在西欧中世纪盛期大多已开始出现的制度，包括法治（rule of law）、合作团体（如行会）、欧洲婚姻模式和公民权的概念等，分析了这些制度的相对效率，看它们是怎样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交换的。通过观察反映制度绩效的相对价格，证实相对高效的制度是怎样影响在西欧发生的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过程的^[18]。然后将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显示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相对较快的增长。通过比较北海地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的情况，发现了这一联系。由此来比较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的情况时，也就可以更好地解释19世纪初的“大分流”。

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长期经济变化曲线的特点，是中世纪的突然扩张，随后是长时间的稳定期，即便不是“高水平”的经济停滞，这一路径也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或者中东的经济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但是只有北海地区在近代早期保持了持续的扩展，这也使得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有了不同之处，因此欧洲“小分流”最终导致了世界的“大分流”。

在本书中，作者特别把中国和日本作为观察西欧经济变化的对照。他对各种不同的制度效率指标和人力资本形成指标进行了分析，

[18] 他用书籍产量和消费量、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增长以及技能溢价等指标来衡量这一过程。

显示出日本和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不同。从中国清朝和日本德川时期开始，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两国都有繁荣的书籍贸易，同时书籍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尽管从人均数量上来看还赶不上西欧。同时，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日都有逐渐复杂的市场交换和高水平的市场融合；在中国还有相对较低的技能溢价（可能在日本也是如此）；而且，资本市场的进步也让利率迅速降低。因此在中国和日本，可以发现同样的相关关系，即制度效率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日本的高效制度和高水平人力资本使得它可以迎接西方带来的“开放”的挑战，并且还能迅速复制西方的技术和一些有活力的制度。在中国，结果非常不成功。可能关键的不同点是，日本在1860年明治维新之后运用国家来进行关键的改革，而中国在19世纪的时候没有起到相似的作用。作者特别指出：尽管他强调从中世纪以来的西欧的独特的发展可以作为其长期成功的解释，但是日本和中国的例子证明还有另外一条通往“近代”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高效率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特征的。在西欧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和制度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日本和中国，近代制度的出现是国家从直接对经济的干预中退出并决定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得来的。

作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即中世纪欧洲的部分制度传统包括了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新概念。这个公民权的概念也构成了重新解释民主国家和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的基础。这个进程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并且构成了1776年后的“大西洋革命”（Atlantic Revolution）的基础。建立于中世纪的民主传统在西欧新的议会制度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1500年以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能保持住经济活力，特别是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和中部（德国），在中世纪本来是很有活力，但

是在近代早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简言之，在 900—1300 年间的几个世纪中，增长的过程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但是 1500 年之后，增长则被限制在北海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北海地区保持、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的民主传统。

为什么民主的制度相对有效呢？本书作者的答案是：这些制度使得保护没有权力的人的财产权成为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民主的程序，不论是在合作的团体（例如行会和公社），还是在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国家中，民主程序都提供了一种透明的方式以改变“博弈规则”。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经常关注于如何发展高效的制度，但是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发展有效的路径去改变不理想的博弈规则。经济发展意味着制度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与此同时，制度总是有利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这可能不利于其他人；每一次博弈规则的变化都有失败者和胜利者。一个社会需要元规则（meta-rules）来改变制度，这些元规则必须透明，并且能让所有人都接受。民主的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在原则上可以被所有人接受，可以在元规则的稳定性和具有规则的灵活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这种平衡可能是最优的选择。这种情况正如丘吉尔的名言所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

从上述简单介绍，读者即可看到本书的大致内容和贡献。当然，要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唯一的办法是认真阅读此书。和许多过于注重细节研究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不同，本书内容丰富，气象宏大，文字简明扼要，把丰富的内容包纳到有限的篇幅中。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将会和我一样，在获得丰富的知识的同时，也得到很大的乐趣。林语堂曾说：“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

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19]对于那些渴望了解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读者来说，阅读此书就是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指引者。

此外，我还要提一提本书的译者隋福民博士。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年学者，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修养都很好。他在此书的翻译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准确表达了原著的意思，而且译文也流畅易读，从而为读者在阅读本书中文版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最后，衷心祝贺本书中文版的刊出。

李伯重

2015年元月

[19] 林语堂：《读书的艺术》，收入《博览群书》杂志选编：《读书的艺术——如何阅读和阅读什么》，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318—324页。

要使收入增长在一个社会中产生，大多数人必须经历他们为自己和后代所设想的种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且关于未来的梦想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引领他们改变行为方式，他们后代的数量，以及他们赋予后代的希望：他们分配时间的方式。换句话说……经济发展需要“百万个反叛 (a million mutinies)”^{*}。

——罗伯特·卢卡斯 (Robert Lucas), 2002

* 卢卡斯所说的“百万个反叛”来自英国 (印度移民) 奈保尔爵士 (V. S. Naipaul) 的著作《印度：百万反叛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奈保尔记录下的百万反叛，其实并非是真意义上的背叛和造反。它指的是印度人民在宗教、种姓、丑陋的印度教习性等方面进行抗争和偏激，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这些激进主张导致了印度人心灵的解放，心灵的解放促生了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感。——译者注

献给 Lenny, Bas 和 Joost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by Jan Luiten van Zanden

Copyright © 2009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5-201 号

《社会经济史译丛》书目

01 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

赖建诚 著

02 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

[美] 托马斯·莱昂斯 著 毛立坤 方书生 姜修宪 译 方书生 校

03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美] 托马斯·罗斯基 著 唐巧夫 毛立坤 姜修宪 译 吴松弟 李天锋 校

04 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

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荷] 皮尔·弗里斯 著 苗 婧 译

05 历史上的理学（修订版）

[美] 包弼德 著 [新加坡] 王昌伟 译

06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

[英] 科大卫 著 周琳 李旭佳 译

07 为什么是欧洲？

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美] 杰克·戈德斯通 著 关永强 译

08 看得见的城市

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

[荷] 包乐史 著 赖钰匀 彭 昉 译

09 制度变迁的逻辑

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

[美] 卞历南 著 [美] 卞历南 译

10 早期近代中国契约与产权

[美] 曾小萍 [美] 欧中坦 [美] 加德拉 编 李 超 等译

11 说狐

康笑菲 著 姚政志 译

12 刺桐梦华录

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 (946—1368)

苏基朗 著 李润强 译

13 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

[英] 罗伯特·艾伦 著 毛立坤 译

14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

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

[英] 彼得·罗澜 著 隋福民 译

15 延续、偶然与变迁

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

[英] E.A. 里格利 著 侯琳琳 译

16 近代中国的条约港经济

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的实证研究

苏基朗 [美] 马若孟 著 成一农田 欢 译

17 美国小企业史

[美] 曼塞尔·布莱克福德 著 刘 鹰 何国卿 等译

18 何以为家

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

[美] 胡其瑜 著 周 琳 译

19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 1000—1800 年

[荷] 扬·卢滕·范赞登 著 隋福民 译

目 录

图表目录	xxxiii
------	--------

导言：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1
----------------	---

第一部分 中世纪的基础

第一章 提出问题：有效率的制度在中世纪的出现	21
------------------------	----

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	21
-------------	----

利率的全球分布以及其他衡量制度效率的指标	27
----------------------	----

第二章 为什么欧洲经济在政治分裂时期出现了迅速扩张	39
---------------------------	----

导言	39
----	----

政治分裂影响了经济发展吗？	45
---------------	----

Mann—Berman 假说	52
----------------	----

Greif—De Moor 假说	61
------------------	----

对权力真空的第三种反应：封建制和庄园制	68
---------------------	----

与阿拉伯世界的简要对比	75
-------------	----

结论	80
----	----

第三章 中世纪知识经济兴起的反映：书籍产量， 500—1500 年（与 Eltjo Buringh 合作）	85
引言：书籍产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85
数据库和估计值	88
长期模式	93
欧洲的一体化：书籍产量的趋同	98
其他证据：读写能力与年龄集聚	104
结论	107

第二部分 欧洲内部的小分流

问题简介：欧洲内部的小分流，1400—1800 年	113
第四章 女性的能量：中世纪末期北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 欧洲婚姻模式（与 Tine de Moor 合作）	120
问题：Janne Heyndericx 和 Hajnal 的理论	121
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	124

Hajnal 的欧洲婚姻模式的典型特征	144
欧洲婚姻模式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150
父权制的回归	160
结论	165

第三部分 普通工人、哲学家和欧洲知识经济的诞生

问题简介：欧洲知识经济的诞生	171
工业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出现	171
第五章 普通工人的人力资本：从全球的观点看欧洲的 技能溢价	176
导言：技能溢价能告诉我们什么	176
20 世纪中期的技能溢价	178
欧洲：1300—1914 年	181
欧洲之外的地区	186
解释：作为投资的人力资本及其与利率的关系	189

培训制度的效率·····	195
与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关联·····	198
经济增长的影响·····	202
结论·····	205
第六章 哲学家与印刷机的革命·····	209
导言·····	209
古腾堡先生的经济影响·····	211
欧洲之外的书籍产量·····	222
缩小鸿沟：读写能力的提升·····	225
读写水平、技术形成和经济增长·····	231
结论·····	236

第四部分 迈向二元革命：国家形成和现代经济增长

第七章 国家形成和公民权：处于中世纪城邦和现代国家 之间的荷兰共和国（与 Maarten Prak 合作）·····	241
---	-----

简介	241
公民权的经济解释	244
一个悖论：税收、经济增长和国家的规模	251
案例研究：荷兰共和国	253
公民权的优势：广泛的税收基础	257
公共品：国家做了什么？	264
公民身份和英国 1640—1688 年工业革命前的历史	268
结论	272
第八章 北海地区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276
导言	276
争论：19 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增长还是停滞	278
英国：1086—1688 年	280
1000—1800 年间的欧洲经济增长	284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模拟：荷兰，1500—1800 年	290
英国，1500—1800 年	299
结论：早期现代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305

第五部分 两次大分流

第九章 阿拉伯世界、中国和日本	319
西欧之外的长期经济增长：阿拉伯世界	321
中国在 18 世纪的经济绩效和结构	326
日本：通往工业化的另外一条路	334
结论	340
结论：“百万个反叛”	343
附录 1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进一步实验： 意大利和西欧	355
附录 2 18 世纪中国人均 GDP 的估计	361
参考文献	365
主题索引	391

图表目录

表

表 1	城市化率的估计（生活在超过 10000 名居民的城市的人口比重）	40/50
表 2	西欧僧侣的估计数量（6—15 世纪）	44/54
表 3	每世纪手写本出版的绝对数量（6—15 世纪）	77/94
表 4	每年的人均写本书籍产量（每百万人口），6—15 世纪	81/98
表 5	低地国家和西欧其他地区的年龄集聚，15/16 世纪	88/105
表 6	1300—1800 年间欧洲建筑工人的技能溢价 （平均每 50 年为一个阶段）	155/184
表 7	根据《物料价值则例》得出的 1769 年的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 （两 / 天）	174/207
表 8	1451/1500—1701/1800 年间的读写水平发展的估计 （与 Allen 的估计相对比）	193/230
表 9	根据 Campbell 和 Lindert & Williamson 的研究得出的 1290 和 1688 年的英国的收入水平和结构的估计值（百分比）	237/282

* 图表目录标示的页码，斜线前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斜线后的页码为本书页码。——编者注

表 10	1500—1820 年间欧洲六国的人均 GDP 发展的估计 (英国 1820 年 =100)	241/286
表 11	欧洲 1300—1800 年间 GDP 和人均 GDP 的增长的预计 (平均年增长率)	258/307
表 12	1769 年建筑业工人的实际(稻米/小麦)工资 (升/天)	283/335

图

图 1	基本方法: 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	11/14
图 2	荷兰的长期利率 (<i>losrenten</i>), 1174—1550 年	23/28
图 3	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市场一体化	27/32
图 4	中欧地区手写本产量的变化估计, 1300/1309—1490/1499 年 (1300/1309 年 =100)	79/97
图 5	西欧地区每百万人口的书籍产量, 501/600—1701/1800 年	82/100
图 6	书籍产量和修道院数量, 6—15 世纪 (以对数表示)	83/102

图 7	欧洲对书籍需求的结构估计, 9—15 世纪	85/102
图 8	1400—1800 年间欧洲城市的非熟练建筑工人的 实际工资的估计	97/117
图 9	北海地区的平均工资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平均工资的对比, 1400—1800 年	98/118
图 10	现代早期欧洲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原因	148/175
图 11	建筑工人人均 GDP 和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 (大约 1950 年)	152/179
图 12	1300—1914 年间西欧、欧洲南部和中欧的建筑业 工匠的技能溢价	154/183
图 13	1300—1914 年间西欧、印度、爪哇和韩国的建筑业 工匠的技能溢价	158/188
图 14	技能溢价和人力资本报酬之间的模型关系; 三个 变量	161/193
图 15	1563—1766 年间安特卫普 (Plantijn) 的印刷工人、 排版工人和木工的技能溢价	164/195
图 16	1300—1800 年间技能溢价 (9 年的动态平均值) 和	

	英国人口的估计 (百万)	169/201
图 17	1326—1800 年间技能溢价 (9 年的动态平均值) 和意大利佛罗伦萨 / 米兰的人口估计 (百万)	169/201
图 18	1750 和 1820 年的建筑业工人的平均技能溢价 以及 1820—1913 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	172/204
图 19	1750/1820 年的技能溢价和 1913 年 (log 级) 的 人均 GDP	173/205
图 20	1450—1800 年间荷兰书籍的实际观察价格 (平均价格) 和模拟价格 (指数 1460/1474 年 =100)	181/215
图 21	1460—1800 年间荷兰书籍的实际价格的 估计 (指数 1460/1474 年 =100)	183/217
图 22	1454—1800 年间西欧不同国家新版印刷书籍	185/221
图 23	1500—1800 年间 (成年人口的比例) 荷兰、英国 和法国的读写水平发展的估计	191/228
图 24	1750—1800 年间的人均书籍产量与 1820—1913 年间 的人均 GDP 的增长	198/234
图 25	1750—1800 年间的人均书籍产量与 1913 年的人均	

	GDP	198/235
图 26	1500—1800 年间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人均税收 (用建筑业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来衡量)	218/257
图 27	荷兰的实际工资: 估计值和模拟值, 1510—1805 年 (指数 1510/1514 年 =100)	247/294
图 28	荷兰的人均 GDP: 点估计值和模拟值, 1510—1805 年 (1510/1519 年的莱茵盾)	248/295
图 29	荷兰在 1510—1514 到 1800 年间的实际租金: 实际发生值 (开放型经济) 和模拟值 (封闭型经济) (指数 1510/1514 年 =100)	250/298
图 30	英国: 实际工资和模拟以及预计的工资, 1500—1800 年 (指数 1500 年 =100)	252/300
图 31	英国的人均 GDP: 点估计值和模拟值, 1500—1800 年 (指数 1500 年 =100)	254/302
图 32	英国的土地租金: 实际发生值 (开放的经济) 和 模拟值 (封闭的经济), 1550/1559—1790/1799 年 (以固定价格计算, 1550/1559 年 =100)	255/304

图 33	模拟的人均 GDP：欧洲、意大利和英国，1300— 1800 年（英国 1800 年 =100）	258/307
图 34	1500—1820 年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人均 GDP 指数（英国 1820 年 =100）	272/324
图 35	中东、雅典、罗马和英国 1500 年前的以升小麦 计量的实际工资	274/325
图 36	1710—1859 年间 14 个日本市场的稻米价格（以银计算）	285/336
图 37	日本稻米价格共变与距离的关系，1710—1859 年	286/338
图 38	意大利：模拟的和估计的实际工资，1300— 1800 年（指数 1300 年 =100）	302/356
图 39	意大利：模拟的和估计的人均 GDP，1300— 1800 年（指数 1300 年 =100）	303/358
图 40	欧洲：实际工资、估计工资和模拟工资，1500— 1800 年（指数 1500 年 =100）	305/359

导言：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1

肇始于 18 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即使真的得到了提高，也是在以一种极其费力的缓慢形式进行着的。在 1820 年之后的两个世纪中，全世界人口的实际平均收入从 1820 年的 667 美元增加到了 1913 年的 1512 美元，在 2000 年又进一步达到 6000 美元（全部以 1900 年的国际美元计算）。更重要的是，在工业化国家中，从 1800 年到今天，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 15 至 20 倍（Maddison, 2001）。1800 年以前的经济扩张，在绝大部分时间只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尽管在部分地区——如宋代中国、罗马帝国、公元 800—1100 年的中东或中世纪的意大利——或许存在着实质性和半永久性的人均 GDP 增长，但在 1800 年以前，这些增长阶段却总是在经历少数几代人后便逐渐消失了。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陷入了“高水平的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之中，Mark Elvin（1973）提出了这一概念，用于描述中国宋朝之后的社会经济

发展特征，即在一种“高均衡水平上停滞”^{*}。简言之，1800年之前的经济变革并没有产生累积性的增长（cumulative growth），累积性的增长仅为19和20世纪所独有（Clark, 2007）。

工业革命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突破，而且，同样明显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设法参与到这一开始于18世纪的经济技术发展进程中的程度。“现代经济增长”完全是工业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概念由西蒙·库兹涅兹（Simon Smith Kuznets, 1966）提出，用于描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经济结构性变化过程。^{**}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与之相连的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中的变化，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地扩散到了西欧和北美地区。19世纪下半叶，日本加入了由这些正在经历着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所组成的“趋同俱乐部”^{***}，1945年之后，“亚洲四小龙”也紧随其后，成为工业化社会。

2 现代经济增长进程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扩散到了亚洲的大部

^{*} 伊懋可（Mark Elvin, 1973）在《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有较好的市场制度，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能够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从而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但是这也使得中国人口增长很快，其结果就是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这种禀赋结构使得对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需求不足，从而没有推动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因此没有在中国发生。关于这一理论最简单和精练的概括，可参见 Daniel Little, *Micro 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hapter 8,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pp. 151—169,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译者注

^{**} 库兹涅兹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现代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他对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做出长期统计，然后对各国经济增长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库兹涅兹的分析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译者注

^{***} 俱乐部趋同是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一种类型。根据 Barro 和 Sala-i-Martin 的经典定义，俱乐部趋同（club convergence）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等方面都相似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即达到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人们根据各国经济增长的截面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那些基本经济特征和初始条件类似的国家划分在一个样本或群体中，比如 OECD 国家或非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国家，以此描述它们的群体趋同特征。俱乐部趋同的结果是形成趋同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译者注

分地区；现在，中国、印度，以及亚洲的其他地区正在开始快速赶上。在工业革命掀起初次波澜之后的二百年中，世界上超过半数的人口已被卷入了这一现代经济增长进程（Földvari and Van Zanden, 2006）。但在同时，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相对缓慢的传播速度，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现象的极大增加，后者已成为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工业革命在使得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口享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收入与生产的极度不平等。

工业革命将那些收入极低，并长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与另一些国家区别开来。在那些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地区的发展的模范。对于其受益者来说，工业革命导致了贫穷与繁荣之间的巨大差别。这是一场发生于 18 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历史中的激烈变革，而理解它的起源和原因，已成为经济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什么力量引起了这一激烈变革？它是由 18 世纪在英格兰发生的，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的精巧机械的大量出现和创新的突然增加所引起的吗？它是 1688 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之后采用的一系列更有效率的制度，如金融制度的创新（长期公共债务，中央银行），或是用以保护发明和创新的专利法所产生的结果吗？或者说，农业部门才是经济变革真正的动力，它促使劳动力从乡村流向迅速增长的城市？又或者，它是否根源于在 1492 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重组了世界经济格

* 光荣革命是英国一场与基督教有关的非暴力宫廷政变，发生于 1688 年到 1689 年。这场革命未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当时，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为了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在废黜国王之后，他们把王位传于原本的继承者，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威廉带兵进入英国，未发一枪，便使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后成为威廉三世。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译者注

局的西欧帝国主义扩张过程，因而“西方”成了新格局的有活力的增长中心，而“其他地区”沦为了停滞不前的外围地区？

在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工业革命的研究集中于 18 世纪期间英国所发生的事件：哪些技术的、经济的，以及制度的改变加快了 1780 年之后出现的工业增长（Deane and Cole, 1962；Deane, 1965）。一些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工业增长的加速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或低地国家？变革到底出现在 1760 年，还是 1780 年之后——甚至晚于 1830 年？哪些行业和技术为工业增长突如其来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动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工业革命的概念被逐步地拓宽了：我们现在了解到，农业部门、运输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革命与政治上的革命和工业上的革命是同时发生的，甚至可能先于工业化而发生。

此外，已经变得较为清楚的是，这一场“革命”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突然激增，而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加速增长，并不能完全用一场“革命”来形容（Crafts, 1985）。“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通过劳动力将农业活动与面向世界市场的工业活动结合起来的乡村的、小规模工业——被认为是促进工业和人口增长的一种动力，这一增长先于产业转型而出现。^{*} 伦敦所具有的催化剂般的增长引擎作用得到了加强；它促进了城市对农村的需求，也集

* 这一发展过程也被大多数历史学家称之为“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原始工业化”理论由门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于 1969 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18 世纪佛兰德的工业化和人口压力》中首创。门德尔斯给原始工业化的定义是：“主要是一种农村制造业活动的扩张”，这种制造业的“‘绝大部分’劳动力由有地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劳动者组成。不管有没有土地，他们在夏天通常都从事农业劳动，而不是亚麻布制造”（1972）。原始工业化有别于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ization），前工业化一般是指 18 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与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和文明。而原始工业化作为一个术语，“用来定义欧洲 16—17 世纪的农村工业作为现代工业最早的或原始的形式状况”。也有人将原始工业化的时间定于更早（14、15 世纪）或更晚（17、18 世纪）。在门德尔斯看来，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

中体现了亚当·斯密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分工。这是从16世纪起就对英国起着改变作用的经济增长源泉之一（Wrigley, 1967）。

消费模式的变化：新型消费品的出现，诸如咖啡、茶叶和棉衣；家庭决策过程的潜在变化也很重要，它使大部分人群能够获得这些新产品。这些变化可能引起家庭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劳动投入，从而形成一场或许推动了工业化发展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De Vries, 1994）。

最后，North和Weingast提出，工业革命的先决制度条件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的几十年中就已得到建立。英国在这一时期吸收了形成于欧洲大陆上的金融制度，并确立了议会制度，从而能够对国王的行为加以约束（North and Weingast, 1989）。

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关于工业革命起因的讨论，在八九十年代发展成了关于近代早期阶段（1500—1800年）欧洲经济活力的争论。欧洲经济的活力导致了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远距离贸易和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部门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此外，经济发展（至少在一些事例中）与国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对工业革命的起因的新的看法，来自

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译者注

* Jan de Vries, 荷兰历史学家，“勤勉革命”论的首倡者。“勤勉革命”一词本不是Jan de Vries的发明，而是日本学者Akira Hayami最先于1967年提出的，1986年第一次用英语表述，其意是指走向工业化的劳动集约型路径。1992年，Akira Hayami还系统论述了“勤勉革命”。Jan de Vries提出“勤勉革命”是为了替代“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因为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很多缺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勤勉革命”含义与日本学者的“勤勉革命”已经不同。Jan de Vries的“勤勉革命”指的是在家庭消费欲望的驱使下，一个家庭中的劳动投入会比以往更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劳动时间加长和妇女儿童参加劳动，这既能增加市场上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又可增加对商品的市场需求，由此推动了经济发展。“勤勉革命”先于“工业革命”产生，又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译者注

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现代主义者的反抗 (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就像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Jan de Vries (1994) 描述的那样。他们认为，欧洲经济，特别是西北欧的经济，在 18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就已开始不断扩张。工业革命因此可以被解释为一段经济扩张过程的顶点——这一过程开始于 16 世纪，或者更早，开始于中世纪 (见 Van Zanden, 2002a 对其所做的评论)^{**}。于是，一种全新的正统观点产生了：西欧，特别是与北海接壤的地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便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它更有活力，更具竞争性，并且更富有创造性。许多著名经济史学家赞同这种新观点并加以普及，例如 Eric Jones (1987)，Angus Maddison (2001)，以及 David Landes (1998)。

但是，那些早期现代主义者并没有真正解释所有有关欧洲经济活力的起源问题。这种修正主义路线 (revisionism) 中最富有勇气的一个尝试^{***}，即 Jan de Vries 和 Ad van der Woude (1997) 对被他们描述为“首个现代经济”的荷兰共和国所进行的富有创意的研究，但他们并没有解决如下问题：这些被他们认为对荷兰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相对更具现代性的制度，是在何时，以及在何种原因下产生的？事实上，作为他们的故事起点的经济结构及社会—政治结构，

* 与之前的大多数学者将工业革命理解为一场“突变”不同，早期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工业革命理解为欧洲经济本身的“渐变”，内生于欧洲的经济、制度、文化等。——译者注

** 中世纪 (Middle Ages) (约 476—1453 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主要是西欧)，自西罗马帝国灭亡 (476 年) 数百年后起，在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1453 年) 之后，资本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中世纪”一词是 15 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当然，这些传统观点与本书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译者注

*** 把欧洲经济的活力追溯到 1800 年之前的数个世纪，这个突破在此似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译者注

在这段时期的开端就已极具现代性；举例来说，在16世纪初的荷兰，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5%左右，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之中（Van Zanden, 2002b）。这些现代结构和制度从何而来？

同样，关于利率水平长期演变过程的研究——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它是反映制度结构好坏的一项重要标志——发现，最重要的变革已经在1350—1450年间发生了（这期间，欧洲许多地区的利率由10%—12%下降到了5%—6%）（Clark, 1988; Epstein, 2000）。中世纪晚期欧洲利率的下跌似乎是一个更普遍过程的一部分：以Peter Lindert为首的一群学者通过对长期相对价格和工资进行研究，提出了新的关于西欧经济显著特征的假说。Lindert等学者（2002）的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认为“西北欧地区在非农业生产率增长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在资本品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发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该论文推测，资本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在该地区已经相对低廉，与此相关，利率水平在该地区也相对较低；反之，农产品和食物（土地）的价格则相对较高（Lindert et al., 2002）。因此Lindert等学者推测，可能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5
欧便已在需要大量人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高技术产品方面拥有了比较优势。

在评议一次关于工业革命根源的讨论中，笔者呼唤一场“中世纪学者的反抗”，去分析并说明为什么早在公元1500年以前，作为近代转型之基础的相对现代的经济制度就已存在（Van Zanden, 2002a）。这些新制度的实质性突破发生于何时？哪些人（或哪些组织）制定了这些后来成为欧洲经济与社会典型特征的新博弈规则——为什么制定它们？在公元500—1500年间，哪些发展解释了该时期西欧的经济扩张？

本书研究工业革命“深层次的”，或者说，最根本的起因，并

旨在表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事实上笔者认为，中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比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富有活力。在公元900—1300年间的大繁荣时期，增长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人口的大幅增长与人均实际收入的长期提升之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1500—1800年间，增长却局限在了北海地区——16世纪的佛兰德斯（Flanders），黄金年代的荷兰，以及大约1610年之后的英国（和苏格兰）——而在同一时期，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最好的状况也就是停滞不前。本书的目标之一便是解释这种增长模式的改变——即，为何1300年以前发生于整个欧洲的增长，在1400年之后却只集中于北海地区。

这能够解决有关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突破）之起源的三种不同争论：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争论^{*}，人力资本形成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所起的作用的争论（这一争论由内生性增长理论所引发），以及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为了表明本研究的贡献，有必要对这些争论做一简要回顾。

工业革命源于之前几个世纪的缓慢积累这一观点，近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其中，最著名的是Roy Bin Wong（1997）、李伯重（Li，1998）以及Kenneth Pomeranz（2000）。他们认为，1800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参见史建云撰写的书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译者注

年以前的欧洲并非十分“与众不同”。中国，可能还有亚洲的其他部分，与欧洲的增长轨迹并无二致；并且在18世纪，欧亚大陆上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率极其相近。根据他们的观点，1800年之后欧洲增长的决定性的加速——Pomeranz称之为“大分流”——并不是由于增长潜力中存在着根本区别，因为两个地区在1800年之前都经历了一种相似的、被称为“斯密型增长”的过程，并且市场和制度也同样发达。恰恰相反，欧洲，特别是英国在1780年后的惊人表现，应归功于两个几乎完全偶然的因素：一是价格低廉且现成的煤矿资源，这使蒸汽机革命得以产生；二是广大殖民地的占有保证了诸如棉布和食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廉价供应，从而减轻了土地约束。另一方面，在中国，煤矿资源的不利分布使之无法被轻易运输至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增长中心。此外，中国只能使用本国的土地资源去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它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并不像英国（和荷兰）那样，有着大量可以利用的“幽灵土地（ghost acreages）”，即殖民地资源（见Vries，2001对这些观点的评论）。通过将工业革命置于这种比较背景之中，Pomeranz（2000）再一次将其视为18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突变。另外，以从突变这一角度出发去比较世界不同地区的增长轨迹为目的，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史”的发展（Brenner and Isser, 2002; Pomeranz, 2002; Broadberry and Gupta, 2006; Allen et al., 2005）。

这些新观点迫使我们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欧洲的发展轨迹，并将这一地区的表现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加以比较，同时，它还导致了如何为这种比较提供基础支撑的问题。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制度还比较缺乏“效率”时，欧洲的制度已经开始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适当的刺激，是否可以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定量检

7 验？或者，这样一种探究是否能够支持 Pomeranz, Wong 和 Li 的主张，即制度和市场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印度，中国，日本和西欧）同样富有效率？并且，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衡量日本、中国或印度的经济表现，并与西欧地区加以比较呢？

第二个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学家也已经开始研究这一历史中的主要突破（断裂）；他们同样对此提出了解释，并建立了有关其可能过程和原因的模型，这些模型对可能导致工业革命的长期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Lucas（2002）等新增长理论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人口模式的改变等因素上，但这些却并未成为新近的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第一代增长理论倾向于将关注点放在资本积累和（外生的）技术变化上，并将它们作为增长的主要因素；著名的 Solow（索洛）模型（1956）是这一方法的最好例证。由 Lucas（1988）和 Romer（1986）所阐述的外生增长理论集中于对其他因素的研究。从该理论的视角看，这是一个人力资本形成与知识积累在工业革命之前何时，何地，以及因何而开始加速的问题。更近期的发展是统一增长理论，该理论正在对 1800 年前世界的“稳定性”以及后来的加速增长的可能原因提出新的观点（Galor, 2005）。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原理，用以解释 1800 年左右发生的生长模式的激烈变革。一种方法集中于人口模式的改变，它假定家长会以下两种模式间做出选择：其一是拥有许多子女（最大化后代数量）；其二是拥有很少的子女，但对他们进行大量投资（最大化后代质量）。该观点的支持者将工业革命的产生看作是人口模式改变的结果，这一改变以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形成成为特征，即更多地关注后代的质量，而不是数量（Becker, Tamura and Murphy, 1990；Lucas, 2002）。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随即引发了对新技术的探索，

从而使人均产出得以增长；而那些最大化人口数量的社会最终则会遭遇马尔萨斯陷阱的约束。这种方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将经济增长——工业革命的起源——与微观层面上的家庭行为联系在一起（参见 Lucas, 2002）。但迄今为止，经济史学家们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发生于 1800 年前几个世纪的人口结构变化（Mokyr, 1990；Clark, 2007）。但在这里我将说，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在北海地区，一种新的人口模式，即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确实出现在了中世纪的晚期阶段。总体上来说，这种人口模式是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以及对市场交换的大量参与为特征的。它使北海地区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地区之间产生了差别：西部地区在 1400 年之后仍保持着发展，而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见第四章）。

本研究的目的是将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与经济史联系起来。^{*}尽管新增长理论对工业革命的起因形成了新的见解，但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却忽视了，或者干脆拒绝接受其对工业化过程的解释。本书的目标并不在于尝试通过建立新模型去解释工业革命以使两者一致，而在于研究 1800 年前的几个世纪中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的发展方式。这一研究基于大量新近的，关于知识经济的重要构成因素的数据库，并提出如下假说：与外生增长理论（以及

* 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罗默（P. Romer）、卢卡斯（R. Lucas）等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的研究潮流。新增长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地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比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译者注

统一增长理论)相一致,知识积累的增长,以及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的增加,是先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而发生的。由于用来分析人力资本的标准数据——如识字率和教育程度的估计值——通常难以获得,因此本书将采用一系列替代性的定量指标,如书籍生产数量和技能溢价,来反映人力资本形成的长期发展过程。同样,这些指标也能够用来将欧洲的经历置于一种比较视野之中,从而建立一幅关于全球教育成就水平的图景。

第三个重新评价工业革命之前历史的理由是与另一理论方法,即新制度经济学的实用性相关的,这一理论由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发展起来,用于分析和理解长期经济绩效。正如 Douglass North 表明的那样,该方法的起点是:一个社会必须安排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相互合作与交往的方式。社会需要(或者实际上拥有)“制度”,比如国家颁布的法律(用来保护生产者的财产权),以及协调相互交往行为的非正式规则(行为模式)。假如这些制度相对富有效率——如果它们增强了信任,从而使财产权得到保护——那么实施契约的成本就会相对低廉,市场便会繁荣。另一方面,如果国家的行为具有“掠夺性”——如果统治者对他统治的居民进行掠夺——或者,如果财产权并未得到尊重,且并不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对市场交易行为的激励便会很小。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将倾向于进行自给自足生产,经济发展便会受到阻碍。总之,这是一个关于社会能否形成一套适当的竞争规则去鼓励交换和市场生产,从而使专业化和增长成为可能的问题。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即对西欧工业革命成因的解释——发展这一假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1800年前西欧采用的某些主要制度创新及对效率的影响。最成功的例子或许是 North 和 Weingast (1989)对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资本市场制度变化的分析。William 和 Mary 登基时引入了新的“博弈规

则”，这暗示着议会取得了对国家金融业的控制，英格兰银行等新型机构也得到了建立，用以维持国王和议会间的新的权力平衡。这些都使国家变得更值得信任，并刺激了金融革命的发展，包括低利率长期债券的建立。

这种方法通常导致对某些制度——商业和工业行会，定期集市和其他类型的市场，公社，以及农业活动中土地使用权的不同形式（如租佃分成制度）——的效率和效果进行分析。它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几乎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以上制度是富有效率的，这与那些通常认为它们（例如行会和庄园）并不十分有效的早期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肯定行会，租佃分成制度，以及封建制度的特定方面甚至奴隶制度的作用，这些研究对重新评价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经济状况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研究者想要指出的那样，这几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比以往学者所想象的更具有“理性”，也更富有效率。批评者争辩说，这易于使我们认为“存在即合理”，或者，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就像 Voltaire（伏尔泰）小说中的哲学家 Leibniz（莱布尼茨）教给 Candide 的那样（见 Ogilvie, 2007）。然而，事实上制度有时会极其缺乏效率，但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却并未对有效制度与无效制度的区分给予足够的关注。在下一章中，我将提出另一种方法来研究制度的效率问题，并关注于一系列可以被量化的特征。这将使我们能够衡量西欧制度结构效率的各个方面，并与世界其他地区加以比较，并由此表明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为何变得“不同”，这一变化开始于何时，以及“不同”到了何种程度。

作为本研究的基础的分析框架可以概述如下（图1）。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我的兴趣在于制度的效率（见第一章）以及起源：这些西欧特有的制度出现于何时，以及因何而出现；第二章

10

(950—1300年)，第四章(1300—1500年)，以及第七章(1500—1800年)会以不同的方式论述这一主题。研究这些制度如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影响是本书的另一重要目标：第三章绘制了中世纪人力资本增长的图表，第六章和第七章将内容延续到了1800年。我将论证：制度变革与人力资本形成方式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并在第三章和第八章中对此加以衡量；第八章还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的问题。基本上，每一章都包含与欧洲之外的地区的详尽比较，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或者中东。第九章会更为系统地回溯考察这些对比，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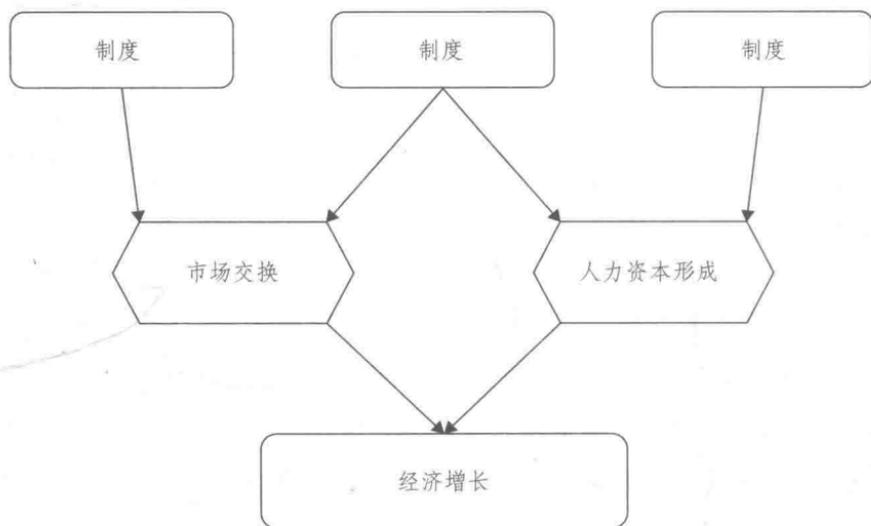


图1 基本方法：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

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新近获得的，试图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的数据。在量化研究当中，本书展示了：

- 西欧及其他地区的制度效率的衡量；
- 西欧及其他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程度，以及投资于知识和思想的程度的衡量；
- 西欧（部分）地区和欧亚大陆部分地区经济绩效的衡量。

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将欧洲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之中；欧洲究竟是否真正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并且，假如真的如此，那么在何时出现了明显差异？这些重要问题只有在对制度效率，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的各种指标体系进行详尽的定量比较之后才能得到回答。同时，这一方法将使我们能够研究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以及人力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本书所希望证明的那样，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便在所有三个方面（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都具有突出的表现（但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优越），特别是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极为抢眼的北海地区（英国和低地国家）。因此，本书将对这一地区给予格外的关注。然而，佛兰德斯、布拉班特（Brabant）、荷兰和英格兰等经济体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所取得的成功，都深深根植于中世纪鼎盛时期形成的制度之中，在这段决定性的转型时期，西欧作为一个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体出现了。 11

本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知识经济何时出现于西欧，并对其原因进行解释。知识经济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实用性”知识，进而引发一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Mokyr, 2002）。哪些长期过程和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思想的积累，以使西欧确实能够经历这种向知识经济，进而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我们将长期地追溯这段历史过程，从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的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公元900—1300年，这段时期发生了一场遍及全欧洲的经济扩 12

张，拉丁西部（Latin West）的基本制度也建立于这段时期（Part I）。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于中世纪晚期（1300—1600年）：在欧洲的北海地区仍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却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减缓。我们试图通过对微观层面进行研究，以解释这种“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现象：婚姻模式，以及家庭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Part II）。第三部分考察了1400—1800年间知识经济在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独有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知识积累过程，并构成了北海地区在18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具有的强大经济表现的历史背景。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这段历史过程延续到了18世纪晚期的“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并继续对制度（如公民身份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双元革命”这一术语由Hobsbawm（1962）提出，意指政治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与工业化导致的经济革命相结合，它们分别发生于英吉利海峡两岸——这是一场结束1000—1800年间的制度和经济长期变革过程的双重“隆重收场”（grand finale）。* 一方面，我们想精确地确定现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变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进程始于何时。另一方面，基于对荷兰共和国所进行的案例研究，我们研究了近代早期的市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重构中世纪制度下的村社“公民”与1789年后形成的现代公民之间的联系（将历史延续至法国大革命）。在第五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西欧的发展与欧亚大陆

[1] 然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还应被置于一种更广阔的政治变迁背景中，即大西洋革命（Palmer, 1959）。它开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并结束于18世纪20年代早期的拉丁美洲解放战争。

* “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这本书中提出，指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译者注

其他地区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并试图确定西方的崛起究竟有多么“特殊”。此外，本书的每一部分都将从一段简短的陈述开始，其内容与该部分中特别提到的问题有关，并试图在随后的章节中对该问题加以论述。

致 谢

本书的观点最初形成于分析经济发展长期变化的不同方面的一系列论文之中，其中一些论文是与我的同事合作完成的（Joerg Baten, Eltjo Buringh, Tine de Moor 和 Maarten Prak）。我将这些论文改写成了不同的章节，从而使它们更符合全书的整体结构。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同事们致以谢意，特别是 Maarten Prak 和 Tine de Moor，他俩一直是我学术上的“辩论对手”，并对本书观点的形成做出了许多贡献（当然，余下的错误由我负责）。我同样要感谢所有参加了2004—2007年由 Patrick O'Brien 创建的 GHEN（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共同举办的四次乌得勒支世界经济史大会的学者；这为我提供了平台，以便讨论成为本书内容的论文，并使我从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那里了解到了许多论题，它们在本书阐述的方法中具有重要作用。^[2] 我特别要感谢 Bob Allen, Gareth Austin, Joerg Baten, Maarten Bosker, Eltjo Buringh, Bas van Bavel, Dan Bogart, Peter Boomgard, William Clarence-Smith, Greg Clark, Floris Cohen, Metin Cosgel, Clare Crowston, John Devereux, John Drobak, Jessica Dijkman, Josef Ehmer, Oscar Gelderblom, John

[2] 这四次会议的主题分别是：“建立价格和工资的世界史”（2004）；“要素市场的兴起，组织及其制度结构”（2005）；“行会的回归”（2006）以及“法律与经济发展”（2007）；所有论文仍可见 <http://www.iisg.nl/hpw/conference.php>。

Haley, Seong Ho Jun, Najaf Haider, Phil Hoffman, Timur Kuran, Bas van Leeuwen, Bozhong Li, Peter Lindert, Ghislaine Lydon, Debin Ma, Paolo Malanima, Deirdre McCloskey, Luca Mocarelli, Christine Moll-Murata, Mary Louise Nagata, Larry Neal, Patrick O'Brien, Sevket Pamuk, Ken Pomeranz, Jaime Ries, Jean-Laurent Rosenthal, Tirthankar Roy, Osamu Saito, Johan Söderberg, Hugo Soly, Oliver Volckart, Marianne Ward, Roy Bin Wong, Harriet Zurndorfer and Jaco Zuijderduijn 等人对讨论所做出的贡献——以及 Larry Epstein, 他在一次研讨会中审阅了本书的第二章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 他在研讨会结束不久后就于 2007 年初突然去世, 这使我感到无比悲伤。Peter Koudijs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资料收集上对我帮助很大, Bas van Leeuwen 协助完成了一些基础性论文中的计量工作, Sarah Carmichael 编辑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在本书的初稿完成后, 我与 Maarten Bosker 和 Eltjo Buringh 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 内容涉及 800—1800 年西欧与阿拉伯的两种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 这篇论文似乎印证了本书阐述的观点; 与两位合作者的讨论也有助于我澄清本书中的一些论点。

最后要谈谈有关地理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本关于西欧的书, 如果从彼得堡 (Petersburg) 到的里雅斯特 (Trieste) 划一条线, 那么本书所指的西欧便是这条线以西的地区, 依照 Hajnal (1965) 的观点, 这片地区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其人口制度。对西欧的这种定义与“拉丁西部”的概念相一致, 该地区受到了发生于 900—1300 年间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强烈影响。本书将多次提到的另一重要地区是北海地区, 在这里是指低地国家和英国; 由于本书第二部分将阐述的原因, 西欧的这片地区在中世纪晚期出现了特有的繁荣。

第一部分

中世纪的基础

第一章 提出问题：有效率的制度 在中世纪的出现

17

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

Douglass C. North (道格拉斯·诺思)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了广泛的重新评价。受其影响, 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框架的质量对其经济绩效具有直接的影响。正如引言中所说明的那样, 这种方法的核心假设是有效率的制度(“约束行为的规则” [“rules that constrain behaviour”]) 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从而促进市场交易和专业化,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检验这种假说的方法是建立一套能够衡量制度效率的方法, 并将其结果与可观察的经济表现联系起来。然而, 该领域中的大部分研究却都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制度, 如商业和工业行会, 以及财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制度所谓的有效性之上(租佃分成制度 [sharecropping] 的效率如何?), 或是集中于公地制度 (commons) 的效率, 以及该制度在圈地运动 (enclosures) 后的废除。典型

地，该领域中的新文献认为，如果对那些以往被看作是“保守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如行会和公地制度，庄园制（manors）或租佃分成制度——进行更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事实上出乎意料地富有效率。以行会制度为例，行会制度保证了知识和技术在一代代人之间（以及通过熟练工人的流动在地区之间）的有效传递，保持了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稳定，保障了产品质量（这对国内消费和出口是必需的），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税收的有效来源（Epstein, 1998）。另一些人则认为以上说法言过其实，他们认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m）忽视了诸如行会等制度的“阴暗面”（“dark side”）——即，它们会排挤外来者（例如女性），垄断市场并试图抑制创新行为（Ogilvie, 2007）。

18 这种方法试图确定不同制度体系的效率，但其问题之一是，由于所有制度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它们是相互依赖并相互联系着的。而且，在具体的制度与它们应当解决的“问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特定制度（如商业行会）通常与不止一个问题相联系，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某一具体制度往往也会对其他问题的处理方式产生影响（Gelderblom, 2008）。

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衡量单个制度对交易成本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即使可行，也是非常困难的。最近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用于衡量制度成就的定量标准，几乎全部是反映市场有效性程度的代理变量（proxies）；因而它们衡量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制度的效果，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导致市场表现良好或不佳。因此，它们并不真正衡量某项个别制度的效果。对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长期影响的讨论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评估其影响的不同方法导致了对其成就的两种极端不同的估量，或是根本没有得

出结论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 参见 Clark, 2007)。问题的关键在于: 特定社会中的制度构成了一套或多或少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制度系统, 从而几乎不可能衡量某个个别的“博弈规则”(“rules of the game”)的效率, 并评价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 为了检验相关理论文献中提出的制度与经济绩效的联系, 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确定制度系统整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不是试图确定任何特定制度的影响。

考虑到有关“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争论, 我们可以将上述问题明确为一个关于分别支配着欧洲和亚洲经济生活的制度系统的相对效率的问题。问题由此变为: 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的制度来评价西欧制度的相对效率? 并且, 如果西欧拥有相对高效率的制度, 那么它们出现于何时, 原因又是什么?

相关文献提出了许多方法来评价体制框架的质量对经济的影响, 尽管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的成果为数极少。^[1]在这里, 我们打算建立具体的综合度量指标, 用以评估社会制度框架的效率, 并借此确定西欧的制度效率, 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制度框架的比较结果。有三组指标成分(elements)可用于测定制度的效率。^[2]

第一组指标包括如下成分, 这些成分能够衡量制度对财产权的保护程度及其对商业信用发展的促进程度:

■ 利率可能是反映制度在特定社会背景中保护财产权(债务人

[1] 衡量当前制度效率的各种不同指标, 见 Acemoglu and Johnson (2005)。然而, 这些指标并不能被轻易地用于历史研究。

[2] 衡量不同种类制度的效率的第四种方法在 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中有所阐述, 它同样使区分“横向”制度(“horizontal” institutions)和“纵向”制度(“vertical” institutions)成为可能。

和债权人的财产权)和扩大社会信用规模的程度大小的经典指标。因此,利率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反映制度框架质量的**最佳代理变量**(North, 1981; De Soto, 2000; Reis, 2007)。^{*}

利率并不总是易于观察(由于缺乏资料来源);与利率相关的间接指标有:

- **技能溢价 (skill premium)**, 即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的工资差额, 它与利率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在第五章中, 我们将会看到, 技能溢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对(例如)学徒期收入的放弃, 以此换取培训结束后的高收入; 当利率较低时, 相对较低的技能溢价便足以使这项投资变得合算(然而, 在第五章中我们将会看到, 技能溢价也能够衡量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有效程度); 简言之, 较低的技能溢价反映了个人对通过技术培训获取未来收益所持有的信心。
- **谷物价格的季节性变动**, 它同样可被看作是对利率(及相关仓储成本)的反映, 见 McCloskey and Nash (1984) 的开创性论文。^[3]

20 第二组指标用于衡量经济体的市场一体化程度, 相关假设认为,

* 原文为低利率, 但作者认为此处应该为利率。——译者注

[3] McCloskey and Nash (1984) 的假设认为, 利率越高, 秋收后用于存储谷物的费用就将越高, 谷物价格的季节性波动也将越大; 事实上, 谷物在 $t+1$ 月的价格将是 t 月的价格与月利率以及额外的仓储成本之和; 也可参见 Poynder (1999)。

有效率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导致高程度的市场一体化。直接衡量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有：

- （年度）价格的变动（variability of prices），反映了市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贸易缓和其受到的冲击：总的来说，在交易成本较低和贸易规模较大的市场体系中，价格的变动程度会相对较小，因为市场受到的冲击很容易被贸易所吸收。反之，在不发达的市场体系中价格的变动程度则会较大。
- 价格的趋同程度（convergence of prices）：这是衡量市场间的联系程度和相互牵制程度的指标——高度的趋同意味着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反之亦然；Studer（2007）在一项对18和19世纪的印度粮食市场的分析中，用对市场效率进行评价的不同指标——市场的变动性，或是市场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得出了极其相似的结论，这表明这些指标全部都与基本制度（underlying institutions）的效率有关。

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关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历史研究衡量的都是粮食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过，相似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并且已经被运用到了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之中（例如 Neal [1990] 关于18世纪的研究）。

或许还有第三组用于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即要素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中，家庭成员能够通过两种方式维持生计：成为工资劳动力，或是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与市场“保持距离”（at arm's length）。交易成本的高低（部分地）决定着人们的选择：当要素市场表现疲软且不可靠，并且市场信心不足时，即简言之，当市场交易成本很高时，第二种方式将会更具吸引力，

而在市场运行极佳的情况下，第二种方式的吸引力便会相对较低。因此，如果很大一部分人口都积极地参与到了劳动力市场中，这就可能意味着制度是富有效率的，且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基于相同的逻辑，人们对资本市场的参与程度（通过储蓄或借贷）或许也是其效率的一种反映。

理论上，所有这些标准预计都将指向大约同一个方向：一旦制度富有效率且交易成本较低，依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就会出现低利率，高水平的市场一体化以及密集的市场（dense markets）。能够扩大市场交易规模的要素之间似乎同样存在着相互巩固的作用。经济学理论假定声誉机制（reputation mechanisms）对持续性的交换行为十分重要——它是任何市场经济中都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制度要素（Greif, 2006）。*声誉机制促使人们表现良好（遵守承诺并信守契约），因为人们害怕由于违背承诺而被未来的交易排斥在外，其约束效力则取决于（从参与者所在的关系网得出的）预期未来交易的数量，以及利率（它将交易的未来值转化为现值）。总之，当利率较低且未来交易的现值较高（因为利率低），以及当人们预期未来会产生大量交易时，他们将倾向于表现良好，并通过行为加强自身信用。因此，市场交易的总体水平，特别是利率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贸易网络的效率（如果这种理论方法是正确的）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信用的发展程度（更为详尽的分析，见 Grantham, 1999）。由此同样可以得出，在从不活跃市场和高交易成本到高市场参与程度以

* 声誉简单地讲，指声望和名誉。企业家声誉是对企业家能力、经营业绩、公众关系以及履行承诺契约水平和社会地位的评价。企业家声誉包括两处方面的：一是企业家的个人声誉，包括企业家个人信息的媒体披露的可靠性、企业家个人荣誉、企业家行为的道德水准等等。二是由企业家行为引发的企业社会声誉。声誉机制指构成对企业家声誉进行评价的社会关系。声誉机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企业家声誉的评价内容；二是构成对企业家声誉进行社会评价的机制。——译者注

及低交易成本的长期移动过程中，或将存在多重均衡模式。举例来说，一些观察发现，东南亚地区似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处在不活跃市场 / 高利率水平的轨道之中，并且没有能力移动到另一种均衡模式（Henley，2008，Van Zanden，2004）。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Acemoglu and Johnson（2005）认为政治制度（或财产权）与经济（契约）制度之间存在着一项重要的区别。Greif（2006）认为，与阿拉伯世界相比，西欧地区不断扩张的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是以该地区调节市场交换的制度的优越性为基础的。他的观点与诺思相异，诺思认为，限制国家掠夺性行为的政治制度是西欧能够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所有这里提到的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框架质量的两个方面；不过，市场一体化程度（受市场间距离的限制）或许最接近于对“横向”制度的衡量，Greif认为这一类的制度最为重要；而利率，则像诺思（1990，第69页）认为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长期信用以及财产权的保护。

以这些衡量标准为基础，我们可以尝试着回答如下问题：欧洲的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否真的富有效率？而且，假如欧洲制度真的如此，那么这一效率增长始于何时？由于利率最易于衡量，因此这章的主要论点将重点关注第一组指标，特别是利率这个指标；不过其他指标也同样会被采用。

利率的全球分布以及其他衡量制度效率的指标

利率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Clark（1988，2007）和 Epstein（2000）的研究表明，西欧的利率水平在中世纪晚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并且早在15世纪就已降低到了5%—6%的水平，这一

利率水平在今天看来也是很低的。这些结论与 McCloskey and Nash (1984), 以及 Poynder (1999) 对粮食价格季节性波动模式的研究相一致, 这些研究同样指出了利率水平 (以及季节性波动) 在中世纪晚期的大幅下降。此外, 图 2 展示了 Zijderduijn (2007) 对荷兰地区利率水平的最新研究结果, 反映了该地区特有的利率水平长期下降模式 (与之最为相近的数据, 见 Clark, 2007, 第 169 页)。^[4]

西欧在 14—15 世纪间开始向利率水平较低的经济体转变。不过, 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利率水平又如何呢?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确信欧洲, 特别是英国 (Great Britain) 和荷兰 (Netherlands) 的利率水平远远低于中国, 他写道: “12% 的利率在中国是很普遍的”, 而英国的利率一般在 3%—4.5% 之间浮动 (Smith, 1776/1976, 第 19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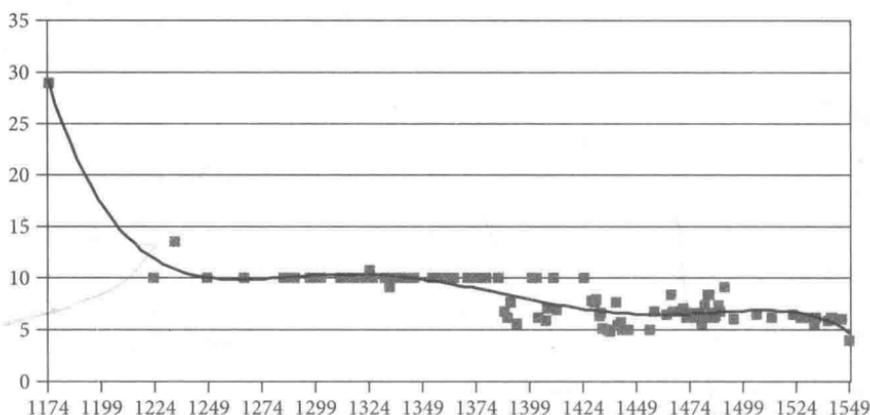


图 2 荷兰的长期利率 (losrenten), 1174—1550 年

资料来源: Zijderduijn (2007)。

[4] 由于 1250 年前的资本市场极不发达, 因而该时期的观察结果极其有限, 但这并不影响图 2 的主要论点, 即在 13 世纪出现了利率已然相对较低的资本市场。

极端的利率水平出现在东南亚地区。17世纪中，东南亚的经济处在一种“高利率水平/小规模资本市场”（“high interest rate/thin capital markets”）的均衡陷阱之中——并且似乎直到今天仍深陷其中，新近的讨论研究了该现象的成因（见 Henley, 2008）。举例来说，Boomgaard（1986）在对茂物（Buitenzorg）地区（在如今的雅加达 [Jakarta] 附近）资本市场的深入研究中发现，1805年该地区“通常的”利率水平高达40%—50%（也可参见 Van Zanden, 2004）。在另一篇论文中，他研究了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的信贷交易的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这种高水平的利率在东南亚地区十分普遍，但总体来说会稍低一些：占碑（Jambi）地区（位于苏门答腊岛 [Sumatra]）24%—36%，万丹（Banten）地区（位于爪哇 [Java] 岛）18%—24%，以及泰国，大约24%。在印度，VOC（东印度公司）在科罗曼德（Coromandel）和孟加拉地区以12%—18%的利率水平借入资金并发放贷款（该公司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而在苏拉特（Surat）地区稍低（Boomgaard, 1996）。然而同一时期，该公司在荷兰却能够以3.5%—5%的低利率借到资金。其他原始资料证实了相对较高的利率在亚洲南部地区的普遍存在。Divekar（1989，第44页）在其名为“普纳地区的物价和工资”（“Prices and Wages in Pune Region”）的研究中引用的原始资料表明，这里通常的利率水平是24%，但借入小笔资金利率常常会更高（以货物偿付的小额贷款利率最高达到75%）。

然而，对中国，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的情况进行观察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Pomeranz（2000）和 Li（1998）及随后的研究在该地区发现了相对先进的制度。James Shih（1992，第29页）的观察发现，在明朝早期的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按照惯例，如果一个人借入了一石大米，则秋收后必须归还两石大米；如果一个人

借入了货币（银币或铜币），则必须支付 50% 的年利率”。^[5]在同一时期（15 世纪），苏州商人之间的借贷利率通常是每月 2%（Marmé, 2005, 第 145 页）。17 和 18 世纪期间，中国的利率水平产生了明显的下落。扬州地区的大盐商能够以 10% 的“最低”（rock-bottom）利率从北京的内务府（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借入大量资金（Finnane, 2004, 第 121 页），这与欧洲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欧洲，通常是富有的商人为皇室提供资金。关于 18 世纪利率水平的最好资料存在于 Paul van Dyke（2005, 第 154—156 页）对广州贸易的研究中，他分析了该时期欧洲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为数众多的信贷交易。他发现，欧洲商人向欧洲地区其他商人（有时也向中国商人）借入货币的年利率在 10%—12% 之间，然而，他们向中国商人贷款的年利率却高达 18%—36%（短期贷款的月利率在 1.5%—3% 之间）。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正确的：尽管中国的利率水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表现出了下降趋势，但仍远远高于西欧地区。

有关朝鲜地区的数据指向了相同的结论：根据 Jun and Lewis（2007）的研究，18 和 19 世纪朝鲜地区的利率水平在 25%—50% 之间波动，平均水平是 37%。日本可能是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例外。17 世纪的大阪出现了资本市场，对其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型商行之间的借贷利率甚至从最初开始就处在 12%—15% 的较低水平之间（Crawcour, 1961）。Saito 和 Settsu 在最新的调查中发现，大阪地区的利率水平在长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下降：18 世纪上半叶向大名（daimyo）放贷的利率在 12%—13% 之间，而到 19 世纪上半叶时，

[5] Shih（1992, 第 29 页）；文中引证，1367 年以前的“普遍”月利率水平是 4%，尽管法定最高月利率只有 3%（第 46, 271 页，注 44）；在该书的 59—60 页中，他同样提到了明代末期大量较低水平的利率（如每年 24%）。

就已降低到了8%。其他市场中也存在这样的下降。降低后的利率尽管仍然高于欧洲，但却足够表明资本市场交易的组织方式正在变得越发地富有效率。

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西欧在中世纪就已经具有相对富有效率的制度框架——比其他地区的调节资本市场和规定财产权的制度更为有效——的观点，似乎被有关利率水平的证据证实了。关于技能溢价的研究指向了相同的结论，作为第五章的核心内容，这里只对其作一简短的概述：西北欧地区的技能溢价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就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且远远低于诸如朝鲜，印度或印尼等地区。技能溢价在欧洲的下降——集中发生于1350—1450年间——与利率水平在黑死病后几十年中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尽管图2中显示，利率水平的下降大部分发生在12和13世纪早期）。在亚洲，中国的南部和日本地区的技能溢价水平与欧洲较为接近（因而拥有可与西欧地区相媲美的调节熟练劳动力供给的有效制度），尽管有关日本地区的证据较为杂乱。中国北部（包括北京）的技能溢价水平却相对较高。

衡量市场制度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小麦和大米等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情况。这种方法认为，当交易成本较低时，就会出现程度较高的市场一体化，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局部地区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可以通过市场之间的交易得到缓解，因而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较低。这种方法的实例之一是Söderberg（2004）所做的研究，他通过对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衡量，证明了在中世纪的西北欧地区，粮食市场的稳定性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中东地区。一些学者认为近代早期的市场效率可能产生了额外的增长（Persson，1988；Jacks，2004），然而，这一观点遭到了Bateman（2006）的质疑，

他指出，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早在 15 世纪期间就已经和 18 世纪大致相同。有效市场的形成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如果 Söderberg 和 Bateman 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中世纪，去寻找其形成的原因。

26 新近的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爪哇地区）是市场制度表现极差的一个典型实例（Van Zanden，2004）；爪哇地区的大米市场在 19 世纪上半叶表现极不稳定，该地区质量极差的制度和低水平的商业发展是直接的原因。另一项关于季节模式（seasonal patterns）的研究同样表明，与清代的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相比，爪哇地区的市场表现简直差到了极点（Van Zanden，2004）。

为了将日本、中国和印度加入比较当中，我们需要跟随 Shi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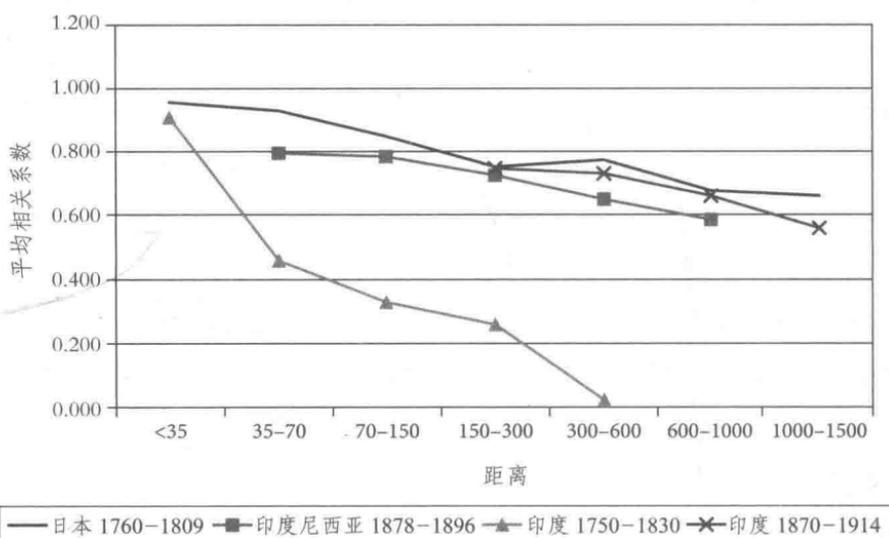


图 3 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市场一体化

资料来源：Studer（2008），Shiue and Keller（2007）以及自己基于 Iwahashi（1981）稻米价格数据（印度尼西亚的年度殖民报告 [Indisch Verslag, 1878-1896]）的计算结果。

and Keller (2007) 和 Studer (2008) 的脚步，他们将一套普遍的方法应用于对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的衡量当中，即：衡量关于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并将它们与市场距离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非常明显，因为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提高。通过这种处理，清晰的市场一体化格局便显示出来：例如，Studer 表明，18 世纪印度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极其低下，并且远远落后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Shiue 和 Keller 又指出，中国的远距离市场一体化程度似乎高于欧洲，然而，近距离市场的相关系数是欧洲稍高。关于日本地区，Iwahashi (1981) 公布了 1710—1860 年间 14 个商业中心地的有关数据，从而能够建立市场距离与相关系数之间的关系；与印尼地区有关的第一组数据反映了 1878—1896 年间的情况。^[6]这种分析方法的细节会在第九章中进行介绍；这里只展示引人注目的结果（图 3）。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 1760—1809 年间市场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已与欧洲和中国相当，有时甚至高于这两个地区（例如，在 150—300 公里的距离上，欧洲市场的相关系数在 0.65(1770—1794 年间) 至 0.94(1831—1855 年间) 之间，中国在 1770—1794 年间是 0.74，日本稍高，达到了 0.75)(Studer, 2008, 第 407 页)。18 世纪的印度表现出另一个极端。在 150—300 公里的距离上，相关系数仅有 0.26。

27

直到 19 世纪晚期，由于铁路和轮船所导致的运输革命才使印度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赶上日本 18 世纪的水平。令人吃惊的是，直到 18 世纪末期，印尼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还是低于上个世纪的日本，

[6] 关于价格的数据可以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全球价格和收入历史群组 (Global Price and Income History Group) 网站上获得 (<http://gpih.ucdavis.edu>)；我感谢 Osamu Saito 对价格数据的解释，该解释对我很有帮助；关于这些数据的更多的细节和对它们的分析将在第 9 章呈现，在那章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也要被加以讨论。

这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其他证据也证实了日本较高的市场发展程度。作为德川时代 (Tokugawa Japan) 的日本商业网络中心, 大阪 (Osaka) 早在 17 世纪就已出现了大米的期货市场 (Takatsuki, 2007)。将日本和印尼加以比较的原因之一, 是两者都具有相似的地理结构, 这使大部分交易都能够以低成本的沿海运输方式来进行,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早在 18 世纪就能够拥有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市场。平均来看, 在西欧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 (North Sea and Baltic region) 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内陆地区 (inland zone) (Bateman, 2006)。印尼虽然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 但其经济表现却与日本相差万里, 这说明, 调节市场交易的制度的有效性等其他因素,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8

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所做的估计相对来说更难获得, 也更难于在国际间进行比较。然而, 关于欧洲西北部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文献却表明, 早在 14 和 15 世纪期间, 总人口中就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一些情况下甚至更多——会在每年的一段时间中参与劳动力市场 (Dyer, 1989; Van Bavel, 2003, 2006)。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甚至会更高; 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人多半都在从事雇佣劳动 (或者成为佣人或学徒), 并且, 无论是对居住在英国城镇和乡村的人, 还是对居住在低地国家的人来说, 以工资的形式被雇佣都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在第四章我们对北海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特征讨论得更为详尽, 并将其与该地区以小型核心家庭 (small nuclear family) 为特征的人口模式 (demographic pattern) 联系起来。我们并没有对近代早期的中国、印度、日本和印尼做过类似研究, 但从有关文献中却能得出大体印象: 雇佣劳动在这些地区远不像在西欧那样普遍 (关于日本的研究, 见 Saito, 2005b; 关于东南亚地区的

研究，见 Boomgaard, 1990, 2005)。文献中唯一的估计结果认为，在明代末期的中国（16 世纪），大概只有 1% 的农村人口在从事雇佣劳动——这与英国和荷兰地区的估计值 60% 相去甚远（Xu et al., 1999, 第 37 页）。

对衡量制度效率的不同指标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欧就已经具备了相对富有效率率的制度，这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家庭对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大规模参与，以及高水平的市场一体化。特别地，极低的利率水平意味着财产权在西欧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且普遍存在着相对较高的信用（trust）水平，后者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市场一体化程度所做的比较表明，西欧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优于日本和中国。因此，西欧的比较优势或许与其调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的“纵向”制度相关，而“横向”的契约制度或许在 18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也同样富有效率。Acemoglu and Johnson (2005) 指出，这些“纵向”制度（vertical institutions）在解释近代经济表现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横向”制度，这与最近的经济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从这一角度看，西欧能够像新制度经济学所预言的那样产生长期的经济变革，并发展到世界上其他地区从未有过的程度，并不应当令人感到惊讶。换言之，“现代经济增长”在欧洲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相对富有效率率的制度的结果，这些制度最晚从 15 世纪开始就已是该地区的典型特征。

无论用哪种指标进行衡量，西欧的制度效率都与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和印尼地区）的糟糕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极低，利率极高，并且技能溢价也远高于其他地区。1850 年以前，即使是在爪哇等人口更为稠密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

作用也是相对较弱的 (Boomgaard, 1990); 在印度次大陆的小部分地区存在着例外, 在那些例外的地区, 我们确实发现了相对水平较高的雇佣劳动 (Lucassen, 2005)。

这一考察同样表明, 不出所料, 仅有的两个能够在技能溢价水平, 并且特别是在大米或谷物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上与西欧相媲美的地区, 就是德川时代的日本和清代的中国。从 17 世纪 (晚期) 开始, 这两个地区都出现了相似的制度成熟迹象, 尽管在一些方面——例如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仍然与西欧存在明显不同。并且, 由于西欧的制度成熟性 (institutional maturity) 早自 1350 年起就已经与上述地区 (至少) 处于同一水平, 这便意味着西欧具有最少几个世纪的领先优势。单从利率水平和资本市场的效率来看, 西欧的领先地位是完全无法被撼动的: 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利率能够降低到 3%—5%, 而在 17 和 18 世纪的荷兰和英格兰, 这样的低利率竟然极为平常。

第一部分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欧的制度早在 15 世纪就已明显地富有效率。但确切来说, 这些制度又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 最佳答案似乎是: 开始于 1347/1348 年的黑死病之后, 因为利率水平在这段时期从 10%—12% 降低到了 6% (图 2)。因此, 该时期对经济史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Clark, 1988; 2007; Epstein, 2000; Zijderduijn, 2007); 例如, Clark (2007, 第 171—175 页) 推测, 人们的时间偏好 (time preference) 在这段时期发生了非常突然的变化, 从而导致利率的变化。然而, 对全球利率水平的总览却表明, 在黑死病爆发之前, 10% 也已经是相当低的利率水平了 (例如, 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利率达到了 24%, 甚至更高)。此外, 利率水平在 1350—1450 年间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供给和需求

因素来加以解释，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利率水平更加接近其最低限度，同时也反映了交易成本的水平。利率下降的第一阶段发生于1300年之前很久，这一阶段的利率下降与欧洲中世纪社会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的重要变迁直接相关，因而更为重要。这些变迁也推动了利率下降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1350年以后），正如我们将要在第4章中进行解释的，利率下降与中世纪晚期的制度变迁有关。

通过对供给和需求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出，这些因素很可能是导致1350年之后利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在1348年黑死病爆发之前，或是在1315—1317年的欧洲大饥荒（Great European Famine）*（这是西欧许多地区发展的转折点）之前，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经济的强劲扩张在同时进行，投资活动受到宗教原因和经济原因的双重影响而极为活跃。这便是农业耕地大规模开垦的时期：1100年前还覆盖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森林，这时已经基本消失了，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建立，城市出现了，城墙和教堂盖了起来，无数坚固的城堡鳞次栉比地涌现在乡间。突如其来的投资潮结束于14世纪上半叶，起源于英国的教会建设项目的数量变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见Dyer, 1998, 第102页）。此外，城市化进程——它是投资潮背后的驱动力之一——在13和14世纪间也开始放缓（见表2）。

黑死病在1347—1349年间的爆发出乎意料地改变了西欧经济体的特征参数。投资活动出现了急剧下降，这不仅是由于资金缺

* 1315—1317年的大饥荒是由恶劣的天气引起的。1315年春天和夏天，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持续降雨，气温低，而引起农作物普遍歉收，1316年、1317年又持续多雨，粮食供给受到较大影响。粮食价格上涨，肉类价格上涨，数百万人因为挨饿、疫病而死。这次大饥荒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向东至俄罗斯，向南至意大利，英国也受到了影响。——译者注

乏，更是因为已经不再需要进行新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在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同时（低地国家或许只减少了20%，而英国却可能高达50%），资本存量却并未受到影响，这导致现有资本（available capital）与人口数量的比率发生了突然的改变。资本需求
31 急剧下降，实际收入却提高了，这或许导致了人均储蓄的增长。^[7]

同时，使核心家庭（nuclear household）和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得以出现的人口模式变化同样增加了储蓄（见第四章）。总而言之，人口数量在1350—1450年间大幅减少导致了人均储蓄增加以及投资减少，这两者都有助于利率的降低。因此，利率水平在这一时期的减半完全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来解释。作为其结果，在1315年之前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充裕的西欧地区在这段时期已经变为以低利率和高实际工资为特征的经济体。

从以上对1350—1450年间利率水平的下降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可能早在1300年之前就已发生，并有助于形成极低的利率水平，它是1450年后西欧地区的典型特征。如图2所示，利率下降的第一阶段发生于12和13世纪期间，从当时的世界“正常”利率水平（30%甚至更高）降低到了10%—12%，只有在西欧才形成了如此之低的利率水平。接下来，我们要转向其奠定于950—1300年间的基础，我们要从这一基础出发去解释为什么西欧早在13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远胜于其他任何地区的高效的制度。

[7] 然而，偏向低收入者的收入再分配或许部分地抵消了这种影响：例如，在实际工资近乎翻倍的同时，土地和资本的收入却相对其他收入来源产生了下跌。

第二章 为什么欧洲经济在政治分裂时期 出现了迅速扩张

32

导言

公元 1000 年左右，西欧地区的经济还较不发达，在欧亚大陆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宋朝的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当时都极为繁荣。与这些地区正在经历的辉煌的发展过程相比，西欧地区的落后更加确凿无疑。在那时通常被称作“拉丁西部”（Latin West）的地区，与其近处和远处的对手相比也并不显眼。除前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之外，这一地区还包括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和意大利南部（Southern Italy），并逐渐在 950—1350 年将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Scandinavia）也包括在内。伊斯兰文明在同时也统治着一片辽阔的区域，从西班牙南部附近的以科尔多瓦（Cordoba）为中心的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到乌兹别克

斯坦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有时甚至延伸至中国。^{*}此外，欧洲的人口也非常稀疏；无论是宋朝的中国还是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数量都远远超过欧洲。更重要的是，欧洲地区的经济活动完全以农业为主，并伴随着较低的城市发展水平（甚至在公元500年作为前欧洲城市中心的意大利也是如此），伴随着落后的技术，较低的商业化水平和市场交易水平（仍然相对中国和中东地区来说），以及大量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口。

所有这一切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the High Middle Ages）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950年持续到1300年的长期繁荣使西欧成了全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Joseph Needham（1970，第414页）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技的专家^{**}，据他估计，西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14或15世纪就已超越了中国，并且赶上了中东地区经济中心的发展水平。在中世纪的“大繁荣”（big boom）阶段，欧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00%—150%。此外，由于新技术从其他地区（主要是中东地区）的传入以及在本地的开发，西欧的经济变得非常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简而言之，一场名副其实的经济革命发生了，同时，
33 它也为130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简要描述了950—1300年间的“大繁荣”之后，本章将集中考察欧洲经济复兴背后的根本制度变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欧洲的经济转型竟发生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时期。在800年查理曼

^{*} 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在伊斯兰教最初的四位哈里发（即所谓“纯洁的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的执政结束之后，由阿拉伯帝国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后来的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建立。从661—750年，该王朝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王朝。——译者注

^{**}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他在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译者注

(Charlemagne) 帝国统治着欧洲时，西欧大陆上只有不到十个国家，而在 1300 年，国家数量竟然达到了二百多个。确切的数量取决于对政治实体“独立性”的精确定义。例如，我们该如何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划分，以及半独立的城市在何时成了城市国家 (city-state) ?^[1]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不管以何种方式定义独立性，政治实体的数目都增加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分裂的结合似乎与直觉不符。具有坚实逻辑基础的论点应当是：经济增长，特别是贸易的增长应与政治实体的规模正向相关 (Epstein, 2000)。庞大的帝国在过去经常导致繁荣的经济。例如，在最近对明代和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做的重新审视中，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中国在这两个时期能够产生大量的内部贸易流动，其规模与同时期的欧洲相当，甚至高于后者 (Pomeranz, 2000; Shiue and Keller, 2007)。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由于罗马的征服，地中海地区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一定程度上的）和稳定状态，毫无疑问，这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穆斯林在 7—8 世纪间征服了中东地区并建立了倭马亚帝国，这同样导致了经济繁荣：贸易的障碍不复存在，整个地区被唯一的阶级所统治，使用相同的语言并推行相同的制度 (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8 世纪卡洛林帝国的建立有着类似的影响，不过较少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贸易的飞速发展，并将帝国的不同区域连为一体，从南部的帕维亚 (Pavia) 地区一直到北部的德斯泰德 (Dorestad) (McCormick, 2001)。1945 年之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可认为是受到了同一原因的驱

34

[1] 参见 Tilly (1990)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他似乎武断地将欧洲在 1490 年的国家数量确定为 200，并辩称，“没有合理的定义能使我们得出不同的政治单位的数量少于 80，或是多于 500 的结论”。

动：更为广泛的政治联盟提高了贸易和专业化的程度，并促进了增长。同样，政治崩溃导致经济衰退的例子也并不鲜见。20世纪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哈布斯堡皇室（Habsburg）和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的解体，更不必提西欧在公元4—6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发生的情况。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在18世纪的表现又是一个例子（Bayly, 1983）。

初看上去，西欧似乎是这种一般模式的一个例外：西欧地区虽然在900—1300年间经历着日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却一直保持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这便是本章试图加以论述的现象。不仅国家的数量发生了“爆炸性”（explode）增长，与此同时（特别是从950年至1150年期间），这些政治实体也出现了“内向崩溃”（implosion）的迹象，它们越来越难以在其领地内实施法律或维持秩序。这种情况被（多少有点不恰当地）称为“封建革命”（Feudal Revolution）：上层政治权力的解体与下层“实力人物”（strong men）的崛起一并发生，后者开始在他们的城堡周围建立自己的微型国家（mini-states）。政治权力的分散在导致地方领主间战争不断的同时，也使地方权力得到了强化。^[2]

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在这段政治分裂的时期中，贸易和其他产业依然保持着持续的显著增长。繁荣在11—13世纪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欧地区由于匈牙利人（Magyars）和维京人（Vikings）的入侵而在10世纪上半叶中发生了最初的倒退，但或许在随后的50年中便已经开始了蓬勃的增长。^[3]与此同时，人口在快速地增加，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总而言之，欧洲的经济史中最为

[2] 关于“封建革命”的讨论，见 Bisson（1994）和 Wickam（1997）。

[3] 参见 Lopez（1976），像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他将“大繁荣”的开始时期确定在了950年。

辉煌和持久的阶段之一，在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了。本章的目的便是试图回答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何种制度促进了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发展，从而更好地理解奠定于这段时期中的特定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相关文献提出了两种假说以解释这种矛盾。第一种假说认为，由于卡洛林帝国的崩溃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教会及其相关机构（如修道院）的弥补，后者有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为欧洲社会建立起新的制度框架——一种同样能够促进经济交换的制度框架。这种假说的支持者之一是 Michael Mann，他在《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一书中这样写道：

使欧洲在野蛮人的迁徙和入侵之后能够得以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是一种多头的政治联合（multiple cephalous federation）。欧洲没有权威，没有中心，然而它仍然是一个整体，组成它的，是大量规模较小的，横向之间相互交叉的组织网络……因此，并不存在能够对明确的领土及其居民加以排他性控制的任何单一权力机构……但是，这些权力机构间的关系得到了协调，从而使秩序战胜了混乱。最重要的协调机构就是基督教会，它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广泛的权力网络（Mann，1986，第 376—377 页）。

与之相似，“基督教作为规范性（*normative*）制度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却被当作无关紧要的因素而遭到了完全的忽视。基督教并不仅仅通过精神因素的影响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它也在一种涂尔干式（*Durkheimian*）的意义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规范性的和平（*normative pacification*）”（Mann，1986，第

377 页)。法律史学家 Harold J. Berman (1983) 分析了欧洲法律制度 and 法律传统在 11 世纪的“教皇革命”(Papal Revolution) 中的起源, 他将后者看作是“作为规范性制度的基督教”发展的决定性时机。

36 另一种假说则认为, 卡洛林帝国的崩溃导致的权力真空为“自下而上的”(bottom up) 制度建立过程提供了先决条件。行会——既包括商业行会, 又包括手工业行会——和(城市和农村的) 公社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观点在 Greif (2006) 对意大利商业行会的作用进行的分析中得到了详尽阐述。他察觉到了调节交换行为的现代制度框架在这段时期的起源, 并集中研究了商业行会对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贡献。行会制度是“社区责任制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的支撑, 在这种制度下, 社区(城镇) 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威胁: 如果某个社区中的个别成员没有履行义务(比如, 未能如约偿还债务), 其他社区便会联合起来对其进行抵制(也可见 Greif, Milgrom and Weingast, 1994)。在一篇最近的论文中, De Moor (2008) 提出, 行会的出现是更为广泛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建立过程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沉默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 包括公社、公地 (commons) 以及行会制度的形成。她认为, 这些以公共团体(社团) 形式出现的新型组织在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交换的发展。我将这种解释称为 Greif—de Moor 假说。

另外, 西欧地区在 950 年之后产生的权力真空还具有第三种填补方式: 它就是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地方骑士阶层 (local knights) 的封建革命。在 10 和 11 世纪期间, 地方的骑士阶层强化了他们对乡村资源的控制, 从而导致了陈腐的领主制和庄园制在大部分地区的兴起。以上三种制度变迁的结合对西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长期影响。我将论证, 特别是在“自上而下”(top down) 和“自下而上”的两

种变动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作用。举例来说，“自下而上的”制度建立过程的动力，持续，以及最终的成功，都必须通过教会“自上而下”的调和（pacification）才能得到解释，教会同样为“沉默的革命”提供了法律和政治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对政治分裂的三种不同反应的结合解释了欧洲地区在1000—1300年间出现的独特制度框架。

在讨论中应当提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一种知识来源，书面材料重要性在几个世纪间得到了不断增长，并在11和12世纪期间产生了明显的加速（Mostert, 2006），这对以上两种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一过程与西欧的权力结构在这些年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天主教会及修道院等下属机构再一次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作为一项重要的副产品，该过程极度扩大了对读写能力以及相关技能的需求，从而开始了知识积累（knowledge accumulation）的过程，这对西欧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政治分裂影响了经济发展吗？

37

欧洲在900—1300年间的政治分裂过程对经济发展到底具有多大的不利影响？理解两种过程的联系的一种方法，是对西欧的不同地区进行观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轨迹。分裂是欧洲的政治和制度发展变化在这几个世纪间的总体趋势，但并非所有地区都在同等程度上经历了这一过程。^[4] 欧洲大陆与不列颠群岛的发展情况并不相同。查理曼帝国在8

[4] 一系列阐明这些过程的地图，见 http://www.euratlas.com/history_europe/europe_map_0800.html。

世纪统一了前者的大部分区域，尽管它很快就在 830 年崩溃了。而恰恰是在查理曼帝国的核心地区，即如今的法国，政治权威的内向崩溃在 10 世纪间表现得最为严重；大部分研究封建革命的文献都以前卡洛林帝国西部的原始资料为基础（见 Bisson, 1994）。相比之下，自 9 世纪以来，特别是在 1066 年诺曼人（Norman）入侵之后，不列颠群岛地区就开始了中央集权的过程，这是国家统一的起点。但即使在欧洲大陆上，不同地区的政治变迁速度也并不相同：与法国地区的国家的内向崩溃相比，神圣罗马帝国的良好表现保持到了 11 世纪晚期（直到被教皇和君主间的斗争所削弱）。不过，这两个地区从 11 世纪中期开始便已开始背道而驰：受“自下而上”过程的影响（下文将对其进行分析），政治分裂在欧洲的中央地带（从意大利北部延伸到低地国家）加速发展；然而，国家建构复兴的最初迹象却出现在了法国和丹麦地区（英国已经正在进行之中）。到了 1300 年，在位于城市带（urban belt）范围之外的英国、法国、伊比利亚以及丹麦等地出现了新的政体，它们构成了近代早期阶段形成于这些地区的民族国家的核心。

38 政治分裂是否影响了经济发展——或者，是否出现了替代性的制度，从而抵消了政治分裂的影响？一种检验方法就是观察西欧不同地区这些年来年的发展状况。政治统一的地区（如英国）是否比政治分裂地区发展得更快？然而，寻找该问题的答案并不轻松。即使是对人口规模等最基本的事实的估计，也显得极为粗略和不完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对某些关键的指标进行汇总，这些指标能够反映一些重要的长期趋势。

毫无疑问的是，西欧人口总体上在 900—1300 年间产生了极大的增长。根据 Russell（1972）和 McEvedy and Jones（1978）的估计，中世纪鼎盛时期各个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地

中海的距离，地中海周围在最初具有最大的人口密度。在中世纪大繁荣期间，伊比利亚（Iberia）和意大利地区的人口增长了100%—150%，然而，低地国家和英国的人口增长更为迅猛，或许达到了300%之多。德国和法国等其他地区位于两个极端之间。从这些迹象来看，经济增长与政治分裂的联系似乎并不明显；政治上支离破碎的国家（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与较为统一的国家（英国和西班牙）的人口增长旗鼓相当。

与人口增长相比，城市化水平或许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更好指标。阿拉伯历史学家 Ibn Khaldûn（大约1375年）早就提出“对一座城市来说，人口越是众多和富裕，居民的生活就越为奢华”（Boulakia, 1971），换言之，人均收入会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由于 Bairoch et al.（1988）的工作，我们能够对城市化率的发展进行非常粗略的估计，该比率被定义为总人口中居住在人口数量大于10000的城市中的人数（见表1）。对公元1000年前的所有估计都是探索性的，并且由于原始资料极其缺乏，城市化水平很可能被低估。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大于10000的大城市应该至少留下了一些痕迹。表1的最后一列包含 Jan de Vries（1984a）对城市化率的估计，它们与 Bairoch 对15世纪的估计大致相同。

表1展示了一系列有趣的模式。伊比利亚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8世纪遭到伊斯兰世界的征服之后突然提高，但在公元1000年之后又逐渐降低。^[5]意大利的城市模式比西欧其他地区保持的更久，并且

[5] 见 Bairoch et al.（1988）；该假设被一些极端数据所修正：Cordoba（科尔多瓦）（基于 Glick [1979] 所做的研究）和 Palermo（巴勒莫）（基于与 Jeremy Johns 和 Larry Epstein 在2006年4月的电子邮件交流）；根据 Bairoch 等，科尔多瓦在1000年应该拥有450000的人口（但 Glick 认为这一数字只有110000），Bairoch 等认为科尔多瓦的人口规模达到了350000，但我们估计只有60000左右；Bairoch 对其余数据的估计看起来更为现实；不过，他对伦敦各项数据的估计显得过低，与近期的著作并不一致（见 Campbell, 2000, 第429—433页）。以上各项估计数据可见 <http://www.iisg.nl/bibliometrics/urbanisation800—1500.xls>。

其城市化水平甚至在 900 年之前就已相对较高。同时，该地区也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在了 900—1300 年间城市化的普遍增长之中（也可见 Malanima, 2005, 第 108 页）。公元 900 年以前，西欧北部地区的大城市数量极其有限，城市化的增长也更为平缓，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数量的爆炸性增长相一致。但是，似乎同样有迹象表明城市化进程早在 10 世纪就已开始加速，城市中的人口数量在当时增加了一倍，并在 1100—1300 年间再次急剧上升（关于英国城市发展的极其相似的年表，也可见 Dyer, 1995）。大部分国家的城市化增长结束于 12—13 世纪期间，但在低地国家，增长却一直持续到了“中世纪晚期的危机阶段”。

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城镇系统的潜在发展，但几乎无法对其加以量化。西欧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体化的城镇系统，对其来说，人口数量大于 10000 的城市只是冰山的一角。城市化的真实水平远远高于表 1：例如，英国地区就达到了 15%—20%（Dyer, 1995）。此外，对城镇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的量化分析显示，在 1000 至 1200 年间，西欧地区的城镇和城市正在越发紧密地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公元 1000 年之前，国家的规模似乎对城市化具有有利的影响：卡洛林帝国导致了德国和法国地区城市化的适度增长（以及低地国家，见 Verhulst, 1989），并且，在直到 11 世纪上半叶还控制着伊比利亚和北非部分地区的后倭马亚王朝（emirate of Cordoba）*中，出现了最高水平的城市化。大约在 1100 年之后，城市化和政治集权之间却表现出了负向的关联。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中央地带，

* Emirate of Cordoba, 科尔多瓦艾米尔国（8 世纪中叶），阿拉伯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小王国，后归入后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译者注

特别是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等极端地区相比，英国或法国等政治上较为统一的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趋于（稍微）较低。政治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规模和力量不断增长的结果，它使国王对其领土完整性的保持以及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参见 Tilly, 1990）。并且，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可能抑制了城市的发展，或者导致城市格局变为被大型首都城市（例如伦敦）所主导的发展模式。

在下一章我们介绍了对欧洲次大陆不同地区书籍产量的发展情况所做的估计，这有助于阐明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见第三章的表 3）。这些数据反映了迄今为止讨论过的发展：欧洲经济在 8—9 世纪卡洛林帝国复兴时期的日益繁荣，在这期间，书籍生产的重心由南部（意大利）转移到了卡洛林帝国的中心地区——法国北部，以及如今的德国和比利时周围。随之而来的是 10 世纪期间遍及全欧洲的书籍产量的显著衰落，它是不断的战争以及法律和秩序缺失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衰落在法国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德国在 10 世纪末期以及 11 世纪早期的奥托王朝*复兴时期（*Ottoman Renaissance*）仍然具有良好的表现，不列颠群岛也在 10 世纪间表现出持续的繁荣。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家的形成与经济在该时期中的表现存在着正向的关联。

1100 年之后，这些趋势发生了改变：政治分裂地区的（比利时、德国以及意大利北部）书籍产量表现得极为抢眼，特别是在人均方面。这些地区在 14 世纪中有着最高的书籍生产水平，并且政治集权与经济表现间的关系似乎完全倒转了。城市化结构的改变有助于解

* 奥托王朝，亦称萨克森王朝（919—1024 年），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因第一位帝王奥托一世而得名。——译者注

释书籍产量在地域格局上的变化，但这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作为中世纪书籍生产的重要中心的修道院，大部分都分布在乡村地区（见第三章）。

在这些趋势中，更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伊比利亚地区的特殊模式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爱尔兰地区，它被掩盖在了不列颠群岛的整体数据之中）——西欧不同地区的发展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似性，这反映了中世纪期间一种泛欧洲发展轨迹（pan-European trajectory）的存在。卡洛林帝国复兴的影响遍及整个拉丁西部，并且，950—1300年间的繁荣确实是全欧洲的现象。伊比利亚地区是这些长期过程的例外之一，它的发展开始得更早（紧随穆斯林的征

表 1 城市化率的估计（生活在超过 10000 名居民的城市的人口比重）

世纪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500
波西米亚			0.0	0.0	0.0	0.6	0.9	2.0	4.3	5.9	1.7*
不列颠群岛			0.0	0.4	2.4	3.1	2.2	2.2	2.5	2.1	2.0
法国	0.5	2.1	2.9	3.6	4.9	5.7	5.5	6.1	6.7	4.2	
比利时		0.0	0.0	3.0	9.9	12.5	15.0	26.2	29.6	21.1	
荷兰		0.0	0.0	0.0	1.0	2.2	4.1	4.7	10.4	15.8	
德国	0.9	2.5	3.5	4.8	5.8	5.3	4.7	5.0	5.0	3.2	
瑞士		0.0	0.0	0.0	0.0	0.0	0.0	0.7	2.4	1.5	
奥地利		0.0	0.0	0.0	0.0	0.5	1.0	1.3	1.3	1.7*	
意大利	3.0	1.8	3.0	4.3	9.9	14.3	13.0	13.2	13.6	13.1	12.4
伊比利亚**		0.0/4.5	0.6/10.0	2.4/13.5	3.5/16.4	3.2/13.2	5.6/36.2	7.6/23.3	9.6/13.8	5.7	
欧洲平均**	0.6	1.8	3.5	4.8	5.4	5.6	6.1	6.7	6.9	5.6	

* 包括奥地利和波西米亚。

** 伊比利亚：第一个数字仅代表基督教部分。

资料来源：基于 Bairoch et al. (1998) 的计算；Bosker, Buringh 和 Van Zanden (2008) 以及基于 800 年的后向推断估计；1500 年数据列：De Vries, 1984a, 第 39 页（粗体部分）。

服)，并导致了书籍生产和城市化在 10—11 世纪间的兴盛，经济情况随后再一次出现了逐渐的相对恶化。因此，欧洲经济史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什么因素应当对欧洲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负责？或者，用 Bartlett（1993）的术语来说，是什么导致了欧洲的“一体化（Europeanization）”？

目前，对中世纪鼎盛时期大繁荣的解释集中于经济的供给方，特别是农业技术在这之前的变化。例如，像 Mokyr（1990，第 31 页之后）在对相关文献的评论中所表明的那样，中世纪早期是技术创新的阶段。作为一流的学者，Lynn White（1962）推测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农业技术——重型犁（heavy plough）、三圃制（three-field system）和一系列以马匹作为动力源的技术（马镫和马颈圈）——是如何彻底改革了农业，或至少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创造了先决条件。在农业领域之外，水磨（以及随后的风磨）的发展至少潜在地对谷物碾磨（grain milling）、纺织业（fulling）以及冶铁等行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Mokyr，1990，第 34—35 页）。 42

从供给方对大繁荣进行的解释已经遭到了质疑，因为许多技术创新很可能在中世纪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一般来讲，几乎不可能精确地确定关键性技术变革出现的时期（有关讨论参见 Verhulst，1995，第 483—487 页；Fossier，2000，第 54—57 页；Fossier，2004，第 40—44 页）。更为重要的是，对中世纪繁荣的技术性解释忽略了有关市场交易的根本性问题，即，使市场交换成为可能的制度和信任是如何得到建立的（Greif，2000，2006）。农业史学家们得出的结论认为，近代之前的欧洲在农业供给方面并不存在严重的约束：农业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因此，需求的增长能够很轻易地被供给的增加所满足。正是城市和国际间贸易的发展导致了需求的增长，从而使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成为可能（对相关文献所作的最佳审视，见 Grantham，

1999)。因此，农业部门的重要技术革新并不像 Lynn White 和其他人分析的那样，是导致该时期经济繁荣的唯一原因。为了对繁荣作出解释，我们需要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交易成本的降低，从而促进了市场交换，进而使发生于该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变得可能。并且，必须从特定于拉丁西部地区的泛欧洲过程中去寻求解释（从而不考虑西班牙地区伊斯兰化后的发展），并找出是什么弥补了政治分
43 裂对该地区的影响（甚至使其从中获益）。〔6〕因此，我们必须说明，在 900—1300 年间的欧洲究竟形成了什么制度，从而导致了分散的（如果不是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与繁荣的经济相结合——一种在世界历史中显得如此独特的结合。

Mann—Berman 假说

我们以卡洛林帝国的解体和继之而起的政治组织在随后两个世纪间的内向崩溃作为起点。当然，我们应当牢记，帝国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在这时已经紧密地与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交织在了一起：教区（bishoprics）和修道院（monasteries）对维持帝国赖以生存的广泛权力结构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帝国的解体却开始了一系列使教会权力得到极大增长的历史过程。由 909 年起源于克吕尼（Cluny）宗教运动而来的修道院改革，可被看作是对

〔6〕 Pirenne（1922）阐述了关于贸易发展的另一假设；他认为，作为 7 和 8 世纪早期伊斯兰征服的结果，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路线的“外生性”关闭造成了 8—9 世纪间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更低的收入水平；相似地，国际贸易路线在 10 世纪的复兴引起了转变，并导致了中世纪鼎盛时期的繁荣；他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及经济表现的相关指标）的假说已被最近的研究所推翻（见 Verhulst，1989，McCormick，2001）。

政治解体的最初反应。^[7]克吕尼的改革者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修道院不应继续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像曾经的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ies）那样），而应作为僧侣集团（hierarchy）的一部分，由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直接控制，并间接受罗马主教控制。^{*}改革取得了迅速的成功：据估计，修道院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增长，并且似乎先于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的经济进步而出现（表2）。在封建欧洲的中央地带——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北部，以及西班牙和英国的相邻地区——修道院数量的增加甚至令人感到吃惊。

修道院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后果：它使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具备了阅读和书写的能力，也提高了书籍和其他书面产品的产量。^[8]修道院同样采取了许多新的手段以保护其日益增长的财富。或许是对帝国解体导致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性所作出的反应，修道院开始将它们拥有的财产（或是接受的捐赠；即，财产权的变更）记录在契约中，作为拥有某处特定土地的证据。Moore（2000，第86页）也同样提出，修道院在该时期中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了新的观念，即“现代的”专一财产权：“僧侣们（the monasteries）这样来应对他们与世俗社会间产生的危机：他们对条款进行了言辞鲜明的澄清和重新定义，以证明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这表明，与人的记忆相

44

〔7〕或许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随着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解体，也出现了一波修道院改革潮，在这之中，最初的本笃会在525年左右的建立最为重要。

* 克吕尼运动是10世纪末至11世纪天主教会内部的一次重大改革运动，因以法国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故名。10—11世纪，罗马教廷势力衰微，教会私有化，教士堕落腐化。克吕尼修道院倡导改革，主张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教士须过集体生活，教士不得婚娶，以防止教产私有化；禁止买卖圣职；要求独立，反对世俗统治者任命主教和修道院的授职权等。该运动得到西欧各国修道院的响应并接受克吕尼修道院的领导。克吕尼运动得到罗马教廷的积极支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并亲自指导运动。该运动加强了教会，尤其是教皇的势力，从而引起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主教授职权之争。——译者注

〔8〕见下一章中对修道院与书籍产量的关系的分析。

比，以契约形式存在的书证（written evidence）是对财产权更为有效的证明，这种推断根源于罗马法之中，并在后来成为欧洲法律传统的基石。Clanchy（1979，第117页）总结了关于文字材料的争论，并以12世纪中期一位名叫William de Braose的僧侣为例：“人的记忆过于脆弱，并且由于圣人说过：‘人不管怎么跑都跑不过时间（old age runs in from the first）’，因此，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必须以文字的形式留下痕迹，从而不致被时间的流逝或是后代的聪颖所冲淡。”

表2 西欧僧侣的估计数量（6—15世纪）

世纪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中欧	0	0	0	0	16	79	458	718	695	690
波西米亚	0	0	0	0	17	32	113	119	107	113
英国	236	460	463	437	437	526	1325	1530	1447	1333
法国	586	988	1240	1636	2091	5051	8104	8564	8189	7554
比利时	0	53	68	70	88	175	313	364	361	335
荷兰	0	2	4	7	13	20	68	189	336	679
德国	0	138	622	824	1129	1652	2873	3110	2967	2752
瑞士	10	19	37	71	104	144	247	321	337	333
奥地利	12	11	70	99	113	186	344	406	413	372
意大利	291	306	495	704	995	2072	2990	3405	3416	3333
伊比利亚	58	117	170	537	1340	2549	3290	3223	3003	2876
西欧	1193	2094	3168	4385	6343	12485	20125	21948	21270	20369
新区（New foundations）	1013	1021	1284	1533	2397	6776	8888	3836	1516	1226
增长（%）		86	58	44	48	91	63	17	6	4

资料来源：Buringh，2008。

45 同样，教会也正是为保护自身的财产和教众而发起了“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运动，而克吕尼修道院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试图为其教众带来些许和平的教会会议，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975 年左右（地点是法国中部的勒皮（Le Puy）地区）：主教为教区内的骑士和农民召开了一场露天会议，以“听取他们关于保持和平的意见”（Cowdrey, 1970, 第 43 页）。巩固“上帝的和平”的手段之一是逐出教会的威胁。与会者通过起誓，来加强他们对社会和平的承诺。不过，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通常也号召与他们存在亲属关系的骑士或其他实力人物承担如下誓言：“尊重教会的财产，以及穷人的财产。”（Cowdrey, 1970, 第 43 页）很快，受保护的人群扩展到了旅行者（商人以及朝圣者），农民（上文中提到的穷人）以及妇女。“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是该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它试图在特定时间内阻止一切暴力行为；最初主要是在圣诞节期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应用于其他节日和集市时期。尽管这些运动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然而，世俗统治者和教皇仍然能够将其作为行动的基础；就像 Mann（1986, 第 382 页）所评论的那样，“它们导致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的旧式差别，并形成了某些规则，用以约束对待平民和被征服者的方式……道德说教和警告具有潜在的力量，它们并不源于国家内部，而是源于欧洲整体”。

“上帝的和平”运动意味着教会介入了国家无能为力的领域，它试图调和（pacify）社会和政治关系，并创立法律和秩序。教会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权力基础，并增强了自身威望。因此，教会毫无疑问地从 10 世纪间的权力真空中获益极大，并（作为克吕尼运动等内部改革的结果）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形成了更为稳固的权力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11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的教皇革命可被看作是这些历史过程合乎逻辑的最终发展。

Berman（1983）说明了西方法律传统如何作为发生于 1070—1122 年间教皇革命的副产品而在 11 和 12 世纪间出现。10 世纪之前，欧洲的法律制度的构成极为混乱，并且毫无条理：既包括日耳

46 曼法和罗马法的传统，又包括由（不同地区的）教会颁布的裁决和教义，后者通常（非常不严谨地）建立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两者）之上。但正如 Berman 所写，“没有专业的法官或律师，没有分等级的法庭制度。同样缺乏的是将法律理解为一种由规则和观念构成的独立‘实体’。没有法律学校……没有关于法律起源的成熟理论”（Berman, 1983, 第 85 页）。在 1050—1150 年短短的一百年中，这些情况全部改变了。一项重要的变化是重新发现了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ivil law）中制定的罗马法，这导致人们对法律的兴趣突然大增。然而，它却发生在教会法（Church law）与世俗法（secular law）的关系成为中心问题的时期，这是一场源自于 1070 年教皇革命的争论。

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主教和其他重要宗教人士的任命（授予）权，这种权力之前掌握在世俗权威的手中（或是由双方共同掌握）。通过声明教会对该权力的独占，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宣布教会将脱离世俗权力的掌控，并作为独立的宗教权威而存在，而在之前，国王作为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与教会一同拥有宗教权威。格列高利七世通过这种方式将宗教与世俗分割开来：皇帝被剥夺了宗教权力，权力范围得到了明确的划分，并成为欧洲发展中的独有特征。简言之，一种一分为二的法律秩序得到了确立，并且，为保证以上要求顺利实施，统治教会的法律制度也得到了系统化。通过对不同的传统和学说进行审视，以及推理和逻辑的运用，经院学者（特别是格拉提安 [Gratian]，他在 1140 年出版了《教令集》[*Decretum*]，这是教会法的“圣经”）创立了一套系统的法律，用于管理教会以及相关领域（如家庭生活）。这些法律涉及遗嘱及其他类似契约的执行，（教会无疑在这方面拥有既得利益），并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寡妇和孤儿）加以保护。格拉提安对教会法的协调建

立在对法律原则等级次序的系统考察——例如，习俗被认为从属于“自然法”——以及调和冲突的辩证方法之上。这些原则和方法结束了经院学者之前的不同法律传统之间存在的混乱，并使它们变得井井有条（Berman, 1983, 第 145 页）。

从 1072—1150 年，系统的法律体系得到了建立，它们不仅统治着教会，还同时掌管着社会和经济（以及政治）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教会要求对世俗事物施加确切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些要求，新兴的西欧国家开始制定自身的法律体系。教会和国家间的竞争使法律受到了更多关注，这与罗马法的重新发现结合在一起，导致人们对法律制度及其发展和协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9]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新的大学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不断兴起，法律学者就在这些大学中诞生，并受到相应教育以及专业训练（Berman, 1983, 第 160—164 页）。

在教皇革命后的几个世纪间出现在拉丁西部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系列的特征。首先，它导致了人们对法治的强烈信念，法治在原则上被运用于所有人，既包括君主，也包括臣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构成了法治观念的基础，尽管在这段时期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影响了其实际运用：骑士与农民受到的待遇大相径庭。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许多次级体系的并存：教会法（管理教会及其信徒），城市法（管理城市及其居民），封建法（调节国王与封臣的关系），以

[9] 在相关文献中，罗马法的重新发现有时被强调为该时期法律改革最重要的动力（例如 Stein, 1999），但是，第一，罗马法中的大部分内容被忽视了，因为他们对西欧地区的准则和惯例有着不利影响；第二，罗马皇帝是罗马法所有权威的最终来源（特别是从确实被重新发现的 6 世纪查士丁尼法典中可以看出这点），然而，新的正在形成的欧洲法律传统认为国王自身也要服从法律的约束；第三，罗马契约法的流行明确地反映了社会对这类法律概念的需求，即使罗马法没有被重新发现，这种需求也会被其他观念和思想所弥补。甚至可以说，罗马法的日益流行及其关于权力的等级观念，加强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向专制主义和的家长制发展的趋势，后者与罗马法最开始的作用截然相反（见第七章）。

及庄园法（调节领主与农奴或自由农民的关系）。这些法律与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法律传统——这通常基于习惯法*，但越来越受到罗马法，以及“创制”法律传统的有意尝试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全部依照最新的经院程序被加以合理化和系统化。多样化的法律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也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源泉。法律越来越被看作是人为操作和设计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过去和不变的习俗的结果。同时，法律也被认为具有前瞻性，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然而，构成欧洲法律体系之特征的，并不是法律“传统”的自发变化，而是法律学术辩论的规范化（通过伟大的经院学者得到贯彻），书面法律和法规中的变化，以及正式写成的法律书籍和法律概论的出现；它们构成了新法律体系的发展的独有特征。

此外，修道院在10和11世纪间掀起的潮流导致书面文字自身也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法律只有在具备书面形式后才具有坚实的效力，并且，在诉讼程序中，书证与基于回忆的口头证词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10]对国王的臣民来讲，这意味着王权可以通过书面言辞得到限制。最初，国王和贵族亲自雇佣神职人员（修道院中精通文字的人）起草宪章，并对自身的权力和要求加以阐述。然而不久

* common law 也可译成“普通法”、“不成文法”、甚至是“判例法”。与之相对的概念是成文法。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法律传统甚至是哲学传统、思维体系。习惯法一般是指英美国家的做法，其立法一般是法官的工作，具体方式是判例。律师碰到案子后是去寻找以前的类似案例而不是翻阅法条。成文法正好相反，法律是由专门的立法机关制定，制定后才实施。律师碰到案子是去翻阅法条规定。代表国家为法国、德国。从历史上看，罗马经历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程。古罗马初期没有成文规定法律，只有按照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来处理罪犯和判断犯罪。这叫习惯法。因为没有成文的法律条文，奴隶主贵族们经常按照自身的利益随意解释法律，引起平民的不满。在斗争下成文法出现了。公元前5世纪，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罗马共和国时期，制定公民法，适用于共和国境内；罗马帝国时期，制定万民法，适用于被罗马征服的广大帝国；6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辑《民法大全》，标志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译者注

[10] Clanchy (1979, 第231页及以下页)将这一变化的发生时间确定在13世纪，不过，英国很可能是这方面更早的先行者。

之后，他们的行为便开始被其臣民加以模仿：后者发现可以利用王室宪法或城市特许状（city charters or royal charters）中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权利来保护自己免遭王室的掠夺；《大宪章》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君主与其臣民的谈判产物。对书面言辞的高度重视实质上极大地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因为“实际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会使君主有权去做任何想做之事，而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并且，通过书面形式的限制，权力就其本身而言也受到了约束，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宪法化了。

最后，分裂的法律体系也反映了权力的分裂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教皇革命意味着拉丁西部地区的权力将在教皇与世俗皇帝间进行划分，而其他法律体系的发展则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现象。在其他社会中，最高权力通常都单独掌握在皇帝或国王的手中，因此（在理论上）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然而在西欧，国王却不得不与主教和僧侣共同分享权力，领主也必须将其一部分权力交予城市及其市民。权力不仅得到了宪法化，也成了不同权力集团（Power—holder）之间的谈判内容，包括世俗皇帝与教皇之间，国王与主教之间，国王与城市之间，或者，在更低的水平上，城市政府与行会之间。以授职权斗争（investiture conflict）为例，它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是达成了一种妥协：教皇和世俗皇帝共同具有对主教的任命权，但最终的决定权却必须由教皇掌握。这种基于谈判的妥协构成了欧洲权力分割安排的最基本要素。

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在当时出现的分裂的政治实体和法律体系中成了管理者。正如 Mann（1986，第 379—380 页）的评论：

最为广泛的互动网络以天主教会为中心扩展开来。天主教

基督徒的范围扩展到了相当于大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与之前历史中疆土最为辽阔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面积相当……教皇权力的基础结构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受到了极大限制。但在 11 世纪晚期，这一意识形态权力网络通过两个类似的权威统治集团在整个欧洲范围得到了牢固的建立。这两个集团分别是主教团体和修道院团体，他们都对教皇负有责任。权力网络的交流体系由对同一种语言，即拉丁文的读写能力所保证，后者在 13 世纪之前一直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经济支撑则来自教徒缴纳的什一税，以及从自身拥有的大量财产中取得的税收……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得到了对宗教权威的一种君主观念的支持（sustained by a monarchical conception of religious authority），并声称自身在最终极的意义上高于世俗权威。

Berman（1983，第 113—114 页）同样强调了教会在该时期中与国家类似的特征：

教会声称自身是独立的、等级森严的公共权威。作为其首脑的教皇具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格列高利教皇的继任者们实际上也颁布了一连串新的法律……教会同时也通过行政集团（administrative hierarchy）来执行法律，并像近代君主一样通过其代理人进行统治。进一步来说，教会对其法律的解释和应用，都是通过法律集团来完成的，后者在罗马教廷（papal curia in Rome）中达到了顶峰。

因此，两种力量的最终结果——发起于修道院的，以成文形式的法律对财产权加以保护的运动，以及教皇革命导致的权力界定过

程中更为广泛的变化——是权力的宪法化 (*constitutionalized*)，即由书面文字加以界定和约束，以及可协商化 (*negotiable*)。它是不同参与集团间可能的协商主题，并因此具有可分割性 (*partable*) (正如教皇和世俗皇帝对主教授职权的共享一样)。这种权力观念与该时期 (以及古代) 绝大多数非欧洲社会中的观念存在着根本不同，这些社会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和整体的。^[11]

Greif—De Moor 假说

由主教和僧侣发起的“上帝的和平”运动试图对法国乡间的公开战争加以控制和抑制，与此同时，伦敦正在进行另一项策略的尝试：伦敦的居民“在埃塞尔斯坦 (Athelstan) 国王的支持和鼓励下”成立了名为“*gegildan*”的组织**，以维持城市内的和平与安全 (Epstein, 1991, 第 40 页)。这是“行会 (*guild*)”一词最早的使用之一 (大约在 920—930 年间)，但这个“和平行会 (*peace guild*)”并不像后来的行会那样具有社团特征。这一行会被认为是一种关于人的组织：组织的成员庄严地发誓彼此间相互支持并互相保护，并“通过为灵魂献礼，以及吟唱纪念性的诗歌，来向他们中已故的成员致以敬意” (Epstein, 1991, 第 40 页)。国王只是有限地参与到了

[11] 当然，在古代和在其他非欧社会中，权力在实践中也是分享和谈判的。中国的皇帝与英王相比，事实上拥有较小的权力，并且更多地依赖于臣民，后者在原则上受到大宪章的约束。

* 埃塞尔斯坦于 927 年成功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约克王国的维京人，使其成了整个英格兰的第一位统治者，也被历史学家成为第一位英格兰国王。——译者注

** 从大约颁布于 694 年的《伊尼法典》和 890 年的《阿尔弗雷德法典》中所使用的“*gegildan*”一词看，7 世纪时的英国可能已有行会组织的存在。1087—1107 年间授予英国伯弗特市的特许状提到了行会，这是迄今所知与行会有关的最早的英国历史文献，13 世纪时，大部分英国城市都已建立了行会。——译者注

这个组织当中；10世纪晚期，英国的剑桥地区成立了一个类似的行会，它似乎也仅仅是私人组织，并不受国王的管制（Epstein, 1991, 第40页）。

随着中央权威的崩溃，很自然地，许多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如伦敦和剑桥等城市的商人和市民——开始为保护自身财产权而进行自下而上的尝试。这些尝试有着更早的基础；地中海和北海地区（以日耳曼传统为基础）都存在着商人联合的传统，宗教的，社会的，以及经济上的动机经常一并混杂在这种传统之中。宴饮交际（conviviality）（友好的晚餐聚会和酒会）是这些仍然相对非正式的“商业行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ynolds, 1984, 第68—70页，第158—166页）。

51 这类“横向的”制度在1050—1150年间的任命教会官员的授职权（investiture）斗争中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在作为城市公社（半独立的城市行政机关）建立运动的中心地区的意大利北部，城镇居民为争取更多的独立性而进行着日益频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最初迹象可追溯至9世纪晚期；早在10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反抗的增长”（insubordination grew）（引自Jones, 1997, 第131页，他对这一运动做出了经典的研究），并且“城市试图限制、控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篡夺政府的权力……这即使没有导致社团行动制度上的发展，也更多地促进了这种行为”（Jones, 1997, 第131页）。但是，随后便出现了真正的突破：“正式的和完全的自治，从‘自由民（liberties）’向‘自由（liberty）’，以及从‘城市（civitas）’向‘城市公社（commune）’的最终和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1世纪的晚期，精确时间是1075—1122年”，在这段关键时期中，世俗统治者与教皇的分裂极大地帮助了城市的发展（Jones, 1997, 第134页）。城市公社的兴起与这些年的“广泛混乱”（general turmoil）的联系也

由 Hyde (1973, 第 49—53 页) 通过比萨 (1081)、热那亚 (1056) 以及博洛尼亚 (Bologna) 等地区的实例得到了证实。

城市公社是城镇居民“个人间宣誓而成的联合”，市民通过自身的誓言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并自愿保护和巩固城镇的权利。地方委员会和议会城市公社的组织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它们“高度参与了决议的制定过程” (Hyde, 1973, 第 54 页)。到了 12 世纪中期，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处在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城市公社的统治之下，腓特烈大帝 (Emperor Frederick) 在被由意大利城邦组成的伦巴第同盟 (Lombard League) 击败之后，在 1183 年签订的康斯坦茨和约 (Peace of Constance) 中承认了城市公社的独立 (Coleman, 2004, 第 41 页)。^{*} 特许状 (charters) ——在这里是康斯坦茨契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城市极其小心地守护着这些争取到的“特权”，并从有关它们的“自由”的书证中获得了很大力量。

城市公社运动的第二个独立中心位于法国北部以及相邻的佛兰德斯 (Flanders) 地区。11 世纪 70 年代，这一运动开始从位于勒芒 (Le Mans, 1070) 和康布雷 (Cambrai, 1077) 的起源地区向欧洲西北部的大城市和小城市扩展 (Reynolds, 1984, 第 176 页; Stephenson, 1933, 第 27—42 页; Verhulst, 1999, 第 125—127 页)，并在半个世纪之内传播到了佛兰德斯的大城市，荷兰北部最重要的城市乌得勒支，以及法国北部的许多城市 (拉昂在 1109—1112 年间有着一个著名的城市公社) 和科隆等诸多地区之中 (Reynolds,

* 康斯坦茨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 (红胡子) 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和约。腓特烈一世 (红胡子) 在 1176 年莱尼亚诺战役惨败后，次年与同盟签订六年停战协议。1183 年停战期满后双方在康斯坦茨签订和约。依约腓特烈一世放弃在北意大利城市任命官吏等权利，城市有权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废除隆卡利亚会议的一切决议……腓特烈保留了形式上的最高任职权，并规定伦巴第同盟在皇帝出巡时必须接待和配合，算是保留了一点脸面。——译者注

1984, 第 173—177 页)。

52 城市公社模式与行会模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商业行会有时先于城市公社成立，而有时却是在城市自治措施实施以后才得到建立。意大利的行会出现在城市公社之后。Jones 描述了行会的典型特征：

新的组织，新的产品和扩张手段……出现于 12 世纪初期，最初，它们主要由商人协会和专业人员团体，如法官和司法人员（有时甚至包括校长）等构成，后来又将零售商和工匠协会包括在内——但在威尼斯（Venice）和热那亚（Genoa）等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些地区，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它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团体组织（Jones, 1997, 第 229 页）。

在英国、法国的北部和低地国家，商业行会的前身先于城市公社运动而出现；最好的例子或许是 1000 年左右梯尔（Tier）地区组建的商业行会（Reynolds, 1984, 第 165—167 页；Verhulst, 1999, 第 123—125 页）。英国公社运动的发展由于中央君主制的存在而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力，那里的商业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公社权力的替代物（Britnell, 1996, 第 27—28 页）。

以上运动从 11 世纪开始具有了更大的连续性，因为从那些相对非正式的团体中涌现出了大量法人团体（corporative bodies）。这是 11—12 世纪的法律革命形成的一个关键概念。将一群人构成的集体看作一个单位、一个社团或是一个联合体（universitas）的法律概念构成了这些团体的核心。

社团（corporation / universitas）在法律上被视作这样一种

组织：它拥有不同于其任何个别成员的法律人格。社团所欠的债务并不由作为个体的成员负担；对社团意愿的表达并不需要每个成员都表示赞同，而只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社团并不一定会解散；即使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动，社团仍然作为不变的法律实体而存在（Tierney，引自 Huff，1993，第 134 页）。

这种由单一法律实体组成，并且独立于自身成员而存在的团体的观念，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教会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团体；并且，修道院和兄弟会（fraternities）（后者同样在最近才得到发展）也同样可被视作这种团体。穆斯林法律承认瓦克夫（*waqf*）的存在，*这是一种一旦其目标被确立，（原则上）就无法再加以更改的教会基金。相比之下，中世纪的行会显得更为灵活。原则上，大多数人的意见能够修改其规则。这也为行会增添了几分与众不同的“民主”意味：当大多数人决定修改团体的规则时，就确实可以这样做。这意味着一些制度是必需的：成员之间的会议，以及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全体成员的委员会。 53

西欧在 1050 年左右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公社和商业行会，随之又出现了工会。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间形成的法人团体如何有助于解决“交换的根本问题”（fundamental problems of exchange）呢？商

* 瓦克夫（*Waqf*），伊斯兰教法用语，亦译“卧各夫”、“卧各甫”。在北非亦作“哈伯斯”（Habs）或“胡伯斯”（Hubs），法文作“哈波斯”（Habous），为同一词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限制”、“保留”、“留置”，专指保留安拉对人间一切财富的所有权，或留置部分有益价值的土地、产业。这种永久性冻结所有权、限定用益权（只能用于弘扬正道事业）、禁止出售、抵押、典当、继承、赠予的土地、产业，泛称为“瓦克夫”，在中国亦称为“义地”、“义产”。中世纪教法学家据圣训提出的有关规定，即瓦克夫制度。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译者注

业行会通过规定“社区责任制”（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做到了这一点（Greif, 2006）。大量的文献认为，工会通过控制产品的价格、质量、特性以及确保技术知识（在两代人和两个地区间）的保持和传播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交易（Epstein, 1998；Gustaffson, 1987；Persson, 1988；Prak, 1992, 2003）。对这些观点的评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De Moor（2008）所做的补充指明了西欧该时期的城市商业行会、工会和农村公社等不同形式的“社团集体行动”（corporate collective action）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并强调了它们与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正像 Greif 在其创造性的工作中所做的那样）。De Moor 的核心论点是：

以行会和公社等形式存在的集体行动提供了适当的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以便在参与市场的同时避免市场的不良影响……社员和行会成员都试图通过保护生产资料来避免由于市场的疲软和不完善所导致的不良影响。[社员]还试图对其拥有的珍贵且易耗的资源加以保护。如果这些资源在市场上被轻易出手，就会对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造成威胁，并进而威胁到社员的收入，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公社才能进行商业化的农业生产。

并且，“如果行会不对它从自身成员的生产中获得的商业利益加以限制的话，那它的收入也将面临相似的威胁。需要保护的生产资料是其成员的知识 and 熟练的技能”——即行会拥有的人力资本。行会规定了非成员人士获取这些知识的方式，也规定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方式。行会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持一种合理的（并且十分稳定的）收入水平，“在市场极为不可靠，因而某项投资的收益将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会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定的“集体行动机构能够提

供富有吸引力的临时协定 (De Moor, 2008)”。因此,行会是市场经济得以出现于这几个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证这些法人团体 (corporate bodies) ——无论是城市公社,商业行会,工会,还是农村公社——的重要性的一个相关论点认为,相对于其他模式,这些社团 (universitates) 能够更有效率地促进新制度的形成。市场交换在 11—13 世纪间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必须创造和实行新的规则,以便对市场进行调节 (事实上,这是关于如何“创造”市场的问题,因为市场本身曾经就是现在仍然是规则的集合)。同时,作为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法人团体的成员能够通过经验得知问题所在,因而能够创造出 (或是从其他地方学来) 需要的,并且是最佳的规则,以组织市场交换行为。法人团体的灵活性——原则上其成员拥有某些能够改变团体规则的民主权利——意味着规则能够被相对容易地加以更改,尽管通常需要征得管理者的同意;城市行会特权的修正需要得到城市或国王的支持,但这明显与当时已成为常态的权力的可磋商性 (negotiability) 相一致。同时,法人团体也确保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它们大体上是“永久的”,几代人之后仍能继续存在 (事实上,许多法人团体甚至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从而为定期的市场交换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简而言之,这些法人团体在调节市场交换的有效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工具”。

一边是灵活性和适应性,另一边是稳定性和永久性——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欧洲整体的“一体化”与地区差异这两者的平衡中,得到了最确切的反映。“博弈规则” (rules of the game) 的试探性发展过程会导致地区规则之间的差别。例如,既存在一系列同中有异的城市特权 (城市间相互借鉴对方的法规,但又保持着重要的地方

特色)和公社“法规”,同时,在同一城市或地区的公会之间,又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条例。然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两种过程——
55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共同引起了欧洲的规则和惯例的同质化过程。相同的制度模式——城市公社、商业行会和工业行会、兄弟会、宗教和骑士阶层的秩序、契约、市场以及集市^[12]——出现在了整个拉丁西部。同时,这些制度在欧洲毫不费力地传播——例如,城市公社和自治市镇在欧洲次大陆上最遥远的角落出现并得到适应——证实了文化同源性的存在,它是这几个世纪的典型特征。这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的可预测性:商人可以预先得知他在国外经商时所必须遵守的规则,这或是因为“社区责任制”等制度已成为一种全欧洲的现象(Greif, 2006),或是因为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自治城市——它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王室和其他势力的干预——已经遍布欧洲大陆。

对权力真空的第三种反应:封建制和庄园制

有关中世纪社会 and 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文献通常都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对封建制(feudalism)进行研究。“封建制”是个难以处理的概念,它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在本书的语境中,“封建革命”——即陈腐的庄园制(banal lordship)的兴起,地方领主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可被看作是西欧地区在10—11世纪间对权力真空产生的第三种反应(最近的讨论,见Fossier, 2000; Bisson, 1994; Wickham, 1997)。地方领主从封建君主的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并凭借其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在他们的城堡周围建起了微

[12] 该时期中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制度在整个欧洲迅速传播,见Britnell(2001)。

型城邦（与之相似的现实过程是10—11世纪的堡寨在乡间的发展和广布，这象征着寨主日益增长的权力）。同时，地方领主还利用自身的权威，向地方居民强行施加新的税种和劳务，或是重新征收旧有科类的税收和劳务（Fossier, 2000, 第50—53页），这导致“施加于生产力即依附农身上的领主权威”的日益增长（Duby, 1974, 第177、181页）。在卡洛林帝国的解体似乎导致了大型政治单位的衰落的同时（这是7—9世纪的特点），10—11世纪间却出现了庄园制（manorialism）的复兴，后者建立在利用依附劳动力（dependent labour）开发私有领地的基础之上。^[13]

与这种对领主和农民间的权力关系的重新定义相联系的，是盟约（bonds）在不同领主之间，以及在地方领主和国王（kings）或公爵（counts）之间的转变（transformation）。关于封建制的兴起的传统解释认为：以尊贵的人（men of honour）对誓言的遵守为基础，国王与领主之间形成了分封与受封的关系；然而，对“封建突变”（“feudal mutation”）的这种解释遭到了很多批评（例如Reynolds的批评，1994）。

在其对封建经济的早期增长所做的富有影响的研究中，Duby（1974）认为，是对农民日益增长的压迫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从而开始了欧洲经济在10—11世纪间的增长过程。封建贵族（国王，地方领主，以及僧侣）拥有的日益丰富的剩余产品造成了他们对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促使交易活动集中在某些地点，通常位于城堡和大修道院（abbeys）附近。通过这种方式，采邑制

[13] 卡洛林帝国时期庄园（estate）的衰落，见Verhulst（1995，第495—497页）；Fossier（2000，第42—45页）和Duby（1974）；卡洛林帝国时期的庄园（estates）与后卡洛林帝国时期的庄园（manors）之间的首要差别，在于后者不再使用奴隶，所有的强制劳动都由农奴承担，后者对其使用的土地拥有一定程度的索取权。

(*seigneurie*) 的兴起从背后推动了国际贸易在大繁荣初期阶段的复兴；这在 10 世纪城市化水平的不断增长中得到了反映。修道院数量的显著增长同样与这些过程相关，因为它们深深地根植于在封建革命中形成的新型农村制度当中（修道院通常也参与了封建革命过程）。“新式”领主也乐于建立新的市场（可以从中征税），并试图以多种方式从变革中获利，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例如，他们引入河流通行费并将类似费用扩展到其他方面，以便向新城鎮的居民课税。这极大地激励了领主以向其领地内的城镇授予特权等方式来促进贸易活动。

57 但是，形成于封建突变过程之中的新制度体系就其自身来说并没有真正解决交换的基本问题；相反，庄园制的兴起造成了地方统治者间各自为政，并且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对贸易活动危害甚深。封建制以及庄园制的兴起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教会和商人推动着自上而下的革命，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息半独立的地方领主之间的纷争。因此，10—11 世纪间的封建突变对西欧社会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造成了对奢侈品的新需求，并提供了支付手段；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政治分裂（如公元 1000 年的法国）和领主间不断的内部斗争，从而对市场交易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结果，从能够平息骑士的纷争并且改善市场交易条件的制度改良中获取的潜在收益极大地增长了，从试图缓解紧张局势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尝试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因此，封建制和庄园制在欧洲这段时期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对权力真空的第三种回应，并没有带来能够造成改变的新型制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化日益增长的影响之下，随着工资劳动力和租金支付的效率日渐胜过强制劳动，欧洲大

陆上的庄园制和农奴制 (serfdom) 从 12 世纪起便开始了衰落的过程 (参见 Poynder, 2003; Van Bavel, 2008)。封建制最为持久的遗产存在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 它为将于中世纪晚期出现在西欧的领土国家 (territorial state) 提供了基本材料 (Tilly, 1990)。

封建传统的缺失有时被认为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例如, De Vries 和 Van der Woude (1997, 第 160 页) 在他们对“最初的近代经济体”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的根源的分析中指出, 这种类型的经济体之所以出现在荷兰, 是因为该地区并不存在封建传统。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同样在 Greif 对西欧行会形成原因的分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尽管只是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基本的问题是, 为什么西欧在 9—13 世纪间选择了由其自身创立的制度。Greif 强调了形成于中世纪的制度和形成于近代早期的制度之间的相似性: “两个 [阶段] 的核心都包括个人主义; 社团主义 (corporatism) (包括国家层面上的), 特别是非家族形式的社团主义; 人为制定的正式法律; 以及规则确立过程的制度化 (在这种过程中, 受规则约束的人同样具有发言权, 并能对规则施加影响) (Greif, 2006, 第 390 页)。最后他得出结论: “西方的兴起, 从应归功于其基础性制度的意义上说, 它的根源早在中世纪阶段就已深深埋下。”事实上, 西方的兴起并非偶然现象, 而是以西欧制度的基本的连续性为基础的: 例如, 中世纪的行会与近代早期的行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尽管许多行会在 16 世纪中失去了宗教功能), 近代早期的城邦——或许包括组成荷兰共和国的城邦联盟 (coalition of city-states) ——也很相似, 它们都以中世纪晚期的公社和城市为基础 (见第七章)。然而, 是什么原因促使西欧选择了那些更为“个人主义”的制度, 从而使亲属关系纽带被诸如市民之间, 共同职业

者之间，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更为实用的联系（functional ties）所取代？

正如 Greif（2006，第 252 页）所言，教会在这里再次发挥了作用。Glick（1979）在一项名为“从伊斯兰化到基督化：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的极富吸引力的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发现，在基督教统治的北部地区，亲属关系出现了逐渐弱化的趋势，而在阿拉伯和柏柏尔地区（Berber）却并未出现相应的发展。在基督教治下的西班牙（Glick，1979，第 141—142 页）：

大家族（extended family）在面临更利于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stem or nuclear family）的社会—经济环境时，表现出了更为明显和有意的衰落过程。主干家庭不仅因为边疆生活的特殊环境而具有某些社会优势和经济优势，同时也得到了教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这里出现了第二个明显的不同：伊斯兰教提供的结构将宗族价值观合法化，并赋予其宗教意义；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则趋于相反：个人之间，而不是团体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他用来展示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组织方式的例子则更为有趣：

在征服并占领了安达卢斯地区（al-Andalus）之后，基督徒开始频繁地将以往的宗族制度替换为非宗族制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位于西班牙东部及南部的，以公有形式组织起来的灌溉系统。我们知道，之前的灌溉渠道，特别是柏柏尔人聚居地的灌溉渠道，是依照宗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宗族社会中，就像在如今的摩洛哥的某些灌溉地区一样，这些灌溉水渠通过

宗族政治组织的正常工作而得到管理：长者团体决定水源分配方案，解决争端，规定惯例，并提供行政权力。基督徒接管这些水渠之后，虽然在最初借鉴了穆斯林的传统安排，但是很快，水渠的管理权就落到了城镇议会或以行会的方式自发形成的公社手中。（Glick, 1979, 第 145—146 页）

简言之，法人团体（corporate bodies）接替了宗族组织。

为什么教会或者说西欧基督教地区通常会导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Jack Goody（2000, 第 30 页）推测：教会为谋取自身利益而倾向于削弱家庭亲属关系；当某人必须确立遗嘱时，或者更一般地，当某人必须决定如何处理其财产时，他必须在捐赠给教会及其相关机构与留给家人这两种方式间做出选择，教会与家族间存在着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实际上与大家族，特别是父系氏族和世袭家族的生存形成了对立。这些团体可能会威胁到教会的工作，特别是财产的积累。

并且

所有的宗教行为都必然包括人类对神明的献礼（通过他们在人间的代表），并通过祭品、牺牲、祈祷以及艺术和宗教仪式等方式进行。对神明的献礼需要个人或家庭做出让渡（一种“牺牲”），就像对凡人的施舍一样……教会不仅依靠这些赠送将自身缔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组织”，还以此建立和维持其设施，供养其全体人员，并开展种类繁多的学术，慈善和僧侣活

动 (Goody, 2000, 第 31—32 页)。

毫无疑问, 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就像在第四章我们将会讨论的那样, 教会有关婚姻的教条导致了家长权威的弱化, 尽管无法完全确定的是, 用以对教会的这项策略进行解释的这种唯物主义论点, 是否真正促进了婚姻应当基于配偶双方的同意这一教义的发展。教会在这些事物中的影响无疑是有限的; 例如, 正如 Marc Bloch (1961, 第 142 页) 已经指出的那样, 在爱尔兰和其他位于欧洲边缘的凯尔特地 (Celtic) 中, 亲属关系是如此的强大, 以至于封建制度 (并非主要基于家族关系的另一种联系) 在那里根本没有发展起来。Glick (1979, 第 145 页) 的理解与之相似: “亲属关系的弱化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开始寻求或接受其他有能力提供安全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并补充道, “人们可能会说, 封建关系正是为了取代或弥补亲属联系而出现的, 因此, 它们只有在后者被削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接下来 Glick 又提出, 也正是由于强大的亲属关系, 才导致封建制度并没有在西班牙的由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统治的那部分地区发展起来。^[14]

相反, De Moor (2008) 提出的观点认为, 中世纪的法人团体通常可被视作家族关系的替代物。她引用了 Anthony Black 的观点, 后者将欧洲的行会看作“人造家族 (artificial families)”, 它满足了对社会网络和社会服务的诸多需求, 而这种需求在其他社会中多由家族来满足。中世纪的“沉默的革命” (silent revolution) 是以一种亲属关系相对较弱的家庭和家族结构为前提的。

[14] 这或许多少证实了 De Vries 和 Van der Woude (1997) 的观点, 即, 封建传统的缺失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特别是当这种缺失是由强大的亲属关系导致的时候。

但是，这些情况是否真的与基督教的教义，即作为教会行动之基础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了一起？Goody很可能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Michael Mann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论述。当然，对宗教是过去人类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这种观点进行论证，几乎已经成为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的禁忌。仿佛过去几代的历史学家超越了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拒绝将这些信仰看作是过去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文化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对此加以承认）。Michael Mann在这一领域发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他在韦伯的作品中寻找灵感，但却对韦伯关于宗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点做出了重要的重新解释（important twist）。他强调（早期）基督教的“解放性”（emancipatory）特征：基督教相对来说更为民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更为合乎道德（Mann, 1986, 第325—326页）。也许这并不是巧合，即中世纪教会的行为有助于建立一种相对来说更为民主和道德的制度秩序（正如这一观点所清晰表明的那样，即，包括国王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与阿拉伯世界的简要对比

试图对西欧的成就做出解释的尝试，应该同样能够说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的相对衰落过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自发过程的结合使西欧形成了相对民主的制度，从而促进了市场交换，这到目前为止仍被认为是西欧取得如此成就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同样“民主”（就“安拉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类似的概念而言）的伊斯兰教却并未形成类似的制度？伊斯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最初极为辉煌：在被伊斯兰战士征服之后，这些地区仅仅用了一两代人

61

的时间就已发展成为高度城市化和货币化的经济体——远胜于伊斯兰世界兴起前的状况（Kennedy, 2002）。毫无疑问，西欧从伊斯兰世界获益匪浅：从（已被翻译的）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许多都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到诸如汇票、纸张和风车等重要的技术创新，更不必说“零”的概念和阿拉伯（印度）数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11或12世纪开始，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便开始减缓，而欧洲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却开始了加速发展（例如，见Glick [1979] 对该时期的西班牙北部和南部的情况所做的富有启发性的对比）。拉丁西部出现了哪些中东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不消说，这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这里，我只能试图简要地对导致中东地区无法继续维持经济强劲发展的一些因素加以描述。Toby Huff（1993）采取了一种有趣的方法：他对早期近代科学在西欧的兴起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分析了两个地区的制度发展之间存在的分歧。他试图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非中东，尽管后者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科学研究水平。他的答案过于复杂因而无法在此详细陈述，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与我们的分析极为相关。

两个地区之间的一项重要差别存在于制度方面：欧洲在12世纪出现了大学（universities），这是一种由学者和学生构成的独立团体；大学不仅在持续性上远远超过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das*）（后者更多的依赖于个别教师的声望，因而其兴衰会受到这些教师的生命周期的影响），还提供了独立的场所，以鼓励独立的研究和不同的思想，甚至是不受教会的学说约束的思想。Huff认为伊斯兰世界中并未出现这种情况：伊斯兰世界的科学研究必须在宗教学校以外进行，宗教学校仅仅从事对《古兰经》的研究（Huff, 1993）。伊斯兰世界虽然也拥有瓦克夫等“独立组织”，但无论是其任务还是作用，

与 De Moor 所说的在“沉默的革命”中形成的法人团体相比，都显得极为有限。瓦克夫由教会基金加以维持，并服务于许多不同的目的——例如慈善，医疗，以及其他社会需要——但是，缺乏灵活性的制度使其成员无法在必要时对组织的规则和程序加以更改。相比之下，欧洲法人团体的灵活性便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优势。^[15]

伊斯兰世界同样形成了一系列商业合伙制度（例如 *commenda*），它们是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法人团体的先驱。然而 Kuran 的研究却表明，伊斯兰法律的相对僵化性造成了结构性的问题，特别地，它未能形成一种以独立于其成员的形式单独存在的合伙团体的观念。“无论以何种确切形式存在的伊斯兰合伙关系，都会随其任何一个成员的死亡而宣告结束……死亡成员的继承人并不会自动取代他的位置。如果团体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对新的合伙形式进行协商，从而任何新成员的加入都会增加提早清算的风险。因此，将合伙企业保持在较小规模并限制其持续时间是有益的。”（Kuran, 2003, 第 421 页）强大的家族联系和复杂的伊斯兰遗产制度也是一部分原因。古兰经严格地规定了继承人的数目，个人几乎没有机会挣脱这些规则的束缚；“强加于遗嘱上的限制，明显地迫使个人偏好服从于大家族对经济安全和稳定的需要。”（Kuran, 2003, 第 428 页）这意味着一旦某个合伙人去世，就必须与许多继承人重新协商合伙关系，从而极易导致合伙关系的提早解散。这样，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家族的联系，就与其在形成“法人团体”的观念上的失败结合在一起，阻碍了法人实体（*corporate entities*）的发展。后者对欧洲经济的扩张起到了

[15] 事实上 Kuran 认为，一旦瓦克夫被建立起来，其自身的僵化性就会削弱人们对其运行的长期信心（Kuran, 2001）。“在实际过程中，人们经常会避开组织创始人的指令，这无意间侵蚀了瓦克夫制度的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在法律上存在疑点的适应行为都无法取代团体拥有的合法选择。”

至关重要的作用。

63 另一项根本区别是伊斯兰法律一直依赖于记忆和人证 (personal testimony), 而并没有转变为书面记录的形式, 后者是形成于拉丁西部的新型法律传统的特征。在伊斯兰的法庭中, 书面文件的可靠性必须由证人加以证实, 这与西欧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在西欧, 书面文件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比记忆更加可靠 (Lydon, 2007)。我们已经看到, 开始于 8—9 世纪时的修道院对特许状的颁布并受之约束 (作为诉求某种权利的证据) 的这场运动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 并构成了发生于 1050—1300 年间的“沉默的革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 由皇帝和国王颁布的书面特许状构成了城市宪法 (constitutions of cities), 由市政府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了行会和社团的权利与义务, 就像《大宪章》(Magna Charta) 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一样。^{*}这种书面文字运用的日益增长——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同时期书籍产量的大幅增长所证明——正是欧洲所独有的现象。^[16]作为这些过程的结果, 对读写能力和法律技能的需求增加了, 这是大学得以兴起的一项决定性因素。在 Huff 对近代科学在西欧的兴起的解释中, 大学的兴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Huff, 1993)。从某种程度上说, 大学是 12 世纪法律革命的一项副产品: 正是对法律意见以及对学者、律师、牧师和神职人员的需求促进了大学 (universitas) 的发展, 并且也几乎完全意外地创造了使科学得以繁荣的机构和平台。

* 大宪章是英国于 1215 年订立的宪法, 用来限制英国国王 (主要是当时的约翰) 的绝对权力。订立大宪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教皇、英王约翰及封建贵族对皇室权力出现不同的意见。大宪章要求皇室放弃部分权力, 及尊重司法过程, 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大宪章是英国在建立宪法政治这长远历史过程的开始。——译者注

[16] 试图对该过程进行量化的尝试, 可见 Clanchy (1979, 第 42—46 页) 和 Burgers and Mostert (2003, 第 137—139 页), 以及本书下一章中对书籍产量的估计。

两个社会之间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区别体现在城市的地位中。欧洲的城市取得了（半）独立的法人团体地位，并由商业精英进行管理。Jones 总结了这个过程，并指出“通过有效地分离城镇和乡村并使城镇服从于贸易活动，一种全新的元素出现在了欧洲，并在几个世纪内为其所独有：拥有社团身份的贸易阶级，这是最初的中产阶级。其他任何事实都无法更好地解释和说明中世纪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创新（Jones，1997，第33页）。”然而，伊斯兰世界中却没有发生任何相似的情形。Kennedy（2002）表明，城市在伊斯兰征服后的惊人发展，主要是由于国家决定以货币形式对其军队进行支付，即利用战利品和新增的税收来奖赏士兵。大城市是能够容纳大量（退伍）军人的军事营地。由于国家用货币向他们支付报酬，致使这些地区对商品的需求突然增长，加之当地已经存在的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在征服之后的最初几十年中有着惊人的发展，然而一旦最初的动力开始减弱，随之而来的便是缓慢的衰落过程。^[17] 尽管如此，商业化进程的部分结果仍然是无法改变的；商业复兴也有力地推动了更为发达的经济体的形成，从而使国家能够维持更高水平的税收，进而承担起规模更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这两者反过来又刺激了需求。

这些本质上是军事营地，并且基于国家的税收权力而存在的城市，其发展方式与商人共和政体下的西欧城市存在着天壤之别。900至1050年间（国际）贸易的逐渐增长源自领主对农民封建剥削的日益增加，它是西欧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在11—12世纪间的某段时期，城市需求的增长开始成为一种自我维持的过程，同时，为解

[17] 科尔多瓦和巴勒莫最好地反映了西欧城市的这种增长曲线；见 Bairoch 等（1988）的数据，<http://www.iisg.nl/bibliometrics/urbanisation800-1500.xls>。

决交换中的基本问题而进行的制度改良的效应也开始显现 (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扩张阶段再次出现：大繁荣在 12 和 13 世纪间有着辉煌的尾声。经济增长在 1100 年封建剥削动力减弱之后仍然得以继续，究其原因，在本章中我们所分析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制度建构 (institution-building) 过程功不可没。

结论

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00—1300 年的中世纪大繁荣是经济史中最缺乏研究的领域之一。由于缺乏历史记录和详尽数据，并且几乎没有对其进行解释的挑战性假设 (challenging hypotheses)，致使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本章试图通过对新近文献中的新旧观点加以选择来部分地填补这一空白，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发生的事实，以及它们为何发生。在本章中，我们着眼于 10—11 世纪间的权力真空的三种填补方式，它们建立了类似国家的制度，从而重新确立了法律和秩序。或许正是这种如此独特的结合，即，一方面是技术相对熟练的人口（特别是修道院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在城市中也一样）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为各种尝试提供可能的权力真空（它同时也为在各种尝试的竞争中胜出提供了激励），才能解释突然出现的“制度小发明潮 (wave of institutional gadgets)”，它是西欧在 950—1300 年间的典型特征。^[18] 许多制度在这段长期制度创新过程中涌现出来，并为欧洲所特有。

[18] 工业革命有时也被分析为“技术小发明潮 (wave of technological gadgets)”的结果。

以上的发展如何导致了有效制度的出现，并使第一章中我们所描述的交易成本和利率的降低成为可能？Douglass North（1981；1990）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主体财产权的保护，从而使它们免于国家的掠夺行为。这意味着弱势群体——穷人，农民，甚至商人和中产阶级——必须不受强势群体的侵犯，并最好能够受其保护。因此，有效的制度集合的核心便在于建立起一种平衡，从而遏制强势群体对其财富和权力加以滥用的自然倾向——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滥用。这需要“正确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惯例。发生于11和12世纪的法律革命提供了所需的法律观念，并至少在原则上确立了“法治”（rule of law），从而奠定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基础。上述内容是这个故事中的“理想化”部分，但光有这部分并不够：弱势人群需要有效的手段去实施这些观念。修道院为保护其财产权而采取了一种有力的手段，即具有优越性的书面文字。对垄断着书面文字神职人员来说，这种方法很明显能够增强其地位——绝大多数的骑士都不识字。书面文字的广泛使用最终增强了手中没有武器的人们的地位，并导致了权力被“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66（以及作为副产品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时，或许是由于该时期存在的权力真空，致使城市居民成功扫清了集体行动的障碍，并以公社，行会和其他形式的法人团体等能够促进自身利益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法人团体是西欧政治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平衡性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它们设法保护强权下的“弱势群体”（powerless）的利益。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自下而上的”制度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处于不同的状态，这导致了Tilly（1990）所分析的国家形成轨迹；经济发展在法人团体地位强大的地区表现得最为强劲（意大利、德国部分地区以及低地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对于这些发展具

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并不认为基督教就其本身而言能够成为一项重要的解释因素。“证据”之一是，在仍然受到罗马时期官僚政治结构影响的拜占庭（康斯坦丁堡）（Byzantium/Constantinople）地区，权力并没有被重新定义，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也并未改变。相比之下，随着宗教和世俗权威逐渐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拜占庭的等级制度大概变得更为森严了。引用 Angeliki Laiou（2007a，第 19 页）对 10 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描述：“皇帝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权力和权威均源自他手。拜占庭人只承认唯一的皇帝；并且，由于只存在一个上帝，基督教地区中也只存在唯一的权威。拜占庭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基督向皇帝的加冕仪式充分表达了这种权威观念。庞大的文职官僚和军队都只能依靠皇帝获得自己的权力……”从全球视野来看，这或多或少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其他地方的皇帝都拥有相同的地位，尽管实际权力有多有少。无论如何，与拜占庭的比较说明对于西欧来讲，与罗马的彻底决裂是多么重要；如果西欧也遗留着以往的权力结构的类似影响，那么在 10—13 世纪期间，令人影响深刻的制度建构过程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67 封建制和庄园制的结合在 10—11 世纪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农民日益增长的压榨导致领主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并在城堡附近形成了贸易集中地，从而使市场和集市得以复兴。但封建制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交易成本在 10 世纪间极为高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领主和国王之间战争不断，这是封建制的一个典型特征。

富有成效的封建剥削为欧洲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商业化过程随后出现，并改变了发展方向。城市的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日益突出。在几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新型制度使 1100 年之后的

加速增长成为可能。^[19] 12 和 13 世纪的经济繁荣不再是封建剥削的结果，因为在大陆上的许多地区，商业化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导致了庄园的解体和农奴的消失（只有在英国，商业化才导致了庄园制的发展 [回归]）（Poynder, 2003）。从这两种对“交换的基本问题”的中世纪的解决方式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它们构成了中世纪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力。

上文中讨论的三种趋势也推动了国家的形成过程，国家的形成基于两个基础：（1）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紧密且相对友好的城市（见第七章）；（2）逐渐将领主与农民的关系转变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近代关系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参见 Reynolds, 1984, 第 250 页之后内容）。Charles Tilly（1990）对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所做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表明，这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轨迹，分别主导着从 990 年至 19 世纪开端的这段历史：一种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轨迹，以城邦和西欧的城市带为代表；一种是威权密集型（coercion intensive）的发展轨迹，存在于次大陆的其他地区。

它同样能够解释西欧在 1000 年之后独有的政治分裂与经济扩张的结合：950 至 1300 年间，欧洲次大陆上出现了富有竞争性的国家体制，这被看作是能够解释西欧所取得的成就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存在着小型和中型的国家，而是即使在这种政治分裂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交易成本也较低，最为重要的是财产权得到了多种形式的保护。富有竞争性的国家体制就其本身而论并不能（并不有助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能够对其做出解释的，是政治竞争和经济合作（通过贸易）的结合，它对

68

[19] Britnell（1996）将第二次扩张确定在 1180 至 1330 年间；或许在大陆上开始更早。

该地区的长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过程表明了欧洲在随后几个世纪间的特征：相对民主的政治，^[20]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以及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结构（包括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人们（通常）会遵守（书面的）法律，并能够采取相对有效的方法创立新制度并调整旧制度（行会、大学、公社、市民制度、法庭、委员会、集会和议会、特许状和特权、市场和集市）。简言之，欧洲次大陆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不过，关于这种特殊的制度结构实现长期经济扩张的方式，则是本书其余部分的内容。

[20] Hyde (1973, 第 54 页) 阐明了公社“为了自身利益而充分参与决议制定过程”，但同时补充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旧式意义或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他同时也指明了这个原则，即“权力是由共同体授予的”。

第三章 中世纪知识经济兴起的反映： 书籍产量，500—1500年

69

(与 Eltjo Buringh 合作)

引言：书籍产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在前两章中，我们论述了能够管理市场交换的有效制度在中世纪欧洲的出现，包括对法律传统的形成方式的讨论。书面文字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根本作用，同时它也导致了读写技能需求的不断增长。本章通过着眼于书面文字材料，特别是作为知识载体的手写本和印刷品，以及从书籍生产和消费发展情况推断出人力资本的增加，从而对前两章的内容加以补充。为了能够以量化的形式衡量西欧的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在这几个世纪间的发展过程，本章将集中于研究在500—1500年这一千年中西欧地区的手写本和印刷品产量增长的估计值。首先，我将阐明我们能够从书籍产量的研究中了解到什么，然后分析这一代表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指标的发展情况。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说明了书籍产量的惊人增长以及产生这种增长的核心地区在哪里，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说明了这一过

程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书籍是极富战略意义的商品。它是社会基本信息结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种能够储存全部思想的“硬件”（hardware）——至今仍具有这种功能。因此，书籍的生产和积累能够反映思想的形成和积累——后者是外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中的一项重要变量（Kremer, 1993）。特定社会对书籍的需求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水平，尽管其他变量，如人均收入和书籍的相对价格，以及宗教等文化因素也都会产生影响。总之，书籍产量与人力资本和知识产量等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的变量之间存在联系。

其次，书籍和手写本是奢侈品，其需求会随收入增长而增加。因此，经济繁荣一般将导致书籍产业的发展；而经济萧条（以及战争、侵略和国内动乱）将导致书籍产量和需求下降。^[1]最后，由于该时期的许多文物都被保存在博物馆中或是被私人所收藏，因而能够统计其数量并加以分析，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大量文献对该时期的书籍生产进行了研究，并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统计和分析。有关手写本和印刷品在何时何地抄写和出版的信息通常易于获得，这使我们能够构建包含这些信息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对 500—1500 年间手写本和印刷品的总量进行估计。

这些论点表明，在特定社会中，手写本和印刷品的数量是能够反映经济表现和社会力量的多层次指标，因此，它们是研究长期经济变迁过程的宝贵指引。对卡洛林帝国的研究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正如 Rosamond Mckitterick（1989，第 63 页）所言：

[1]. 以最新的数据（大约 1995 年）为基础，我们能够证明，书籍生产和人均 GDP 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r 值约为 0.90 或更高；书籍产量的数据来自 http://www.ipa—uie.org/statistics/annual_book_prod.html；人均 GDP 数据来自 Maddison（2001）。

书籍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一样，都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标志。作为奢侈品贸易的一部分（如今很多都是必需品），书籍贸易应当被看作是反映人们支出方向的重要指示。此外，卡洛林帝国时期的遗留书籍是反映帝国繁荣程度的一项指标，这项指标虽然清晰，但却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没有历史学家敢于在评价卡洛林帝国时期的经济活动水平和范围时忽略书籍产量和持有量这两个因素。在这个经济体中，读写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真的就像我们即将表明的那样，对书籍的“投资”在早期处于较低的水平，那么当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在随后的时期中被用于购买这种奢侈品时，情况也一定相同。因此，书籍生产的量化研究使我们能够解决欧洲经济史中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增长的发生时期相关：例如，欧洲经济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哪段时间中处于最低水平？是在6—7世纪之间，还是直到10世纪才开始复苏？中世纪鼎盛时期的书籍生产（以及总体经济状况）具有多大的活力，它是如何对中世纪晚期著名的“危机”做出反应的？或者，黑死病之后那段时期的经济状况相比之下是否更为繁荣？发明于1450年左右的印刷机对书籍产量具有什么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与欧洲经济的区域格局相关的问题：书籍生产的中心从南方移动到了北方，从地中海移动到了北海地区，并预示着根本性的经济变迁。这仅仅是个别的情况，还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拉丁西部发现一系列的经济中心转移过程？

进一步来说，为什么书籍产量在长期中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增长？收入增长和城市化如何影响了这种增长？修道院发起的运动如何影响了书籍产量，书籍产量与大学（从11世纪开始）的兴起之

间存在联系吗？在（人均）书籍产量和消费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同时，其他反映人类福利的指标却并未出现长期的提高（Koepke and Baten, 2005），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总而言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知识和人力资本在 500—1500 年间的积累？

我们将首先展示作为本章内容之基础的数据库和估计值（第二节），随后对这些模式（patterns）按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进行分析（第三节）。这两节共同回答了书籍生产的时间问题和地点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500—1500 年间书籍产量增长的决定因素（第四节），最后，我们将考察影响该时期人力资本增长的其他因素。

数据库和估计值

本节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们对 500—1800 年的手写本（manuscripts）和印刷品（printed books）产量的估计。数据库由两部分构成：手写本产量在 500—1500 年间的估计值和印刷品在 1454—
72 1800 年间的估计值。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以单独的手写本为分析单位，在第二部分我们以（新）出版物（title）和版本（edition）为分析单位；另外，我们估计了 1454—1800 年间的书籍平均印刷量，借此同样能够对该时期的书籍总产量进行估计。我们的研究对象为西欧地区，国家的划分以当前界限为准：不列颠群岛（在印刷品的研究中区别了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岛 [Great Britain]）、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伊比利亚半岛（印刷品的研究仅限于西班牙）、奥地利、波希米亚（捷克共和国），以及中欧（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瑞典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对印刷品的研究中，波兰、瑞典以及俄罗斯被单独加以分析，但是，对俄罗斯的分析是试探性的，并且有关它的数据并没有包括在对西欧的估计之中。

在后面的附录中，我们展示了更为详尽地估计手写本和印刷品产量的方法，并提供了手写本产量在6—15世纪间的详细情况。^[2]对手写本来说，我们（以参考文献为基础）构建了501—1500年间西欧11个地区生产的17352种手写本的数据库。数据的代表性通过将其结果与以下的详细研究进行对比而得到了证实：对5—8世纪间拉丁文福音书（Latin gospel）的研究，对9世纪修道院书目的研究，对11—15世纪间拉丁文动物寓言集（Latin bestiaries）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欧洲语料库（European corpus）的研究，它包括超过15000册标明了日期的手写本（*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Datés, housed in libraries in Austri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Netherlands, Sweden, Switzerland and Vatican City*）。

随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数学运算，以修正数据库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地理偏差（geographical biases）和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es）。首先，我们运用空间校正因子（spatial calibration factor）来标准化数据库中手写本产量的空间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这一校正因子通过将地理上的过量或者不足量的样本（相对意义上的）（over-or underrepresentation）与数据库中的总体平均值相比较，从而对数据进行合理调整。接下来，我们确定数据库中手写本数量的相对的时间分布（temporal distribution），并且这一分布数据除以Neil Ker（1964）在手写本中提供的跨期（over time）分布数据；再把算出来的结果，即倒数因子（reciprocal factor）乘以上面获得的空间校正地理分布（spatially calibrate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现在我们生成的时间分布还是一个相对数，这一相对数要与不同国家的规模相匹配，从而得出拉丁西部的尚存的手写本的绝对数量。 73

[2] 附录可见“世界历史文献计量学”的网站，<http://www.iisg.nl/bibliometrics/>。

对于6、7和8世纪中的产量，我们采用Elias A. Lowe在*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系列和他们的附录中提供的尚存手写本的绝对产量来确定规模因子（scaling factor）的值。对于9世纪的数值，我们用Bernhard Bischoff和Birgit Ebersperger提供的对拉丁西部的尚存的大陆手写本的估计值来确定规模因子的值，当然，我们把9世纪的西哥特人（Visigoth）*和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尚存手写本的数字也加进去了（Bischoff, 1998, 以及Bischoff and Ebersperger, 2004）。对于13世纪的书籍产量，我们用Ron Baxter提供的尚存的英语中世纪动物寓言集（bestiaries）的数量来确定规模因子的值，并且将这一计算结果与Neil Ker的分布数值和数据库相比较。对于10和12世纪的数据，我们运用9和13世纪的数据进行插值（interpolate）推算，对于14和15世纪的数据，我们采用外推法（extrapolate）获得。

现在我们就获得了尚存手写本的绝对数量分布，然后乘上每个世纪的特定因子（century specific factor），这一因子可以弥补由于我们缺失制造商信息而导致的少量数据不完全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估计出原始产量。我们从Neil Ker提供的数据中得到了从12—16世纪的手写本的（几何）平均损失率（average loss rates）。对于12世纪之前的手写本平均损失率，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即之前中世纪的每一个世纪的损失率都为25%。有了这些损失率的数值，我们就可以估算不缺失的部分的数值，然后，通过将每一个世纪的尚存的手写本产量的数值除以不缺失部分的数字，我们最终就可以估计中世纪的手写本产量。

* 西哥特人是日耳曼族的一支族，于公元4世纪入侵罗马帝国并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建立了王国。——译者注

对对印刷品产量的估计值是这样得到的，即用 1454—1500 年间西欧的出版物（title）数量或版本数（edition）乘以对平均印刷量（print run）的估计值。^[3] 出版物（title）和版本（再版）的定义来自于 OECD*，目前 OCED 也正在收集这类数据，^[4] 根据 OCED 的定义，一项出版物（title）是“构成单独总体的印刷出版品，无论发行了一版还是多版。不同国家中以不同语言发行的同一项出版物，应分别视作单独的出版物”。这包括初版和再版，后者是“由于内容修改（修订版）或是版式变动（新版）而与之前版本存在区别的出版物，而且需要新的 ISBN 出版号”。出版物可以是书籍（根据定义，需要多于 49 页），或是小册子（例如，小型出版物）。古腾堡圣经（Gutenberg's Bible）的第一次出版便是一项出版物，新版圣经将会被再次计算，但对同一原本进行的不加任何修改的重印则不会被包括在内。”

[3] 1454 年后书籍产量的估计值，见第六章。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 30 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 1961 年，目前成员国总数 34 个，总部设在巴黎。——译者注

[4] OCED 的定义：OCED 收集以下数据：某个特定国家中公众可以获得的非期刊印刷出版品的数量（书籍和小册子）。除非另外说明，对出版物的统计都将初版和再版的数量共同包括在内；出版物的定义：构成单独总体的印刷出版品，无论发行了一版还是多版。不同国家中以不同语言发行的同一项出版物，应分别视作单独的出版物；初版：首次发行的原稿或翻译稿；再版：由于内容修改（修订版）或版式变动（新版）而与之前版本存在区别的出版物，需要新的 ISBN；见 http://www.uis.unesco.org/ev.php?ID=5058_201&ID2=DO_TOPIC。

** 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作谷登堡、古登堡、古滕贝格），约 1400 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1468 年 2 月 3 日逝世于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在古腾堡以前许多世纪，中国人就懂得刻板印刷术，在中国发现了注有 868 年印刷的书。在古腾堡以前，西方人也懂得刻板印刷术，刻板印刷可使一本书印成许多册。但是这种方法有一项很大的缺陷，就是印刷每一种新书都需要一套崭新的木刻或印板，因而出版种类繁多书是不切合实际的。尽管活字印刷术数百年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现，但并未流行，因而近代的活字印刷术主要来自古腾堡的发明。1455 年 2 月 23 日，约翰内斯·古腾堡用活字印刷机第一次印刷了《圣经》。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亦称四十二行圣经，即 42-line Bible）是《圣经》拉丁文译的印

对于新出版物的计算来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高级目录（meta-catalogue）（或是简明目录），它们以图书馆书目中记载的和目前保存着的在不同国家和以不同语言出版的书籍目录为基础。如果能够获得有关古版书（incunabula）的一项重要高级目录对于我们的估计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西欧在1500年前出版的所有书籍的目录。^[5]

75 我们的数据应被看作是对最低数量（lower-bound）的估计：我们并未考虑那些已经无处可寻的书籍，也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书市上的书籍也仅仅是书籍总量的一部分。连续的出版物也并未被包括在内。对印刷量的估计也是保守的：我们参考的文献表明，年均出版数量在1450—1500年间从100增长到了700；有足够的证

刷品，由古腾堡于1454—1455年在德国美因茨采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这个圣经是最著名的古版书，它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图书批量生产的开始。——译者注

[5] 此外，也可以获得其他书籍的高级目录：荷兰和比利时生产的书籍，英文书籍（不止覆盖了大不列颠地区，也包括爱尔兰、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以及——这份目录有时并不完整——西欧在1454—1830年间生产的书籍（所谓的《手工印刷书籍档案》[*Hand-Press Book File*]）。对少数国家——特别是瑞典和瑞士——来说，后一种目录似乎并不完整。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始资料对新出版物数量的低估程度，可以通过将其与更为完整的古版书简明目录（*Incunabula short title catalogue*）加以比较的方式进行估计。这使我们能够估计出前一种数据集对1454—1500年书籍产量的低估率，从27.5%（法国）到48.4%（意大利）。为了估计每个国家的书籍总产量，我们用该低估率修正了根据《手工印刷书籍档案》得出的书籍数目，从而得出了1455—1800年间书籍产量的系统序列。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即它假定《手工印刷书籍档案》的低估率是恒定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例如，资料中记载的西班牙出版物的数量似乎发生了间断，从1700年的742突然降低到了1701年的175，以及1702年的133。）因此，我们以国家为单位检验了该方法的结果，详见附录II，也可见<http://www.iisg.nl/bibliometrics>。相同的方法可被用于估计德国和波兰（以及俄罗斯）的新出版物数量，但其结果却远远低于该时期的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书展的书目中提到的新出版物的数量（该系列书展开始于1565年）；因此，《手工印刷书籍档案》以及附加的修正在这些事例中严重地低估了新出版物的数量。对于这些国家，我们依靠书市的数据加以估计，尽管也存在低估（书市中并不包括所有的书籍）。最后，对于挪威、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这六个国家，我们无法直接估计其书籍产量，因为《手工印刷书籍档案》和书市目录中包含的书籍数量非常之少。为了获取与1500年前手写本产量估计值具有可比性的西欧地区的总体估计值，我们以上述六个国家在《手工印刷书籍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为基础估计了印刷产业的总量——但这一比例却极其微小（1454—1500年间为0.18%，在18世纪间增长到了1.54%）。

据表明 1500 年后仍然存在着增长，只是速度放缓了。^{〔6〕}

对 15 世纪后半叶来说，可以将两种估计书籍产量的方法加以比较。维基百科列出了 18 所收藏有最重要古代书籍的图书馆，以及每所图书馆的收藏数量。可以计算出这 18 所图书馆收藏的古版书数量与它们收藏的手写本总量间的比率，为 1 : 4.95。保存下来的手写本总量估计在 290 万册左右，这意味着全世界目前仍存在着大约 590000 册古版书。据 Neddermeyer (1998, 第 77 页) 的估计，古版书的平均保存率为 4.2%，因此可以推测，古版书的平均产量为 1380 万册。该结果与另一种方法的结果非常吻合，即计算版本数并将其与平均印量相乘，其结果为 1260 万册。因此，计算古版书数量的不同方法得出了非常近似的结果。

长期模式

欧洲书籍产量在这段被研究的时期中出现了巨大规模的增长，在 500—700 年间中，每个世纪的手写本产量仅仅稍高于 12000 册（每年 120 册），而到了 15 世纪，手写本数量已经超过了 500 万册，书籍数量更是超过了 1250 万册（见表 3）。由于年代跨度很大，因此平均增长率并不十分显眼：从西欧地区整体来看，年平均增长率仅稍高于 1%。表 3 同样反映了书籍产量的高低变动。起初，在 6—7 世纪间出现了下降：7 世纪的书籍产量在这一序列中处于最低点，这与最近对西欧经济在（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长期发展情况所作的解读相

76

〔6〕 我们姑且推测在 1800 年出版数量达到 1000，可能这也是一个保守估计；比如，Harris (1984) 认为在 16 世纪这一水平已经达到，但这可能有高估的嫌疑。关于出版数量的讨论，可进一步参见 Febvre 和 Martin (1976, 第 216—222 页)；St Clair (2004, 第 458 页及以下页、第 466 页) 和 Harris (1984, 第 121 页)。

表3 每世纪手写本出版的绝对数量（6—15世纪）

世纪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中欧	0	0	0	0	0	3983	27530	120987	301833	376650
波西米亚	0	0	0	0	0	657	1136	5377	42066	45363
不列颠 群岛	81	1026	5474	7926	9793	20360	81044	200654	155513	208729
法国	1682	2441	15920	74190	12752	45061	197831	510828	564624	1195783
比利时	0	127	1111	3029	1555	8529	43219	119588	106148	572124
荷兰	0	26	60	82	58	354	1731	2066	13179	171974
德国	0	0	7503	59771	45703	49548	166876	270392	293814	515116
瑞士	0	30	594	5330	1799	1090	2355	3821	6349	10652
奥地利	0	0	2735	9414	0	2808	37370	37408	39777	88623
意大利	10194	4478	6536	20307	15215	38768	95207	253013	879364	1423668
伊比利亚	1594	2512	3770	21693	48763	40871	114422	237818	344284	390478
西欧	13552	10639	43702	201742	135637	212030	768721	1761951	2746951	4999161
每世纪 增长(%)		-21	311	362	-33	56	263	129	56	82

资料来源：全球历史文献计量学网站上的附件，网址是 <http://www.iisg.nl/bibliometrics/>。

一致。^[7]紧接着，卡洛林帝国的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出现于8—9世纪间，这是书籍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尽管起点很低（有关该时期书籍产量增长的内容，见 McKitterick, 1989）。很可能是由于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的解体，以及维京人（Vikings）和马扎尔人（Magyars）自北面和东面的入侵，书籍产量在10世纪中再次下降，这在法国和奥地利表现的最为明显。^[8]持续的复

[7] 对这些讨论的最近的概述，见 McCormick (2011) 和 Verhulst (1989, 1999)。

[8] 书籍产量在法国的下降最为剧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0世纪间出现在法国的权力真空是帝国解体的结果，它导致了试图重塑法律和秩序的“上帝的和平”运动，见 Cowdrey (1970) 等研究；西欧其他地区所受影响较小；德国相对良好的表现，以及英国和爱尔兰书籍产量的持续增长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0世纪晚期的德国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王朝复兴”；在英国和爱尔兰，政治发展（集权化）和修道院生活的盛行导致了书籍产量的进一步增长。

苏出现在 11 世纪（恢复到了 9 世纪的水平），并发展为欧洲中世纪经济在接下来的 250 年中的一次显著扩张。书籍产量从 11—13 世纪的骤然增长尤其值得注意。

1348 年的黑死病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水平下降对书籍产量有着复杂的影响。正如图 4 所示，书籍产量在短期内出现了急剧下滑。^{*}图 4 的数据来自 Neddermeyer (1996)，它包含对德语国家 1300—1500 年间注有日期的手写本进行的更为详尽的（以年代为单位）估计。^[9] 14 世纪上半叶的快速增长突然停止了，而且，新手写本的产量从 1340/1349—1360/1369 年下降了大约 50%，但在同一时期，人口数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然而，产量在短暂下降之后便显著回升，进而出现了急剧增长，并在随后的一百年中增加了 10 倍；平均增长率在 13 世纪 60 年代至 14 世纪 60 年代间达到了 2.2%，反之在 14 世纪上半叶中只有 1.8%。^[10] 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手写本产量在 1470 年后的急剧下降，如图 4 所示，而且在欧洲各地都能发现这一趋势。但是显而易见，人均书籍产量在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仍然保持着增长，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中世纪晚期的危机”（Epstein, 1991; Hatcher and Bailey, 2001）。增长在 1370 年之后很可能出现了加速，并且在 1470 年之后，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第二次加速。1450—1500 年间的书籍产量已经是整个 15 世纪手写本产量的 150%，后者又几乎是 14 世纪手写本产量的两倍（见表 3）。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对不同国家的模式加以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书籍产量在总量中占据较大部分的国

* 原文为图 3.1，疑有误，应为图 4。——译者注

[9] 中欧地区在这里是指大陆上的德语地区，包括德国、奥地利和部分瑞士。

[10] 也可见 Bozzolo 等（1984）。该书展示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中相似的书籍产量时间序列，它们都反映了书籍产量在 14 世纪后半叶和 15 世纪间的强劲增长。

家，以大国为主；以及人均书籍产量最高的国家（这里小国的表现更为突出）（见表3和表4）。这种方法的问题之一是国家的规模存在区别；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北部（包括巴黎）的更为详尽的数据，这两个地区的人均数据很可能就会更高。

79 在6—7世纪间，书籍产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经济的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中保持的完整程度。意大利在6世纪（依旧）是最重要的书籍生产中心，无论在绝对数量上（它生产了占总数三分之二的书籍）还是在人均数量上都是如此。这可能是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重要复兴，或者说是由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建立的，以拉文那为首都的，作为拜占庭附属国的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的最后一次复兴。^{〔11〕}7世纪中，意大利的书籍产量出现了实质性下滑，并且只是部分地被其他地区，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等地的增长所弥补。从人均产量方面来看，爱尔兰可能在8—9世纪间遥遥领先，根据我们的数据，爱尔兰的产量占到了该地区手写本总量的36%（7世纪）—28%（9世纪），而其人口数量可能还不到不列颠群岛人口总数的20%。

在卡洛林帝国时期形成了新的书籍生产地域结构：查理曼帝国（Charlemagne's empire）的核心区域（法国北部、比利时以及德国西部）的手写本产量在总量中占据了较大部分，瑞典、奥地利和西班牙是另外三个重要地区。西班牙在10世纪中暂时处于领先地位，这反映了（伊斯兰统治下的）西班牙经济在该时期的重要性（Glick，

〔11〕 见 Bertelli（1998，第55页），他表明“没有任何其他的西方主要城市像东哥特国王治下的拉文那一样，有着如此大规模的书籍生产活动和如此繁荣的书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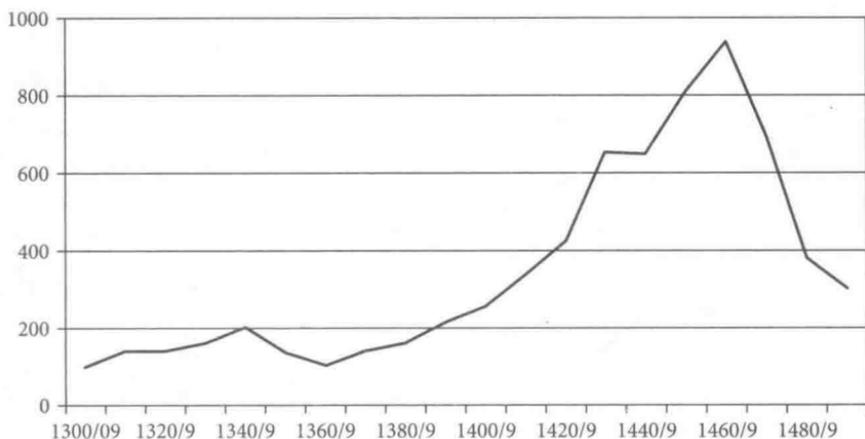


图 4 中欧地区手写本产量的变化估计, 1300/1309—1490/1499 年
(1300/1309 年 = 100)

资料来源: Neddermeyer, 1996

1279)。法国和德国在 12 和 13 世纪中再一次成为最重要的生产中心，与之相邻的比利时拥有最高的人均产量。因此，800 年至 1300 年这段时期——10 世纪的危机阶段除外——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连续性，（前）卡洛林帝国的核心地区在这一产业的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再一次成为最重要的书籍生产中心；然而，德国和法国的生产却在 14 世纪间发生了停滞。总产量在不列颠群岛和比利时甚至出现了下降，尽管后者仍然在人均产量方面保持领先。古版书（incunabula）在 1454—1500 年间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尽管古腾堡的创新出现在了德国南部，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还是迅速成为了最重要的书籍生产国。意大利也是在 1454—1500 年中唯一一个能在人均产量方面与瑞士和荷兰等小国相抗衡的大国。因此，意大利（北部）的产量突增导致了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前卡洛林帝国的核心地区（比利时，德国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法国的东部和北部）与意大利北部联系在了一起。

文艺复兴由此见证了西欧城市带 (the urban belt of Western Europe) 的出现: 自意大利北部起, 经过德国南部, 最终延伸至西欧的新核心地区, 即低地国家 (De Vries, 1984a)。

欧洲的一体化: 书籍产量的趋同

研究 1500 年前数世纪中书籍产量的惊人增长的一种方法, 是将书籍看作一项成熟于 300—800 年间的创新。散装书和线装书 (codex or bound book) 发明于 2—4 世纪, 并逐渐取代了笨重的书卷 (Brown, 2003, 第 23 页)。大约 600 年左右, 爱尔兰的僧侣发明了将不同单词以空格隔开的书写方法, 从而极大地方便了阅读。最终, 大约在 800 年左右, 现代标点符号、统一的字母和段落

表 4 每年的人均写本书籍产量 (每百万人口), 6—15 世纪

世纪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中欧	0.0	0.0	0.0	0.0	0.0	10.8	72.4	186.1	443.9	509.0
波西米亚	0.0	0.0	0.0	0.0	0.0	8.2	10.3	35.8	247.4	283.5
不列颠群岛	0.9	11.4	54.7	61.0	54.4	88.5	270.1	466.6	370.3	485.4
法国	3.5	5.1	32.5	142.7	22.0	62.6	217.4	384.1	418.2	919.8
比利时	0.0	4.2	37.0	101.0	38.9	170.6	540.2	1087.2	1061.5	5721.2
荷兰	0.0	1.3	3.0	4.1	1.9	8.9	34.6	29.5	188.3	2149.7
德国	0.0	0.0	23.4	181.1	134.4	130.4	333.8	360.5	376.7	660.4
瑞士	0.0	1.0	19.8	177.7	60.0	27.3	47.1	54.6	90.7	152.2
奥地利	0.0	0.0	54.7	156.9	0.0	35.1	339.7	233.8	248.6	553.9
意大利	25.5	12.4	17.2	47.2	31.7	71.8	146.5	294.2	1034.5	1674.9
伊比利亚	3.7	6.4	9.7	51.7	110.8	83.4	193.9	312.9	453.0	550.0
西欧	6.5	5.3	20.9	88.1	52.6	70.2	206.1	330.0	507.8	929.2
变异系数	2.37	1.56	0.83	0.81	1.06	0.80	0.77	0.90	0.67	1.23

资料来源: 用表 3 的数据除以来自 McEvedy 和 Jones (1978) 的人口数据。

划分的采用大大帮助了读者快速理解文章内容。总之，新的信息技术得到了创造，并推动了欧洲经济随后的发展（Ulrich Blum and Leonard Dudley, 2003）。表3和表4中的书籍产量增长总体上与以下观点相符合：最初的增长率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在8至9世纪之间，这一增长同时伴随着书籍生产从作为中心区域的意大利向整个欧洲的传播。

81

此外，中世纪鼎盛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新，不仅有代替了羊皮纸的草纸，还包括图书租借制度（*pecia system*）*等更为有效的手写本制度的传播（Rouse and Rouse, 2000），以及15世纪的印刷术等。这些新技术大幅降低了书籍的价格，并为增长过程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图5反映了人均书籍产量在三个不同地区和欧洲整体的长期变化趋势，令人惊讶的是，这几个地区的长期变化趋势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表现出高度的同步性。书籍产量的惊人增长出现在了所有地区（只有一两个例外，如1000年后的爱尔兰），并以大约相同的速度进行着，从而证实了西欧在这方面的统一性（unity）。

然而，故事其实更为复杂。供给和需求在500—1500年的千年里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修道院运动（*monastic movement*）与书籍的生产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存在着紧密联系：修道院不仅是最重要的书籍供给来源，还是最大的需求来源。履行宗教职责和研究上帝之道（*the word of God*）是这些“祈祷者集团（*powerhouses of prayer*）”核心任务。因为自基督教早期开始，即使是对官方信条的微小偏离也会使一项宗教仪式变得无效。书面指导是重要的，这导

82

* 这一教科书的租借、复制体制诞生于13世纪初期的意大利的大学，后来在该世纪的后半叶传入法国的巴黎大学。把每本教科书按照章节分割成几部分，学生可以租借其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进行复制。这增加了教科书的利用率，满足了学生对教科书的需求，也有助于降低学生的学习成本。因为在当时，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拥有自己的书籍仍然是一种比较奢侈的事情。——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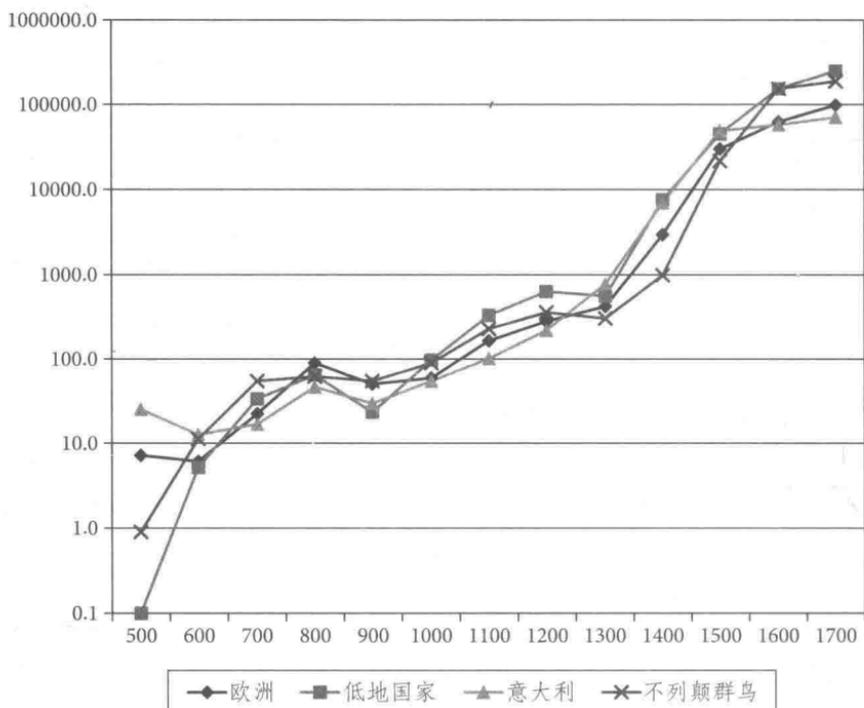


图5 西欧地区每百万人口的书籍产量，501/600—1701/1800年

资料来源：表4和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致修道院和教会对书面材料不断强调。在市场还极为软弱，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中世纪早期，书籍生产只能在修道院内部进行，并以其农业剩余（surplu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作为经济支撑。Michael Gorman（2002，第229页）解释了这些联系。在对11世纪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Tuscany, Italy）最重要的修道院之一，即 Monte Amiata 修道院的手写本产量所做的研究中，他揭示了修道院的经济状况与其图书馆之间的紧密联系：

修道院的经济史非常值得强调，因为手写本的生产与有利

的经济因素是一致的。缮写室的积极发展有赖于拥有丰富样书的藏书室，并且两者都需要有力的资金支持。农民必须辛苦地饲养绵羊，制造羊皮纸，并供养在修道院的藏书室和缮写室中长期劳累的僧侣们。

因此可以推测，中世纪早期的书籍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修道院数量和规模的影响，进一步又决定于相应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有多少农业剩余分配在了这些方面。

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我们以不同的资料为基础（图2，表2）推测了修道院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世纪中的估计数量，并将其与同一时间和地点的书籍产量对应起来（见图6）。^[12] 两个变量间的关联性是一致的，从而证明了修道院对书籍产量增长的重要作用。

修道院数量在中世纪的迅速增长反映了一种持续的增长模式。在中世纪的前半段，修道院的数量在每个世纪都会增加1000以上，在随后的10—12世纪中更是出现了激增。10世纪早期的克吕尼（Cluny）改革运动后来逐渐传播到了拉丁西部的其他地区，它能够部分地解释这种激增。很明显，这些改革增强了人们对修道院及其提供的仪式（如对逝者灵魂的祈祷）的信任，从而使更多的财富被用于这类宗教仪式。采邑制（*seigneurie*）兴起于10—11世纪，封建领主（local lords）对其城堡周围的农村具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并凭借自身的权威向地方居民强行施加新的税种和劳务，或是重新征收旧有科类（Fossier, 2000; Bisson, 1994; Wickham, 1997）。修道院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这些变革。所有这些都使修道院

[12] 修道院数量和书籍产量的零值并未包括在图3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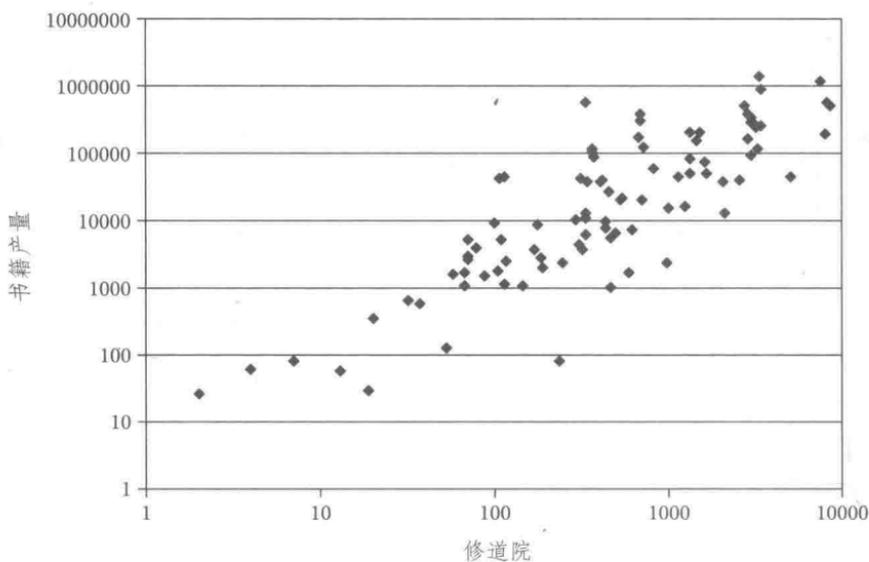


图6 书籍产量和修道院数量，6—15世纪（以对数表示）

资料来源：表2和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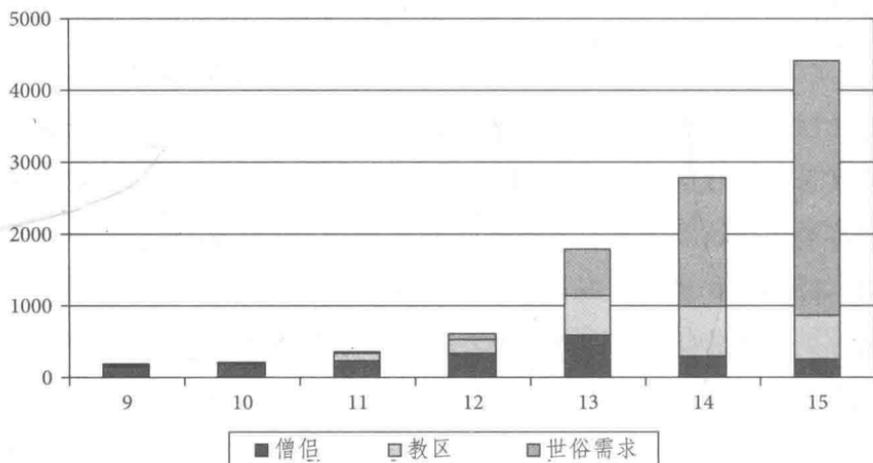


图7 欧洲对书籍需求的结构估计，9—15世纪

资料来源：Buringh, 2008。

运动在 900—1300 年间风起云涌，从而大大增加了书籍产量。修道院运动的迅速发展终止于 1300 年左右，1300—1500 年间，拉丁西部修道院数量稳定在了大约 21000 所。^[13]

相关文献表明，其他需求来源——城市，大学，以及更广泛地来说，世俗人群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在中世纪鼎盛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Rouse and Rouse, 2000）。我们在其他研究中检验了关于书籍生产决定因素的假说（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回归结果证明了相关文献中关于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和大学在 1000—1500 年间的重要性的假设，但它们同样表明，城市化甚至早在公元 1000 年前就已经具有一定影响。

另一种解释产量增长的方法是再现书籍需求的来源结构，Buringh（2008）完成了这一工作。在对僧侣（clergy）数量、教区（parishes）数量、城市化比率以及城市精英书籍需求的发展进行的试探性估计的基础上，他能够将手写本供给的增长归因于不同的需求来源（图 7）。僧侣需求在 1000 年主导着书籍生产，随后被教区需求所取代（它构建了密集的联系网络）。1200 年后，城市精英的需求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市场导向的制度转变完成于 14—15 世纪间，并且超过 60% 甚至超过 80% 的市场都是城市的需求所推动的。

85

[13] 只有荷兰是这种趋势中的一个例外，因为其修道院数量在不断增长（以城市修道院为主的规模相对较小的修道院在 15 世纪间的迅速发展很可能与这一时期集中在荷兰北部地区的现代灵修运动 [Modern Devotion] 有关）。

其他证据：读写能力与年龄集聚*

500—1500年间书籍产量的巨大增长意味着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我们必须记住，积累是从很低的最初水平开始的。积累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修道院运动的推动，但是，从中世纪鼎盛时期开始，一场更为广泛的人力资本形成过程开始了，并根植于新兴城市之中。那么，人口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人力资本形成这三项指标在中世纪晚期大体上处于何种程度？

86 第六章包括了对1450—1800年间的情况进行的估计，它以书籍产量的数据为基础，并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检验和确认。估计结果表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大约只有八分之一的人口具有读写能力。事实上，这种读写能力通常仅仅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契约（通常是婚约或是出生证）上签名——然而，相对于在中世纪早期已成为常态的极低的人力资本形成水平，12%的识字率在当时已经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前几个世纪的人口读写能力所做的高度试探性估计如下：11世纪的识字率为1.3%，12世纪的识字率为3.4%，13世纪为5.7%，14世纪为6.8%，15世纪上半叶为8.6%（1451—1500年间为12%）（详见第6章）。这些比率反映了人口读写能力的缓慢提高，以及在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明显加速，人力资本形成在这段时期中得到了更强的激励。

然而，不同地区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城镇和乡村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识字水平在从意大利北部到

* 在人口统计制度不太健全、文化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或国家中，进行分年龄人口统计时极易产生误报现象。许多人偏爱某些特定数字，在申报年龄过程中喜欢“凑整”，即将处于整数年龄组中间的年龄凑成整数，如10、15、20、25、30等等。这种现象在人口统计学中称之为“整数偏好”。其直接后果是分年龄组中的人口多集中在以“0”或“5”为尾数的整数年龄组，这导致了年龄集聚现象（age heaping）的产生，严重地影响了人口资料的准确性。——译者注

低地国家的城市带中最高，但即使在这些地区，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大的区域差异。Alain Derville (1984) 发现，法国北部（靠近佛兰德斯的城市地区）的识字水平在 1420—1550 年间出现了显著提升，这与中世纪晚期教育供给水平的增长相符。更多的定性资料证明了（例如）荷兰地区具有的高识字水平；证据之一是 Lodovico Guicciardini 自 15 世纪 60 年代起的游记。他的叙述表明，几乎所有的荷兰人都能够阅读和书写，住在农村的人口也不例外（Van der Would, 1980, 第 257 页）。

表 5 低地国家和西欧其他地区的年龄集聚，15/16 世纪

	时期	N	城市 / 乡村	Z—所有	Z—男性	Z—女性
荷兰	1514	1430	两者兼有	21	21	—
荷兰 / 泽兰	1505/1541	105/24	乡村	13	14	12
佛兰德斯 / 布鲁日	1470—1520	231/224	城市	14	14	14
佛兰德斯 / 乡村	1470—1570	1616/41	乡村	13	12	14
英格兰	14 世纪	235	乡村	31	31	—
佛罗伦萨	1427	14.358	城市	22	15	30
托斯卡纳	1427	104.835	乡村	41	34	48

资料来源：De Moor and Van Zanden, 2008。

了解中世纪晚期人力资本形成的发展的数量维度的一种方法，是衡量“年龄集聚 (age heaping)”的程度。年龄集聚是指当不具备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人对自身年龄进行粗略估计的方法：当他们被问到有多大年龄时，他们通常不会说“39岁”，而会说“40岁”或“大概40岁左右”，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也并不习惯每年都记录自己的年龄。从人口普查或类似的资料中可以估计出有多大一部分人口四舍五入了自己的年龄。通常来说，年龄的最后一个数字为0和5的人大约有20%，但是，当年龄集聚发生时，这一

比率就会高出许多。衡量年龄集聚的一种方法是 Z 系数法，它直接反映了百分率高于 20% 的程度。Z 系数越高，年龄集聚现象越严重。研究表明，年龄集聚的百分率与给定人群的计算能力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这再一次与识字水平紧密相连（A'Hearn, Baten and Crayen, 2006）。

87 对低地国家来说，我们能够发现若干来自 15 和 16 世纪的原始资料，从而能够衡量年龄集聚的程度（De Moor and Van Zanden, 2008）。数据涉及 1500 年左右的布鲁日（Bruges）及其附近的农村地区，以及同时期的荷兰和泽兰（Zeeland）（表 5）。我们将这些数据与对 14 世纪的英国（它或许反映了中世纪欧洲的更为常规的模式）以及 15 世纪中西欧最富庶的两个地区，即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所做的类似估计进行了比较。结果十分引人注目：年龄集聚的程度在低地国家极低，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并没有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发现区别。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可以认为，在落后的德汉（Wenduine）（佛兰德斯附近农村的数据来源于此），布鲁日贫穷的近郊，以及荷兰和泽兰的乡村之中，平均人力资本形成水平竟远远高于富庶的佛罗伦萨地区！托斯卡纳地区的模式与预期一致：男性和女性之间，以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这两种差异的源泉在低地国家的数据中都完全不存在。出人意料的是，在 1514 年的一项要求提供年龄的政府调查中，农村和城市的上层人口的表现却远远不如非上层人口在其他资料中的表现。^[14]

关于年龄集聚的数据显示，低地国家的人口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具备了高水平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其特征是城市和农村之间不

[14] Dupont (2001) 对有关布鲁日的资料中的社会构成进行了详细分析。他发现资料中的大多数妇女都是妓女，这表明我们的研究对象确实是非上层人群。

存在差异，更为有趣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并不存在差异。该地区的高读写能力水平得到了更多定性证据的支持，例如现代灵修运动（Modern Devotion）在15世纪间的传播，现代灵修活动是以经书研究（《圣经》和托马斯·坎佩斯的 [Thomas Kempis] 《效法基督》 [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为重点的宗教运动。^{*}女性的数量在参与运动的全体人群中占到了至少60%。Derville（1984）回顾了有关该时期人口读写水平提高的证据，他认为，西欧部分地区的新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的传播与该地区读写水平的提高紧密相连。在本书的下一部分，特别是第四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北海地区的独特发展，以及该地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形成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并解释为何中世纪早期的女性就已经具有较高的读写水平。

88

结论

本章对书籍产量的估计反映了其在长期中引人注目的持续增长。在8—9世纪的卡洛林帝国复兴时期，中世纪鼎盛时期（11—13世纪）以及“中世纪晚期的危机阶段”（1350—1500）中，增长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体现了中世纪知识经济的高度繁荣。1454年之后，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加快了增长速度。

西欧的所有地区都对书籍产量的增长有所贡献。最初，6世纪的意大利是手写本的主要产地，但早在卡洛林帝国复兴时期，生产

* 所谓的现代灵修运动是一种神秘（密契）的敬虔运动，14世纪时在荷兰发展，此一运动的发起者为 Geert (Gerhard) Groote (1340—1384)。Groote 于 1380 年在荷兰的丹文特 (Deventer) 组织了“共同生活弟兄会 (Brothers of Common Life)”，带领人们群聚过敬虔生活，也办学校教育。虽然他们未与教会领袖发生冲突，但是提倡个人直接与神交通，不需教会当局作中保，间接瓦解了传统教会的权力架构与宗教功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 Thomas Kempis (约 1380—1471)，他写的《效法基督》为灵修经典名著。——译者注

的中心就已转移到了法国北部、德国西部和比利时，并一直持续到了14世纪。其他地区——爱尔兰、英国及西班牙——在部分时期中同样促进了中世纪手写本生产的繁荣。在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生产的中心回到了南部（意大利北部地区），并形成了由托斯卡纳延伸至低地国家的高书籍生产消费区域。

书籍产量在西欧所有地区的巨大增长为研究该时期经济增长和知识积累过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它反映了中世纪增长的泛欧洲特征。并且，我们还能发现另外几股推动以上过程的力量，例如修道院运动的发展、大学的出现以及城市化的兴起。在最早的阶段，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是推动手写本的传播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中欧和西欧地区在6—7世纪中还并未出现教会，也基本不存在书籍的生产，这与那些已将天主教确立为国教的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段时期中，传教士和僧侣对基督教在拉丁西部其他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修道院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支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手写本生产——只有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城市化才具有一定的作用。在500—1000年中，手写本的生产还并未市场化。卡洛林帝国时期的书籍生产需服从宗教和世俗权威人士的指示，以履行宗教职能为主。1000年之后的加速增长反映了该时期修道院运动的发展。

然而，自11和12世纪以来，市场逐渐取代了修道院的角色。城市需求和来自大学的需求推动了书籍产业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持续发展。（城市）人口读写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的长期增长（增速在1348年之后加快），特别是书籍生产技术在1454年之后持续快速的变革一并支配着以上过程。

对欧洲知识经济兴起的解释通常以古腾堡（Gutenberg）发明的活版印刷书开始，并将其视作书籍产量增长和知识积累的关键性时刻（Eisenstein, 1979）。然而，手写本生产在1450年前（特别是在

1348年黑死病之后)的极富活力的发展表明,活版印刷术的出现更应被看作是对书籍需求在该时期的快速增长所作的反应。古腾堡的发明(或者说再发明,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相似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可被视作中世纪当时存在的经济发展趋势的高潮。正如第六章中将会详细解释的那样,它不仅是对书籍市场扩张所作的回应,更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结果,从而使古腾堡选择了这种“高科技”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需要高熟练度的劳动力,以及高水平的物质资本和资金支持,而这些生产要素在西欧都极为充裕。同时,这也是非常节约劳动力的一种生产方式;劳动力在1348年之后变得较为稀缺。创新的迅速传播同样令人吃惊:在14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批古腾堡圣经印刷出版之后,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印刷机就已经遍布欧洲所有地区。这证实了中世纪经济在这段时期中具有高度的一体化特征,并且极富活力。^[15]

为什么在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丝毫提高的同时,书籍消费仍然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增长(Koepke and Baten, 2005)?在这一阶段中,书籍在绝大多数时间是供上层人士消费的奢侈品——最初是宗教贵族(religious elite),但在1100年后逐渐变为城市贵族和学术精英(urban and academic elites)。很明显,他们能够将自身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这些(以及类似的)奢侈品的消费。城市化极有可能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极大增加(Van Zanden, 1995),从而更有利于商人阶层和专业人员等消费规模较大的群体。因此,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可以部分地解释刚才提到的现象。书籍价格的大幅下跌同样可以解释这种矛盾。散装书(codex)

[15] 事实上,纽科门蒸汽机等所谓的“大型创新(macro innovation)”的传播速度要慢得多:蒸汽机用了一个世纪之久才大量地传播到了海峡对岸,但这项新技术十分依赖于合适的环境,在最初仅仅被用于制造开采煤矿所需的水泵。

发明于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并迅速取代了书卷（scroll）的地位，手写本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也倾向于降低从书籍中获取知识的成本。然而，书籍需求的增长同样具有宗教和社会—文化效应。一种新的社会出现在了900—1300年间，这个社会相信书面文字的力量，并认为书面文本比人的记忆更适合作为法庭证据，以及权力与特权的“载体”。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开始相信只有通过亲自阅读《圣经》（和其他的神圣书籍）才能真正触及宗教真理——中世纪晚期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运动强调了这一点。宗教改革——正如 Derville
91（1984）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下层人口读写水平提高的结果。因此，与印刷机的发明和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以及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的傳統意义上的中世纪的结束，就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外生发展，而是之前一千年中各种趋势合乎逻辑的最终发展。

第二部分

欧洲内部的小分流

问题简介：

欧洲内部的小分流，1400—1800年

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经证明了900—1300年间的经济增长是怎样一个泛欧洲的现象，其特点是几乎次大陆的所有区域都出现了人口的显著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实际收入增加。欧洲从经济的边缘地带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增长和创新的中心。900—1300年间，欧洲经济的繁荣可能被认为是19世纪工业化之前欧洲最明显的扩张阶段。

然而，在现代早期（1500—1800年）情况非常不同。现代早期增长大部分集中在西欧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区：低地国家和大不列颠群岛。北海地区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非常具有活力，当佛兰德斯成为西北欧的城市中心，并且在后1348年“危机”和1500—1800年的几个世纪期间仍然表现良好。16世纪的时候，增长可能集中在荷兰南部；17世纪的时候，荷兰和荷兰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变成了扩张的焦点；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开始成为领头羊。同时，意大利北部开始衰落：15世纪时，意大利的人均GDP可能达到了顶峰，

直到 1600 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高水平的平稳状态，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人均收入开始下降（Malanima, 2003）。同样地，西班牙在 1500—1800 年间的经济表现算是在人均收入方面接近停滞的地区之一，这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很“正常”，我们将在第八章中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Van Zanden, 2001a; 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从 1400—1800 年间的实际工资的长期发展的证据看，北海地区和西欧其他部分的小分流也非常明显。Bob Allen（2001）在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中发展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估计当时大多数欧洲城市的非熟练和熟练工匠的实际工资标准，从而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的出现。图 8 展示了 Allen 对非熟练劳动力的估计，我在其中加入了相似的对于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实际工资的估计（参见 Baten and Van Zanden, 96 2008）。在 15 世纪，实际工资在整个欧洲都相对较高，但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以后，两种模式开始出现：在北海地区（安特卫普 [Antwerp]、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和伦敦）出现了实际工资长时间平稳保持在黑死病之后达到的水平状态，而在其他地区则出现了长期下降，这种情况直到 18 世纪后期才结束，而在一些国家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前 10 年。我们在图 8 中加入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佛罗伦萨（Florence）的趋势线，这样就使“小分流”更加明显。

欧洲内部的分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Allen（2001）指出是 17 世纪，但是我们有理由将这个时期向前推进（还可以参考 Pamuk, 2007）。正如图 9 的证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实际工资和欧洲其他部分的差距在 15 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在这个图中有两个版本的平均工资：第一个是七个城市的平均工资，我们拥有这七

个城市从1400—1800年间的全部连续的序列数据，另外一个序列数据也包括所有城市，但是我们只有很短一段时期的信息。例如，斯德哥尔摩序列开始于16世纪，因此没有包括在第一序列，而只包含在第二序列中。对整组序列的相关系数的分析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5世纪上半期欧洲内部的实际工资差异非常小，当时的相关系数在0.16上下浮动，但是从1450年后开始增大（1450—1499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20），并且持续上涨直到18世纪末（1750—1799年间，相关系数为0.43，在18世纪末高达0.50）。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西北欧“分流”的发展过程呢？为什么只有北海地区延续了从900年开始的经济的蓬勃发展过程，而西欧其他地区却在现代早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当然这个序列数据的起点是15世纪早期。1348年黑死病之后的人口下降而来的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确实对问题的解释有些影响。一种解释方法是，欧洲其他地区在大约1450或1500年后的人口数量恢复，带来了向“常态”（normality）的回归，即工资水平的下降，这在黑死病之前是个正常的现象。在低地国家和英国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那里，则是实现了向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的突破，这使得实际工资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稳定，虽然人口增长强劲。事实上，1500—1800年间北海地区的人口增长已经超过了欧洲其他地区（Van Zanden, 2001a）。^[1]

98

于是，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英国和低地国家有哪些相似之处可以解释它们在1400年后出现的相似境况呢？为什么这个起源于中世纪的经济，在被称之为“中世纪危机”（“crisis of the Middle Ages”）的阶段，可以变成生产率更高的经济？英国和低地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结构方面的差异大于欧洲内部任何其他两个地区。英

[1] 参见第八章关于人口、实际工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

99 国是一个典型的拥有封建传统的中央君主制国家（从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开始）。在西欧没有一个地区的庄园制度像它在英国那样重要：在 1300 年，庄园仍然占据了 20% 的农业土地，很可能产出也占到了同样的比例（Campbell, 2000, 第 58 页）。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典型的庄园在 1180—1320 年间就已经消失。关于政治经济，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除了国王，贵族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城市相对较弱，这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是因为其相对较低的城市化水平。^[2]

相比之下，低地国家则由分散的政治体联合（collection of polities）构成，在这些政治体中，有些城市的城市化程度很高（佛兰德斯、布拉班特、荷兰和泽兰），它们也是政治体中最重要的城市；大型城市已经对政治事务有了大部分的控制权，虽然省与省之间都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个政治规模扩大的过程已经开始，主要是由于勃艮第公国（Burgundian state）的崛起，* 它逐渐合并了低地国家的不同地区，但是这个过程在 1500 年之前都没有完成。贵族相对较弱，特别是在西部最发达的地区，庄园制度和农奴制（serfdom）在 11 和 12 世纪已经消失或者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例如

[2] 因为英国自从 11 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不像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在中世纪时，没有什么地区的权力真空可以让这些城市去填。他们不可能得到他们自己的自由，虽然后来他们变得强大和有影响力。

* 勃艮第公国（法语：Bourgogne）由理查德伯爵于 9 世纪建立，包括法国中部和东部一些地区。在腓力二世（大胆者）当政时期（1363—1404 年），勃艮第公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有所扩展，亦获得了佛兰德、阿图瓦、弗朗什孔泰（又称勃艮第伯国）以及其他地区；在腓力三世（好人）当政时期（1419—1467 年），又获得了布洛涅伯爵领地、卢森堡以及尼德兰的一部分和皮卡第。勃艮第公国在查理公爵（大胆者）统治之下（1467—1477 年），势力达到顶峰，并与法国争雄。然而，1477 年查理公爵在南锡战役中被瑞士击败，公国逐渐被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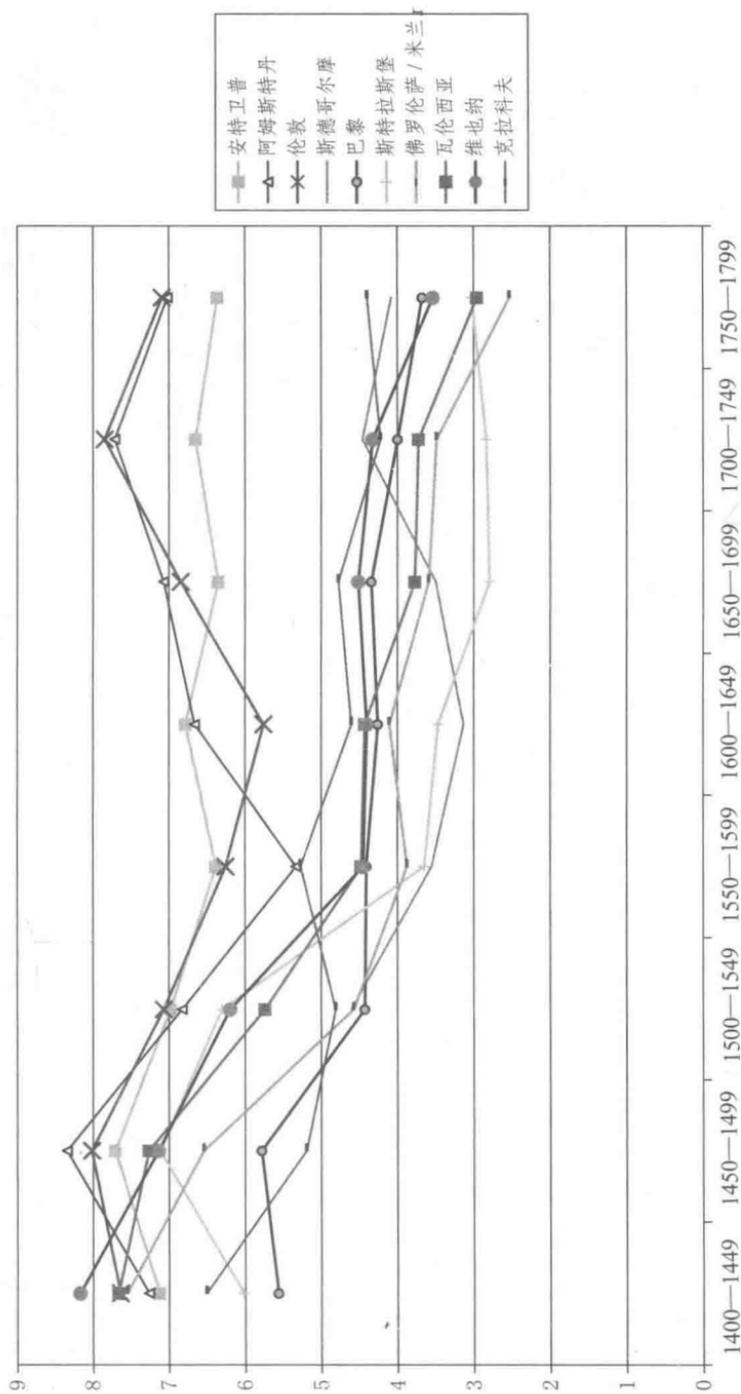


图 8 1400—1800 年间欧洲城市的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的估计

资料来源: Allen, (2001) 数据库 (<http://www.economics.ox.ac.uk/Members/robert.allen/WagesPrices.html>) 和附件 (由 Christiaan Van Bochove 整理的没有出版的对于斯德哥尔摩的实际工资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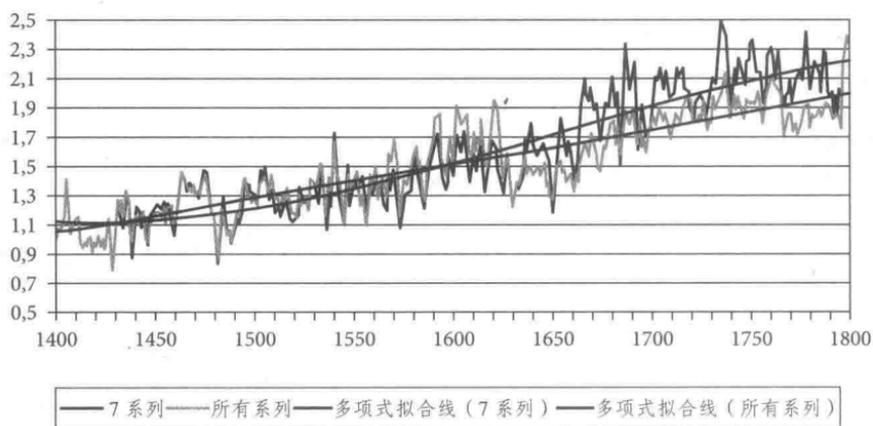


图 9 北海地区的平均工资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平均工资的对比，1400—1800 年

资料来源：参见图 8。

荷兰。^[3]

这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也有显著的差异。英国首先是一个农业国家，可能多达 60%—70% 的人口都在积极参与这个职业（更多细节参见第八章）。它是一个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家：主要是羊毛，这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产品；还有一些谷物和矿产，这主要是由于采矿业的活跃，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地区是康沃尔（Cornwall）和德文郡（Devon）。这些活动得以发生的基础是相对有利的土地 / 人口比例。总之，英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之下，低地国家的经济由出口工业所主导，除了加工英国的羊毛，还要加工其他生产资料，然后制成产品，包括啤酒、亚麻制品、鲱鱼和其他高附加值的产品，例如图书和油画。除了这些加工业之外，还有其他以这些产

[3] 1500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政治经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分流，特别是在两次成功的现代早期起义之后：反抗西班牙的起义（1572 年之后）和内战和光荣革命，都引进和 / 或保持了对行政官的强烈限制，这是第七章的主题。

品为基础的早期国际贸易和服务。食物供应，特别是荷兰还有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的食物供应，主要依靠从波罗的海和法国北部进口。1514年荷兰的经济结构可以说明这点：只有1/4的劳动力活跃在农业产业上，另外15%的劳动力在其他第一产业（挖泥炭、捕鱼）领域，20%—25%的劳动力在服务业（特别是贸易和运输），同时38%的大量的劳动力在工业领域工作（Van Zanden, 2002b）。

北海地区这两部分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可能它们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综合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的重心从佛兰德斯（11—15世纪）经过布拉班特（16世纪）和荷兰（17世纪）到英国（17—18世纪）。虽然经济结构的主要差异用这种方式做了解释，但是仍然很难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这个“经济体系”的两部分都在1400—1800年间经历了相似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而西欧的其他国家在950—1300年间却没有保持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过程。

鉴于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在中世纪末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经济的显著差异，如果我们只是考虑和这些宏观结构相联系的因素，那么很难解释北海地区这两个部分的显著的经济绩效。下一章将要发展的观点是我们必须转向微观层面，即转向家庭的人口行为以及他们怎样和产品市场、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互动，以便找到英国和低地国家之间的关键相似点。我们将会证明，从家庭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发展新策略的这个层面上看，北海地区是独特的；而这正是导致“小分流”的原因。在北海地区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家庭和家结构（欧洲婚姻模式），这种结构正是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

101 第四章 女性的能量：中世纪末期北海地区的 劳动力市场和欧洲婚姻模式^[1]

(与 Tine de Moor 合作)

做女人很好，而做男人更好！

女孩儿和女仆们，切记你们将要学到的经验

不要太快使自己走进婚姻

正如格言所说：“你的配偶在哪里？你的荣誉在哪里？”

但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不应该匆忙地去遭受男人的棍棒……

虽然我不反对婚姻生活；

但解除束缚是最好的！很高兴女人没有男人

——Anna Bijns (1493—1575) 撰写的关于独身和晚婚
的优点的诗 (Wilson, 1987, 第 32 页)

[1] 我们要感谢参与 GEHN 2005 年 6 月 23—26 日乌得勒支的“要素市场的出现、组织和制度框架”的研讨会的成员，特别是 Peter Boomgaard, Bruce Campbell, Marcus Cerman, Ken Pomeranz 和 Maarten Prak 对本论文第一个草稿的评论。

问题：Janne Heyndericx 和 Hajnal 的理论

1505年，生活在位于泽兰的寇温柯克（Kouwenkerke）村的31岁的 Janne Heyndericx 告诉了当地违法行为质询委员会（committee of inquiry）^[2] 下面的故事：八年前她承诺嫁给一个名为 Adriaen Jacopsz 的年轻人，而他也回应了她的承诺。他们同居了，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从来没有按照神圣的宗教法律的要求正式结婚，婚礼被推迟到了一个更加合适的时间。她仍然跟她的母亲和继父一块儿生活，他们拒绝供养她，所以她被迫去别的地区找工作挣工资。

当她去寇温柯克村工作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和他有一个孩子。四五年前 Adriaen 想放弃他要娶她的承诺，虽然他们仍旧经常相见而且睡在一块儿。她仍然想要嫁给他，虽然他们没有在教堂结婚，但他们确实已经在上帝面前结婚了。而且，她走了那么远（即和另外一个男人有了孩子）也是他的错误，因为他让她等了这么长的时间（Bange and Weiler, 1987, 第404—405页）。 102

Janne 的故事非常现代。从全球的观点看，Janne 的行为非常独特。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婚姻”很难想象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然而，这在中世纪的北海地区却非常典型。在那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姻模式，这种模式具有 Janne Heyndericx 的故事的所有特征。这个故事如此现代的因素之一就是婚姻的决定过程不是由父母或者老一代的其他人员决定，而是由结婚的双方 Janne 和 Adriaen 自己决定。他们承诺要和对方结婚，并且认为这和在上帝面前结婚（关于这点他们遵循了教会的教导，参见下文）的效力一样。第二，母亲和继父

[2] 错误行为包括没有经历教会的正式结婚程序而生活在一起的人，这种行为要被仲裁处罚。从1505年开始，对于错误行为可以进行正式的询问，像 Janne 一样的人将会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生活故事，这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她（Janne）很显然抓住这次机会进行控诉了。

在这个故事中只是干预了此事，因为他们认为“上帝面前的婚姻”（marriage before God）应该导致新家庭的形成：他们拒绝继续供养 Janne，因此强迫她离开父母的家庭。第三个显著的现代特征是 Janne 实际上可以做这件事的事实，她可以到其他的地区找到挣工资的工作：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该市场使得父母和孩子的行为成为可能。

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在中世纪晚期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在现代早期成为西欧社会的特征。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人口的其他方面，那是这个婚姻模式的典型：婚姻的平均年龄、不结婚的人口比例以及对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本著作遵循了 Hajnal 的原创论文（1965）的观点，在该论文中他强调欧洲婚姻模式的这些“典型特征”（Hajnal, 1965, 第 101 页）。很少有人认识到导致这些结果和导致欧洲婚姻模式出现的基本结构和机制，而这些结构和机制无疑正是现代早期的人口和社会历史的主要秘密之一。Hajnal 在 1965 年的经典论文中确实提供了一条研究这些基本机制的线索。例如，他提到“婚姻双方只有在未来的夫妇十分了解双方的前提下才能结婚的信念”被认为是“一个区分现代西方人口和社会的主要的相关因素”（Hajnal, 1965, 第 126 页）。除了双方同意非常重要之外，还有相似的暗示，不像许多其他社会，在那里婚姻包含着双方家庭首领（heads of households）之间的约定，他们交换夫妇双方的意义大于交换结婚礼物的意义；在西北欧婚姻意味着夫妇双方自己将会组建新的家庭，因此他们将会需要婚姻基金（conjugal fund）。这个新乡土观念（neo-localism）意味着许多人因为负担不起这项投资而不能结婚。^[3] 在本章中，我们将会试

[3] 在他 1982 年的论文中，他用更加细致的方式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说明。参见 Hajnal (1982, 第 113 和 115 页)。

着发展这些线索，并尝试解释 Janne Heyndericx 和 Adriaen Jacopsz 背后的结构。^[4]

这个论点的核心是家庭作为一个合作的经济体，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成员物质和精神需求，它的特征是各代之间和性别之间的某些不平等（权利不平衡）。家庭的基础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隐含的或明显的契约，而婚约则是最基本的契约。但是家庭内的合作也受到各代之间隐含的契约的管束。本章的假设是欧洲婚姻模式的特点是丈夫和妻子之间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权利的平衡，这与其他社会通常的婚姻模式和家庭组成非常不同。在欧洲婚姻模式中，女人有相对较大的发言权，因为婚姻的基础是夫妇双方的同意，再有就是孩子的地位也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当他们开始为家庭的收入做出贡献时，他们的地位也相对较强。欧洲婚姻模式的特点——晚婚或者独身（non-universal marriage）——是它的相对民主的特点所导致的结果。

欧洲婚姻模式是婚姻的制度性适应，更加广义的说是人类再生产行为，对快速扩大的工作机会和黑死病之后的世纪中相对较高的报酬的适应。总之，这是由挣工资的人——男人和女人——发展出的人类再生产策略，这种策略嵌入了一个更大的制度框架中。在这个制度框架中，市场交换和信任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因素。不仅工作收入变成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而且家庭还可以参与资本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大部分的产品不是由他们自己生产，因为工资是他们的收入。同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长期生存策略以便增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新市场环境中的成功。这些策略包括扩大对

104

[4] 这个观点由 Richard Smith 在 1979 年提出：“对于欧洲婚姻模式的探求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数据’制造物是有趣的事情，但是将实际年龄的观念先入为主，那将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能够觉察到支持它的更加宽广的社会结构。没有这个，任何试图理解这个独特的约定的精确的决定因素都是非常困难的。”（Smith, 1979, 第 101—102 页）

相对正规的学校的投资，加强对学徒工或者如何在其他家庭当仆人的培训的投资，或者加大投资社会资本，以便化解一些伺候老人或者单亲家庭的问题。结果就是在这个社会中有 30%—60% 的人口成为部分或者全部依靠挣工资的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在这个社会里市场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小的婚姻家庭和维持他们的再生产的社会基础设施在这个社会里不断地交织互动而且日益增强。我们断言北海地区特别是英国和低地国家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社会，^[5]正是这个结构的长期演化的结果，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地区在现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能够获得长期的成功。

当和世界其他地区，即 Hajnal 想象线以东，也即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港市）和圣彼得堡之间（Trieste-Saint Petersburg），特别是的里雅斯特与中国之间的婚姻实践的情况进行对比的时候，欧洲婚姻模式的特征和重要性才变得非常明显。是什么使得北海地区的情况如此特殊，使这个地区的经济领先，特别是当和欧洲南部和东部比较时呈现出来的经济的领先。Hajnal, Herlihy 和 Reher 发现现在欧洲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婚姻实践，我们用他们的地理分界线能更好地解释引起欧洲婚姻模式在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出现的环境。

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

三个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条件相结合使得欧洲婚姻模式成为可能：

[5] 分辨关键区域——荷兰的海滨省佛兰德斯和东部的英国——我们发现这个系统的特征非常清楚，北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荷兰的内陆省份、比利时、法国北部和英国剩余的地区，在那里社会经济情况经常差异很大，这个制度的“纯粹”形式不可能总是出现。

- 一致同意 (consensus) 相对于父权 (parental authority)
- 财产的代际转移
- 进入劳动力市场

a. 一致同意相对于父权；新居家庭 (neo-local) 相对于从父居家庭 (patrilocal)

Janne Heyndericx 的故事说明了中世纪后期挣工资的人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夫妇双方一致同意，这个因素已经由 Hajnal 提出，并且认为是欧洲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思想对欧洲婚姻模式如此重要以至于欧洲婚姻模式年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这个学说的出现时间推算出来。按照 Peter Biller 的观点，中世纪早期婚姻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的事情 (a lay and secular matter)，本质上是父亲将女儿移交给新郎，交换礼物和之后给新娘举办一个盛大的集会游行 (*deduction in domum*)，然后她被带进新郎的房子或者新郎的家庭的房子” (Biller, 2000, 第 22 页)。由于 1054—1150 年的教皇革命 (Papal Revolution) 而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教会在拉丁基督教徒的大部分地区慢慢地接管并“取得了在婚姻方面的接近独一无二的权力，这个变化的象征是结婚典礼的地点从新郎的家庭转移到本地的教堂 (Berman, 1983; Biller, 2000, 第 22 页)。同时，教会决定怎样定义婚姻，婚姻是不是基于双方的同意或者是不是基于身体的结合 (*copula carnalis*)，这个讨论可以回溯到 St. Augustine (Gies F. and Gies J., 1989, 第 138 页)。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和南方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代表北方的巴黎强调双方同意，

* 也称教皇革命，或者格里高利七世改革，是指 11 世纪末期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 (Investiture Content)，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译者注

而代表南方的博洛尼亚 (Bologna) 则强调成婚的事实。当时的学者意识到这个代表了不同地区风俗习惯的对比 (Biller, 2000, 第 53—54 页)。在 1140 年前后, 格拉提安 (Gratian) 根据教规规定婚姻关系是基于双方一致同意而不是婚姻的既成事实而确定, 因为“身体结合的同时, 思想也得结合” (Noonan, 1973, 第 425 页)。^[6] 格拉提安和他的跟随者不断提出证据证明如果婚姻的安排违背了结婚双方的意愿, 通常都会带来很坏的结果 (Noonan, 1973, 第 434 页)。格拉提安的工作促进了进一步的神学讨论 (theological discussion),^[7] 并且最终将这个教义包含到了格里高利 9 世 (Gregory IX) (1234) 的教令中。^[8] 因此, 到了法定结婚年龄的男孩和女孩 (男孩 14 岁, 女孩 12 岁) 可以自己宣誓结婚并履行婚姻的神圣义务。婚姻是由上帝决定的 (这个也是 Janne 的想法); 牧师只是在事后庄严宣告上帝对夫妇的意愿。但是这个教义也可能会引起秘密婚

[6] 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关于这个以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婚姻理论怎样在天主教出现的情况, 可以参见 Sheehan 和 Farge (1996, 第 91—117 页) 关于“中世纪婚姻伴侣的选择: 一种婚姻理论的发展和应模式”。

[7] 根据格拉提安的观点, 如果两个人一致同意并且在完成身体的结合之后即存在婚姻关系; Peter Lombard (12 世纪另外一个理论家) 则宣称不需要发生性关系, 因为玛丽和约瑟夫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结婚的但是并没有身体的结合 (婚姻只是通过口头上的同意)。Lombard 因此宣称只要夫妇双方到了一定的年纪, 并且在没有其他干扰的情况下, 通过善意的承诺成为妻子和丈夫, 那么这个婚姻就是有效和神圣的。这个就成为非常有名的“现场宣誓结婚” (*sponsalia per verba de praesenti*), 这个不同于宣布将来结婚 (*sponsalia per verba de futuro*) 或者“订婚”。参见 Ozment (1983, 第 26 页) 和 Sheehan and Farge (1996)。

[8] 格里高利 9 世的法令中的婚姻部分的基础是亚历山大教皇三世, 该法令依据 Brundage 的观点, 因此“持续地想要把婚姻从父母、家庭和封建贵族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 并将婚姻的选择权完全由婚姻双方自己决定”, 参见 Brundage (1990, 第 332—333 页); 而考虑到大男子主义和性别平等的无意识, 其他的例如 Goody 认为教会对待婚姻的态度背后的动力是其对财富积累的无限渴望。通过鼓励相爱的人结婚, 立遗嘱的人可以自由地向教会捐献他们的财产。参见 Goody (1983, 第 103—156 页)。一些关于这个理论的证据可以在 Katherine L. French 的最近的著作中找到。她发现在黑死病之后的一段时期, 英国的女人而不是男人更愿意根据自己的意愿向教区捐款。这或许可以确认, 通过推动夫妇间的婚姻, “打破”父亲的权威, 会对教会的财产有积极的影响。参见 French (2007, 第 40—41 页); 也可以参见 Smith 的讨论 (1992, 第 18—21 页)。

姻的问题，婚姻私下里举行，没有见证人并且与所有的公共制度脱节。这乃是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期间，此教义屡受攻击的原因之一（Ozment, 1983, 第25—27页）。

虽然实际上父权在决定婚姻伴侣方面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是格拉提安的教规承认个人的权利不依赖于他或她的家庭，并且承认有一部分的自由区域是父母不能越界的：“格拉提安承认个人主义的位置，并且在择偶选择方面不受社会干预的自主权。”（Noonan, 1973, 第425页）如果一个父亲暴力殴打他的女儿来推行他的选择，那么这样的婚姻是无效的。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强迫值得注意，即父亲威胁女儿不让她继承财产，从而迫使女儿选择不自主的婚姻，这样的婚姻也被认为是无效的，即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父母强迫他们的女儿，她们可以拒绝宣誓，因为这种强迫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罪过（Noonan, 1973, 第434页）。^[9]当然，对于强迫的惩罚不会总是执行。^[10]一般情况下，教育比惩罚的意义更大（Noonan, 1973, 第434页）。

虽然事实已经显示，贵族对这个教义比较抵触，但是这个教义还是通过教会会议以及主教立法和布道的方式传达到了普通大众。

[9] Noonan (1973), 指出了一个事例，如果一个女儿拒绝按照他的指定结婚而被剥夺继承权，那么这个父亲在临终时刻可以被拒绝赦免。

[10] 和16世纪的新教教义相比，路德关于强迫的婚姻：路德认为强迫妇女的意志而形成的婚姻不能被废除，这个看法和天主教教义相反：“如果一个孩子被强迫结婚该怎么办？这样算是婚姻，可以维持吗？答案：是的，它是一个婚姻，应该维持。虽然她是被强迫的，她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同意、接受和遵循了这种强迫行为，所以她的丈夫公开拥有对她的婚姻权，这个权利任何人都无法剥夺。如果她感觉到自己被强迫了，她可以及时作出一些事情，反抗并且不接受这件事，召唤她的一些好朋友。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她可以向有关部门上诉或者向牧师或者公众控诉，并通过口头陈述证明她不想这么做，因此公开大声抱怨反对这种强迫……然而，如果在案例中发现一个孩子被严密看管，所以不能获取这些途径，并且没有经过她的同意，直接由媒人介绍强迫其订婚，那么她随后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同意，我将会宣布她是自由的，即使是在完婚之后……”选自路德（Luther）1530年的著作；Karant-Nunn and Wiesner (2003, 第113—114页)。

通过对英国的牧师手册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之后，这个教义逐渐开始被当地的牧师用来指导世俗的人。Murray 总结出双方一致同意结婚的教义到15世纪中期的时候已经迅速并广泛传播到教区的水平（Murray, 1998, 第140—144页）。^[11] 实施这个教义产生的问题——例如重婚（bigamy）和秘密婚姻（clandestine marriage）——已经逐渐被13和14世纪的手册指了出来。^[12]

婚姻必须得到夫妇双方的同意的事实表明婚姻是平等双方的契约，因为任何一方（男人或妻子）都不能强迫对方同意。这表明至少在原则上，这种婚姻模式中的女性的协商地位相对较强：她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丈夫。对于欧洲婚姻模式更加罗曼蒂克的解释是婚姻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这肯定会有很强的平等的意味，因为爱情已经假定了婚姻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平等。这一平等的含义也

* 第一次拉特兰会议（1123）在教皇加里斯都二世任内召开，重申之前主教特别会议的教令（谴责买卖圣职圣物和禁止神职人员结婚）。第二次拉特兰会议（1139）在教皇英诺森二世任内召开，意在结束因选出敌对教皇而出现的分裂局面。第三次拉特兰会议（1179）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任内召开，会议中建立选举教皇应达到枢机团2/3的多数同意，并谴责清洁派异端。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在教皇英诺森三世任内召开，英诺森三世致力于教会改革，颁布教规天主教徒每年应认罪一次，批准变体论为正统教义，并为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做准备。第五次拉特兰会议（1512—1517）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任内召开，称灵魂是不朽的，并使战争中的基督教国家君主之间恢复和平。——译者注

[11] 对于低地国家：Bange and Weiler（1987）；Hoppenbrouwers（1985，第73—74页）。双方同意的婚姻的教义是和教会关于寡妇有权再婚的观念同时传播的。1160年埃克塞特的主教Bartholomew写了一份赎罪规则书确认了教会的这条寡妇有权决定是否再婚的教义。这种一致同意的教义很快就扩展成为自由决定所有的婚姻；Murray（1998，第131页）。一些手册甚至倾向于鼓励秘密结婚。Murray指的是14世纪英国人William of Pagula，出自Oculus sacerdotis（William of Pagula所写的用于忏悔和说教的神学手册）；Murray（1998，第138页）。

[12] 参见Ghent, Nicholas（1985，第54页）。

可以从双方处理他们的财产的方式中找出证据。^[13]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期这种婚姻中的不平等现象将会比在一个妻子的同意不被考虑的婚姻制度中少很多。当然，年轻女人实际拥有的话语权的程度因时因地有所不同（Laiou-Thomadakis, 1993）。比较而言，中国的婚姻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而是两个家庭间的契约：“婚姻是两个姓氏的结合”，是家庭之间的事情，由两个家庭操办，并且也是为了两个家庭（Eastman, 1988, 第 24 页）。即使在当今中国，谱系的原则仍然在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女孩通常在他们结婚的当天第一次见到她们的丈夫，即使他们从出生就定下了娃娃亲；婚姻双方都是由他们的家庭选定，并通过媒人达成协议（Maynes and Waltner, 2001）。

西欧婚姻的基础是夫妇双方的同意，这一事实表明家庭中男性109家长的权力比其他制度中受到的限制更大。David Herlihy 确信：

父亲……既不能强迫儿子或者女儿走进他们不想要的婚姻，也不能阻止他或她结婚……教会的教义是对中世纪家庭中父权的沉重打击，而且，教会的教义本身也使得中世纪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父权制（Herlihy, 1985, 第 81 页）。

与之相似的是，Theo Engelen 认为欧洲婚姻模式的实质是欧洲的父亲（和母亲，对于这件事而言）“缺少控制他们的成年子女

[13] 为了说明这个：Schmidt 提到在 17 世纪的莱顿，超过 3/4 的遗嘱将夫妇双方的任何一方作为最重要的继承人，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和其他亲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遗嘱中指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夫妇间的感情”或者“爱情”。参见 Schmidt（2001, 第 186 页）；Goldberg（1992, 第 273 页）。如果想对这种友好婚姻的出现争论有一个总的看法，请参看 Crawford（2007, 第 13—19 页）的近作。也可以参见 Goody（1983, 第 128—129 页）关于年龄差距、友好的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论述。

的方法。因此他们让子女自己通过他们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并且雇佣其他人的子女做着在中国将会由自己的儿女所做的事情”（Engelen, 2005）。按照他的观点，父权的差异——在中国较强，欧洲较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家庭允许自己的儿女自由选择婚姻的伴侣，组建自己的家庭。

以双方同意为基础的婚姻和天主教的教育有关系，对此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那么欧洲婚姻模式将会在教会影响较大的地区存在。但事实上，欧洲婚姻模式仅仅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地区，而“欧洲其他基督教地区，……家庭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父权婚姻策略，经常公开挑战牧师的指示”（Hartman, 2004, 第98页）。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虽然必须承认的是，最终欧洲婚姻模式在里雅斯特—圣彼得堡一线（Trieste-Petersburg line）以西的欧洲成为主要的婚姻模式，而这些地区大致上符合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所在的区域。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但是Hartman和其他人提出的观点是，其他因素对于欧洲婚姻模式首先在欧洲西北部，特别是英国和低地国家出现也有一定的作用。在这两个地区（英国和低地国家），我们发现早在15世纪，婚姻的主要模式就是夫妇双方的一致同意，尽管平均结婚年龄在当时还是非常低的。^[14]

110 我们现在将会转向对欧洲婚姻模式的形成有贡献的其他因素，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婚姻模式的起源在北海地区。其他因素包括：财产的转移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

[14] 在Hajnal的1965年的论文中得出EMP在中世纪后期还没有完全就位，这个结论的基础是其对1377年的人头税的分析；有人认为他对这个来源做出了错误的解释，“结婚率的水平……和14世纪后期欧洲的英国的类型完全一致”，参见Smith的讨论（1999，第19—49页，特别是第41—42页）。

b. 财产的代际转移

财产的代际转移作为因素之一，有助于理解欧洲婚姻模式为什么在欧洲西北部出现而不是南部，这两个地区的财产代际转移有许多不同之处。总体上来说，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的女性已经在遗产继承方面有了非常优越的地位。Goody 强调说，西欧遗产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女性的继承权和将土地财产作为遗产或者嫁妆转移给女性或者通过女性转移的方式。在欧洲，新郎和新娘在结合之后都有财产权（property rights）。^[15]当然，地区之间也有许多差异，特别是在妇女获得遗产的时间方面有所不同。婚姻在这一时间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女儿应得的遗产份额或者在她的婚姻开始时以嫁妆的形式转移给她，或者是在她的父母婚姻走向结束时给她。前一种方式在欧洲南部比较典型，而后一种则在北部比较典型。

这两个地区的交界处在法国，我们对两地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南部（属于法国）——这个地区被称为 *pays d'écrit* 地区或者成文法地区——婚姻财产制度（marital property regimes），对于普通人和特权阶层来说都是用嫁妆的形式。在 *pays d'écrit* 地区，婚姻财产关系的决定和继承大致是根据从罗马法衍生出来的法律原则而来的，这些规则是由法律学者、高官和地区行政长官撰写、注解和认可的。在这个制度下，惯例不像在北方那样管理着遗产。个人有权利选择怎样使用或者转移他们的财产，那些被认为是家庭财产的所有人比北方人在这些决定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理论上，父亲可以在孩子们结婚时给孩子们不同的财产，例如，嫁妆就是这个家庭和其他家庭的夫妇协商的结果。

[15] 这些制度被称为“分散转移”因为财产可以转给儿子和女儿和转移时的“转移”（或者“移交”）。

这些差异还包括婚姻中的财产的拥有方式不同。欧洲南部的制度通常被称为“独立主义”（separatist）。因为夫妻中的每一方的婚前财产都被认为是单独的财产，在婚姻关系中不会形成公共财产（conjugal fund）。欧洲北部的情况被称为“婚姻主义”（conjugal）。在大多数欧洲北部的习惯法地区，我们发现这些制度的精神实质是“共有”（communal）而不是“独立主义”。^[16]在这些制度下，新娘的婚前财产不是像南方那样作为单独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共同财产的一部分，这些财产完全在丈夫的控制之下，但是遗孀也有权利（Howell, 1988, 第 199 页）。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最后也是作为公共财产。

这些——至少在理论上——为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参加经济活动提供了激励：在北方，她们可以为共同财产而努力，并且可以从财产的增长中获益；而在南方，不论她们参加任何经济活动，她们的财富差不多都相对固定。她们在婚姻关系结束后——作为遗孀的地位也很重要，如果她们有权利分到共同积累的财产，那么她们就有机会开始一项新的业务，并找到新的伴侣。在此我还要说的是，实际情况和理论可能差异很大。北方的夫妇可以根据婚姻契约分得财产，Howell 写到，在南方，在实践中没有统一的模式，并且也不会特别致力于独立主义的观念。至少到大约 1500 年之前，南方的婚姻财产法在混合性和灵活性方面与北方的公共制度（communal systems）很相似（Howell, 1998, 第 212—213 页）。^[17]

如果我们观察父辈和孩子之间的财产的代际转移的差异点，就

[16] 南方的婚姻财产法律的原则在很长时期内被称为是“独立主义”。因为夫妇每一方带进婚姻关系的财产都被认为是单独的财产，婚姻关系不会创造任何公共财产（Howell, 1998, 第 212 页）。

[17] 灵活性的例子还可以参考 Howell (1998)。

可能发现南北方的不同的特征。随着这些制度，例如 *monti dell' dotti* 制度在 15 世纪的托斯卡纳地区 (Tuscany) 的建立，嫁妆制度在南方的社会各个阶层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北方，嫁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作为贵族的一个行为 (Kirshner and Molho, 1978)。Chojnacki 认为，罗马的嫁妆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新郎承担婚礼的费用 (*sustinere onera matrimonii*)，然而，到了中世纪意大利的时候，罗马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改变，与罗马的最初实践有所不同的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嫁妆被认为是女性可以继承的遗产份额。这有几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排除了女性继承其他共同遗产的可能 (*the exclusion propter dotem*)。^[18] 永久的共同遗产 (*fraterna*) 只是在兄弟间继承：姐妹因为有了嫁妆，所以对于他们父母的家庭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法律权利 (Chojnacki, 1975, 第 575 页)。这些遗产是具有一些利益的，因为它经常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结构。这些就是在意大利北方和法国中部形成的农民的遗产继承方式 (托斯卡纳、伦巴第 [Lombardy]、威尼斯)，目的是为了财产分散。这个现象导致了几个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实质上的大家庭情况 (Gottlieb, 1993, 第 215 页)。Laslett 把这些遗产继承方式的出现作为欧洲东部和南部的最主要特征。在西部和中部欧洲的低地国家家庭中，这种财产继承方式基本不存在，而在东部则占到了总家庭数中的 9% (Wall, 1983, 第 527、533 页)。

相比而言，嫁妆在北方 (法国) 却不是非常重要，继承人和他们的财产权情况是由他们的出身，而不是法令决定。在这里，当丈

[18] 因为担心太过宽泛，我们不能在此深入讨论嫁妆制度的准确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向您推荐真正的专家，例如 Owen Hughes and Botticini 的作品。请参见 Hughes (1978), Botticini and Siow (2003)。

夫去世之后，一个人没有选择捐赠或者继承婚姻财产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有一些解释的权利（如同 Douai 的例子）他们可以自由解释“共有”（community）财产，而不必遵循决定个人的绝对所有权的一般原则（Howell, 1998, 第 212 页）。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思考财产代际转移制度对婚姻和家庭形成的不同的潜在影响。首先，我们认为，结婚年龄和财产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转移可能存在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父母希望他们的女儿早点嫁出去，更会使新郎想要延迟他们的婚姻。如果女性在不需要结婚的前提下有权利继承父母的遗产，那么就没有为了财产尽早结婚的激励。

113

相比之下，南方的嫁妆制度使得父母和女儿都希望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这样女性就可以获得一部分的财产作为嫁妆（这些嫁妆在她的丈夫死后将会返回给妻子）。而且他们的嫁妆的多少也取决于他们父母的意愿，这就增加了父母对婚姻过程的控制权。因此在那些遗产可以分割的地区，女性能确定她们从父母处得到的财产的份额，那么她们就会等待。我们甚至可能建议她们利用这段时间积累一些资金，以便使她们自己作为婚姻的一方而更有吸引力。在那些女性需要依靠婚姻而获得父母的部分财产的地区，这个过程将会通过婚姻而缩短。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嫁妆制度也是属于严厉的家长制（paternal）的一种，但是双方一致同意的观点再次发挥作用：天主教的存在——至少在理论上——保证在欧洲南部，女性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结婚伴侣。一个人可能会认为——根据英格兰的例子证明——北部的女性在没有结婚时或者在结婚前也接受了捐赠（Smith, 1986）。这只会支持我们的论断，因为这会减少其他和婚姻有关的财产的转移，因此使得结婚年龄对于财产的两代人之间的转移方面的作用更小。这个观点的实质就是北方的财产转移制度与南

方相比，更加脱离于婚姻关系，^[19] 这更加符合北方的双方一致同意的婚姻（*consensus marriage*）、新居住地（*neo-locality*）和高单身率的情况。

在嫁妆制度（*dowry system*）下，女性有尽快结婚的激励。这个可能也会使父母拥有相似的激励，即把自己的女儿早点嫁出去。Botticini 得出的结论是在 15 世纪的托斯卡纳区，新娘对婚姻家庭的贡献越大（以家务劳动和妻子仍然可以生产孩子的数量来加以衡量），她的父母为了“说服”新郎接受他们的女儿而支付的嫁妆就越少。女性如果在结婚之前等待的时间越久，那么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格将会太高以至于很难“出售”：她的父母将需要向新郎的家庭付出大量的嫁妆来补偿新娘为婚姻家庭的较少的纯粹积极贡献（Botticini, 1999, 第 110 页）。新娘的年龄越小，她对婚姻家庭的实际贡献越大，因此她的父母可以给出很少的嫁妆。新娘年龄小的重要性从下面的事实中已经变得很明显——如同 Molho 展示的那样——许多父亲在早于她们参与到土地登记制度（*Catasto*）之前嫁出他们的女儿，* 此举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婚姻机会（Molho, 1988, 第 193—203 页）。

114

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以及家庭内部的财产分割——在南方的制度中——阻止了女性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婚后），因为不能确定在丈夫死后，她们是否能从她们的努力中得到利益。而且，即使她们在走进婚姻之前没有这样明显的机会主义思想，初为人母也可能让她们不能像西北欧的女性一样积极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在北

[19] 关于法国南部的父母的权威和两代人之间的财产转移的密切联系还可以参考 Leroy Ladurie (1976, 第 42 页)。

* 又称之为 *also catasti, catastale, catastali*, 是意大利的一种土地登记制度，据此土地登记的数量可以征税。——译者注

方，女性可以为她们未来的遗产的份额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她们将会从夫妻共同财产中获得公平的份额。这些规则也有利于遗孀接管她们去世丈夫的生意的规定。在南方的制度中，遗孀很少有机会继续她们丈夫的生意，因为她们既不能（必然地）获得一定份额的遗产，也不能积极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并且因此而被培训——像和她们处于同样地位的北方女性一样。

对于遗产制度和欧洲婚姻模式的可能关系的解释大部分都是假设性的。对于哪种遗产制度会促进或者妨碍女性过早结婚或者参加劳动力市场还不是很清楚。在一些情况下，有人认为世袭的婚姻财产制度（lineal marital property regime）是为了控制女性，^[20]其他人认为嫁妆制度（dotal regime）比共同财产制度（community property regimes）对女性更加有利，因为它会保护妻子免于遭受不幸或者她们的丈夫的坏心思，而且可以作为妻子，以她们的嫁妆的形式给她们一些属于她们自己的财产（Howell，1998，第224页）。

c. 进入劳动力市场

115 教会的教导和遗产制度使得年轻男女很容易反抗父母的权威、决定他们的婚娶对象并组建自己独立的家庭。但正是由于那个时候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才给了像 Janne Heyndericx 一样的男女切实地维护他们相对于父母的独立地位的实现途径。甚至早在 1348 年，西欧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发展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有占人口很大比例的人群在那里谋生。这个潮流在 1348 年后出现了加快的趋势，当时黑死病之后人口的突然下降导致了对劳动力的强大的需求——包括男性和女性——并进而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增，特别是女

[20] 参见 Howell 给出的事例，1998（第 223 页）。

性。这种态势使得大众在 1348 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婚姻模式的接受速度迅速加快。

最初，欧洲婚姻模式是穷人的婚姻方式，这些挣工资的人没有或者没有租赁任何农场或者其他实际的资产。Barbara Hanawalt 在对英国农民的婚姻模式的分析中清楚地展示了这点。她指出穷人的婚姻的特点就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

为爱结婚通常被认为是没有财产的人可能会做出的选择。封建领主懒得收取赎金（merchet：中世纪雇农结婚时支付给封建领主的资金），父母没有财产可以赠与，因此对他们没有控制权，教会不会解除婚姻关系即使夫妻双方确实同意结婚而他们却只能一起睡在草垛里。当一个年轻女性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和工资，试图积累一点不动产和土地，支付自己的赎金，她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婚姻伙伴。但是自由选择婚姻伴侣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事件，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没有财产的人的范围。（Hanawalt, 1986, 第 202 页）

在城市中出现了相似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从 Goldberg 关于约克郡的研究中清楚地发现。女性工资劳动者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这个通常和欧洲婚姻模式的实践有关）^[21] 是贯穿终生的做仆人的机会。^[22] Goldberg 总结出在黑死病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在约克当仆人的青年男女能够比与他们处于同样处境的约克郡的农

[21] Hajnal, 1982, 第 92—99 页。

[22] Goldberg (1992b); Goldberg (1986b), Smith (1992), Laslett (1977, 第 44 页) 和 Mayhew (1990, 第 202 页)。

村的人更加自觉地做出结婚的选择。^[23]

116 他也对比了这两个社会（英格兰和托斯卡纳）对于1348年大瘟疫的后果的反应。在英格兰，大瘟疫造成的死亡率增加引起的劳动力下降，这促进了大量未婚女性进入城镇，结婚年龄的上升和不结婚的女性人口的增加。而在意大利，在后瘟疫时代单身女性的雇佣没有增加，女性结婚率也没有增加……意大利城市的新的职位空缺被来自农村的男性填补，从而导致这些城市具有相对于欧洲西北部的低地国家的较高男性比率，在西北欧女性人数经常超过男性人数。^[24]虽然一些作者不同意，他们认为由于土地登记制度（Catasto）的特性，意大利城市的女性仆人的数量被低估了，^[25]很难找到这样一种情况——例如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约克郡（Yorkshire）——那里的女性仆人占据多数。^[26]而且，事实上从这些女性一生中开始做服务的时间和服务的长度就可以显示出北方和南方的差异：Goldberg推算出约克郡的女服务员在10岁左右就可以进入服务行业，并且一直工作到她们25岁左右——然后她们就步入婚姻——而佛罗伦萨和巴塞罗那的女性从8岁就开始做工，但是到20岁的时候就不再工作了。^[27]Klapisch-Zuber注意到在佛罗伦萨，已婚女性和寡妇作为服务人员的人数超过了未婚女性的人数，而作为未婚女性参加工作只是一个最后的选择而已，因为参加

[23] Goldberg (1992b, 第236, 243—255, 261—63, 273—275页), Goldberg (2004, 第5页)和Goldberg (1986a)。想了解更多关于现代早期欧洲，特别是英格兰的服务业的重要性的数据，还可以参考Smith (1992, 特别是第36页；关于英国和意大利的服务人员的移动的自由请参见第40—41页)。

[24] Hartman (2004, 第77页)，引用部分；Kowaleski (1998, 第50—51页)和Lynch (2003, 第40—41页)，给出了另外的关于北方和南方的性别比率和单身女性在人口中的比例的差异的证据。

[25] Klapisch-Zuber, 1985。

[26] Goldberg, 2004, 第12页。

[27] 参见Goldberg (2004, 第5页)和Klapisch-Zuber (1985, 第173—174页)。

工作有可能给一个人的名誉带来危险。^[28] Smith 将此作为南北方的根本差异：在北方，其基础是自由选择，目标是获得“结婚预算”（marriage budget），而在南方，这是最后的手段，这有可能还会起到相反的降低婚姻选择的可能。^[29]

尽管对于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大小的演变过程还有争论，但是已经有大量文献证明该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令人瞩目的深度。在低地国家，这个趋势明显处于上升阶段，在16世纪的荷兰和盖尔德（Guelders）地区，60%的工作人口都是挣工资的劳动者。^[30] 在英国，占人口总数的25%一直到甚至超过50%的人口（部分）都积极参与到了劳动力市场；由 Chris Dyer 最近做出的估计显示在大约1300—1520年间，有非常稳定的最高占50%的人口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在东部最商业化的国家比例稍高，而在西部比例则稍微低些。^[31] 或者正如 Poos 在他的研究论文中指出的（东部的一个国家）那样：在北海地区作为一个挣工资的劳动者是大多数人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寻常事（Poos, 1991, 第183—229页）。我们可以将这些超高比例的工资劳动者与对中国明朝的估计做个对比，在中国的明朝时期，大约只有1%—2%的人口是挣工资的人（Xu, Wu and Curwen, 1999, 第37页）。

我们因此假定面向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在欧洲婚姻模式的起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黑死病之后，进入劳动力雇佣市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导致了欧洲婚姻模式的关键特征的出现。关于中世纪

[28] Klapisch-Zuber, 1986, 第72—73页。还可以参考 Molho (1998, 第204—217页)，他给出了大量有趣的托斯卡纳式的（Tuscan）关于新娘的理想结婚年龄的想法：她仍然应该是一个女孩（fianculla）或者十几岁的少女，相对而言，她的丈夫年龄可以在20—35岁之间。

[29] Smith, 1992, 第45页。

[30] Van Bavel, 2006。

[31] Dyer, 2005, 第218—220页。

欧洲女性的工资的信息非常少，但是有几个可以获得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 1348 年后发生的状况。Thorold Rogers（唯一一个对长期的男女工资趋势做过对比的作者）指出“在大瘟疫之前，特别适合女性的工作的普通工资是按照每天 1 便士（pence）支付”（Rogers，1866—1982 年，第 1 卷，第 281 页），这个工资是非熟练工人日工资的一半。例如，盖房屋人的帮手经常是女性，她们所挣的工资通常是盖房屋的人的 1/3（1 便士对 3 便士）。1348 年以后，帮助修缮房屋的人的工资分别为：1360 年代每天 2 便士，到 14 世纪末的时候，增加到每天 3 便士，而修缮房屋的人的工资仅增加了 1/3，大约每天 4 便士（Rogers，1866—1982，第一卷，第 321 页；Rogers，1866—1982，第 2 卷，274—334 页）。^[32] 这些修缮房屋的人的工资可能是对 1348 年之后的女性工资水平的相对发展程度的最好例证。^[33] 另外，政府的规章对女性也非常有利：1444 年劳动法案（the Statutes of Labourers）将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定为 4.5 便士，这个工资实际上比男性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还要高（“其他劳动者”），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定为 3.5 便士。

很多作者（Beveridge，Hilton）已经觉察到了 1348 年之后女性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强劲增长，并且指出如果女性和男性做相同

[32] 还可以参考 Dyer（1998，第 215 页）。

[33] Bardsley（1999）没有证明在 1348 年之后女性工资相对男性出现了增长，并且怀疑（1348 年之后）女性是否和男性一样支付相同的工资。然而，Hatcher——在 Hatcher（2001）中——认为 Bardsley 的结论由于受到根据工作时间支付工资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不清，而 Bardsley 关注的单个工资率在农业劳动中远远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女性可能工作的较慢，但是每个单位的工作的工资根据性别情况没有差别，Hatcher 写到。因此根据 Hatcher 的“家长制结构”的胜利而导致的工资歧视的主张是有偏见的。第二，Bardsley 勉强承认劳动生产率作为工资的基本决定因素的重要性，而 Hatcher 指出的原因是那些可以和男性做同样工作的女性应该获得相同的报酬。虽然很明显我们还需要更多关于原因的资料，但是 Hatcher 却认为工资差异更多地受到劳动生产率和制度因素而不是性别偏见的影响的结论被证明是正确的。还可以参考 Bardsley（2001）作出的对他的评论的回复。

的工作，那么通常会被支付相同的工资——这是北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Hilton 还指出“大约 1400 年左右，农村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做相同的体力工作，例如割晒牧草、除草、收割、搬玉米、赶牛耕地以及碎石修路”（Hilton, 1975, 第 102—103 页；Beveridge, 1955—1956, 第 18—35 页）。^[34]我们发现在 14 世纪中期到 16 世纪中期的荷兰同样出现了相似的性别差距消失的证据。^[35]一种相似的工资水平差距的缩小状态同样发生在荷兰，装订工的工资（大部分是女性）从占割草的人的工资的 1/3 上升到 1450 年代的 75%，之后这些工资似乎又再一次出现了转折趋势（到 1490 年代的 50% 和 1500 年代的 44%）（De Moor, 2000, 第 103—106 页）。简而言之：黑死病导致女性劳动条件的大幅提升，不仅在她们可以获得的工作数量方面，而且在她们获得的（相对）报酬方面都有提升。但是欧洲的女性利用这个情况的程度在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北方地区，这些变化导致女性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大增，而在南方，女性的相对工资出现了上涨，而其他因素（例如嫁妆制度）限制了这个过程。

劳动力市场的扩大特别是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市场的扩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代际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家庭是围绕对一个农场的集体协作劳动（collaborative exploitation）而组织起来的，父亲权威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是其对生产资源（productive resources）的控制。如果像中世纪后期的西北欧发生的情况那样，

[34] 还可以参考 Bardsley (1999) 的评论文章。

[35] 对于荷兰和英格兰的不同性别间的工资差距的更加详细的论文正在制作中；对于这段时间荷兰的男女工资相似性的证明可以在 Hamaker (1876, II, 第 423—424 页和第 440—465 页) 对于搬泥煤和在石灰炉工作的人的各自数据中找到。Boschma-Arnoudse 的作品显示在 1550 年代的情况仍然相同，参见 Boschma-Arnoudse (2003, 第 342—44 页)。

家庭不再拥有任何事实的生产资源，那么父权的经济基础就被削弱了。更进一步地，如果同时年轻人有办法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他也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家庭作为仆人或者女仆，有机会成为临时性的农业劳动者，有机会在整个夏天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移民到城市——总而言之，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逃离家长的权威，那么代际之间的力量平衡在根本上就受到了影响。那些年龄超过 16 岁或者 18 岁的年轻的成年人可能在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上赚到较多的盈余，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仍然较低，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建立家庭所需的固定费用。那么把他们和家庭联系到一起符合父母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家庭收入的纯粹的贡献者。同时，年轻的劳动者对雇主的吸引力很大，而且当劳动力市场出现相对大的发展之后她们（他们）经常能相对容易地找到工作。这就表示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和各代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变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世纪后期劳动力市场的增加以及城镇和乡村的工作人口的无产阶级化。教会的教义使得这种显著的变化成为可能：他们对于年轻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必需的思想方面的支持，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则创造了物质基础。

我们或许可以更近一步。年轻男女摆脱了父母的控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一种完全面向劳动力市场的策略：挣工资的劳动变成了生命循环中的关键阶段，它开始于他们年轻的时候，女孩作为仆人或者男孩作为学徒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到了技巧并且积累了建立自己的家庭的财富。她们在 12—14 岁的年龄离开他们的父母，这一过程也为市场创造出了非常机动和灵活的劳动大军，当工作机会增加时，他们可以迁移到城市，或者当别的地区出现好的工作机会时，又可以搬到别的地区。甚至在他们结婚组成新的家庭之后，工资劳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即便不是他们收入来源的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不仅是蓬勃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广大男女改变他们的婚姻模式，而且改变的婚姻模式本身反过来也导致了他们对工资劳动的依赖的增强。这个累积的过程——这一婚姻模式和劳动力市场共同演变的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5—16世纪的北海地区出现了非常高水平的无产阶级化。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在中世纪末期西欧的工资劳动者的显著增加。关于中世纪末期的英国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口所占比例的估计大约在超过1/4—1/3之间。对低地国家的估计高达60%（Dyer, 1989, 第214页；Van Bavel, 2006）。这些超高水平的无产阶级化可以和中国的清朝做比较，在中国清朝时期，大概1%—2%比例的人口赚取工资（参见 Xu et al., 1999）。只要劳动供需条件导致女性的极大参与，年轻的工人不再生活在家庭中，同样对独立决定婚姻有帮助。父亲的意愿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许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离开家庭去当佣人，因此也逃出了父亲的权威。当他们实际决定结婚的时候，他们有法律支持，即使他们的父亲喜欢另外一位婚姻伴侣。

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女性也可以为她们自己，也为她们的家庭成员发展出更多的社会资本，这是她们另外的财富，这些社会资本是她们作为父权制度的一部分所不能获得的。虽然对此进行程度分析非常困难，但是联合的大家庭制度，必须到男方居所去生活的常态，肯定对女性的社会资本有很大的不利因素，因为她们搬到婆家生活时，婆家通常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村庄（Cornell, 1987, 第146页）。那些可以留在同样的家庭和村庄的人有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她们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及她们对当地的社群有较亲密的熟悉度。一个年轻女性离开家庭去结婚，就是将这些所有她熟悉的事物都丢掉了（Maynes and Waltner, 2001）。在某种程度上说，欧洲的

121

年轻女性移民去作常住的女仆或者佣人和这种情况类似。但是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使得她们可以为自己和将来的配偶创造出新的社会资本。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是三个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结果：思想意识（教会的教导），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1348年之后）和特殊的有利于女性（工资）劳动者的两代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制度。其实在1348年之前，欧洲婚姻模式只是众多的替代家庭组建模式中的一种可能，而且主要是“穷人的可能的特权”，黑死病创造了一组非常特殊的环境从而使得欧洲婚姻模式成为大多数人的优先选择，锁定了一种自动永久存在的强制性的工资劳动和家庭组成的系统。只有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变化感觉不是很明显——在那里，父权控制仍然相对较强，而且安排婚姻同样很平常。

Hajnal 的欧洲婚姻模式的典型特征

尽管我们已经详细的分析了促使欧洲婚姻模式（EMP）出现的因素，并且提出了解释，主要是关于欧洲婚姻模式的量化方面（夫妻一致同意、弱化的家庭权威和新的婚后居住方式）。我们可调查一些“显著特征”高的平均结婚年龄和众多的（女性）独身者，从而找到他们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A. “不要使自己太早陷入婚姻当中”：较高的女性平均结婚年龄

122

因为婚姻的基础是双方一致同意，所以欧洲婚姻模式下的婚姻是一个搜寻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只能是在男女双方都足够成熟去选择自己的伴侣的时候。因此，18—20岁的平均结婚年龄是最低

的界限。相比之下，安排的婚姻制度的特征是更加年轻的结婚年龄，特别是对于女性。但是在欧洲婚姻模式下，出现了很多的可能，这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和整体的经济状态。比如，我们现有的少量关于中世纪晚期的荷兰和泽兰的数据指明了一个相对年轻的结婚年龄。在我们关于 1505 年婚姻情况的资料来源中（Janne 的故事就是出自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结婚的男性都只有 20 岁或者一个 22 岁的男性已经有了妻子和 4 个孩子。而且其中还有一名男性，这个人名叫 Adriaen Jansz, 21 岁，是米德尔堡（Middelburg，泽兰的首府）的市民，他在三年前“为了得到豁免就秘密地”迎娶了他的妻子 Cornelia Adraen Vierloesdochter van Vijckenkercke，这一行为可能有悖于她父亲的意志，因为她的父亲好像具有贵族血统。^[36] 根据这些证据，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在 1505 年，泽兰的结婚年龄，即使对于男性来说，好像也低于 20 岁。这里还有一些零星的 1540—1541 年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使我们估计出莱顿周边农村的一组男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在那里女性可能的结婚年龄在 20 或者 21 岁（n=10），而男性则高 1—2 岁（21 或者 22 岁）（n=29），而且大多数的男女在 20 岁之前就结婚了（Anonymous, 1993, 第 28 页）。

这些估计可以和 15 世纪的英国做比较，英国的（女性）结婚年龄在 18—23 岁之间。例如，Goldberg 提出约克郡的农村女性在十几岁的后几年和二十出头的时候就结婚了，而男性则会等到他们将近 25 岁左右。^[37] 这两个国家的平均结婚年龄在 16 世纪都出现了显著增长（Hartman, 2004, 第 39 页），因此它已经到达了 Hajnal 认

[36] 同时，同样的资料来源还展示了两个男性，年龄分别为 31 岁和 30 岁，他们仍然单身并且和他们的母亲一起生活，而且在第一个例子中还有三个没有结婚的姐妹。

[37] 数据很少，参见 Kowaleski (1998, 第 41—45 页)，提供了最近的总的看法，还可以参考 Kowalski (1998 [附录], 第 326 页) 和 Smith (1979) 对一些证据的讨论和 Youngs (2006, 第 135 页)。

为的可以显示欧洲婚姻模式的特征的水平。在 1580 年代—1590 年代之间，阿姆斯特丹女性的第一次平均结婚年龄在 23.5—25 岁上下波动，并且这个水平一直持续到 1660 年代，然后就开始进一步地上升。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要高出 1—1.5 岁。在 1578—1601 年间结婚的 8052 名阿姆斯特丹男性中，只有 118（1.5%）的人年龄低于 20 岁，没有人年龄低于 18 岁，而几乎一半（47.5%）的人的年龄超过了 25 岁（Van Nierop, 1934）。与之相似的是在 17 世纪的前几十年，英国的（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女性增加到超过 25 岁，而男性则在 27.5 岁以上（Wrigley, Davies, Oeppen and Schofield, 1997, 第 134 页）。Hajnal 认为高的结婚年龄是欧洲婚姻模式的基本特征，而我们却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 16 世纪以双方同意和以新的婚后居住地为基础的制度造成的生活水平的恶化导致的。^[38]

大多数关于欧洲婚姻模式的著作都主要集中在它对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方面。以 Hajnal 的成果为基础的第一代研究认为，欧洲婚姻模式使用了马尔萨斯的预防抑制，从而保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并将结婚年龄推迟到 25—30 岁，而且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女性）人口没有结婚。当时代不好的时候，婚姻就被推迟，人口的增长就放缓。这个与亚洲或者中国的婚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马尔萨斯的论断），中国的人口由于缺少这种预防抑制，所以结果应该是人口会出现毫无限制的增长。然而，一些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的解释显示在婚姻关系中，人口出生率比欧洲要低很多，这部分是由于婴儿死亡率，特别是女婴的死亡率（溺婴）。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往往是低水平的出生率（Lee and Wang, 1999,

[38] 相似的是，人们可以发现在殖民地的美洲的平均结婚年龄较低，而他们的婚姻仍然是以这些规定为基础，但是他们的经济条件比西欧要好很多，根据 Gallman（1984，第 613 页）的估计，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 20—22 岁，而男性的年龄在 24—26 岁。

第 8 页)。再者我们认为相对较低的婚后婴儿出生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上述的根本结构。当婚姻的基础是双方的同意——以互相爱慕为基础——那么通常有很高的“发生性关系的倾向”，甚至在实际的结婚典礼举行之前就可能发生性关系（这就更加增加了婚后的婴儿出生率），因此一旦决定结婚并且双方同意，那么这对夫妇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结婚。因此欧洲婚姻模式导致刚结婚之后或者在婚姻中的高水平的人口出生率。而通过安排成婚的夫妇可能使得“发生性关系的几率”很低，或者根据 Kok, Yang and Hsieh (2006) 在对 19 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台湾地区和荷兰的人口出生率对比研究中持有的观点可知：“在安排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巨大的年龄差距可能阻碍了亲密的过程”。这个对“童养媳”来说尤其正确，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部分地区）。在这些婚姻关系中，在未来的新娘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被带到男孩子的家庭中抚养，这对男女像兄妹一样长大，当他们长大成年之后就宣布成为夫妻。正如 Kok, Yang and Hsieh (2006) 所作出的令人信服的证明那样，这些婚姻的特点就是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可能是因为这些夫妇发现很难发展出新的两性行为方式。研究文献显示，在结婚之时，有些夫妻双方需要被迫发生性关系。^[39]生活在父权制度下，也可能限制性关系的发展（Lee and Wang, 1999, 第 90—92 页）。与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关的更加实际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更加低于预期的出生率的解释。因为女性的工作主要是在家庭内部，母亲可以抚养他们的孩子的时间比欧洲要长久，这不仅增加了两次生育之间的时间，而且增强了儿童的成活率。

[39] 这不代表作品中列出的解释中国较低的婚后出生率的其他因素，例如营养不良（参见 Wolf, 2005, 第 232 页）和 / 或有意识的儿童抚养计划（参见 Lee and Wang, 1999）。

欧洲行为模式的基础是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信任：年轻人在 10—12 岁（有时候甚至更年轻）就被托付给其他独立的家庭，因此，找寻未来的婚姻对象的过程就需要这些年轻人自己完成，女性（和男性）可以积极参与到工资劳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互动活动中。这些地区通常距离她们的家庭很远，不会破坏她们的名誉。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相互之间高度信任的最好例子就是求婚和婚前性行为的出现。欧洲婚姻模式在 1500 年之后的发展——伴随着夫妇在 25 岁之后结婚——并不代表想要结婚的每个人因为推迟组建一个家庭而放弃所有的性行为。虽然在父权社会里年轻的未婚男女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为了保护女性的童贞——但是在西欧求婚和婚前性行为并没有导致过高的私生的出现：

夫妇之间很难避免所有的性活动。重要的是避免怀孕，关于遍及西北欧的求爱行为的证据显示，特别是已经订婚的人，经常进行社会上允许的爱抚训练（Hartman, 2004, 第 62 页）。

Jan Kok 在对荷兰的这些实践的相似分析中，同样指出正是由于对年轻人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允许他们享受他们自己的“游戏”——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理的，因为私生水平比其他地区要低（Kok, 1990）。

B. “解除束缚是最好的”：女性中较高的单身率

欧洲婚姻模式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相对较高比例的人口（女性）保持单身。再次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这个事实，即寻找合适伴侣的过程从这些参与者成年之后（即在 18 岁）开始，到他们双方一致同意后结束。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浪漫的版本：当他们

彼此陷入爱情的时候，他们才选择结婚。^[40] Hajnal (1965, 第126页) 评价说这种个人寻找爱情的过程是欧洲婚姻模式一个重大的局限性：

婚姻只有在未来的婚姻双方都对彼此了解很清楚之后才能决定的信念……可能使得寻找结婚对象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人们通常有机会了解的异性年轻人只有几个。相反，如果有可能安排从没有相见的人结婚，那么有可能成为夫妇的范围就会极大地增加。

因此很自然的是，一部分人口找寻的结果是，在婚姻市场比较活跃的时候，部分男女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此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部分人口从来没有结婚。在人为安排婚姻的制度里，这种情况则不太可能。^[41] 在那里，普遍的婚姻——特别是对于女性，因为经常会出现缺少女性的局面——非常正常，因为安排一场婚姻的花费有限，但是潜在的利益却非常大，并且乡村和家庭网络也可以被动员起来以用于为年轻人找到合适的伴侣。^[42]

126

总之，我们认为 Hajnal 的欧洲婚姻模式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我们分析过的模型的结果——特别是以一致同意为基础的婚姻。^[43] 另外一个特征是在“典型的”欧洲婚姻模式中，男女之间

[40] 除了女性中高比率的未婚妇女，女修道院的重要性也对女性的高单身率有影响。

[41] 在传统的中国只有1%—2%的女性在30岁的时候仍然未婚。相比之下：在西欧15%—25%的女性没有结婚 (Maynes and Waltner, 2001)。

[42] Kowaleski——她对于已知的欧洲单身女性的数字有着非常有用的总体看法和评语——认为北方和南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英国的单身女性的数量可能比西北欧的大陆部分的数量还要多 (Kowaleski, 1998, 第46页)。也可以参见她的关于平均结婚年龄和单身女性的比例的总体观点，出自第326—328页的表A1)。

[43] 这个也可以将我们的方法和 Hartman (2004) 的方法做如下区别。

的年龄差异相对较小——主要还是因为是（接近）平等的双方一致同意的结果——而在欧洲南部的年龄差异一般都很大（Laslett, 1977）。^[44]事实上，正如 Anna Bijns 的诗中显示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女性在结婚前（和也可能在结婚后）的相对较高的谈判地位受到了结婚年龄相对较大和男女之间年龄差距较少的积极影响。

欧洲婚姻模式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a.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人力资本形成

127 欧洲婚姻模式在中世纪出现，它的时代特征就是家庭结构和婚姻模式对市场机会的基本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的适应。这种适应还包括通过市场获得食物和服务，因为很明显工资劳动者不可能自己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婚姻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以前的可以对比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家庭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工资劳动者逐步发展和执行的策略非常明显：这就显示他们充分信任市场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是对他们的收入，而且包括对他们的消费。这可以

[44] Laslett (1977)。Goldberg 同样对 14—15 世纪约克郡的年龄差距做出了估计，并且得出的结论是夫妇倾向于在相似的年龄结婚，这个是根据 Razi 在中世纪的 Halesowen 庄园发现的数据（Goldberg, 2004, 第 9—11 页和 Razi, 1980, 第 61—63 页）。约克郡城市地区的夫妇的平均的年龄差异是 2.9 年，而农村的平均差异是 3.8 年。Goldberg 同样认识到在这些例子里，男性通常年龄很大，他们经常在第一次娶妻的时候就是鳏夫。同样可以参见 Wrigley, Davies, Oeppen and Schofield (1997, 第 151 页及以下页) 关于英国的夫妇之间的年龄差距的讨论以及对于意大利现代早期新娘和新郎更大的年龄差距的对比。这些是由 Herlihy and Klapisch-Zuber 叙述并由 Smith 放到了欧洲的环境中 (1992, 第 33 页)。

被看作是该地区在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的指标：人们建立起来的对于市场的信任使得这种转型成为可能。

出现于中世纪晚期并且直到 19 世纪（甚至可能到 20 世纪）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是接受“在职”培训和教育的时间的延长，它构成了个人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欧洲婚姻模式通过这种方式与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的学徒制（主要存在于行会中）以及“流动”的服务员、女仆和熟练工人的形式实现了混合。^[45] 这些混合极大地增加了个人在生命周期中接受训练和教育所占用的时间。

促使社会—经济发生改变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借助于家庭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西欧的这种服务现象所具有的特征没有在流行低龄婚姻的地区被发现。当人们可以不通过做服务员的阶段就可以挣钱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更年轻一点就结婚（Gottlieb, 1993, 第 60 页）。Reher 确认了这点：根据 Hajnal 1965 年的文章（特别是他的表 2 和表 3），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欧洲南部不完全符合欧洲婚姻模式，即普遍的晚婚和低比率的婚姻，也与东欧的模式不尽一致。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仆人的数量比中部和北部欧洲都少很多，女性结婚年龄也要小很多（Reher, 1998, 第 207 页）。当然他们的结婚年龄不是很早。这就导致了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儿童最后离开家庭的时间比北海地区要晚（Reher, 1998 第 207 页）。在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年轻人在结婚之前不会离开他们父母的家庭。^[46] 在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当中，有许多仍然和他们的父母住在

128

[45] 关于中世纪欧洲的学徒制度，参见 Epstein, 1991；有一些关于服务的重要性的讨论，参见 Bailey, 1996, 第 7 页；Fox, 1996。

[46] 今天仍然是这种情况（参见 Reher, 1998, 第 208 页）。这可能和嫁妆制度有关，这种制度在欧洲南部非常著名。

一起，因此那里产生了几代同堂的家庭。^[47]

另外一个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现象是人力资本的发展。欧洲婚姻模式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似乎是一对很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婚姻模式不利于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此投资产生的任何额外的收益，家庭本身不可能得到——特别是对于作为投资人的父母——这些收益流入到了结婚后由新一代组建的家庭里。总之，结婚后在新的地区居住可能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当结婚后在男方家居住，或者当年轻人住在父母的家中时，他们的父母可以直接从他们创造的收入中获得投资收益，这样对父母来说可能有更大的激励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但是有证据显示，尽管存在新的婚后居住制度，西欧的父母仍然为他们的孩子投资很多，这也可以从理论上说明“以爱为基础的婚姻”将会导致比安排的婚姻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个先导研究中，Edlund 和 Lagerlöf (2006) 证明“婚姻的决定权从父母转向个人同意导致资源向同样的方向转移，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资源转移对年轻人更有利”。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成年人比老年人更加有为他们的后代投资的意愿，因为老年人“只有很少的一段时间了”。另外一个方面的解释就是新的父母——“摆脱了”他们父母的控制——可能会有更多的方式做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

[47] Laslett 声称几代同堂的家庭的比例在欧洲南部比较高，而在东部则非常高，不像在北部和西部，这类家庭的比例则比较低 (Wall, 1983, 第 526 页)。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心理上的原因显示通过工资劳动取得收入的人很有可能推迟结婚，特别是女性：在最近的研究中，美国的心理学家 MacDonald 找到证据证明人们的生育行为也受到提高或者保持其社会地位的动机的推动。因为这个可能会与想要许多孩子的想法有冲突，所以这些动机可能影响生育的决定。MacDonald 的解释证实了我们关于中世纪中期西北欧的女性的选择的观点：女性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特别是黑死病之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也很受欢迎。这表示他们可以存钱以便过“更好的生活”。因此她们要孩子的意愿被推迟，因为这和她们想要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的期望相冲突 (参见 MacDonald, 1999)。

印度的家庭结构则关注于为他们年长的父母提供这样一份孝礼，对于已故的先人举行祭典和多种仪式，并将仪式传给后代以便这些祭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父母的权威是为了保证这些孝礼的转移，在他们最有生产能力的时候，子女照顾他们的父母，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父母方。伴随欧洲婚姻模式而产生的最基本的变化是子女不再用这种方式照顾他们的父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新的制度里，谁将会照顾这些老年人？同时，它也会创造出一些机会：它释放了一些资源，这些资源很明显是要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和培训当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也可以被看作是受到了同时发生的家庭所处环境的商业化的影响。在新环境下衡量成功的标准不再是继承父亲管理农场（和继续这种血缘关系），而是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工资劳动获得最大化收入联系在了一起。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向子女投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在北海地区，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人们的读写能力大幅上升。低地国家对此情况有相对良好的资料证明：新的宗教运动的传播（15世纪的现代灵修运动 [Modern Devotion] 和 1517 年后的宗教改革）与这个潮流有很明显的关联（Derville, 1984; Uitz, 1990, 第 71 页）。在 16 世纪，荷兰的大部分男性可能都可以读和写，即便是在乡镇或者农村，那些男性也可能掌握这种技巧（Van der Woude, 1980, 第 257 页）。在 1585 年，有 55% 的新郎和 32% 的新娘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婚姻注册的时候签署自己的名字；外地移民和阿姆斯特丹本地的居民之间存在的差异已经不是很明显（Van Zanden, 2004; Kuijpers, 1997）。在英国，1340—1548 年间教育出现了相似的增长，Hoepfner Moran (1985) 的关于约克郡的文件资料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证明。在伦敦，1470 年代的读写能力的水平可能已经与阿姆斯特丹一样高，虽然对此还不是很确

定 (Moran, 1985, 第 20 页; Hanawalt, 1993, 第 82 页)。^[48] 在和北海地区接壤的相同的地区, 熟练工人的溢价在 1348 年后快速下降, 并且在 16—19 世纪之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这也显示这里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 (参见第五章)。而且, 两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形成本身联系也很紧密: 低地国家和英国的行会要求他们的学徒必须有读写能力, 或者在他们的学徒训练当中包括阅读和计算能力 (Hanawalt, 1993, 第 82 页) 的训练。在阿姆斯特丹, 穷人救济机构也注意到将孤儿送进学校, 以便让他们获得当学徒的机会 (Kuijpers, 1994, 第 48 页)。更加突出的一点是男女性别差异相对较小: 西欧国家的父母为她们的子女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时, 不太歧视女性。虽然男性的读写能力仍然领先于女性, 但是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区来说, 比如中国和印度, 这种领先相对较小 (Van Zanden, 2004)。因此, 正如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所展示的细节那样, 北海地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个时期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的形成, 而这种人力资本的形成成为此地区在下个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b. 制度和信任

由欧洲婚姻模式产生的小型核心家庭在面临个人成员丧失的时候比大的家庭更加脆弱。特别是对于丧失父亲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家庭主要是靠工资劳动者, 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强大的家庭纽带——最好的“传统”支持网络——不再是一个真实的替代物, 因为欧洲婚姻模式的基础是自给自足: 年轻人在很小的年龄就离开家

[48] Moran (1985, 第 20 页), 引自于 Sylvia Thrupp 的估计。

庭，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经常远离他们父母的居住地，这些都显示欧洲婚姻模式的基础是松散的家庭纽带。^[49]这就需要替代的以社区、城市甚至国家层面的团结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网络，构成这种网络的基础主要是互助而不是血缘的联系。老人无疑是父权权威衰落和子女婚后同在异地居住的趋势的受害者。当然，当他们的子女成功后，父母可能也会从他们的成功中获益。但是这些事情，在父权制度下是通过父权的权威以“强制”的方式进行，而在西欧制度下更多的是通过自愿的货币和物品的转移来实现（Smith，1986，第199—201页）。

另一方面，这可能会使父母在情绪上愿意给他们和子女的关系进行投资。^[50]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明显地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动机，即在他们生命周期内便开始为他们的老年时代生活做好存款准备。此时发展中的资本市场开始起作用：在新制度中，为未来进行储蓄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有孩子不再能保证他们在晚年能够得到悉心照顾。在他们十几岁到二十岁初期的时候，男性和女性应该储存大量的金钱以便在他们结婚的时候组建自己的家庭，而在他们结婚之后，则需要进行储蓄以便保证他们在年长的时候有积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在同代之间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转移调节，从而解决老年时期的问题和照顾建立新家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父权制度中是通过两代间的财产转移解决。

131

[49] Hoppenbrouwers（1985）从一些细节上用文件证明了中世纪后期荷兰家庭的影响的下降和“个人主义”的上升。

[50] 关于中世纪后期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的辩论的评论包含在 Hoppenbrouwers（1985）当中，以他收集的与荷兰有关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为基础，展示了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的重要性。

因此，欧洲婚姻模式不仅要依靠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而且还要依靠可信赖的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非常不可靠，效率低下，那么它的良好运转也存在困难。然而，幸运的是有很充足的理由证明在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资本市场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参见第一章）（Clark, 1988, 第 265—294 页；Epstein S.R., 2000, 第 18—25, 60—61 页）。在低地国家，最流行的一个发明就是年金，如果一个男性或者女性拥有了年金，那么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将会得到相对较高的利息。这些年金在中世纪后期变得非常流行，而且低地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地区（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荷兰），年金都是城市（长期）资金的最重要来源（Zuijderduijn, 2007）。年金是为老年时代存款的最理想方式（VerLoren van Themaat and Dokkum, 1983）。在对 15—16 世纪的伊丹（Edam）以及周围农村的案例研究中，我们也证明了这些年金（*renten*）也用在两代间的转移。父母将农场和工场交给下一代，作为回报，父母可以在生活中收取租金，这样就能保证在他们退休之后有足够的收入（de Moor, van Zanden and Zuijderduijn, 2009）。相似的发展可以在中世纪的英国找到，在英国养老金合同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老人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权交给家庭成员或者其他成员，作为交换他们个人可以获得养老金收益。^[51]

同时，穷人救济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教会予以资助，后来逐渐地——特别是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之后——由市政府督促和 / 或管理，特别是在英国，由国家管理。在

[51] Elaine Clark 指出在 13 世纪后半期的英吉利东部，已经有 40% 的男性和女性领到了养老金。在 1350—1457 年间，女性和男性领取养老金的比例分别为 38% 和 23%（Clark, 1981, 第 316 页）。

中世纪的时候，穷人救济主要是教会的责任，教区的部分收入将会用作“招待”，例如给陌生人或者旅行者提供住宿和对穷人进行施舍。^[52] 在市中心的地区，这种和教会有关的穷人救济经常由新的机构提供，这些机构是由虔诚的市民发起组织，但有时候也是由城市发起和管理的——目的是处理穷苦大众的问题。在登博斯（Den Bosch）的布拉班特（Brabant）市，这些中世纪的自发行动导致了穷人救济机构的资本和土地的积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为那些城市的穷人救济提供资金（Prak, 1994）。与之相似的是，在乌得勒支市（Utrecht），在中世纪后期出现了几十个机构，他们分别照顾不同方面的穷人和“失败”的家庭——孤儿、老人和病人（Bogaers, 2008, 第497—577页）。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中，穷人救济的范围非常广，但是也很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自下而上”自发行为。在16世纪的时候，这些不协调的穷人救济机构逐渐受到了大家的批评，所以出现了对这种“体系”进行改革的尝试。在低地国家，这种尝试导致了查理五世（Charles V）在1531年颁布的第一个国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穷人救济的进一步的改革和扩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每个城市和省的行动（Parker, 1998）。英国通过1572—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建立了全国性的制度，这个也是建立在中世纪的传统之上（Tierney, 1959, 第129—133页）。* 这些制度的相同之处是它们相对于当时的标准来说似乎更加慷慨（Lindert, 1998）。例如，De Vries

[52] 对于中世纪的穷人救济基金的分析依据教会法规提供的资料（Tierney, 1959）。

* 根据《伊丽莎白济贫法》，治安法官有权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费。救济办法因人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作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和身体残疾的人，得到救济或赡养；给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译者注

and Van der Woude (1997, 第 657—660 页) 估计在荷兰穷人的救济占据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多达 3%—4%，他们将这个与“最适合的非正式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收入再分配实践”相联系。从这个观点看，北海地区的这个“相对慷慨”的穷人救济可以被看作是在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人口统计制度的副产品 (Smith, 1986, 第 199—201 页)。

另外一个容易受伤的群体是在这个年龄范围中的另外一端。中国和欧洲家庭处理“不想要的”孩子的方式完全不同。在中国和印度，杀婴，特别是不要女婴的现象非常普遍 (Lee and Wang, 1999)。杀婴与这两种模式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之处有关，即两性的相对价值。中国的模式实质上是夫方居住：婚后夫妇搬到男方的父母家居住，在此后的时间里，照顾男方父母是这对年轻夫妇的应尽义务。因此，男孩是真的资产：延续血缘关系，而且让自己年老时有得到照顾的保障。女孩则是负债：她们的抚养花费很高，结婚时还需要陪送嫁妆，然后结婚后就消失到另外一个家庭去照顾那里的父母了。这样一个男女之间的明显对比在欧洲婚姻模式中完全不存在。有例子显示，虽然在西方确实存在杀婴的现象，但是对于除掉不想要的孩子的方法，比杀婴更普遍的行为是弃婴。而且，通常来说，遗弃婴儿的男女比例相对较为平均。在中世纪后期，我们看到杀婴（女婴）的现象在西欧已经开始逐渐消失 (Hartman, 2004, 第 43—44 页)。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会鼓励收养弃婴：教会在 6 和 7 世纪的时候提出了向上帝供奉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允许将儿童捐献给神职机构以服务上帝，这个可以被看作是对遗弃婴儿的合理化和制度化。在 13 世纪中期前后，在新的专业化城市中照顾遗弃儿童的机构开始成立，这些机构在 16 和 17 世纪的时候遍布于欧洲大部分地区 (Boswell, 1988, 第 401 页, 第 405—

408页)。弃儿的“提供”也与欧洲婚姻模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单身和已婚母亲不只是因为贫穷而遗弃她们的孩子，例如，在巴黎，2/3 遗弃她们的孩子的未婚妈妈都是在做家务，作为佣人，她们面对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并且远离父母的监督（Ransel, 1988, 第173页）。她们中80%的人在城市之外出生，所以也没有社会支持网络。^[53]

在 Reher 看来，家庭关系是否牢固，相对应的制度的弱和强是解释欧洲北部和南部的家庭制度差异的基本点。他还认为，两代人的家庭，特别是只靠工资工作的家庭与父权社会大型的三代同堂家庭相比更加脆弱，大家庭通常有一些获取土地和其他资源的途径。在南部社会，对于社会中容易受伤的成员的帮助主要来自于家庭或者个人慈善团体，而在北方社会，这些帮助则大部分通过公共和私人机构来完成（Recher, 1998, 第209页）。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有几个方法处理穷人的问题：通过共同居住、将老人安排在他们后代的家庭周围或者将老人的房子靠近子女的家庭所在之地。另一方面，在英国，只有很少一部分老人和她们的子女一起生活（Recher, 1998, 第209页）。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平民对于老人的安宁的责任在济贫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参见 Smith, 1981）。

按照 Reher（1998, 第217页）所言，可能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强大的社区制度，可以在困难时期帮助分担风险——在欧洲的同一个地区发生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个说法显得有些夸张：

个人对于公共道德和需求的责任的意识对于西方的民主和

[53] 选自 Fuchs, 由 Tilly (1992) 引述。

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意识很明显在欧洲南部的社会中经常是缺失的……总之，欧洲北部和北美国家都很好地发展了由个人发起的良好市民社会，但是比较黑暗的一面就是缺乏社会凝聚力，而且绝望和痛苦在他们中间非常普遍

父权制的回归

135 在 16 世纪，西欧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工作者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显示，对劳动（以实际工资作为指标）的需求与女性在婚姻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自从后者开始被教会和国家逐渐破坏以来，二者的关系更加紧密。在 16 世纪，实际工资急剧下降使得男性和女性很难单独依靠工资生存。女性的工资可能比男性的工资下降得更多：随着中世纪后期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再次变成劳动力富余，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对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的降低比熟练工人更为严重。例如，Clark 估计 1599 年之后，英国的女性的相对工资水平比 1599 年之前低很多；平均比 1599 年低 31%，在 1599 年后比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低 58%（Clark, 2005）。在瑞典，建筑行业女性的工资在 1624 年之前基本上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等；在经过了两次“分流”之后，到 17 世纪末期，女性挣的工资只有当时工资水平的一半，有时候甚至更少（Jansson et al., 1991）。泽兰的情况也一样：1700 年之前，女性除草的工资和男性一样多，但是在 18 世纪的时候，男性的名义工资得到了增加，而女性的工资却没有变化（Priester, 1998, 第 643 页）。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平均结婚年龄大幅上升到了 Hajnal 认为的这个制度的典型水平。以我们稍微不同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被认为是欧洲婚姻模式

的黄金时期——由于15世纪繁荣的劳动力市场导致的男性和女性的自强——在北海地区已经走到了尽头。

人们普遍接受的假设是，女性在工作和商业中的作用自16世纪以来就开始下降。^[54]对于这一进程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方式。其中对这个假设的最近和最著名的拥护是 Nathalie Zemon Davis(1986) 136 和 Martha Howell(1998) 做出的。Howell 从女性的自发处理资源，控制产品的生产、分销和消费方面比较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她们对这些方面的控制能力越强，那么地位就越高。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女性还经常拥有这些“高的劳动地位”。在此之后，她们的自发性和控制力下降了，到18世纪女性已经很难得到高水平的工作了。这不是说女性参加工作的计划少了，而是女性变得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待遇较好的职位了。新教主义者（跟随路德）和基督教徒（跟随反宗教改革）都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出现了再次强调父母的权威的趋势，这并不是偶然的。直到16世纪，结婚的人和单身的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别：许多情况下，男女生活在一起过着夫妻的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婚。从16世纪开始，新教和基督教的权威和非宗教的政府都试图使结婚者和单身者

[54] 这个概念首先是1919年 Alice Clark 在他的作品“17世纪的女性的工作生活”中提出的。她认为英国的女性在中世纪和16世纪的时候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但是到17世纪的时候就丢掉了这个地位。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女性负责家庭成员的衣着。如果她们嫁给了一个手艺人，那么她们可以在业务上帮忙，甚至在丈夫死后可以接管这个业务。只要掌握了这个手艺，这个可能是最佳的选择。Clark 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学徒变成手工大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许多学徒的命运就是在余生为手工大师工作。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如果丈夫赚的钱够多，那么她们可以只在家里活动。如果不行，女性还需要成为工资劳动者。因为缺少女性工资劳动者的组织使得女性很难利用她们自身的有利条件：对于线的需求总是大于其供应。

之间的分辨变得更加明显。除了批评独身主义者 (celibacy),^[55] 新教主义者大力批评基督教认为两位父母是婚姻的唯一需要的要素的想法, 并暗示那样将会导致不合道德的婚姻。他们强调父母的同意、公开的婚礼和牧师的到场是一个有效的婚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路德的看法 (Karant-Nunn and Wiesner, 2003 第 214 页)。

137

子女在没有父母的同意之前不能订婚, (虽然) 父母不应该……也不能强迫或者阻碍他们的子女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因此, 一个儿子在没有父母的同意之前不允许带其他人的女儿回家。同样父亲也不能强迫别人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

加尔文教徒强调婚姻不是教会的典礼制度, 而是整个社会约定的组织。方方面面的人都在这个婚姻契约的形成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结婚的夫妇分别在对方面前并且在上帝面前宣誓他们的婚姻, 并且与作为参与方、证明人和裁判三重角色的上帝商定了婚姻约定。这对夫妇的父母, 作为上帝指派的子女的牧师, 也同意这对夫妇的结合。

[55] Wiesner (1999, 第 196 页) 解释了新教徒对独身生活的观点: “新教徒的信仰是独身不比结婚优越, 因为他们认为是人类受到有罪的爱的影响太大, 以至于放弃上帝对婚姻的救赎。并且他们认为独身生活经常导致同性恋和非法同居, 这阻碍了人们去做牧师服务的道路。因此独身生活不能成为当牧师的首要条件。因此婚姻对于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来说是正确和合理的事情。” Wiesner 认为虽然从传统上看, 新教徒的宗教改革总是强调这点, 但是有证据显示在宗教改革前的几十年中, 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赞扬婚姻, 而且城市的当权者也认为婚姻家庭是关键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当然, 称新教徒是鼓励结婚和攻击独身的最激烈的一群人也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不结婚的人违背了上帝在伊甸园的命令, 和他凭神的力量创造的不可抗拒的性欲望”。

天主教改革者用天特会议 (the Council of Trent) 同意的 Tametsi 法令 (the decree of Tametsi) 回答了这个问题。^{*} 结婚需要见证人在场, 包括教区的牧师, 以及互相说出誓言, 这种婚姻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婚姻。后来婚礼“雷同化”了, 并且在整个天主教的辖区实现了统一化 (Gottlieb, 1993, 第 69—70 页)。到 16 世纪后期, 两个宗教分区都明确规定了已婚夫妇和单身的界限。他们认为婚姻行为的改革是推动他们走向忏悔和社会自律的关键方面。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加强了牧师、父母和政府对婚姻的控制 (Wiesner, 1999, 第 196 页)。因此宗教改革需要负责制定一个关于婚姻的新观点。它已经迫使天主教做出一些改变, 虽然这些改变也受到了内部的很多批评, 这是因为婚姻的安排导致了许多困难。

到 16 世纪, 人们已经对两种基督教的婚姻模式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英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范围之外。这个也解释了 Macfarlane 的对于英国的婚姻制度有些特殊的怀疑, 但是从这方面看, 英国的“例外”是最近的——1500 年后的——一个现象。他提到了 Montesquieu。Montesquieu 指出英国的女儿经常根据她们自己的幻想而不用咨询她们的父母就可以结婚, 因为法律允许她们这样做。而在法国, 有一部法律规定女儿在结婚前必须等待她们父亲的同意 (Macfarlane, 1986, 第 124—125 页)。恩格斯 (Engels) 在一个世纪后发现在那些受法国法律管辖的国家, 子女被要求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结婚。而在那些受到英国法律管辖的国家, 父母的同

* 天特会议是指罗马教廷于 1545—1563 年期间在北意大利的天特城召开的大公会议。会议的目标在于反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驳斥改教神学, 维护教会稳定, 革除教会弊端等。路德在宗教改革中特别反对未经父母同意的秘密结婚。天特会议在 Tametsi 法令中肯定了秘密结婚的有效性, 但自此之后必须确定在教会合法的权威下结婚方始有效。——译者注

138 意根本不是结婚的法定条件 (Engels, 1972, 第 88 页)。

Macfarlane 认为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重新主张使用罗马法抑制了 12 世纪教会法律创建的浪漫爱情婚姻的教义的实施。自从罗马法取得法律地位和效力之后,特别是从 16 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给予了父亲更大的权利,导致宗教法律的失效。只有英国没有重新主张单一的罗马法。英国的普通法 (common law) 强调婚姻是有关双方之间的合同。对于所有合同来说,其生效需要各方的同意。Macfarlane (1986, 第 127—128 页) 认为“从 12 世纪到 18 世纪,男性 14 岁和女性 12 岁之后有权利反对任何外在世界的压力……1753 年哈德威克婚姻法案 (Hardwick's marriage act)* 首次使得英国的法律逐渐向大陆法 (continental laws) 转移……21 岁以下的年轻人,除了寡妇和鳏夫,未经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就结婚是违法行为”。哈德威克婚姻法案的有效时间很短,到 1823 年就被废除了。在西欧的其他地区,在 17—18 世纪的时候,只有婚姻双方的同意对于结婚来说是不够的:“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对于所有阶层来说,结婚伴侣的选择都受到了直系亲属、亲戚和邻居的很大的控制和影响,因为伴侣可能会不顾及家庭劳动力对于家庭经济的重要性。” (Mitterauer and Sieder, 1981, 第 122 页)

* 法令于 1754 年 3 月 25 日生效,是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首次有成文法明文规定婚姻关系必须通过正当仪式缔结。法令制定的目的是要打击盛行的秘密婚姻,这种风气在当时造成了社会上出现男女未经家长同意私奔甚至是重婚的问题。有见及此,法令除了规定婚姻必须在教堂内由圣公宗神职人员主持证婚外,又规定男女双方婚前必先经由教会刊登结婚启示,或先向教会申请结婚执照;每家教堂也要保管一份婚姻登记册以记录所有曾经举行的婚姻。——译者注

结论

人们有时候称中世纪后期为“劳动力的黄金时期”，但是，这更多的是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想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得更加活跃，而这时期刚好可以满足她们的愿望，因为这是一个黄金时期。^[56]在北海地区，相对收益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很方便，虽然在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仍存在严重的劣势。正如20世纪工资的相对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这促进了女性的解放，而且这种解放在劳动力稀缺时期加速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和1950年后的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劳动力都是稀缺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思考，我们可能就会想到人口统计学家假设的女性相对收益的增加将会导致较低的生育率，因为培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很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或许有助于解释1348年后英国的较低的生育率，较低的生育率导致了人口滞涨，以至于降低到大瘟疫后的水平。^[57]

139

我们认为多种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世纪后期出现的欧洲婚姻模式（EMP）。这些因素包括：天主教的教谕、两代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制度、家庭之外的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黑死病的影响。欧洲婚姻模式的特征是父母对于子女，以及丈夫对于妻子的相对较低的权威和相对较弱的权利。

[56] 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女权历史学家将中世纪后期定义为“女权主义的第一波”，例如 Stuurman 和 Akkerman (1998)。根据 Joan Kelly (1984) 的观点，早期的女权运动开始于 Christine de Pisan 的 1406 年的城市女性之书。

[57] Bailey (1996) 对于这个假设有一个批判性检验，在这个论文中，我们没有专注于人口统计的“纯”效力，而是专注于欧洲婚姻模式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欧洲婚姻模式很好地适应了同时期出现的新的商业环境。工资劳动成为小的婚姻家庭的生命周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其他的市场交易（例如贷款的使用和储蓄的积累）变成了生存战略的一部分。人口体系（demographic regime）和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共同演变有助于解释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商业化的深刻转变，当时 1/3 乃至多达 2/3 的人口开始成为（部分）依靠工资的劳动者，为了工资而劳动已经变成生命周期（life circle）的一部分。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市场的深入渗透，特别是环北海地区的市场发展，应该被看成是这一趋势的先兆。

140 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有着长期的深远影响。我们认为两代间的收入转移的巨大改变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首先，年轻人从增加的人口资本投资中获益。从一定程度上看，欧洲婚姻模式中的晚婚限制了子女的数量，这个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通过牺牲数量来提高后代质量的繁殖策略。通过学校教育和工作培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变成了青年男女的生命周期的一部分，这肯定会推迟他们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因此，家庭不再向后看，例如照顾血统和父母，而是向前看，例如给后代投资。

老人可能是这个新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权威受到了破坏，在父权婚姻制度下，由于他们的父母地位可以获得的收入转移已经没有了。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而进行储蓄对于他们是一个开放的选择，我们推测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和中世纪后期西欧资本市场的强劲的发展有关系。而且，由于家庭小，如果父母其中一人死亡，那么家庭“破产”（分裂）的可能性很大。而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有助于老人、年轻人和体弱的人的安全网。

“工业革命”可以被解释成发生在中世纪后期的变化的延续。现代早期，家庭出现了变化，它利用市场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定位，由

此导致了劳动力供应的增加。Jan de Vries 相信这些变化引发了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而且他认为女性和十几岁的年轻劳动力对于发生在北海地区的经济转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由此导致了 17 世纪的荷兰黄金时期，^[58] 甚至更重要的是导致了 18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 (Vries, 1994)。^[59]

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总体发展都与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及其在 1600 年后的北海地区的成功有着很明显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用欧洲婚姻模式解释所有的事情，但是 Janne Heyndericx 的坚守行为 (stubborn behaviour) 确实造成了不同的情况。^[60]

[58] 还可以参考“现代早期约 1500—1815 年间荷兰北部的女性的工作”这个课题：
<http://www.iisg.nl/research/womenswork.html>.

[59] 在最近的 Voigtländer and Voth (2006) 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个问题，他们区分了两个潜在的原因：欧洲婚姻模式和穷人救济法的慷慨。正如所试图证明的那样，这个原因都与中世纪后期人口再生产策略和劳动力市场导向的变化相互关联并以其为基础。

[60] 和中国相比，可能再次给人以启发。Goldstone (1996) 认为欧洲女性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从青春期、十五六岁的时候、结婚到二十五六岁或者更晚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工资劳动力市场，这是促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原因。中国的女性没有经历过这些时期，也不可能进入工资劳动力市场。虽然——如大家所知——中国确实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但是工厂不能和家庭劳动力相比，因为他们至少还会在家工作。Goldstone 认为由于儒家伦理导致的对于女性外出劳动的限制使得纺纱技术的发展缓慢，因此工厂的生产不能和家庭相竞争。

第三部分

普通工人、哲学家 和欧洲知识经济的 诞生

工业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出现

经济增长，特别是“现代经济增长”，其基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而最根本的基础则是知识的积累。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相对有效的制度是如何在中世纪时被创造出来，并且引起了第一阶段的知识积累。500—1500年间的图书产量的增长可以反映这种情况。然后在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了西欧内部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并且将其和基本的人口结构的改变——欧洲婚姻模式（EMP）的产生相联系——这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具有长期的影响。在第三部分，我们转向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增长，主要

*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 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译者注

关注那一个世纪里引起工业革命的趋势。我们以 Joel Mokyr 对新技术带来的工业革命的长期发展的原因解释作为起点，新技术的发展受到西欧在该时期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发展推动（Mokyr, 2002）。他的论点可以看作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技术发展来源的详细解释。Wrigley 认为亚当·斯密在生前并没有真正洞察发生在英国的技术变化的长远影响（Wrigley, 1988, 第 47—50 页），但是在斯密谈论我们称之为“创新”的原因时，他已经指明了两个引起“机器改进”的原因：“许多工厂用的机器……最初是由普通工人（*common workmen*）发明的。这些工人被工厂主雇佣做一些简单的操作工作，很自然地，他们就想找出更快更容易的操作方法。”他还补充说了第二种原因，即近世创新的来源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这包含“由那些被称为哲学家或者思想家（*philosophers or men of speculation*）的创造所带来的改进……这些人，从那个意义上说，经常有能力将距离最远和最不相似的物体结合在一起”（Smith, 1776/1976, 第 115—116 页；斜体是后加的）。

146

对于这两种知识的区分——即普通工人的知识和思想家的知识——在 Mokyr（2002）最近重新解释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又重新变得重要。Mokyr 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出版的 Kuznets 和其他作者合作的著作中找到，即 1780 年后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是科学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系统应用。但是 Mokyr 的方法有了很大改进：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定理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又称 Ω 知识）和规范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又称 λ 知识）——并且发明了一种关于这两种专业知识的相互影响的理论，主要是关注 Ω 知识映射 λ 知识的方式（Mokyr, 2002, 第 17 页）。1800 年左右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工业革命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这两种知识第一次以系统的方

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实践者、工程师开始使用科学探究模型——系统试验——和科学探究的结果（例如，新发现的自然“规律”）发展和试验新技术。1800年之前，技术的知识基础很弱，技术进步是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之上的，这表示即使有新的发明，技术进步仍然不是系统性的和持续性的（Mokyr, 2002, 第19页）。

对于工业革命的原因的探讨，应该包含在世界经济历史学家正在进行的关于1800年后的“大分流”的起源和性质的讨论当中。正如本书在导言部分所作出的说明那样，通常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就是关注西欧是否在1750年前就已经与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是否“大分流”的原因根植于这个地区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历史。Mokyr证实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 Ω 知识和 λ 知识相互作用的原因，*而这个反过来又以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为基础（Mokyr, 2002, 第36—41页）。**但是他却没有能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或者工业革命确实在英国发生，也没有解释其他社会——中国、日本或者印度——是否经历了相似的转型，如果他们没有，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关于这种方法的一个更加常见的问题是，为了真正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与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做出区分，或者将一段时期与另外一段时期做出比较，那么就需要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量化比较。虽然比较“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发展和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可能很困难，但是做这些事情仍然是重要的和

147

* 启蒙运动是指在17和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知识及文化运动，该运动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译者注

** 大多数科学史家所指的科学革命大约于1543年开始，那一年尼古拉斯·哥白尼出版了著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安德烈·维赛留斯出版了《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当然，具体时间仍有争议，但公认的是，在16—17世纪之间，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的思想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译者注

必须的。这部分内容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出这些量化（评估）方法。我将要试着说明我们实际上可以评估生产、价格和 / 或获取 Ω 知识和 λ 知识的成本。这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长期跟踪这些过程，而且能使我们可以比较欧洲发生的事情以及欧亚其他地区的相似的发展。

这部分的论点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 在第五章，我们将会主要评估人力资本和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的价格，这些可以看作是获取 λ 知识的价格，或者是斯密所描述的“普通工人”（common workmen）获得技术的成本。技能溢价是由一个经济体的培训和教育制度的长期有效性决定的，因此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也是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测度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有否有效率的指标之一）。
- 在第六章，我们将会评估生产和获取 Ω 知识的成本，并再次用书籍的产出作为科学产出的指标，用书籍的价格作为评估获取知识的成本。我将会论证 1450 年代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 Ω 知识的生产和交换的革命，其特征是 1470—1480 年代之间书籍价格的急剧下降，然后是书籍产量和消费的同等级度的快速上升，这对 Ω 知识的产生和交换方式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 最后，1400—1800 年间普通工人和哲学家之间的差距由于读写能力的提高逐渐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有利条件和对书籍产量的上升以及书籍价格下降的反馈。对于书籍消费的评估将会转化成对 1450—1800 年间西欧的文化水平的发展的评估，文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也会被分析。

为了总结这个论点和阐明其复杂性，下列图表将会是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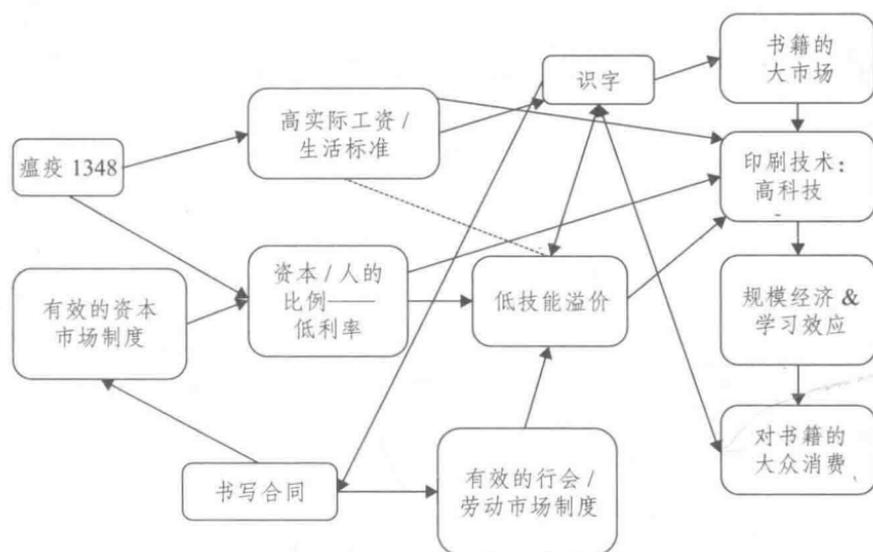


图 10 现代早期欧洲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原因

此处分析的三个相关过程——普通工人的技能溢价的下降、书籍价格的降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集中在欧洲的一个部分，即低地国家和英国。16 世纪之后，欧洲南部和欧洲中部的部分地区落后了，同时欧洲东部也继续处于落后状态。只有欧洲北部的边远地区——这个地区在中世纪的时候一直处于边缘，只有瑞典和苏格兰显示了逐渐赶上的迹象，特别是在 18 世纪。在第二部分我们构想了一个假设，即从 15 世纪以来，北海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大幅高于其他地区，在此部分我们将会对此进行证明。我们将会尝试说明这个地区比欧洲其他地区或者欧亚地区生产和消费了更多的知识（以人均为基础），较低的技能溢价和较高的人均书籍产量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表现得很密切。事实上，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可以用来“预测”19 世纪的“大分流”。

148

149 第五章 普通工人的人力资本：

从全球的观点看欧洲的技能溢价

导言：技能溢价能告诉我们什么

相对价格是经济研究的DNA。它们是反映和解释经济结构特征的基本信息单位。它们告诉我们相对稀缺性，也是引导经济行为的诱因。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时代，当时其他信息来源（例如国民统计的历史数据）很难获得，并且出错误的几率很高，所以相对价格和相对工资是关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关键信息来源。

因此，相对价格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西欧的背景和机制。正如本书在导言部分所提到的那样，一组由Peter Lindert带领的学者已经组织起来，试图探寻相对价格和相对工资的研究是否会对“大分流”的讨论有帮助。Buenos Aires在2002年提出的“全球价格和收入的历史”课题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显示，在现代早期西北欧的相对价格结构有其独特性。他认为在

此地区资本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相对不高，这里的利率也相对较低，而农产品和食物（和土地）的价格相对较高（Lindert et al., 2002）。所以，可能从中世纪末期开始以来，西欧不仅在“高科技”产品上，而且在一个发展良好的资本市场上也具有相对优势。

本章审视了这个假设的某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报酬。本章通过检验技能溢价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以及亚洲最发达地区的长期发展情况，测度了西欧是否真的在知识密集型产品方面部分拥有相对优势。本章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而且我们也了解很多的技能溢价：即建筑行业中的熟练工匠（木工和石匠）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日工资差异，并且提供了在其他贸易中的技能溢价的额外信息。

150

为什么研究木工和石匠的相对工资——除了一个很明显的原因之外，即我们已经知道了大量关于这个职业的报酬数据，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专注于建筑业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行业的技术变化相对较慢，所以那些工匠掌握的技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而且，他们的技术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差距。^[1]我们也可以认为木工和石匠具有很多战略技巧。他们是建造者，同时他们也是很多资本物品的设计者：例如由木头和石头制成的房屋、磨坊、船舶、手推车和大量各种各样的其他建筑（例如，可以参见 Goldthwaite, 1990, 第 125 页及以下页）。因此，他们技能的相对价格肯定对资本物品的相对价格有影响，从而影响投资的利润率。而且，我们认为研究这个领域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力资本作为整体在经济中的情况，而且建筑工人的技

[1] 参见 Van Dyke (2005, 第 62 页) 列举的事例，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的船长，当他们到达亚洲的港口时，“当地的”木匠和其他工匠帮他们修理和维护船舶，显示他们的技能可以很容易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和欧洲的工匠的技术互换。

能溢价也可以用来发展和检验关于制度总体的相对效率的假设。最后，建筑业在欧洲很多地区都被行会组织起来。在过去，人们都认为欧洲的行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试图垄断市场，并且限制别人进入这个被他们控制的职业。最近人们对行会的作用做了重新评价。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行会是一个相对有效的组织，它通过共同管理一个行业的技术，将人力资本传给下一代（参见 Epstein, 1998）。如果对于行会制度的评价正确，那么在行会强大的地区和城市，技能溢价（大师级别的工匠和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报酬）将会较高，而在其他地区技能溢价将会较低，这将证明行会确实会通过人为的保持技术的稀缺性而限制经济发展。对比那些拥有行会和没有行会的地区，例如行会作用比较重要的西欧和欧洲其他没有出现行会的地区，可以有助于解决关于行会作用的辩论。

20 世纪中期的技能溢价

这项探究的起点是假设一个低的技能溢价可以反映出制度的有效，有效的制度又可以引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参见第一章）。当然，需求可能同样发挥着作用，逐渐增加的技能溢价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也反映了对高熟练劳动者的需求的增加。有许多原因促使我们在此只考虑供给方面的因素所提供的证据：劳动类型（建筑业）和时间维度（相关的数据涵盖了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里技能溢价向其长期水平处聚拢，这个水平由“生产”技术的实际成本所支配）。供给因素支配技能溢价还可以从 20 世纪中期相似的数据研究中表现出来。自从 1930 年代开始，国际劳工组织（ILO）开始在公布的年度国家劳工数据中发布 10 月人口普查数据，这是在所有参与国家中都做的相似调查。该调查得出了不同职业的工资水

平。到 1950 年，这个人口普查涵盖的国家已经足够多，以至于我们可以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建筑行业的技能溢价的差异。Freeman and Oostendorp (2001) 最近一段时期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人均 GDP 和工资（或者工资率）的差异程度呈现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不论如何量化这些差异程度，都是这种结果。我们可以从图 11 中找到 GDP 和技能溢价之间的相似的关系的证据，这个证据只用了建筑业的技能溢价的信息，而不是像 Freeman and Oostendorp 一样使用了更广范围内的工业工资（industrial wages）作为例子。该图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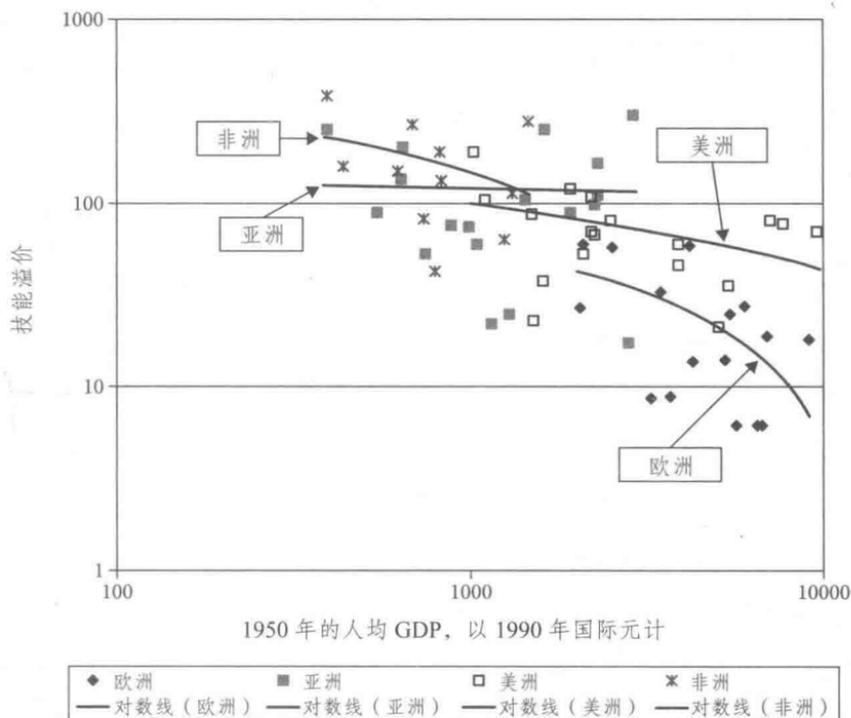


图 11 建筑工人人均 GDP 和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大约 1950 年）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在 1950 年，技能溢价的水平从埃塞尔比亚 (Ethiopia) (人均 GDP 少于 400 美元) 的 400% 到丹麦和挪威 (人均 GDP 大约为 6000 美元) 的 6%。这就显示此论文中使用的对于技能溢价的部分评估——建筑业的数量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反映了如同 Freeman and Oostendorp (2001) 所使用的更加复杂和完整的工资离差 (wage dispersion) 一样的作用。图 11 也包括了不同地区的趋势线。这些趋势线显示，人均 GDP 和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不是在所有地区都一样。

152 美国 (在这个方面北方和南方没有差别)、亚洲和非洲的工资不平等的水平高于欧洲。以技能溢价作为因变量，人均 GDP 作为自变量的数据回归线确认了这样一种情景：对于欧洲的模拟一贯显示了负相关的迹象 (并且非常明显)，而对其他大洲则是正相关的迹象。这就表示欧洲的技能溢价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美国。例如，美国拥有最高的人均 GDP，但是其技能溢价仍然达到 71%。

对于工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的标准解释是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速度高于其需求增长的速度。根据新增长理论 (new growth theory)，我们可以预期到这种关系。这些证据表明低水平的技能溢价对经济增长有好处，该结果
153 已经被 Davin Chor (2005) 所证实。他研究了现代欧洲早期实际工资、制度的质量以及技能溢价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1950 年左右的欧洲看起来多多少少是一个例外。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力资本形成的水平不太可能低于西欧。关于学校教育水平的数据反映了相反的结果 (Barro and Lee, 2000)。制度，可能还包括欧洲的高水平统一 (the higher levels of unionization)，可以解释欧洲相对较低的技能溢价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要转向对这个较低技能溢价的历史根源的探索上。

欧洲：1300—1914 年

Allen (2001), Özmucur and Pamuk (2002) 关于长期的欧洲城市建筑工人的工资的著作使得我们可以很容易建立 1300—1914 年间建筑业的技能溢价的时间序列。这个序列可以分成几组, 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和模式。表 6 显示了对于单个城市的估计, 而图 12 则显示了三个地区的平均技能溢价: 西欧 (根特/安特卫普 [Ghent/Antwerp]、阿姆斯特丹、牛津、伦敦和巴黎)、欧洲南部 (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瓦伦西亚 [Valencia]、萨拉戈萨/马德里 [Saragossa/Madrid] 和伊斯坦布尔) 和东欧 (但泽 [Danzig]、克拉科夫 [Cracow] 和华沙)。图 12 没有显示的是北欧 (对于苏格兰和瑞典的序列都是开始于 16 世纪) 和欧洲中部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奥格斯堡 [Augsburg]、莱比锡和维也纳)。序列的分组在一定程度上是临时性的——其他分类可能也行 (例如, 莱比锡也适合东欧组) ——但是它从整体上看能比我们可以发现的证据更好地反映出不同的类型。而且, 所有的观测都可能出现一些错误, 并且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误。虽然劳动者和木匠是相对普通的职业, 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变化。Allen 有时候会用石匠或者其他工匠的工资, 此数据中包含的这类非熟练劳动力可能会有一些地区差异: 他们是工匠的助手呢还是非熟练劳动力呢? 从各个城市的数据显示, 夏季工资的结构可能和冬季工资的结构稍微有些不同。通过分组观察某个特定地区的几个城市, 我们可知, 由于这些评价方法导致的部分差异可以忽略, 但不是全部。例如, 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就是最低水平的技能溢价不只是出现在西欧和中欧, 而且出现在瓦伦西亚和那不勒斯。我还没有发现如何对那里较低的技能溢价水平进行满意的解释 (参见表 6)。

154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城市的时间序列不是总涵盖相同的一段时期。14世纪这段时间中没有中欧、东欧和北欧的数据。对于14世纪的欧洲南部来说，我们只有佛罗伦萨和萨拉戈萨。但是从15世纪之后，数据就变得非常丰富了。虽然单个的序列之间还有差距，但是我们的研究基础更加坚实（表6给出了每50年时间段里不同城市可以得到的序列的概览）。

图12显示在14世纪上半叶，欧洲部分地区的技能溢价相对较高，占到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的比例为100%—150%。从现有关于英国的证据看，在14世纪的前几十年，好像工资不平等的情况增加了，而在1330年代（1315—1322年欧洲大饥荒之后）又出现了下降。^[2]萨拉戈萨序列在1310年代到达了顶峰，但是在佛罗伦萨和低地国家，技能溢价在1348年后开始下降，直到15世纪中期达到了工资的50%—60%的水平。

1348—1450年间的下降是需要解释的，因为它是欧洲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特别是从此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技能溢价在连续超过450年间保持异常平稳的状态。^[3]在欧洲其他部分——南部和波兰——技能溢价有再次缓慢上升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些“边缘地区”（“peripheral areas”）技能溢价好像随着人口增长的节奏而变化，16世纪的时候保持增长、17世纪的时候趋于稳定，而在18和19世纪的时候再次增长（我在下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从现代早期开始的西北欧和次大陆其他地区的“小分流”仍然可以在20世纪的数据中找到：根据

[2] Clark (2005) 认为英国的技能溢价的下降发生的时间稍微有些不同，Phelps, Brown and Hopkins (1981, 第8页) 指出1350年后的下降已经被Beveridge和Postan注意到了。

[3] Phelps, Brown and Hopkins (1981, 第8—12页)。在1914年之后下降到了一个更低的水平，在1936年下降到了25%。出自国际劳工组织1936年年鉴。

国际劳动组织（ILO）的数据，在 1936—1937 年间，东欧六国的木工工资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平均差距是 56%（范围：28%—95%），三个欧洲南部国家的平均差距是 45%（25%—64%），西欧国家的平均差距只有 22%（12%—28%）（从国际劳动组织 1938 年年鉴计算得出）。

中欧，由于在 1400 年之前这段时间里没有数据可用，我们认为其与西欧模式相同：技能溢价稳定在较低的 40%—60% 水平。在北部、苏格兰和瑞典则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模式。在那些地区，第一个是 16 世纪中期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技能溢价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并且波动很大，爱丁堡（Edinburgh）和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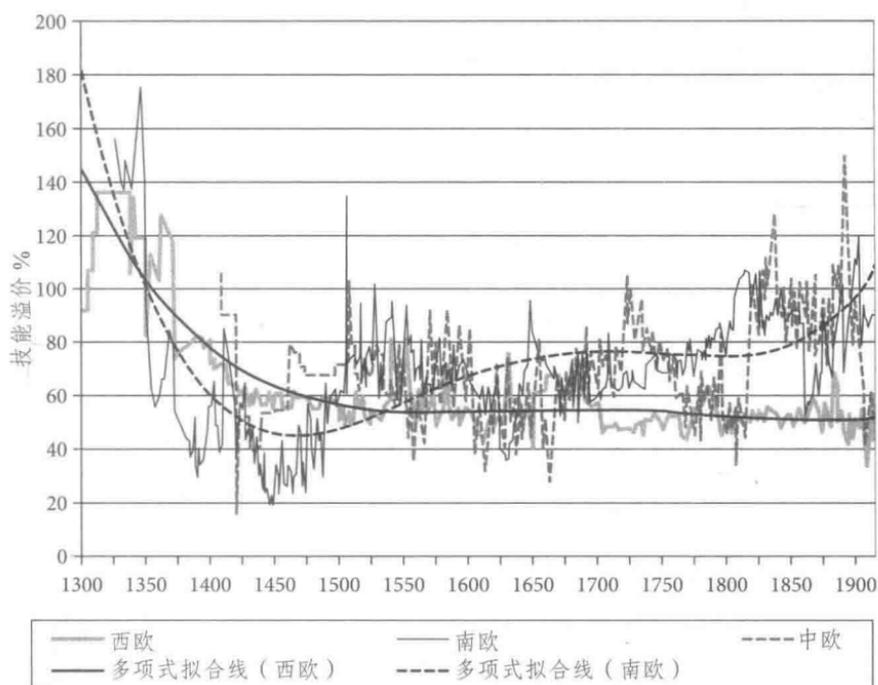


图 12 1300—1914 年间西欧、欧洲南部和中欧的建筑业工匠的技能溢价

资料来源：见表 6。

表 6 1300—1800 年间欧洲建筑工人的技能溢价 (平均每 50 年为一个阶段)

	1300—1349	1350—1399	1400—1449	1450—1499	1500—1549	1550—1599	1600—1649	1650—1699	1700—1749	1750—1799
伦敦	123	104	62	60	60	50	58	51	40	55
牛津	109	92	52	50	52	44	48	50	47	52
根特/安特 卫普	210	93	74	69	73	76	67	67	67	67
荷兰/阿姆 斯特丹	100	88	70	66	48	51	45	40	31	29
巴黎	100	60	60	60	59	63	61	60	59	64
西欧	128	88	64	61	58	57	56	53	49	53
斯特拉斯堡	—	66	63	42	44	61	36	103	51	56
奥格斯堡	—	—	—	—	62	37	42	36	45	46
莱比锡	—	—	—	—	—	76	71	82	68	62
维也纳	—	—	66	53	51	46	28	48	53	60
中欧	—	66	64	47	52	53	44	67	54	58
佛罗伦萨	115	59	42	53	86	99	112	—	—	—
米兰	—	—	—	—	—	—	84	97	91	89
那不勒斯	—	—	—	—	95	58	44	—	45	48
瓦伦西亚	—	37	31	36	55	31	23	49	49	49
萨拉戈萨/ 马德里	219	53	67	18	—	100	—	—	100	100
伊斯坦布尔	—	—	—	70	80	70	52	54	55	83

	1300—1349	1350—1399	1400—1449	1450—1499	1500—1549	1550—1599	1600—1649	1650—1699	1700—1749	1750—1799
南欧	167	50	47	44	79	72	63	67	68	74
但泽	—	—	—	—	49	124	78	82	79	41
克拉科夫	—	—	56	82	100	80	25	64	180	116
华沙	—	—	—	—	—	43	80	64	180	116
东欧	—	—	56	82	90	84	61	63	102	63
爱丁堡	—	—	—	—	—	133	116	—	131	83
斯德哥尔摩	—	—	—	—	67	103	195	111	74	17
北欧	—	—	—	—	67	118	151	111	103	50

* 表示熟练劳动力（主要是木工）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之间的差异除以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例如，100便是熟练木工的工资是非熟练木工的两倍。

资料来源：Allen (2001) 给出了非熟练建筑工人和熟练建筑工人的序列。我使用了 <http://www.economics.ox.ac.uk/Members/robert.allen/WagesPrices.htm> 提供的序列，以此为基础，并对1540年代（英国）和1620年代（德国）的数据做了一些更改，因为那段时间货币贬值，而Allen没有用一个连续的方式处理劳动力和工匠这两个序列。对于伊斯坦布尔，我构建了一个相似的序列；Özmucur and Pamuk (2002)；荷兰，1347—1500年：Van Bavel and Van Zanden (2004)；14和15世纪的萨拉戈萨：Palacios (1994, 第362—363页)；苏格兰/爱丁堡：Gibson and Smout (1995)；瑞典/斯德哥尔摩：Jansson et al. (1991)。

的水平都是 100%—125%。这些模式直到 18 世纪后半期之前都一直没有改变：在 1750 年代，爱丁堡的技能溢价是 100%，之后下降到 1770 年代和 1780 年代的 33%（Cullen, Smout and Gibson, 1998, 第 115 页），与之相似的是，斯德哥尔摩在 1700 年代的水平是 100%，而在 1725 年之后下降到了 40% 之下。北欧则在 18 世纪明显地迅速赶上了。

欧洲之外的地区

对欧亚其他地区——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尼——我们也可以在建筑活动的工资结构中找到相似的数据，图 13 显示了序列数据结果。对于印度来说，此数据系列可以溯源到关于 1595 年的莫卧儿帝国（Moghul Empire）情况的报告，即阿布尔·法齐尔（Abul Fazl）的《阿克巴则例》（Ain-i-Akbari）*，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支付给不同组的劳动者的工资，并且显示了一个比欧洲更高的技能溢价（这一情形被印度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其他数据加以证实）。对 18 和 19 世纪的印尼和韩国的观察显示了相似的高水平。俄罗斯也是相同的情况，由 Hellie（1999, 第 413—474 页）公布的 17 世纪的技能溢价的数据为 100%（木工 / 非熟练劳动者）和 167%（石匠 / 非熟练劳动者）。对于中东来说（埃及和伊拉克），Ashtor（1969, 第 64、224—225 页）已经公布了一些工资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追溯到 8—13 世纪，所有的数据都似乎证明技能溢价水平为 100%。最

* 阿布尔·法齐尔（1551—1602）是阿克巴的密友、最能干的大臣之一，也是莫卧儿王朝第一流的作家、历史家和哲学家。他的显要地位和他与帝国各部门的关系便于他掌握官方资料。他的主要著作有《阿克巴纪》和《阿克巴则例》。在《阿克巴纪》中，他逐年记载了阿克巴统治时期（直到 1602 年）的历史。《阿克巴则例》主要是莫卧儿帝国关于各部门管理的规章条例，是研究阿克巴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著作。——译者注

古老的数据来自 762—766 年间的巴格达 (Baghdad)，那里的工人一天赚 2—3 个 *habbas* (货币单位)，而一个石匠大师赚 5 个 *habbas*。

总体的情况似乎是，在西欧之外的地区，用这种方式测度的技能溢价比环北海地区要高出很多，但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外。我们可以从 Saito 对工资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得到一些观察值。这些观察值相对较高：一个典型的观察值是在 1802—1804 年间，京都 (Kyoto) 的劳动者一天可以挣到 0.92 匁 (monme, 货币单位)，农村 (Kami-Kawarabayashi) 一个木工的工资是每天 2.6 匁，而大阪 (Osaka) 的木工每天可以赚 4.3 匁 (Saito, 1978)。^[4] 但是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时访问过长崎 (Nagasaki) 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其中的数据展示了较小的稍微低于 100% 的技能溢价。^[5] 而且，在 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当时国家统计已经有了记录，当时的技能溢价和西欧的水平相比相对较低 (Van Leeuwen, 2007, 工资和价格附录)。

另外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是中国南部，这一地区是除西欧之外技能溢价也不是很高的地区。一组关于中国北部——北京——的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工资的政府规定显示，在 17 和 18 世纪的技能溢价为 100%，与我们在亚洲的其他部分所发现的情况类似 (Moll-Murata, 2005; Moll-Murata, 2004)。^[6] 对当时中华帝国范围内的工资和价格都进行了最详细的规定的公共著作，是 1769 年的《物料价

[4] Nishikawa (1978, 第 80—81 页) 提供了 1840 年代长州藩 (Choshu) 的制盐工人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一工资结构显示了一个相似的技能溢价 (熟练工人工资为 4.6 monme, 而非熟练工人 1.6 monme, 非熟练女工 0.8 monme)。

[5] 东印度公司存档文件，海牙国家存档文件，第 756 号，1306—1354；长崎 (Nagasaki) 的价格和工资数据可以在 www.iisg.nl/hpw 中获得。

[6] Moll-Murata (2004)；近来的文章提供了北京在 1659、1665、1723 和 1736 年的建筑工人的工资规定，这些数据全部显示了相似的 100% 的技能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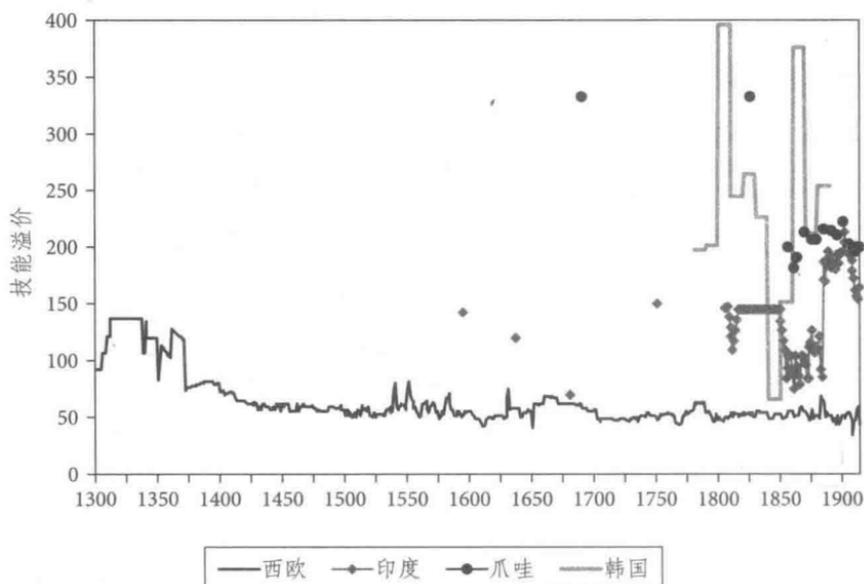


图 13 1300—1914 年间西欧、印度、爪哇和韩国的建筑业工匠的技能溢价

资料来源：Broadberry and Gupta (2006)；印度；Van Zanden (2003)；印尼；Van Leeuwen (2007)；19 世纪的印度和印尼；Jun and Lewis (2007)；韩国；基础数据来源于 <http://www.iisg.nl/hpw/data.php#korea>。

159 值则例》^{*}，此著作显示技能溢价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北部 100% 的技能溢价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在南部，技能溢价与西欧（25%—67%）的水平相当（参见 Allen et al., 2005，对这些数据的详细的分析）。全国范围内的平均低于 40% 的技能溢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南部更加密集的人口数量的影响（表 7）。虽然这一资料的来源可能有问题，但是由此得出的技能溢价可能相对准确。这些已

^{*} 《物料价值则例》是由乾隆时期政府实施，发动全国各省督抚将各地的物料价值搜集呈报到工部，工部将其汇总，编修成书并刊刻出版，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文献。《物料价值则例》一书二百二十卷，记载的是当时修建衙署、城垣、庙宇、仓库等官方建筑所用物料价值、工价和运价，其规模巨大，数据丰富，是了解清中叶物产、物料价格以至全国各地的经济状况的难得资料。——译者注

经被那些实际支付的工资所说明，例如进入广州港口的东印度公司的船舶所提供的数据就证实了这些工资数据的准确性（Allen et al., 2005; Van Dyke, 2005）。因此，中国南部好像是西欧之外唯一一个有着非常低的技能溢价的地区，这显示了那里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

解释：作为投资的人力资本及其与利率的关系

这些数据提出了关于世界各地的人力资本的报酬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第一个可能也是最显著的一个，那就是黑死病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技能溢价突然的惊人下降。结果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1400—1500年间——技能溢价非常低：西欧在1450—1914年间的技能溢价表现出了稳定状态是第二个显著的现象：在那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那些工匠的相对报酬怎么可能“冻结”在那样一个较低的水平？1650年之后的南部和东部的分流（或者可能是1450年？）可能是第三个显著的特征。实际工资的发展和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所分析的“小分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为什么西欧的技能溢价比其他地区低许多，而其中中国南部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呢？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技能溢价是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的报酬，即在学徒工接受培训期间不赚取工资并且向培训这些学徒的工匠大师支付费用。因此，论证的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技能溢价从长期来看取决于：（1）培训成本，例如获得特殊的技巧需要的时间年限（这些年没有赚到的工资，以及支付的费用等），（2）连接现在和将来高收入的利率，以及（3）在完成培训后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以及可能获得技能溢价的的时间的年限（这个可能和平均寿命有关）。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理念，而且这个方法可能有点时代错

160

误，但是此技能溢价可能已经被亚当·斯密（像往常一样）发现，他写到，熟练工人“从他学过的怎样去做的工作……必须有可能超过和高于普通劳动者通常的工资，将会补偿他受教育的所有费用，至少等同于这个有价值的资本的通常的利润……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的差异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发现的”（Smith, 1776/1976, 第 203—204 页）。

欧洲的学徒工制度（apprenticeship system）在世界上非常出名，并且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好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Epstein, 1991; Humphries, 2003）。因此，可以粗略模拟“均衡的”（“equilibrium”）技能溢价和人力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与利率有关。下面的假说是用了这一模拟：

- 7 年的学徒阶段——英国合约中的标准年限——从 14—21 岁（Humphries, 2003, 第 75 页）；^[7]
- 不挣工资的学徒工的年收入大概是 14 岁非熟练工人的年工资的 20%，然后逐步增加到 40%（15 岁）、60%（16 岁）、70%（17 岁）、80%（18 岁）、90%（19 岁），最后到 100%（20 岁）；^[8]
- 学徒期结束之后，熟练工匠将会在 21—65 岁期间的 45 年间挣得较高的工资；^[9]

[7] Also Epstein (1991, 第 142 页)，他给出了 13 世纪时的热那亚（Genoa）木工的一段 7 年的学徒期，但是石匠的学徒期较短（5 或者 6 年）。

[8] 这些估计基于两个来源：Scholliers (1959) 和 Impens (1965)，他给出了 16—18 世纪普朗坦（Plantin）的印刷工人的工资大致情况；Johnson (2003) 给出了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纺织工人的年龄状况。

[9] 简单地将工作的年限定位 45 年的假设不会对实验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之后的几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特别是当利率高的时候。

我们计算了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基于的假设是一个学徒工在经过了7年的培训之后100%可以成为一名工匠；第二个变量基于的假设是有75%机会成为工匠，而有25%机会就是他将只能赚到和非熟练工人一样的收入；第三个变量附加了一个假设，即学徒必须首先付出相当于非熟练工人年工资的50%的额外费用。图14展示了从这些假设中得出的技能溢价和人力资本培训的回报之间的关系。例如，该图显示技能溢价从135%（1325年）下降到60%（1450年），以第一个变量为基础，则与之相一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从19%下降到10%；以第二个变量为基础，则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从15.5%下降到8%；以第三个变量为基础，则投资回报从14%下降到7%。图4中还加入了现代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利率和技能溢价的粗略估计（在第一章中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161

鉴于木工和石匠在黑死病之前和之后都获得了相同技能的事实，所以对于建筑行业的技能溢价在1350年后下降的最直接解释是在这段时间内欧洲的利率大幅下降。这就致使家庭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就导致了观察到的技能溢价的改变。技能溢价的下降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不同地区，这与黑死病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全欧洲的利率下降50%的事实相吻合（参见第一章）。 162

用这种方法评估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似乎高于资本的利率，后者与资本市场的分割（segments）相关，在这种类型的资本市场中土地（或者可能）通常作为抵押品（collateral）。很显然，在现代欧洲早期，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土地投资的风险大，但是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却——如果我们将要相信这些计算——惊人的低。很明显，McCloskey and Nash（1984）在他们对谷物价格的季节性变化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在农村资本市场上利率更加急剧的下降。此处展示的证据和他们的研究中展示的证据可能指出“正式的”和“非正

式的”资本市场的利率差（the spread of interest rates）在135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也出现了下降。

同样引人瞩目的是，1450年之后西欧的利率和技能溢价大致保持了平稳的状态，而且再也没有上升到1350年前的水平，尽管在145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人口数量出现了大幅上升，而且导致随后的土地/人口比例的下降。事实上，1450年之后，荷兰和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特别快，而技能溢价却维持在50%—60%的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意味着将与1348年之后人口下降相联系的技能溢价和利率下降作为资本市场的决定性因素的解释肯定不完整。这一证据暗示资本市场的制度框架的变化和/或家庭储蓄行为的变化同时导致了长期的储蓄供给的增长和利率的长期稳定。在第四章中，我们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个解释已经暗示：欧洲婚姻模式的兴起导致了制度框架和储蓄行为的质变。对此进一步的证明是，在145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北海地区的利率和技能溢价没有再次增长，而是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甚至可能在18和19世纪还出现了轻微的下降，这是该地区区别于欧洲大陆中更加“边缘”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10] 1348年后的人口下降可能是次等重要的地位——只是有助于维持以低的交易成本、高储蓄和低利率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新平衡——也可以以荷兰为基础进行证明，荷兰在1345—1500年间的（城市）人口的长期扩张和技能溢价的下降（从1340年代的100%下降到1500年代初期的40%—50%）以及与之相似的利率下降相一致（Van Bavel and Van Zanden, 2004; Zijderdijn, 2007）。

[10] Epstein (2000, 第60—63页); 和 Clark (2007, 第167—175页) 推断了这些改变但是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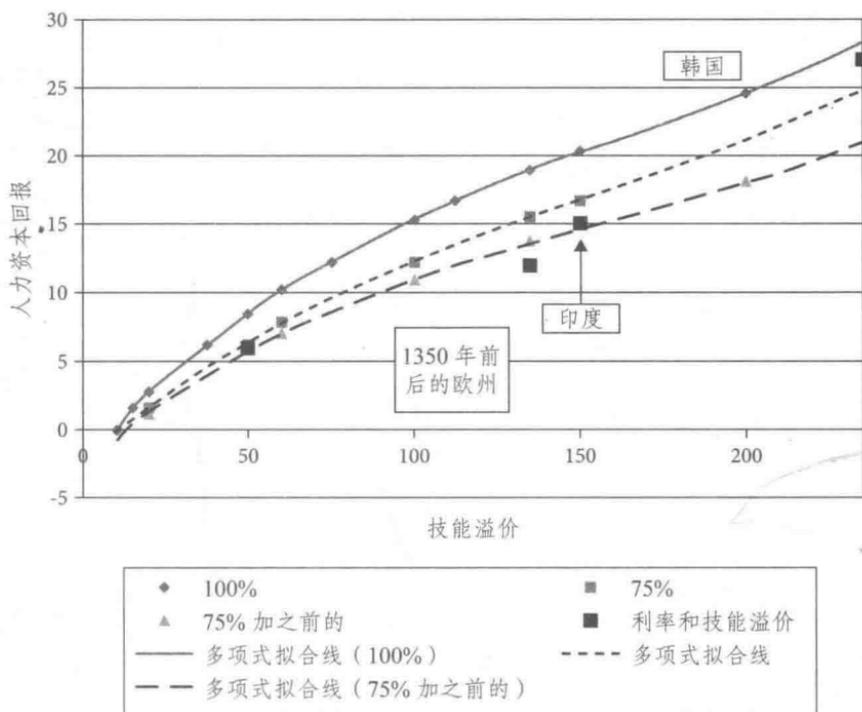


图 14 技能溢价和人力资本报酬之间的模型关系；三个变量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当然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荷兰黄金时期或者工业革命没有导致这一特殊技能溢价的强势增长呢？部分原因是技能溢价可能确实上升了，但是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其他部分（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1997，第 632—634 页），Van Zanden（1995）和 Williamson（1985）发现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增加的证据，特别是拥有高技能雇员的行业。这反映了有技能工人的供应的瓶颈，经济增长的加速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木工和石匠稳定的技能溢价是一个例外呢？为了证实我们的假设——建筑工人的低技能溢价反

映了技能劳工相对灵活的供应这一更加广泛的现象，我也收集了另外一组高技能工匠，即在1450年代活字印刷机发明之后在印刷业工作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数据。这些印刷工人可被看作是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工人，他们操作和发展了大规模生产信息的新技术。1470年代以来，欧洲的书籍生产急剧上升，而对于他们的技能的需求肯定也会快速增加。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极端的”工资水平。1560—1800年间安特卫普的大型Plantijn公司*详细的工资数据显示，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印刷业中心，那些高技能和有文化工人的工资最多就是和建筑行业有技术的工人的工资持平，而且通常还大幅低于建筑行业有技能工人的工资。^[11]因为许多工人是从国外招募的，特别是从德国招募的，这应该可以反映出其他地区的工资趋势。^[12]这种工资变动的趋势再次指出了欧洲现代早期高技能工人的供给的相对灵活性，而且，建筑行业的低水平的技能溢价可能显示了培训制度的总体有效性。

利率的差异（differential）也可以解释欧洲和欧亚其他地区的工资不平等的差距吗？欧洲的利率比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低的证据不完整，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总体趋势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的资本市场比其他地区更加有效，18和19世纪的日本

* Plantijn公司是一家印刷出版工场，位于安特卫普市，该市与巴黎和威尼斯并为欧洲早期印刷的三大领袖城市，与凸版印刷的发明和传播史息息相关。该印刷公司于16世纪由克里斯托费尔·普朗坦（Christoffel Plantijn）创建。1876年，其子爱德华·莫雷图斯（Edward Moretus）将其售予安特卫普市。这个公司一直运营到1867年，公司大楼目前还保存有大量旧印刷设备。——译者注

[11] 同样可以参见关于印刷公司的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经典研究，Voet（1972，第431页）得出的结论是Plantin工人的工资“接近甚至经常超过那些工匠大师的工资”。

[12] 印刷工人和木工按照每天或者每周给付工资，而排版工人则赚取计件工资，这解释了这些数据序列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图 15 1563—1766 年间安特卫普 (Plantijn) 的印刷工人、排版工人和木工的技能溢价

资料来源: Scholliers, 1959; Impens, 1965; Allen, 2001 数据。

可能是个例外。图 14 显示, 假设年轻学徒的培训成本和其他地区相似, 那么欧亚其他地区和 1348 年之后西欧的技能溢价的巨大差异只能由利率的差异解释。中国是个例外, 在中国利率高但是技能溢价比东亚和南亚的其他地区低, 资本市场制度的效率似乎解释了人力资本的价格。在日本的案例中, 利率和技能溢价在 18 和 19 世纪可能都出现了下降, 同样非常符合这样的解释。

165

培训制度的效率

但是, 利率只提供了一部分的解释。培训学徒的管理制度的效率也发挥着作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组织培训的方式: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家庭或者宗族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技能从父亲那里传授给儿子和 (扩大的) 家庭的其他成员。事实上, 在亚洲的

其他地区，作为一个工匠在很大程度上是累世的。例如在 Pune（印度南部）周围的农村地区，农村的工匠或者 balutedars 作为村子里面的累世的服务者（仆人），他“常年给耕种者提供服务”以此可以换取收成的一部分（Divekar, 1989, 第 44—45 页）。* 在中国的宋朝、元朝（和明朝），政府将工匠列为单独的社会阶层，他们通常以提供规定的劳动服务的方式交税（在北京待上几年或者几个月，给皇室家庭劳动）。这个制度在清朝的时候发生了变化：他们废除了工匠累世的强迫劳役制度。1661 年之后，工匠成为普通家庭的一部分，他们像农民一样缴纳土地税。这“表示他们的职业不再是法定的累世义务”（Moll-Murata, 2005, 第 14 页）。工匠在宋、元、明朝的强制劳动的传统和国家对于这些工匠的工作的强烈要求使得解释在中国清朝时期的部分地区发现的低技能溢价比较困难。

166 对比那些家庭起核心作用的相对封闭的制度，西欧则形成了另外一种学徒制度——由行会或者相似的机构组织完成，而且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行会或者跟行会类似的机构在欧亚其他地区也存在，特别是在中东，中国清朝在 17 世纪晚期停止国家管理技术劳动者的供给之后也产生了行会。但只是到了 19 世纪，那些行会才开始扮演与一些欧洲的行会一样的作用，在 18 世纪，大多数的行会都是由从某些特定省出来到一个较远的城市做生意的商人建立（参见 Moll-Murata, 2006）。而且，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三个（可能）技能溢价最低的地区，都有机构例如行会的存在（或者出现），并且管理着学徒的培训。

* Balutedars 是村里累世的仆人。这与印度的种姓制度相关。Balutedars 目前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即便没有消失，其作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也逐渐减小。村庄里的木匠（sutar）、理发师（nhavi）、鞋匠（chambhar）、铁匠（lohar）以及陶工（kumbhar）等都属于 balutedars。——译者注

这说明在行会制度存在的地区可能有许多优势。一个学徒和他的师父的合同非常复杂，涉及长时期的不同的服务报酬（Humphries, 2003; Epstein, 2001）。学徒担心如果先支付了培训费用，不能保证培训达到成为高技能工人或者独立工匠的数量和质量。工匠大师可能担心在合同的开始几年，学徒变成他们家庭的净债务（net liability），而在学徒的第二个阶段变成净收入来源（net source of income）之前离开。^[13] 因为工匠大师控制着进入高技能工匠的途径，学徒可能担心工匠大师会违背自己的承诺（Humphries, 2003, 第 81—82 页）。准确地说，这些“不完整的”合同可能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高效的人力资本形成要求双方一定程度的互惠（reciprocity）和信任以及 / 或者第三方的参与，例如，保证学徒合同得以公平执行的机构。

在欧洲，传统上是行会管理学徒的培训。在英国，政府从 1563 年之后也开始管理学徒的身份，但是这完全建立在工匠行会试行的制度之上（Humphries, 2003）。这表示行会作为第三方监控着学徒制合同（apprenticeship contracts）。因此，欧洲 1450 年之后的超低的技能溢价是行会有效率的证据（而且在英国，还有一个另外的国家机构提供保障学徒合同的制度）。如果行会效率低，如果行会是限制高技能劳动者进入工匠行列的桎梏，那么技能溢价将会很高（或者对图 14 来说，人力资本的报酬和资本市场的利率之间的差距将会非常高）。然而，不同地区的行会的权利存在很大的变化。例如，行会在英国的影响力在 18 世纪的时候好像下降了，这可能是因为国家取代了他们的角色，但是在低地国家中他们仍然非常重要。但是从

167

[13] 参见 Epstein (1991, 第 102 页及以下页)：几乎所有的合同都包含禁止学徒在合同结束前就开始独立工作的条款。

全球范围看，行会和低技能溢价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与正在进行的关于欧洲现代早期的行会的相对有效率的辩论有关的一个结论。虽然过去的文献对于行会的作用非常不满，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行会的作用更加积极，特别是在组织培训方面（Epstein, 1998; Epstein and Prak, 2008）。对于技能溢价的国际比较也显示出，重新评估行会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与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关联

行会制度的存在不能保证技能溢价长期稳定在 50%—60%，这是 15 世纪欧洲的典型状态。在意大利的例子中——那里的行会相对更加强大（Mocarelli, 2006）——很清楚地展示了这点（参见图 12）。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在欧洲南部和东部，行会的确经常管理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好像比次大陆的西北部更加灵活。欧洲南部和东部的技能溢价的长期趋势看起来与人口的增长有关：技能溢价在 16 世纪出现了增长，随后是与 17 世纪“危机”时的西欧平均水平趋同，然后在 18 和 19 世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技能溢价出现了再次增长（图 12）。

这两个不同的模式可以很好地从我们拥有的两个时间最长的地区序列中观察到：英国和意大利北部（1618 年前的佛罗伦萨，以及随后的米兰）。正如图 16 显示的那样，在英国，人口和技能溢价的关系在 15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的下降和技能溢价的下降在 1450 年之前几乎是一前一后发生，但是在此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非关联性”。在意大利（北部），没有发生这种非关联性（图 17）：从 1600 年的情况看，1600 年几乎发生了和 1350 年完全相同的事情。佛罗伦萨的技能溢价回到了超过 100% 的水平，而且意大

利的人口也增加到黑死病之后的大约 1250 万人。1620 年之后人口增长的停滞（稳定在稍微高于 1300 万人口的水平），伴随着的是技能溢价的小幅下降（至大约 80%）；实际的非关联性好像发生在 18 世纪，当时快速的人口增长不再导致（米兰的工人）技能溢价的进一步增加。

为什么意大利的技能溢价对人口的增长如此敏感呢？部分原因可能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有关，而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又与人口数量的大小相关。农村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和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是关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文献中一个著名的主题。在日本、印度和印尼，非熟练劳动者基本上都是农业劳动者——“苦力”（coolies）就是在东南亚对此的称呼——他们以兼职的身份参与城市的建筑和其他活动。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城市中的非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强：城市中的非熟练工人挣的工资和“春天的农场中的男性劳力”一样多。城市—农村工资差异相对较小，至少对于非熟练工人来说是如此（Saito, 1978, 第 88 页；Saito, 2005b）。

与之相同的是，农业工人和建筑业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关系也在西欧被证实了。在 16 和 17 世纪，荷兰的农业工资大致和建筑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当（Van Zanden, 2002a）。与之相似的是，从 1300—1700 年间，英国农业的名义工资和建筑业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当（Clark, 2005）。

人口增长和技能溢价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这种方式解释：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反映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与人口的增长有关系。16 世纪人口数量的快速扩张引发了农村实际工资的强劲下降，但是城市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自己以对抗这种趋势。在北海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像欧洲南部和东部那样下降幅度那么大。而且，劳动力市场融合较好，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和建筑业的工匠的工资相当。因此，人口增长和技能溢价非关联性表明西北欧的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市场比次大陆的南部和东部相对融合更好，割裂更少：在一个更加割裂的系统里，工匠可以垄断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和城镇的工资差距较大，通常有一个高的技能溢价，但是在一个更加融合的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不平等则可能有相对较小的特点。

这个特点可以由 18 和 19 世纪爱尔兰的低融合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的极端例子加以证明。如同大多数处于凯尔特外围（Celtic fringe）的地区一样，爱尔兰并没有完全参与中世纪后期的大繁荣，也没有经历其他地区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框架的重组（按照这个制度被采用的程度看，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控制城镇的英国的少数人身上）。在 18 世纪，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非常高的技能溢价，从都柏林的 100% 到乡村的 200%，从所有的标准看，爱尔兰明显是一个例外，它拥有比西欧其他国家低很多的人力资本形成水平，这个由 Mokyr 的关于年龄集聚（age heaping）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这个研究显示了相似的低计算能力和识字能力（Mokyr, 1985）。^[14] 这个巨大的工资水平差距背后的一个因素是城镇和乡村的工资差距，这是融合度较低的经济体的另外一个特征：例如，在 18 世纪的都柏林，工匠赚取的工资经常是基尔肯尼（Kilkenny，位于爱尔兰）农村相似的工人的一倍，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更大（所有爱尔兰人的工资，来自 Kennedy and

[14] Mokyr (1985)；那里有许多其他信号显示，市场经济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功能：农村地区的利率非常高，土地的资产所有权不清晰，市场总体表现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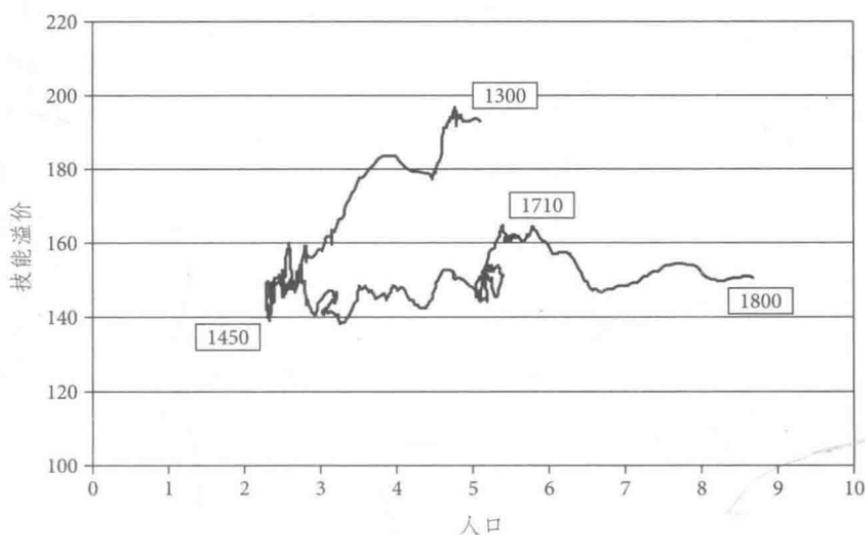


图 16 1300—1800 年间技能溢价（9 年的动态平均值）和英国人口的估计（百万）

资料来源：参见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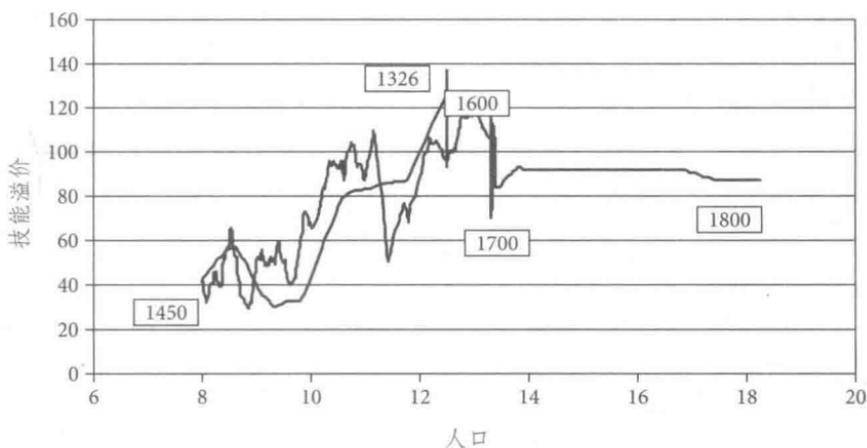


图 17 1326—1800 年间技能溢价（9 年的动态平均值）和意大利佛罗伦萨 / 米兰的人口的估计（百万）

资料来源：参见表 6 和 Malanima (1998)。

Dowling (1997))。更加引人注意的是爱尔兰的技能溢价在 1700—1850 年间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而在相同的时期，苏格兰则大幅下降到和英国趋同的水平。在都柏林，技能溢价从 1700—1760 年的 100% 上升到 1836—1850 年的 140%，而在 Armagh 的农村地区则从 1740 年代的 155% 上升到 1840 年代的 200%。这些和东亚和东南亚的水平相当，但是与西欧其他国家一点都不像。^[15] 此处列出的分析显示我们所宣称的技能溢价的上升是 18 和 19 世纪的爱尔兰的典型现象，它与由人口强势增长引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有关。^[16]

经济增长的影响

新增长理论假定人力资本形成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么本章分析的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反映出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各种情况应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我之前提到过 Davin Chor (2005) 撰写的论文，证明在现代欧洲早期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拥有高效制度的城市的技能溢价较低从而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这是他们相对成功的指针。因此，技能溢价有助于解释发生在 1400—1800 年间欧洲的“小分流”。

[15] 还可以参考 Cullen, Smout and Gibson (1988, 第 113 页)，他们发现这个时期爱尔兰农村的技能溢价高达 300%，和 Mokyr (1985, 第 226—227 页)。

[16] 与之相似的是，事实上德川末期的日本技能溢价的下降也和相对静止的人口增长有关系，但这只是推测。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 (Paul Romer) 和卢卡斯 (Robert Lucas) 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 20 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译者注

人力资本价格的这些差异是否也可以解释 19 世纪的“大分流”呢？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图 18 显示了根据 Maddison (2001) 的估计而得出的 1550—1820 年间的（首都城市）平均技能溢价和 19 世纪（1820—1913 年间）的人均 GDP 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关于 1820 年 GDP 水平的估计存在很大的争议——修正主义者宣称欧洲和中国的差距比 Maddison 估计的要小很多——我也将 1913 年的人均 GDP 的绝对值和 1750—1820 年间的技能溢价做了对比（图 19）。*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 GDP 的增长 / 水平和技能溢价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关系，证实了低的技能溢价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或者说以低的技能溢价反映出的高效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技能溢价与 1913 年人均 GDP 的增长的关系比它和 19 世纪的增长的关系还要密切。在图 18 中有许多例外情况：中国、荷兰和爱尔兰。他们在 1840 年代的大饥荒之后改变了其发展道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表现不能用 1800 年代制度的效率来预测。日本也有一个以 1800 年的技能溢价为基础的可以预计的较高经济增长率，但是我在此使用了 Saito 相对较高的对于 1804 年技能溢价的估计值，这可能不能代表国家的平均水平。以这些标准来看，中国在 19 世纪的表现不佳。根据 Maddison 的观点，中国是 19 世纪唯一一个在技能溢价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均 GDP 出现下降的国家，这种情况的出现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我使用了对北京的估计（100% 的技能溢价），而没有使用乡村的估计，因为对于别的国家我们也使用了他们的首都的相关数据。如果使用表 7 中展示的中国农村更加低的估计，那么

* 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指的是 1990 年代出现的以彭慕兰为代表的观点，因为它有悖于传统的观点，因此被称为修正主义。范赞登本人并不同意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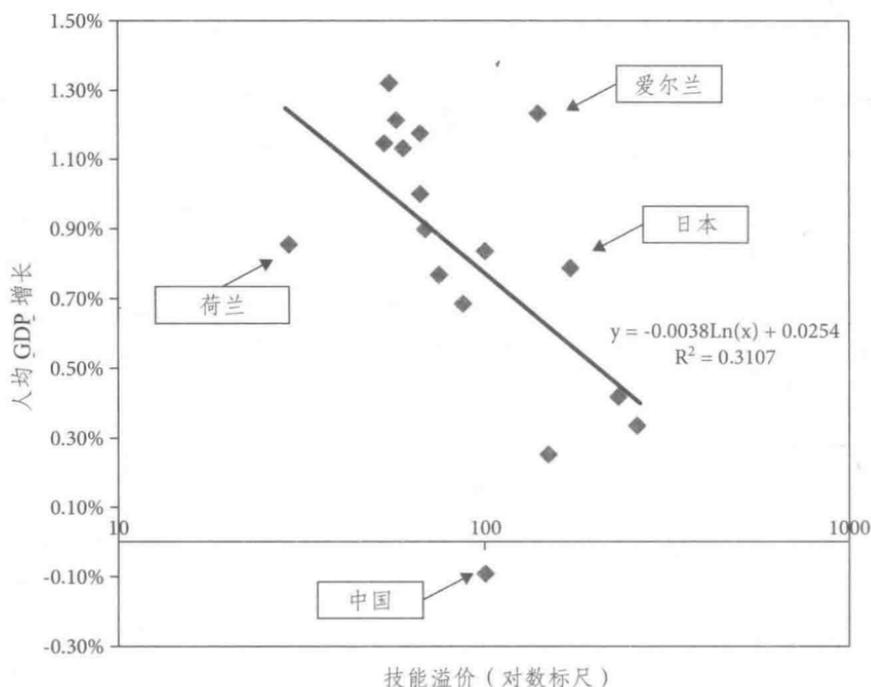


图 18 1750 和 1820 年的建筑业工人的平均技能溢价以及 1820—1913 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参见表 6 和表 7，Kennedy and Dowling，1997 和 Maddison，2001。

将会使中国的表现不佳情况更加严重。荷兰的增长相对更慢，因为它的起点很高。^[17] 荷兰在图 19 中非常反常地消失了。中国在后面的图中仍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外。^[18]

[17] Van Zanden and Van Riel (2004) 对它在 19 世纪表现不佳的情况进行了解释。

[18] Fukao et al. (2007)；中国 1913 年的人均 GDP 可能被低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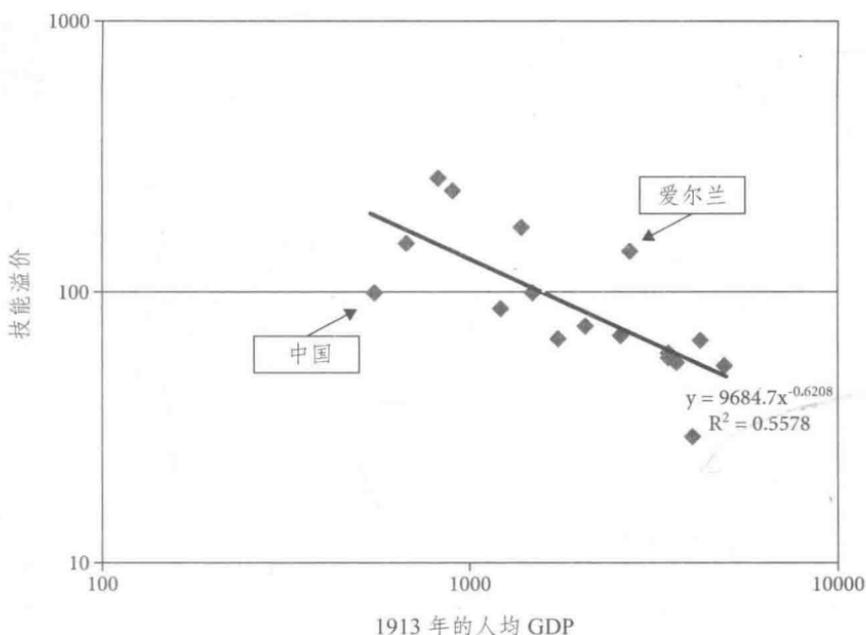


图 19 1750/1820 年的技能溢价和 1913 年 (log 级) 的人均 GDP

资料来源: 参见表 6 和表 7, 图 13, Kennedy and Dowling, 1997 和 Maddison, 2001。

结论

在本章中, 我们论证了以相对直接的方式测度的技能溢价——如建筑业的木工和石匠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异——是评价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质量的好的代理变量。我们试图通过分析决定经济水平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来证明制度的效率:

- 利率水平, 即 (城市) 家庭支付或者使用的影子价格 (shadow price): 通常人们都接受利率是一个经济体的制度

框架质量是否良好的指针，但是他们很难用标准的方式量化。我们通过长时段（西欧从1300—1914年）和跨地区（例如，对比西欧、韩国、印度和印尼）的研究发现技能溢价和利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与标准的人力资本理论相一致。中国南部在这方面好像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利率相对较高，但是建筑工人的技能溢价却可能比西欧还低，而日本的利率和技能溢价在18和19世纪可能都出现了下降，这好像确实符合一般情况。

- 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的效率（以及可以进入这些职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障碍是否存在）：高的技能溢价表示这些制度的效率不是很高和/或存在非常强大的进入障碍。数据显示西欧的技能溢价没有由于保守的行会而抬高，相反，似乎在那些存在行会的地区，技能溢价平均要低于其他地区的水平（行会在18和19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可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 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程度（在城市行业内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市场）：分裂的劳动力市场容易导致较高的技能溢价，而高度融合和高效的市场的技能溢价则相对较低。

因此，低的技能溢价反映出家庭有机会进入相对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而且人力资本市场形成制度运转良好。一个较低的技能溢价似乎指向一个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这将会导致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中一个联系可能是木工和石匠的技能溢价，因为他们是资本产品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所以会影响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另外，这个联系还显示低的技能溢价将会改

表 7 根据《物料价值则例》得出的 1769 年的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 (两/天)

	非熟练	熟练	技能溢价	N=	人口 (1787 年百万)
东北和蒙古					
黑龙江	0.100	0.191	91	2/6	
吉林	0.095	0.160	68	6	1.0**
辽宁	0.057	0.100	75	13	
新疆	0.097	0.110	13	3	?
北方					
热河 *	0.066	0.120	82	7	
北京 *	0.077	0.141	83	24	
天津/保定 *	0.071	0.112	58	34	23.0***
河北 *	0.054	0.081	50	82	
甘肃	0.044	0.054	23	48	15.2
山西	0.054	0.073	35	85	13.2
陕西	0.044	0.050	14	74	8.4
山东	0.045	0.061	36	50	22.6
中部					
河南	0.037	0.039	5	106	21.0
江苏	0.040	0.051	28	63	31.4
浙江	0.040	0.060	50	63	21.7
湖南	0.039	0.050	28	10	16.2
四川	0.048	0.062	29	47	8.6
云南	0.048	0.068	42	84	3.5
南方					
福建	0.030	0.050	67	9	12.0****
台湾	0.030	0.050	67	1	0
广东	0.040	0.050	25	89	16.0
平均 (无加权)	0.053	0.081	53		
平均 (人口加权)	0.044	0.060	36		214

* 直隶省的一部分 (热河归属于另外的管理)

** 东北作为整体

*** 直隶作为整体

**** 包括台湾

资料来源: Allen et al. (2005); 人口: Wang (1973)。

176 善经济绩效。欧洲现代早期的经济增长的差异似乎可以证实这种假设：北海地区在 1450 年之后的增长特别强劲，而当地的技能溢价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更加引人注意的是，1800 年的技能溢价的国际差异和 19 世纪的增长之间所具有的强相关性。因此，技能溢价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质量的衡量方式，也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报器。

导言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西欧普通工人的技能——即 Mokyr 术语中的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的价格相对较低。^{*}我们是否可以同样用 Mokyr 的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来衡量“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知识的价格呢？对于构成知识经济两个因素之间的关键联系的读写水平的长期发展，我们都了解到了什么呢？通过模型化工业革命的出现，经济学家已经识别出，生产“理论”知识的部门的增长以及其生产率是产生一个

* Mokyr 认为，实用而又可靠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又称 λ 知识），一类是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又称 Ω 知识）。 λ 知识即所谓技术知识，或人类操控大自然的方法和技巧，工匠熟练掌握之，新的 λ 知识是新发明； Ω 知识是关于大自然的知识，它包括两大部分：经过细心观察和量度后再被分类编目的“自然现象”以及支配这些“自然现象”的“自然规律”。这类知识需要知识精英去掌握和发掘。新的 Ω 知识是新发现。——译者注

知识创造和人力资本形成的累积过程的关键因素之一（Cervelatti and Sunde, 2005）。我们是否可以用与衡量普通工人的技能的价格的方法相似的方法来测度这些思想，并衡量这类知识的成本和生产呢？

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确认了西欧知识生产制度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僧侣运动的增长和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建立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步骤。与其他发展相结合，例如书面文字逐渐取代记忆而成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僧侣运动和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建立导致了对描述性知识的需求和供应的显著扩大，这一态势从中世纪晚期书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中可以体察之。

在此我们回顾了知识的增长和累积的故事，并尝试测量命题性知识的产出和成本，主要是关注书籍的生产。书籍和杂志只是到了17世纪才出现于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工业革命前夕的最重要的知识载体，当然写这些书的学者除外。正如在前一章中我们所做的那样，我们从全球的视角分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技能溢价数据，在此我们将重新尝试发现西欧的书籍生产处于一种多么优越的水平：通过对比西欧与日本、中国和欧亚其他地区的书籍产出情况就可发现之。而且，书籍的需求显然与另外一种人力资本形成的测度方法即读写水平有关。因此，对于人均图书消费水平的估计使得我们可以用图例表示出1800年之前的读写水平的长期发展。通过这一联系，我们还有可能分析出书籍生产和消费增长背后的原因：收入增长、城市化和新教教义对于解释1450—1800年间书籍的产出的强势增长有哪些重要性呢？书籍生产，作为一种衡量人力资本的方法，与经济绩效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可以用欧亚的不同地区的书籍生产的估计来解释“大分流”吗？

古腾堡先生的经济影响

书籍生产在 1800 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在古腾堡（Gutenberg）于 1440 年代和 1450 年代在美因茨（Mainz）发明活字印刷机之后。研究“书籍出现”的历史学家解释说，印刷机的发明与黑死病之后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有关。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实际收入的增长）导致了书籍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的增长。同时，由于受到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影响，有读写能力的人的数量开始增长，当然是在欧洲更加城市化的地区。这也可以从新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的出现中得到证明*，例如低地国家的现代灵修运动，就强调个人阅读奉献类作品特别是圣经的重要性。在 1450 年代之前，书籍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是较为固定的，因为手写本的价格很高。然而，我们从第三章的数据可以看出，手写本产量在经历了 1350 年代至 1370 年代的下降之后，于 15 世纪有了显著的增长，超越了之前的产出水平。新的复制图书的方式被引入——例如大学中使用的 *pecia* 系统**——以便用来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出。同时纸张作为写作媒介增长很快，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和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都导致了那些年纸张的实际价格下降很快（参见 Febvre and Martin, 1976, 第

* 应该指的是宗教改革运动，该运动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与文艺复兴运动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起源。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其理智上的起源与中世纪末期的经院神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密切相关。中世纪末期天主教会的状况是灵性平庸、道德颓废、教义混乱、制度专横和迷信盛行，教会改良的失败使得信众感到绝望，此时的宗教状况和思想背景都预示着宗教改革的必然性。经院新学、奥古斯丁新学和人文主义三种思潮共同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理智源泉，它们在不同的宗教改革家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译者注

** 一种制作副本的系统，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最早使用（13 世纪），后来传播到整个欧洲的大学。——译者注

29—77 页)。然而，书籍仍然是高价格产品，价格通常比一个工匠的年收入还要高。

179 我们认为，印刷机的发明是在中世纪后期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时期的经济是充满活力的，人们的收入较高，文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黑死病之后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导致了人们的系统性试验，以便凭借新的劳动技术来降低工资成本：在港口城市，人力或者马拉的起重机开始从低地国家扩展到西欧的其他地区，新的船舶设计得以发展，以便更好地利用风能（中世纪依靠人力的狭长船只明显落伍）（Unger, 2006），风车开始传播到西欧的各个地区，特别是在那些不存在水能的地势较低的地区（Van Bavel and Van Zanden, 2004）。而且，开始对欧洲的战爭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军事革命”（大约 1400 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中有大炮的系统使用并且也有对手枪的引进）。*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阶段的相对价格改变的反应：资本品（大炮、枪、马具和大量其他的器械）逐渐取代了那个时代的人力（参见 Hoffman, 2004）。

古腾堡的发明是对如下发展的另外一个符合逻辑的反应：书籍（以及其他印刷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发展良好的低利率资本市场，高工资以及充裕的高技能工人（和低的技能溢价）。15 世纪的中间几十年见证了许多利用新技术的实验，用以解决书籍生产中所出现的瓶颈问题，一些实验的灵感可能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和中东的思想的启迪，另一些可能源于本土。雕版印刷（Woodblock printing）在中国已经成为主导技术，尽管它仍然要与手写本竞争，而活字印刷（movable type printing）的使用比例很少，虽然在 11 世纪的时候已

* 军事革命涉及许多方面，包括步兵的兴起、火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用于抵御新式炮兵进攻的防御工事的迅速发展，等等。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新式武器的运用。——译者注

经被发明 (Moll-Murata, 2008)。在西欧, 雕版印刷在一定规模上得以实验。但让西欧发展有所不同的是, 新的“高科技”印刷技术取得了开创性的突破。鉴于西欧在 15 世纪的要素成本, 发展——活字印刷机——这个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科技产品是非常合理的, 它可以节省劳力, 并以规模经济为表征, 例如, 通过相对大量的印刷大大节省了每本书的印刷成本。这一对高科技方式的选择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学习效应、经济规模——继而又导致了书籍价格的急剧下降和市场的扩大, 从而引发了书籍生产的大增, 并以间接的方式逐步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

中国的要素成本与西欧不同: 劳动力非常便宜而资本则比较昂贵 (第一章, 以及 Allen et al., 2005)。这种禀赋结构就导致活字印刷机的优势相对较小; 自从其在 10 或 11 世纪被发明之后, 几乎仅仅被应用到了政府资助项目, 例如百科全书, 对于这些书籍来说, 成本是次要的问题 (Febvre and Matin, 1976, 第 75 页; Moll-Murata, 2008)。而且, 制作一篇中文文章需要多达 5000 个印字, 而制作一本欧洲的书籍只需要 26 个印字, 这一事实对于活字模的必要初始投资的影响也很大。因此, 中国在宋朝 (960—1279 年) 发明了不同的印刷方法之后, 信息复制的几种方式——手写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一直保持着一种共存的状态 (Moll-Murata, 2008)。*在西欧, 活字印刷的优势是如此明显 (给定市场规模和相对

* 宋庆历年间 (1041—1048), 毕昇根据实践经验, 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技术。这一技术未及推广, 毕昇就去世。他的字印为沈括家人收藏, 其事迹见《梦溪笔谈》卷十八。活字印刷术具有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多且快、省时省力、节约材料等优点, 对后世印刷术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 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毕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 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15 世纪, 活字板传到欧洲。至于古腾堡的发明受没受到中国的影响, 学界众说纷纭。李约瑟博士认为: “直到今天, 没有人认为古腾堡曾看到过中国的印刷书籍, 可是不能排除他听到人们谈论过这件事的可能性。不过, 这种发明 (古腾堡的活

的要素成本时)，以至于它很快取代了其他技术而成为书面印刷的最广泛生产方式。

分析活字印刷发展和使用的长期效应的方式之一就是观察书籍的价格。重建书籍（平均）价格的长期序列数据是不容易的，这主要是因为书籍与其他产品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书籍在印刷刚刚兴起的时候往往是少量的、大本的，且质量很好，因此，价格也不菲；（大概）200本古腾堡圣经可以卖到20莱茵盾（Rhenish guilders）*，相当于一名工人的年工资。^[1]渐渐地，随着印刷工业的发展，小本书开始出现，这些小本书价格低廉，印刷速度很快。例如，在18世纪后半期，荷兰印刷的最便宜的圣经可以便宜到1.5莱茵盾，与一名木工的日工资（daily wage）相当。与古腾堡圣经相比，圣经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仍然比1455年的便宜（大约17.50莱茵盾，或者少于12天的工资），而在此期间，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和工资）都涨幅巨大。我们从一个1788年的收集了荷兰1600—1785年的出版书籍情况的目录中随机选取了数据，构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书籍价格的数据库（主要源自于Abkoude，1788）。数据库中所包含的782本书的平均价格是1.60莱茵盾，中位数（median）为1.20莱茵盾，这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个时期荷兰的书籍价格是多么便宜。我们可以把对于17和18世纪书籍价格的估计与1465—1500年间的一组书籍价格相联系，看看有什么发现。

字印刷）是一种再发明，而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发明”（见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章第12节）。——译者注

* 莱茵盾，又称莱茵旧版荷兰盾，是奥匈帝国在1754年到1892年期间发行的货币。在帝国内，莱茵兰诸侯们就发行黄金货币达成共识，将他们仿造的弗罗林币标准统一起来，统称莱茵盾，简称盾（guilder）。——译者注

[1] 我在此对于印刷业早期的经济进行了详细分析，依据是Cuijpers（1998，第20—108页）。

1465—1500年间的书籍数据来自于对印刷和图书市场的早期兴起的系列研究。两组价格通过可对比的“高质量”的圣经的价格而联系在一起：Metelin 圣经（来自于斯特拉斯堡）1466年的价格是12莱茵盾，而与之相比，1780年代印刷的圣经（带彩色插图的豪华大开本）的价格为17.15莱茵盾。对比结果如图20中的方点显示的那样。^[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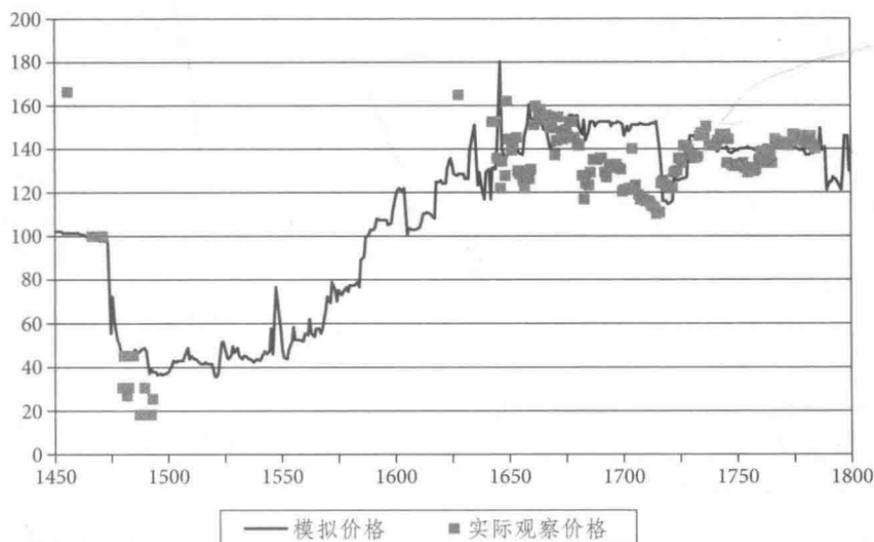


图20 1450—1800年间荷兰书籍的实际观察价格（平均价格）和模拟价格（指数1460/1474年=100）

资料来源：Cuijpers（1998，第33—39页）；1628：Van Selm（1987，第344—349页）；17和18世纪：Abkoude（1788）。

[2] 图20的来源：1460—1500年间的价格出自：Cuijpers（1998，第33—39页）；1628的价格出自：Van Selm（1987，第344—349页）；7和8世纪的价格出自：Abkoude（1788）共有600页包含了荷兰1600—1785年间出版的书籍的名字和价格。该文献是17世纪的所有书籍价格样本的基础，计算平均价格是按照18世纪出版的一本书的第一次价格得出的（对于多卷的书籍或系列书籍，计算结果是基于一卷的平均价格得出的，或者以第一卷的价格为样本，如果这些卷的价格是分开的）。然后计算出这些书的21年的平均价格的变动，如图20所示。

更进一步，我还试图用 1) 最重要的输入品：荷兰的纸张和劳动力（木工的工资）和 2) 规模经济的规模大小和学习效应对成本（以及对价格）的影响（这个影响非常巨大），来模拟书籍价格的长期发展。^[3] 如果假设规模弹性是 0.25（如果给定年份的书籍产出增加 10% 那么书籍价格就会下降 2.5%）和累积产出的弹性（学习效应的表征）也是 0.25（累积产出每增加 10%，也会导致书籍价格下降 2.5%），就可以实现对书籍价格长期发展的良好模拟。^[4]

这个模拟的书籍价格也在图 20 中呈现。该图显示，从长期来看，书籍价格在 1470 年代的特征是急剧下降，该趋势也可以由另外一些文献加以佐证（参见 Cuijpers, 1998, 第 37 页），然后在 1480—1550 年间呈现了停滞，从 1550—1650 年，价格又有缓慢的上升，这些都与纸张价格的上涨以及工资的提升有关。在 1650 年之后，书籍价格有轻微下降的趋势。

当比较模拟的书籍价格和生活成本指数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估计出书籍的实际价格（CPI 来自 Van Zanden, 2005a）。图 21 显示，书籍价格在 1470 年代下降得非常剧烈；模拟的价格下降了 2/3，鉴于图 21 显示的更加急剧的下降，模拟价格可能低估了书籍的实际价格的真实下降程度。这一下降态势在该时期一直在持续，直到书籍的实际价格略微高于 1800 年书籍的实际价格的 10%。^[5]

活字印刷机的发明对于书籍价格的实际影响甚至更加显著，因为在 1460 年代，印刷书籍的价格比人工抄写的便宜 50%—80%（Cuijpers, 1998, 第 36 页）。这就表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

[3] Cuijpers (1998, 第 33 页及以下页)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例如，他表示每页的平均字符的数量从 1473 年的 9000 个增加到 1540 年的 17000，这就表示大大地节省了最昂贵的投入，即纸张。

[4] 模拟的书籍价格以下列成本为基础：来自于 Van Zanden (2005a) 的纸张的价格（60%）和工匠的工资（40%）以及正文中所讨论的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

[5] 可参见 Clark (2007, 第 252 页) 所论述的英格兰书籍价格的显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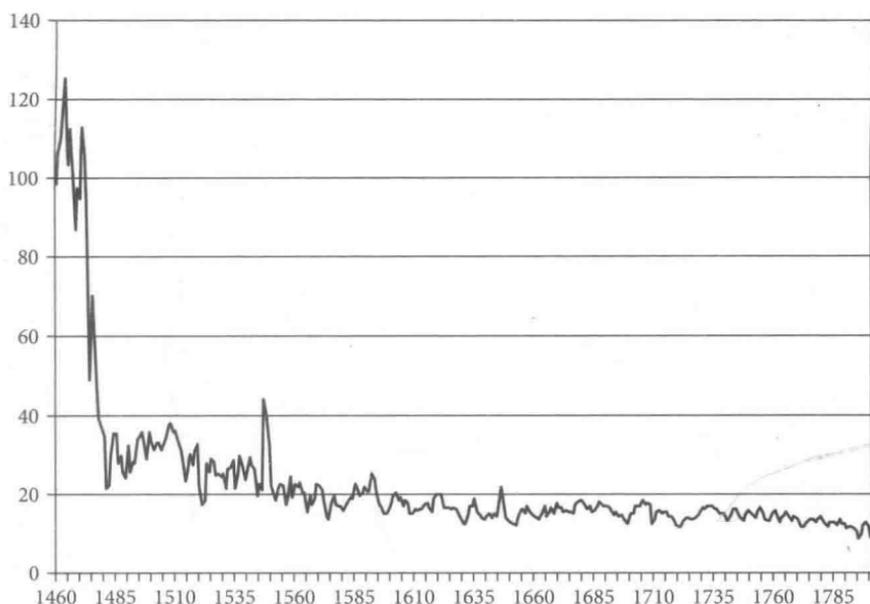


图 21 1460—1800 年间荷兰书籍的实际价格的估计 (指数 1460/1474 年 = 100)

资料来源: 参见图 20 和正文。

1455—1485 年——书籍的价格下降了 (实际) 85%—90%，信息价格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堪比现在的 ICT 技术发展。^{*}

导致印刷机的价格急剧上升的主要因素从文献中就可以看出来。183 最主要的原因是：

- 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与活字印刷机的技术有着天然的联系，按照模拟的价格曲线，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联系非常显著。印刷速度的增加和每页印刷的字符数量的增加大幅降低了书籍的平均成本；

^{*} ICT 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简称 ICT)。——译者注

-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流动性非常大的印刷工来代表——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德国的印刷工已经在欧洲最远的角落里定居，而且由于不同城市 and 不同出版商之间的竞争的加剧，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在前几章中我们提到的，人力资本供给的灵活性也在此处得到了印证；
- 书籍的潜在市场非常巨大，并且为印刷业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的快速传播提供了证据：在 1480 年只有超过 100 个城市拥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印刷厂，而到 1500 年的时候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至少 236 个（Febvre and Martin, 1976, 第 184—185 页）；
- 最后，纸张生产的规模经济（可能也包括其他输入品的制造）对印刷成本的下降也有很大的贡献；总成本中高达 50% 的成本为纸张，纸张的相对价格也下降了很多（Van Zanden, 2005a）。

随着书籍价格的快速下降，书籍总产量也急剧上升。^[6] 在 1480 年，大约 800 版（新）书出版。在 1500 年，产量达到了 2000 版，而到 1600 年则达到了 5000 版书籍的大关，在此之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缓慢了一些（图 22）。最初，德国是工业的重要中心，但是生产很快就扩展到了意大利北部（这里生产的古版书的数量比德国在 1455—1500 年生产的还要多）、法国、低地国家；英国、西班牙和瑞士紧随其后。图 22 显示了欧洲几个国家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书籍出版的版本数量，这可以用来衡量印刷工业的活力。该图

[6] 在第三章，我们已经解释了 800—1800 年间书籍产量的数据是怎么构建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此处展示的数字表示的是版本的数量（而不是印刷的数量），我们主要关注版本的数量，而在第三章，我们对手写本和印刷书籍的总数做出了分析。由于书籍的平均印刷速度从 1500 年的 700 本上升到 1800 年的至少 1000 本，所以实际产出的增长可能比此处展示的还要高一些。

显示，书籍生产的短期波动受到了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例如，16世纪中期的几十年，荷兰书籍产量的减缓是该时期安特卫普印刷业非常快速的扩张的结果，这种扩张使得印刷工业集中于那些城市。政治有时候对书籍的生产也有重大的影响：例如，1640年代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导致了书籍生产的大幅扩张，1789年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之后也出了相同的情况。非常明显的是，不同的长期模式可以鉴别出来：意大利和德国的书籍产量出现了一个突然迸发，而在半个世纪后逐渐放慢。荷兰和英国的书籍产量增长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的的时间更久一些，这导致这些更小的国家在17世纪中期的书籍产量达到相似的水平。最终，瑞典好像是一个起步较慢的国家，但是它在18世纪的表现也是令人瞩目的。

印刷业的革命还有许多别的方面的成果需要被简单提及。社会经济中出现了几个新的角色：1）脑力劳动者，他们借助于他们的笔生活，例如依赖于他们的书所获得的收益（伊拉斯谟 [Erasmus] 经常被称为是第一个例子）*和2）出版商 / 印刷商，他们在将学者集合在一起写新书，发展新项目。这些在学者圈内的新的角色刺激了交换并且为学者团体增加了活力。之后的发展——报纸和杂志的发明——又进一步对知识界（The Republic of Letters）实力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参见 Burke, 2000）。最后，Eisenstein（1979）在她著名的对于印刷机的长期影响的分析中把它作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动力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原动力。如果没有印刷机，那么路德和加尔文或者哥白尼和伽利略的

186

*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荷兰思想家、哲学家、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16世纪初的伏尔泰。1524年写了《论自由意志》，并同马丁·路德通信，批评路德。他知识渊博，忠于教育事业，一生始终重视追求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主要代表作品有《论自由意志》、《愚人颂》等。——译者注

非正统思想可能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两个运动都广泛利用了印刷机，并且印刷机对他们产生了非常有利的作用。Peter Burke (2000) 在对现代早期的“知识的社会史”的分析中用一个相似的方法强调了开始于古腾堡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革命性改变，并且导致了 Mokyr 所称的（工业）启蒙运动的“范式文件”（paradigmatic document），即狄德罗的《百科全书》（Diderot's *Encyclopédie*）*（参见 Mokyr, 2002, 第 42 页）。

187 这些就又回到了本章的主题：工业革命和之前的有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曾经认为印刷机引起了命题性知识在成本、生产和交换上的革命性变化。书籍的实际成本可能减少了高达 85%—90%，大多数的下降发生在 15 世纪后半叶，即在古腾堡之后的三四十年间。同时，书籍生产迅速扩大。当然不是所有在 1455 年之后出版的书籍都包含这些有用的知识：从长期来看，纯粹为了娱乐而出版的书籍出现了缓慢的增长，甚至在相对较为现代和城市化的地区，比如像荷兰，印刷业的产出主要被宗教性质的著作所主导（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宗教知识是命题性知识的一部分）。简言之，如 Mokyr (2002, 第 67—69 页) 所暗示的那样，获得信息的成本变得非常低，对于 18 世纪的工业启蒙运动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事件，而且是 1450 年代以来西欧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信息成本的降低伴随着印刷机的发明和印刷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来，而印刷业的发展正是对新技术和扩大的市场所提供的机会的快速回应。支持这些积极反应的是某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力资本的

* 《百科全书》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无神论者丹尼·狄德罗主编。它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象征，是一部多卷本的畅销图书，是传播启蒙运动思想的最好载体。它把当时全部知识（科学、神学、哲学的等等，狄德罗百科全书给出的分类知识树）汇编为全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多卷本图书，并大量出版发行，这本身就是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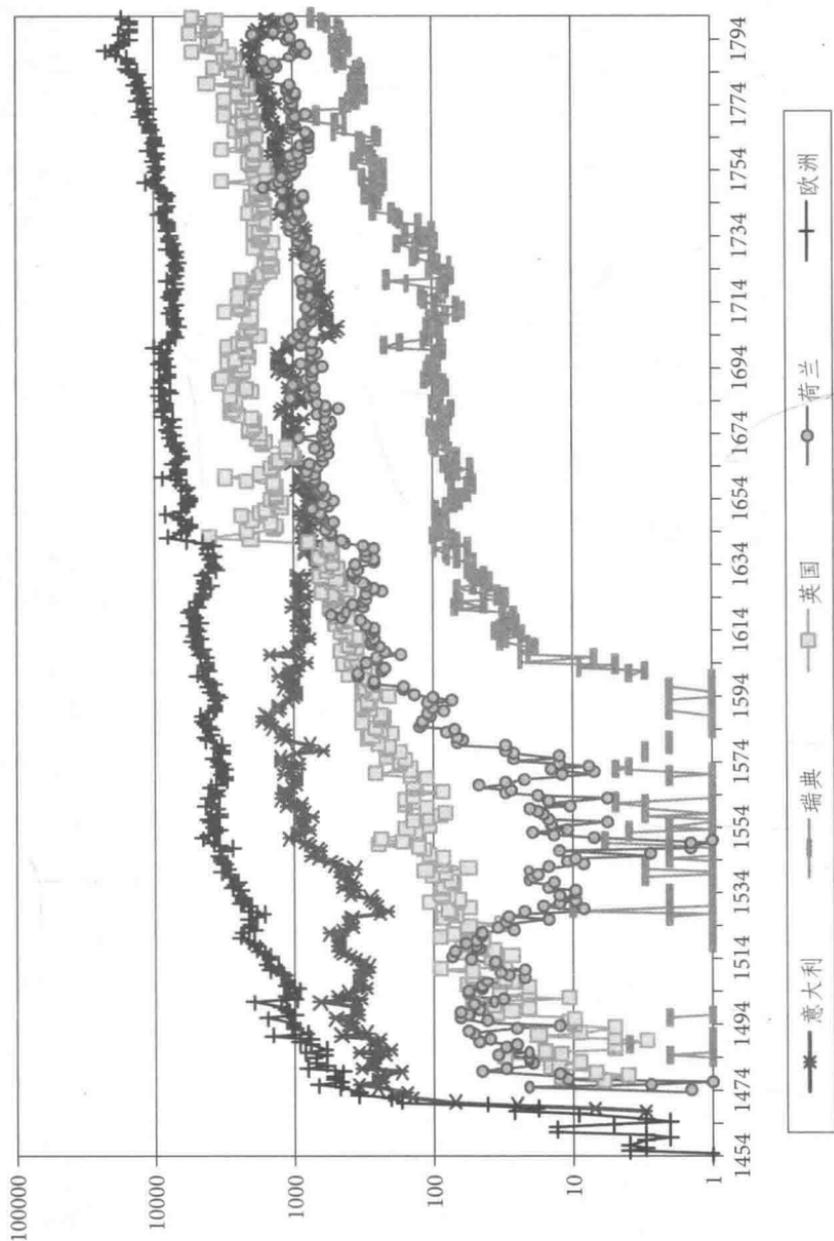


图 22 1454—1800 年间西欧不同国家新版印刷书籍

供给和流动非常灵活，城市和地区之间为了吸引新工业而激烈竞争，以及风险资本弹性供给，这种模式所蕴含的表征正是一个相对灵活的经济体的有效制度所呈现出来的所有特征。

欧洲之外的书籍产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有几个过程导致了西欧书籍生产的快速增长：第一，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僧侣运动（monastic movement）；第二，在12—15世纪之间，城市需求和相关机构（例如大学）的增长；第三，印刷机的发明（它的发明可以看作是对1350年之后的需求增长的反应），导致了书籍价格的急剧下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这些变化——以及相应的书籍生产和需求的水平变化——对于欧洲是独特的现象吗？或者我们可以在其他地区的印刷业中找到相似的扩展情况吗？

在中世纪时，中东的文化水平和书籍的生产可以很容易追上甚至超过西欧，但是那个地区没有凭借着印刷机的发明而转向书籍的大规模印刷，而另一个高度发展和文明的社会——印度的情形与此相同。伊斯兰国家对于印刷机的拒斥可能是“对于普通人的不信任……导致了阻止他们获得印刷资料”的结果（Huff，1993，第232页）。例如，奥斯曼帝国的国王在认识到印刷机对知识传播的重要性之后，就禁止人们拥有印刷资料（Pedersen，1984，第133页）。新技术是如此容易地被压制可能也显示出书籍市场在奥斯曼帝国是非常有限的。在16世纪早期，意大利的印刷商试图通过为奥斯曼印制特殊用途的书籍而进入奥斯曼帝国，但是以商业的眼光观之这些商业冒险都不是非常成功的，这再次显示了奥斯曼帝国对于书籍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Pedersen，1984，第134页）。

另外两个在书籍生产水平上堪比西欧的国家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在18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就发展出了商业印刷业。最近，关于中国印刷业的研究文献增长很快，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从细节上对中国和西欧进行对比。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明朝末期和清朝，中国的书籍生产快速扩张，特别是在16世纪，印刷的书籍大大超过了手写本。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印刷业的增长在这场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Chow，2004，第22页；McDermott，2005）。关于中国书籍产业的产出数量的最近证据是在明朝后半期（1522—1644年），这段时期可能是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这段时期里中国有两个主要的生产中心，建阳（福建）和南京（江苏），并且分别生产了1000种和700种书籍（Chia，2003，第128页）。对于其他城市和省份的估计则比较低。根据张的估计，中国其他地区出版的书籍不超过1600种，其中大约一半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将这些数字综合起来，整个中国在1522—1644年间的书籍总产量大约为3300种新书，或者说是每年27种。^[7] Lucille Chia最近对1505—1644年间的整个中国的书籍产量也进行了估计，他的估计结果是两倍于张的估计，即每年生产47种新书。^[8] 为了比较西欧和中国，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调整。中国的这些数据是以图书馆可以找到的书籍的数量为基础计算的，因此，此数量应该低于实际的产出。但是即使我们将这些数据乘以因数10，这些估计数据相对于西欧的生产水平来说也较低（西欧有一个与中国相似的人口规模）。1522—

[7] 在万历年间（1573—1610年间），南京和建阳的书籍产量达到顶峰，平均年产量为此数字的两倍，即每年50种或者60种（以Chia，2003，第128页为基础）；Chow（2004，第22页）给出了更加低的估计：从1573—1644年间，平均每年的书籍产量仅为19.1种。

[8] Chia（2003）对于明朝的估计是共计7325种（1505年前为707种，1505—1644年为6618种，后者表明年均产量为47种，这个数量大约为张所估计的数据的2倍）；这就显示估计的错误程度有多大，但是不论我们使用哪个估计，它和欧洲的数据的差距依然是令人惊叹的。

1644年间，西欧平均每年的书籍产量估计为3750种，大约为同时期的中国的最高的估计的40倍。

189 对于中国清朝时期书籍产量的最新估计成果较少；其中可以得到的估计是在1644—1911年间新出版的书籍数量大约为126000种，这就表示平均每年的产出为474种。^[9]该水平又一次比欧洲的产出低很多，1644年欧洲将近出版了6000种书籍。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书籍产出甚至比像荷兰这样的小国家的产出还要低。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因为中国的印刷业可能相对有效，生产书籍的成本应该相对较低（虽然没有像欧洲那么低）；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对书籍的需求可能比西欧低很多。^[10]

对于日本，我们也拥有为数不少的关于书籍产量的估计。在1590年两台印刷机被引入日本之后，日本的印刷业确实出现了腾飞。Peter Kornichi（2001，第175页）总结道，“从1597年到17世纪中叶，这是一段印刷业繁荣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新印刷的书籍的纯增长至少为500种，总量比前两个世纪的所有印刷书籍的总和还要大”；这将意味着在这两百年中日本的印刷书籍平均每年“至少”一本，这一点都不引人注目。从Peter Kornichi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另外数据，这可以让我们估计出，从1720年代到1815年，

[9] Tsien（1985，第190页，注f）；鉴于19世纪的书籍印刷的显著增长（参见Reed，2004），1800年前的这段时期的平均值甚至低于474本。

[10] 对于中国书籍的价格和西欧价格的对比可以参见Rawski（1979，第119页）；Chow（2004，第40页及以下）；欧洲和中国的印刷商所使用的不同的技术——活字印刷机和雕版印刷——指向同一个方向：活字印刷机的特征是可以取得大的规模经济，因此当市场大的时候更加有效；雕版印刷的规模经济有限，因此这个技术更加适合市场有限的中国（日本）市场。这个对比还显示中国的新生产的书籍数量较少，并没有受益于快速的印刷速度；事实上，中国的印刷速度可能略低于西欧。

日本总共出版了 22000 种新书，或者平均每年大约 300 种。^[11] 这个结果与 Hayami 和 Kitô（2004，第 241 页）对于“Edo、Osaka 和 Kyoto”三个城市的估计一致：1727—1731 年间总共有 400 种新书，而在 1750—1754 年间约为 600 种新书。毋庸讳言，这些估计相对于欧洲来说都相对较低：法国，人口稍微少一些，在 1727—1731 年间每年生产的书籍数量超过 1500 种，而在 1750—1754 年间每年的数量为 2350 种。假设上述三个城市的书籍生产量至少占日本书籍总产量的 50%，那么日本的书籍生产量仍然远低于法国和大多数的其他欧洲国家，但是高于中国或者事实上高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除了西欧之外，仅有的大规模的书籍生产的中心地区就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对经济发展相对有利的制度（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观察到的一样）。

缩小鸿沟：读写能力的提升

缩小命题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之间鸿沟——存在于普通工人和学者（*savants*）之间——的最根本的力量，可能就是读写能力的提升。思想家（*philosophers*）的世界是文字的世界，包括书籍、信件以及越来越多的期刊文章。为了进入这个世界，为了学习和理解来自于文字世界的方法和结果，并且为了给科学家们提供信息，工匠们必须要有读写能力。Mokyr 在他对工业启蒙的描述中，强调了这两类人群之间的个人直接接触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好像对读写能

[11] 基于 Kornichi（2001，第 198 页）的数据，这一数据给出了对 Edo 和 Osaka 的书籍估计，1720 年代至 1815 年，数量分别为 3636 种和 8000 种，而且在此书第 205 页还给出了出版商的数量。

力的重要性不是很看重，他认为“读写能力在工业革命期间的提升相对适中”（Mokyr, 2002, 第 67 页）。人员之间的接触，特别是工程师、其他工匠和“思考者”（men of speculation）之间的接触，以及特别是他们之间关于实践经验和学术思想卓有成效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普通工人取得进步的条件，而读写能力可能就是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而且，读写能力在工业革命期间没有很大增长的这一事实很明显地表明，甚至在 1750 年之前，英国的公民已经拥有较高的读写能力，这导致了一个快速的经济转轨过程。从这一角度看，英国经济的关键变化可能发生在 1750 年代之前。^[12]

我们对于 1800 年前的这段时期读写能力的发展知道些什么呢？Jaime Reis（2005）在最近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西欧的读写能力增长巨大——特别是在英国、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和德国的西部——在这些地区，读写水平从（有时候）1500 年的女性的接近于零或者男性的 10% 增加到女性“差不多超过”40% 的或者男性的 60%—80%。这些国家中的两个，荷兰（由阿姆斯特丹代表）和英国，从长期来看经历这个过程是有可能的（参见图 23，该图也显示了适用于法国的读写能力的估计）。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数据很好地代表了整个荷兰，因为签订了婚约——重建数据的资料来源——的新郎和新娘有超过一半数量是来自于城市之外：那些移民来自于荷兰的各个省（以及邻国）。而且，他们的读写能力水平几乎和阿姆斯特丹的公民的水平相当（Hart, 1976, 第 130—132 页；Kuijpers,

191

[12] 在他对于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最近分析中，Robert Allen 得出结论：读写能力提高的影响是较小的（Allen, 2003, 第 433 页）；这个结论的得出依赖于相对较差的读写能力的的数据，特别是对于 16 和 17 世纪的低地国家来说，数据更为不可靠。

1997, 第 511 页)。^[13]

这也指明了荷兰这一案例的独特特征, 即农村的读写水平经常高于城市 (Kuijpers, 1997, 第 509 页)。英国的数据被低估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因为伦敦和其他地区的数据并不能充分代表英国; 在英国的案例中, 我们通常认为, 首都的读写水平要高于乡村的读写水平 (Stephens, 1990, 第 555—558 页)。

数据显示这两个国家 (荷兰和英国) 的读写水平在那三个世纪里的增长都非常显著。荷兰的初始水平要比英国高很多, 他们之间的差距一直保持在那个水平。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的那样,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早在 16 世纪, 低地国家的大部分的人口——大概高达 30%—40% 的男性和 20%—30% 的女性——都具有读写能力。这一比例在 18 世纪末的时候上升到 3/4 (85% 的男性和 64% 的女性)。在英国, 读写水平一直保持在至少比荷兰低 20% 的水平。

对书籍生产和消费的估计也可以用来推断 1800 年之前多个世纪中的读写水平的长期发展情况。让我们从观察 18 世纪的最高消费水平所包含的暗示开始, 尽管这样一种观察是简略的。从 1751—1800 年, 当时荷兰的总人口大约为 200 万, 但是它大约生产了 5200 万本书, 并且我们估计, 这其中还有 770 万本书出口, 这就意味着荷兰人均消费量为每千人每年 436 本或者人均每年消费低于 1/2 本书。荷兰人口中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占比估计为 73% (男性为 84%, 女性为 61%),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估计出, 40% 的荷兰人口, 包括儿童根本没有买过书, 这就表示荷兰有读写能力的男性 (或者女性) 平均每年买一本书。

[13] Kuijpers 对于 1585 年的估计如下: 阿姆斯特丹出生的新郎的读写水平为 54.4%, 所有新郎的读写水平为 55%; 阿姆斯特丹出生的新娘的读写水平为 32.4%, 所有新娘的读写水平为 31.7%, 这就显示城市居民和移民的在读写水平上的差异非常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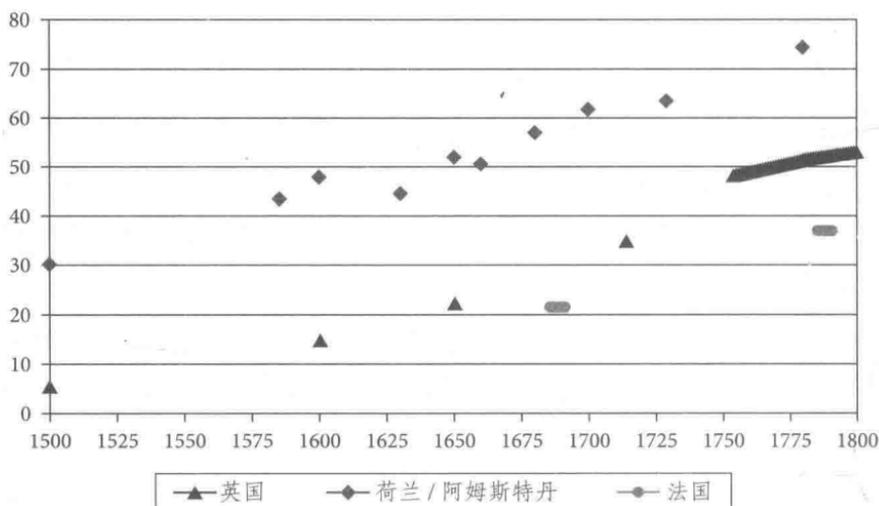


图 23 1500—1800 年间（成年人口的比例）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读写水平发展的估计

资料来源：荷兰：Hart, 1976, 第 130—132 页；Kuijpers, 1997, 第 511 页；英国：Stephens, 1990；法国：Furet and Ozouf, 1977。

我们可以以此为起点推测西欧在 1450—1800 年间的读写水平的发展情况吗？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乃是荷兰书籍的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价格低，这种局面是市场规模相对较大所导致的，荷兰的书籍市场已经扩展到了下层的中产阶级。为了修正这一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个估计与艾伦（2003）所给出的一组关于读写水平的估计做个对比。如果我们假设书籍需求的价格弹性为 -1.4 ，^[14] 荷兰之外的书籍的价格比荷兰高出 50%（英国是一个例外，英国 35% 的比例可能是一个更加正确的估计），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组 1750—1780 年

[14] 我们使用了一个需求函数 $b/p = \alpha \beta^* p^{-1.4}$ ，而 b/p 是人均的书籍消费（从表 4 可以看出） α 是从 18 世纪的荷兰得出的常量（我们对于读写水平有一个独立的估计）， β 是估计的读写水平的比率， p 为本章估计的书籍的实际价格；需求弹性来自 Ringstad 和 Loyland（2006），他们讨论了价格的需求弹性的不同估计值； -1.4 的值是由几个引用的研究建议的，而且，我们对读写能力的发展的估计与 Allen（2003）的对读写水平的估计具有一致性。

间的读写水平的估计值，并与艾伦的估计做了粗略的比较（参见表 8）。我们发现，这一长期的趋势也被艾伦的数据证实了——读写水平从 1500 年的 10% 上升到了三个世纪后的 1/3——这些估计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趋势，1500 年国家之间的差距通常也与艾伦的估计一致。这一对比显示艾伦可能高估了西班牙和荷兰的读写水平，也可能低估了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水平。事实上，此处得出的对 16 世纪的低地国家的估计可能仍然低于实际值。总体模型显示，北海地区（包括瑞典）的读写水平有了强劲的增长，同时南方边缘地区则显示了停滞（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则表现为缓慢增长。^[15] 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的其他结论包括：在 1450/1500—1700/1800 年间欧洲人均生产率增长了 30 倍。这一增长可以分解成两部分：10 倍的增长是由于书籍价格的下降而 3 倍的增长是由于读写能力水平的提高。

如果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估计 1500 年前读写能力的发展以及论证关于书籍价格发展的假设，^[16] 那么我们可以对欧洲总体得到如下结果：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例从 11 世纪的 1.3% 缓慢增加到 12 世纪的 5.7%，然后到 14 世纪变为 6.8%。此处发现的地区模式与我们

[15] 与小型国家——例如比利时或者爱尔兰（或者 16 世纪的荷兰）——相比，这个估计方法可能更适用于大型国家，小型国家有部分书籍依靠进口，它的数量很难估计。

[16] 我们认为，欧洲书籍的实际价格的下降源于以下三种原因：书籍产出的强劲增长，对手写方法的改进以及专注于手写本的大规模生产的机构的出现（某些修道院 [monasteries] 以及共同生活兄弟会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的住所）（共同生活兄弟会，为修会名。14 世纪晚期在 Deventer 地区由神秘主义者 Gerhard Groote [死于 1384] 和 Florentius Radewijns [死于 1400] 成立。目的在于使个人神圣化、做基督的谦卑的追随者。禁止乞讨，以工作 [抄书、手工活以及后来的印刷] 为生。1422 年得到科隆大主教 Dietrich II. von Moers 的确认，不再是异端，并在尼德兰和德国迅速传播。路德曾在此修会位于 Magdeburg 的分校上学。——译者注），欧洲在 1454—1500 年间的书籍的平均价格估计为 600（参见图 20，这个估计是以 18 世纪荷兰书籍价格为 100 得出的指数）。我们假设 15 世纪的手写本的平均价格是该数值的 2 倍，同时在 12—15 世纪期间，该价格下降了 1/3（因此这个指数的序列为：1200 年前：1750；13 世纪：1600；14 世纪：1400；15 世纪：1200）。其他的估计——1200—1400 年间的小规模的下降——没有对我们发现的这个模型造成明显的影响，对于 1400 年前的这个时期的书籍价格的估计可以从 Bozzolo and Ornato（1980）的论著中得出。

表 8 1451/1500—1701/1800 年间的读写水平发展的估计
(与 Allen 的估计相对比)

	Allen1500	1451—1500	1501—1600	1601—1700	1701—1800	Allen1800
英国	6	5	16	53	54	53
爱尔兰	—	0	0	3	21	—
法国	7	6	19	29	29	37
比利时	10	10	17	25	13	37
荷兰	10	17	12	53	85	68
德国	6	9	16	31	38	35
意大利	9	15	18	23	23	22
西班牙	9	3	4	5	8	20
瑞典	—	1	1	23	48	—
波兰	6	0	0	3	5	21
西欧	—	9	16	25	31	—

资料来源：以我们在文字中讨论过的书籍消费量为基础的读写水平的估计和 Allen, 2003。

之前的分析是一样的，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均书籍的生产。1350 年以后，低地国家、瑞士和意大利（这里开始得更早）的读写人口的增长最明显，同时在中世纪后期，大不列颠群岛、法国和德国也出现了持续的读写能力的提高。

书籍价格的下降导致了书籍生产的增长，但是西欧内部的愈演愈烈的分流不能由此得到解释，因为所有地区的书籍的价格都出现了下降。在这一章的工作论文版本中，我们曾经试图解释欧洲内部的这个小分流，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和独立变量的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即收入的增长导致了高水平的读写能力或者说读写水平导致了收入的增长？），结果很难解释（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6）。一个与读写能力和书籍消费都非常相关的变量是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它本身就可以解释西北欧（英国、荷兰和瑞典）和次大陆的其他国家之间的读写水平的所有差异。问题是书

籍生产的增长和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或者经济的因素的推动。“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在书籍消费的估计中已经很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但是作为天主教的比利时或多或少并没有处在高水平的书籍需求地区，而经济上“落后”的新教国家瑞典的书籍生产的扩展则非常迅速。另外一方面，瑞士，另外一个（部分的）新教国家，在16世纪的时候出版还独领风骚，但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出版便遭遇了急剧的下降。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宗教改革是否为一个外部因素，即一个外在的冲击，抑或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生结果，即中世纪晚期（Late Medieval Period）的下层人士的读写水平的提高为路德教（Luther）和加尔文教（Calvin）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Derville, 1984）。

读写水平、技术形成和经济增长

我们怎样解释这些趋势？在前几章对于技能溢价的发展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北欧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特别是在英国和低地国家。这个判断很显然也适合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构成的形式，例如，通过将孩子送进小学的方式来进行投资（或者雇佣私人教师）。中世纪后期的技能溢价的下降和读写水平的迅速提高与书籍的“大众市场”的快速增加同时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结果。在15世纪，低地国家是体现这些发展特征的核心地区，随之而来的是英国。

两个国家都是因为受到了同样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刺激（例如，低利率和有效的制度）才呈现如此的特征。较高的读写水平对学徒培养制度的效率提升很有帮助，与此同时，拥有特殊技能的工匠阶层的增长也可能增强了对小学教育的投资。北海地区

的读写水平和工匠技能的显著增加甚至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城市）管理者在这个方面没有过多干预。因此，人力资本的投资反映了私人的成本和收益，同时也是引致供给和需求共同增长的有效制度的反映。

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政府的政策可能发挥了作用。西欧的北部“边缘”地区的读写水平的提高——比如在瑞典、苏格兰、普鲁士、丹麦和挪威等国家——部分是由于政府的文化启蒙政策，包括引导市民学习读书写字，并且给他们提供学校和老师。虽然在有些地区，这一工作被分配给了当地的教会或者乡村。亚当·斯密（Adam Smith）已经为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并且声称这种政策对于18世纪苏格兰的读写水平的提升贡献很大，但是最近的研究倾向于强调其他的因素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Mitch, 2004, 第352页）。另外一个相似的成功故事可以从18世纪的瑞典或者作为一个总体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看到，在这个地区，政府在推动教育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另外一个通过公共政策提升读写能力的案例。早在16世纪，笃行新教主义的城市政府就颁布了法律鼓励教育（Reis, 2005, 第206页）。在苏格兰和瑞典的案例中，读写能力的上升伴随着技能溢价的下降，这就暗示除了政府的政策，家庭行为的改变和更加有利的人力资本形成的环境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五章）。

技能溢价和读写能力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且很复杂。在荷兰和英国，进入学徒期之前必须拥有读写能力。原因是行会的师傅（master）必须可以读写并且可以计算。这就是为什么阿姆斯特丹的孤儿院的董事想要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上小学的原因——否则他们将不可能进入学徒期（Kuijpers, 1994）。所以，学徒的供给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孩子接受基本学校教育的程度的“限制”——但是由于

教育已经延伸到了社会阶层的底部，因此学徒的供给还是非常富有弹性的，这就保持了低水平的技能溢价。

读写水平的提高也可能与印刷机的革新的影响有关：可以获得便宜的书籍和其他读物——从政府法规（decrees）到各种报纸——以及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书写或者印刷的文字作为人们之间以及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主要或正式的交流媒介这一事实，意味着学习如何读写以及投资于他们后代的教育——使之成为可以读写的人——的意愿变得非常之强烈（参见 Houston, 1988）。 197

在关于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的经典著作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读写水平存在着一个门槛（threshold），一旦越过这道门槛，人力资本形成的有利影响将是非常大的，且足以开启一个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以对 1950 年代世界各国的横截面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is）为基础，Anderson 和 Bowman（1976，第 5 页）得出这个门槛大约为 40%：“有读写能力的男性的人数需要超过总人口的 40%（但是只有这一点还不够），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580 年的荷兰共和国，即在黄金时期的开始时期，和 18 世纪初始阶段的英国，即在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两个地区的读写水平都超过了这个门槛。

书籍的生产和消费——和学习能力——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的假设已经由 Baten and Van Zanden（2008）做出了正式的检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某段时期的书籍的消费对于此后一段时期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有积极影响；因此，人均书籍消费的分流模式（divergent patterns）——北海地区的快速增长和西欧其他地区的较缓慢的增长（瑞典除外）可以有助于解释 1400—1800 年间的“小分流”。然而，这同样可以解释 1800 年后的“大分流”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使用 18 世纪的书籍生产的估计预测 19 世纪的增长吗？

为了检验这一想法，我们将数据扩展到其他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在 18 世纪下半叶的数据可以被得到，他们之中有些国家是欧洲国家（爱尔兰、瑞士、波兰和俄罗斯），还有一些是非欧洲国家（美国、中国、印尼、日本和印度）。我们通过两种方式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图 24 显示了 18 世纪后半期的书籍产量和 19 世纪的人均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1820—1913 年间的这段时期），GDP 数据来源于 Maddison（2001）的估计。我们也检验了它和 1913 年的人均 GDP 水平之间的关系，因为对 1820 年的 GDP 水平的估计相对较弱，有太多的争论质疑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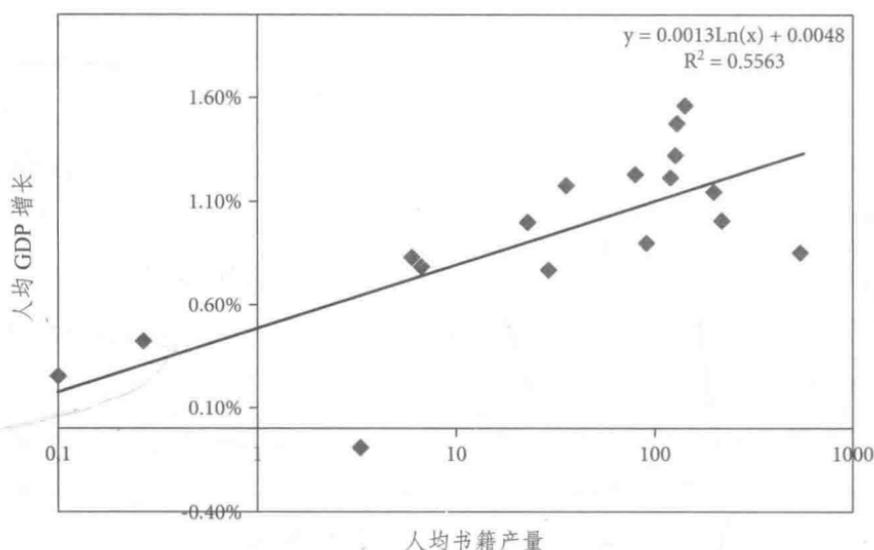


图 24 1750—1800 年间的人均书籍产量与 1820—1913 年间的人均 GDP 的增长

资料来源：欧洲国家的数据，请参见正文（详细内容见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美国和爱尔兰：英语短文章目录（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俄罗斯：Marker（1982）；印尼：Isa（1972）；日本：Hayami and Kitô（1999，第 241 页）；中国：Tsien Tsuen-Hsiun（1985，第 190 页）；印度：Darnton（2002）；GDP：Maddison（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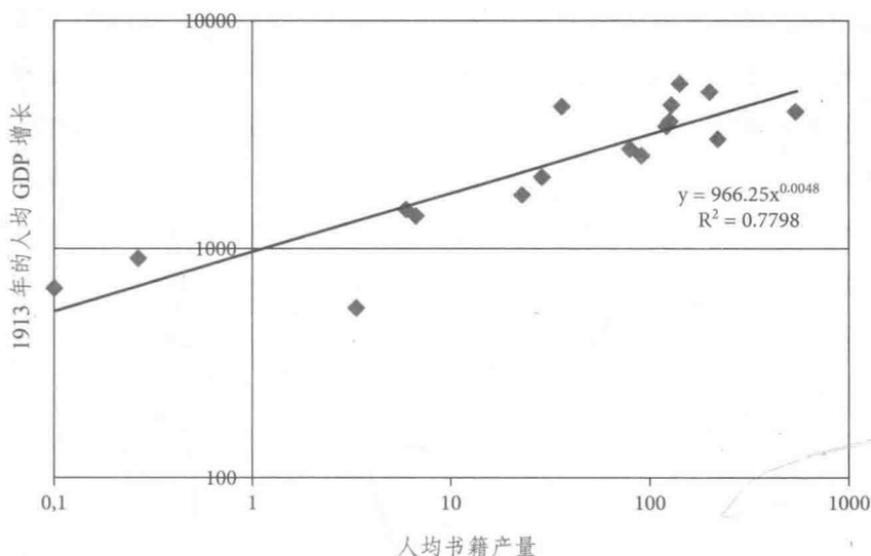


图 25 1750—1800 年间的人均书籍产量与 1913 年的人均 GDP

资料来源：参见图 24。

从两个图来看，二者的关系都非常强。对于亚洲的印度和印尼来说，它们的人均书籍生产接近于零，对于中国来说，差不多是每 100 万人拥有 3 本书。日本的人均数量是中国的两倍多，大约为每百万人中有 7 本，相当于俄罗斯的水平，但是仍然远低于西欧的水平。欧洲内部的差异也很大——比例最高的是荷兰（538）、瑞典（219）和英国（198）；美国紧随其后，每年每 100 万人拥有 141 本书。但是欧洲内部的这种差异对于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图 24 和图 25 中，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表现与其他国家不同，这是因为在前一章中分析技能溢价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中国就是一个例外。两个图都显示，我们测度的 18 世纪的人力资本形成和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绩效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力资本形成水平较低的国家不可能参与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反之那些有一个良好起点的国家则有可能追赶上英国。非常有趣也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从存在大型的书籍市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在 18 世纪已经对教育有了很大的投资。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教育水平很高也被其他的证据所证实（Hayami and Kitô, 2004；以及 Van Leeuwen, 2007 年对于日本 [作为一方] 与印尼和印度 [另外一方] 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的研究）。这个似乎是日本能够成为“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在 19 世纪则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夙愿。

结论

工业启蒙 / 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这是解释西方的现代经济史的关键问题（Mokyr, 2002, 第 43 页）。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对欧洲知识经济的根本改变从长期来看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分流这个论断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我尝试通过回答如下这些关键的问题而对世界分流作出说明：1）提出一种量化分析方法，针对获得不同形式的“有用的知识”的成本、生产和价格；2）表明这些方法为现代早期西欧和欧亚其他国家的路径差异提供了一个一致性的描述；3）对这些过程的长期发展进行了追踪。在中世纪后期，北海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条件的地区，不仅从工匠的技术还是从整体的读写水平（可能还包括一般的教育）来看都是如此。这些是在下降和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和有效的培训和教育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在 15 世纪，命题性知识的生产方式的革新导致了书籍价格的急剧下降，这个又对“学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造成了积极的影响：1455 年后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中书籍的产出大幅增长。最终，普通工人和“思考者”（men of speculation）之间的差距由于这个地区读写水平的提高而消失；这个过程可能在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开始于低地国家（以及法国北部，可能还

包括德国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地区)，然后在 16 和 17 世纪扩展到了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末期，北海地区几乎所有的技术工匠都可能具有读写能力；在低地国家他们完全可以读和写，然后扩展到英国、德国和法国。

从所有这些方面看，这个地区的增长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不论是在技术工匠的供给上，还是在读写水平上都逐渐变得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读写水平在沿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可能还有些下降）。将这一态势与欧亚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相对困难，但是结论也好像指向相同的方向。在欧亚的大部分地区，技能溢价远高于西欧，我们只是在中国南部和（可能）日本发现了和西欧相似的技能溢价。同样，在书籍的生产上日本和中国的表现也很突出，然而相对于欧洲，这两个国家的书籍生产增长更慢，而且人均数量非常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读写水平似乎可以证实这点：对 19 世纪的日本和中国明朝的读写水平估计可与 18 世纪的法国（例如）估计相匹敌（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可能如是），但是这一水平仍然低于低地国家和英国。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中国的部分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的读写水平是否明显高于该国的其他地区。然而，书籍消费的估计显示，欧洲广大读者（reading public）的数量增长要比中国快很多，这意味着欧亚这两个地区的趋势非常不同。然而，我们也应该知晓，18 和 19 世纪的日本和中国是仅有的在制度效率上与西欧接近的地区（参见第一章），因为我们发现这里的人力资本形成的水平要远高于欧亚其他地区。西欧、中国和日本相对较高效的制度产生了相对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但是在西

201

力资本已然形成的信号出现在中国和日本仅是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换句话说，从两方面来看，西欧都比这些最近对手提前了 300—400 年。

最后，关于人力资本形成的这些测度与知识累积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Davin Chor（2005）和 Baten and Van Zanden（2008）在各自撰写的论文中，都发现技能溢价和实际工资呈负相关的关系，而书籍消费和收入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两个测度方法都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大分流。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累积的趋势与潜在的制度框架的效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在现代早期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则没有表现出北海地区那样的活力。

第四部分

迈向二元革命： 国家形成和现代 经济增长

第七章 国家形成和公民权：处于中世纪 城邦和现代国家之间的荷兰共和国

205

（与 Maarten Prak 合作）

简介

国家和它的居民（inhabitants）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国家的利益——即维持其收入水平的最大化和公民（citizens）的利益——即保护其财产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例如，Douglass North（1981）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早期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安全的财产权，而（另外一方面）现代政治早期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约束国家的掠夺行为。虽然国家被认为是公民的代表，但是通常没有制度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以便使公民的财产权受到尊重。

现代早期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在欧洲很有限的范围内，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战争和准备战争的过程中进行着激烈竞争（Tilly，1990）。很显然，国家怎样构建与其公民的关系对他们长远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国家可以找到很有效的方法解决 North 描述的两难

问题，那么它原则上应该比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做得更好一些。很显然，其他的因素——经济的规模 and 任何大型经济团体成立即产生的合作问题的解决方案（Epstein，2000）同样也发挥着作用。一个控制着两倍于其毗邻小国的资源（例如，军队）的国家实力（其他条件不变）也可能比邻国高出两倍还多。^[1]

根据 Latzko（2005）的观点，在 1700 年前的两个世纪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火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经济，也被认为是理解欧洲在 1000—1800 年间发生的集中和合并进程的基础。但是如同 Tilly（1990）所证明的那样，这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尝试组建欧洲帝国的失败证明了规模经济在国家组建过程中的局限性。根据 Tilly 的观点，这个地区的“资本密集型的”（capital-intensive）城市国家，从意大利北部到低地国家，阻止了这些君主，例如查理五世（Charles V）和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创建泛欧洲帝国（pan-European empire）的野心。在 16 和 17 世纪之间，这些小国家通过一种与其居民建立特殊关系的有效方式解决了代理问题。因此尽管他们的国家很小，但是一样可以抵御领土面积较大的国家的侵犯。因此他们有助于维持欧洲的竞争性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被认为是解释这个时期“西方崛起”的原因之一。欧洲没有变成一个单独的整体性的帝国，而是继续保持着相对较小的国家互相竞争的局面——他们中的一些城邦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国家能发挥这些功能。

本章中我们分析了其中一个范例，即荷兰共和国的具体特征。

[1] Latzko（2005）详细讨论了这个概念和其在军事历史上的应用：关于此论述的经典公式已经在 1916 年由 Lanchester 给出：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和数字表达的力量的平方与它的单体的战斗值相乘的结果成比例。

荷兰被认为是一个小国家在这段时期的欧洲国家制度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的最好的案例。他对抗衡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在1568—1684年间的称霸野心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中间，当路易十四（Louis XIV）怀有相似的军事战略目标的时候也试图发挥同样的作用。但是对大多数后来的观察家而言，荷兰共和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无效率的国家：它更像一个奇特的城市和省的特权阶层的相关群体（constellation），这个相关群体被一个A型的分散型国家聚到了一起。但是，这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却表现得非常成功。它虽然很小，但是在17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是欧洲的主要强国之一。而且，我们将会证明这个国家的特征中蕴含了许多在中世纪晚期就发展起来的制度，其中公民权（citizenship）的概念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本章选择了讲述从中世纪晚期的城邦的出现到18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征，其中的一些概念和思想被启蒙思想家重新组合，在1776年开始的“大西洋革命”（Atlantic Revolution）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会证明荷兰共和国是这两次“民主”运动——中世纪运动和“大西洋革命”运动的重要纽带。而且，我们将会简单讨

207

* Citizenship 可译为“市民、市民权、公民、公民权”。对于希腊城邦（城市国家）来说城即国，国亦城，公民权与市民权，本来等义。罗马帝国是扩大化的城邦，斯多葛主义中称之为 Comos Pollis（世界城邦）。对于罗马公民来说，罗马的市民权与罗马的公民权是等义的。但是对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基础“自治市”来说，市民权独立于公民权，罗马的自治市也分别单独与帝国，按条约确立不同的等级地位。——译者注

** 大西洋革命指的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欧洲大西洋沿岸诸多国家里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其中代表性的革命有：英国于1640年开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国内政局动荡，北美借此良机于1775年进行美国独立战争；北美在1775年进行美国独立战争，推动了法国大革命（1789）；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南美借此时机进行拉美独立运动（1791）；海地于1804年正式独立，此时法国拿破仑正计划称帝，并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南美独立运动的成功促进了西班牙、葡萄牙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大西洋两岸的革命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得西方世界步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全球化的趋势逐渐显现。——译者注

论 1640—1688 年间，发生在北海另一侧的英国现代早期的“民主”革命可能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研究国家和公民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欧洲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比较优势的“纵向”制度（“vertical” institutions），这个制度可以保护财产权和增强信任感。关于“横向”制度（“horizontal” institutions），德川（Tokugawa）时期的日本和清代的中国可能和西欧大部分国家一样发挥着同样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这个可以从此处展示的欧亚不同的市场融合程度的比较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为了理解西欧的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我们必须集中精力研究国家和公民的互动方式。

公民权的经济解释

提供公共品是国家的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应该保护财产权制度（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建构一个法律体系），提供公共品以便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度量衡体系，管理市场的规定）和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健康服务等）。作为回报，公民支付税收以便为这些公共品提供资金（Furubotn and Richer, 2000, 第 414 页）。

很早以前，国家筹措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征收贡赋的方式取得，例如，国家利用军事和政治权力强制他的居民通过货币和 / 或劳动的方式缴纳赋税。作为回报，居民可以获得保护，有时候很难分辨这种方式和黑社会（Mafia）为其“客户”提供保护有什么区别（Tilly, 1985; Volkov, 2002）。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国家“保护”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即农民（部落社会的人民大众）

“没有受到保护”，因此为每个领主“提供”此项服务的人将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这种农民和领主之间的交换关系促进和发展了9和10世纪的封建主义（feudalism）。从历史上看，国家从一个强制的结构变成交换占主导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参与者的活动受到契约规则（contractual rules）的限制，即议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在North以及追随者（working in his vein）看来，这一制度是最有效的制度（North, 1981; North 和 Weingast, 1989）。在此我们将会着重探讨这一转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公民权的作用。

国家的最基本问题可以被解释为代理问题。国家被认为是公民的代理人，它代表他们并且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国家有其自身的动力，国家的权力可以并且经常跟他们的居民相反。因此，对于这些居民，如果他们不能确信国家不会跟他们的利益对抗，那么他们既不会缴纳赋税，也不会为增强国家的力量而贡献财力，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可能对它所统治的人有好处：它可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例如，反抗外来的侵略者），保护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他们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一个软弱的国家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支持它的人可能是（对于那些不支持它的人肯定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这个是经典的国家代理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个别居民的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按

* 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可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虽然同一时期的瑞典也已经拥有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其影响力较小。议会民主制的开始可被认为是在1707年，当时的英国理论上还是应由国王主持内阁，挑选阁员。但因当时的国王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使得内阁中一名大臣能够负责主持内阁会议，逐渐就发展出首相一职。随着议会的逐渐民主化和议会权力的增大，议会开始控制政府，并最终能够决定国王必须任命谁来组建内阁。《1832年大改革方案》最终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议会能够挑选首相并决定内阁的组成。——译者注

照约定缴税，以便支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为了所有居民的利益，但是对于单个居民来说，尽可能的逃税对他们仍然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经典的搭便车（free-rider）问题。鉴于他自己的税收份额在总税收中的比例非常小，一个公民的搭便车行为对国家的总收入的影响接近于零。因此，所有人都缴纳赋税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在个人的层面上，不缴纳任何赋税将会是最优的选择。因此，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征税，在很大程度上要么依靠武力强制避免搭便车的行为，要么需要纳税人自觉为“公共福利”（common weal）而贡献财力。

209 关于这些协调和承诺（coordination and commitment）的问题即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在公民权的概念里已经有暗示。这个概念在中世纪时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政治过程的基石，虽然这些概念的根源可能在古希腊的城市里，特别是在雅典找到。按照 Charles Tilly（1985，第 8 页）的观点，公民权可以解释为“个人和特定国家的代理之间的持续性的交易，而这个交易中各方都有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它的特点是政体统治下的公民具有的一系列权利和责任。公民必须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其他活动，目的是为了建设和保护他们的城市。这个包括缴纳特定的城市规定份额的税收，在公共生活中担任某种角色，并且为社会的保卫工作贡献力量。守护城镇的围墙和保护公共的领域经常被分配给一组公民，他们组织成行会、选区或民兵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按照城市法规约定参加政治过程，管理城镇或者选出官员代表公民做出某些行为。作为回报，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这意味着税收的缴纳必须相对公平、透明，被强制缴纳税收的公民必须受到尊敬。最终，公民和被选举出的官员需要宣誓遵守这些规定。通过这种严肃的方式，城邦第一次试图在他们的成员之间建立可信的承诺，这些从 10 和 11 世纪的实

验中成长起来的城市仍然在进行着这种实践。^[2]

这个简略的描述已经揭示了公民权制度怎样有助于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两个协调和承诺的问题。首先，它给予了公民权利，实际上是责任，参加政治过程并监测其结果，因此可以在官方和公民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第二，通过强调为维持国家利益而贡献他们各自的税收份额的道德义务，从而保证了税收将会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缴纳，每个公民都认为其他公民朋友将会支付他们各自的税收份额。如果所有公民都遵守这些规定——而且在中世纪的城市中他们被迫宣誓这样做——那么这两个协调和承诺的问题就解决了。最终每个公民将非常有兴趣维持这些道德作为社会政治行为的基石；他们将会建立一个以信任、参与和承诺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和公民之间的针锋相对的事情出现的几率将会降到最低水平。这也意味着国家依靠武力强制公民缴税的行为将会降到最低。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和合作的相容（mix）与那些没有和其居民发展出相似关系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210

结果是城市（国家）以人均为基础征税将会比“封建”领土国家以强制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税收。国家的存续与它的财政制度的优越性是有关联的。开始阶段，税收道德在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制度中将会相对较高，因为公民权制度有其内在的积极推动力——一个人想成为一个有良好信誉的公民就不会逃税。^[3] 第二，关于财富和收入的新税收制度（例如，每个家庭或者个人根据他或者她的收入或者财富缴纳税收），和根据公民自己提供的信息（例如他们对自己的

[2] 关于中世纪和现代城市的公民权，可以参考 Boone and Park (1966), Bossenga (1997), Cerutt, Descimon and Prak (1995), Nader (1990, 第27—45页), Oldfield (1990), Kirshner and Mayali (2002), Herzog (2002) and Withington (2005)。

[3] 当代经济学家现在也发现了公民权和税收道德的重要性，并且发现了它与国家对待其所管理的公民的方式是如何互动的；参见 Frey (2002)。

财富和收入的评估)缴税可能被认为是比其他间接税收更加有利于公民的实践,更加个性化。第三,因为国家的行为被这些规定所约束,所以可以建立现代化的融资债务。这些债务可以转让,从而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承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这种公债的利率变得相对适当。^[4]

总之,公民权有利于建立国家和公民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因此被认为比强制基础上的关系更有效。换句话说,建立起信任和合作的条件之后,公民身份约定降低了国家和公民的交易成本。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这将会使国家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品。

211 但是这种合作的规则模式带有一些缺陷,而且,这种缺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博弈论已经证明,这种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一段时间的,经常性的重复接触——并且在接触过程中参与者认为他们必须“永远”生活在一起——是强化他们遵守这些规定的内在动力(Axelrod, 1984, 第59、69和83页)。公民权的规定因此可以在统治者和公民之间,或者公民和公民之间,通常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例如乡镇中产生。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些规定容易被这些乡镇的长期成功,被他们的增长和他们的人口社会的差异等损坏。正式的公民权通常被限制在城市人群中的少数部分:即财产和武器的所有人。实际上商人经常主导中世纪的城邦。当城市的容量变大的时候,这些取得权利的人倾向于限制取得公民权的途径,这时候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府变成了小部分寡头政治的统治。寻租的短期利益可能导致这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同时将会破坏城市的

[4] 荷兰的庄园能在16世纪以低利率借到资金的例子对这个观点做出了解释(Tracy, 1985)。

制度构成，并因此破坏其经济成功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反向趋势。公民权利的规定可能产生一种“民主”思想，这种思想可能引起反抗运动。例如13世纪意大利城市中的“公民”或者同时期的佛兰德斯市的手工业行会逐渐增大的影响，最终在1302年金马刺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purs）*之后形成了行会政府（Black, 1984, 第66—67页）。这个“民主革命”为城市政府建立了新的制度，从而把公民重新囊括到这些城邦政府的核心圈内。

早期现代城市公民权的第二个问题是它自身的属性，即创建了一个俱乐部，并规定其中一些人属于这个俱乐部，同时把世界上的其他人定义成为非成员——即权力和特权圈外的其他人。公民权被限制在特定的城市，乡村被排除在外。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虽然记得罗马的公民权，但是他还是清晰地指出了这种国家和公民的特殊关系的局限性：

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虽然自由政府通常情况下对那些获得自由的人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的省来说，他们是最具破坏性和难以忍受的……当一个君主通过征服扩展他的疆域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考虑他的旧国民和新国民的社会地位平等问题……因此，他不会在一般法律中对他们区别对待，同时非常小心地避免对一方或者另外一方的压迫行为。但是对于一个自由国家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而且必须

212

* 金马刺战役，是1302年7月11日在佛兰德斯的科特赖克外围发生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由手工业行会会员组成的佛兰德斯步兵打败了法国和佛兰德斯贵族的骑兵。据说从战败者身上取得许多马刺，故称金马刺战役。佛兰德斯装备不良的步兵所以能战胜法国骑兵，是因为他们把阵地设在四面环水和壕沟的土地上，使骑兵无法冲刺，一筹莫展。由于这次胜利，手工业行会在各城镇的政治中占有优势，同时也消除了法国吞并的威胁，却不能根除法国在佛兰德斯的影响及贵族阶级的经济支配地位。——译者注

这样做，直到人们学会爱护他们的邻居以及他们自己。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征服者都是立法者，他们肯定会设计出一些条例来限制贸易和征税，以便从他们的战利品中得到一些私人的和公共的优势。（Hume, 1748）

由于被城市控制的乡村经常被当作“殖民地”看待，为了城市和市民的利益乡村总是受到剥削。同样，农村人没有进入国家的渠道，他们的利益总是被忽视。对于周边乡村的统治总是引起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剥削和压迫，例如原始工业的增长。^[5]

最终，这种以城镇公民（burghers）和他们的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为基础政府制度，导致形成超过一个城市国家的更加复杂和大型的政治体非常困难。这种尝试在中世纪晚期和16世纪建立城市联盟（德国和意大利）的努力中没有产生稳定的政治体。这些城市联盟总是在一段时间后，由于搭便车问题而瓦解，因为事实证明由于这种合作自身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参见Brady, 1985）。

休谟的引述很好地展示了“封建”领土国家确实拥有合并新领土的机制。封建国家，例如法国、卡斯蒂利亚（Castile）*，还有不得不提的英格兰，他们更容易获得成功，他们可以比这些处于欧洲城市中心的国家以更加迅速和长久的方式增加其领土。这些中心城市是位于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中间的受小规模经济束缚的国家。很显然，国家的力量不仅要依靠其有效的获取资源的方式，而且也依靠其范围的大小。例如在他们边界处存在大量的资源。欧

[5] 这种现象发生在中世纪后期的托斯卡纳地区，可能在佛兰德也有相似的发展过程。在这些地方，城市控制了大部分乡村；参见S.R. Epstein（1991）。

*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Castilla），或译作卡斯特尔，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由西班牙西北部的老卡斯蒂利亚和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组成。它逐渐和周边王国融合，形成了西班牙王国。现在西班牙的君主就是从卡斯蒂利亚王国一脉相传。——译者注

洲城市国家可能在人均方面更加有效，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注定不能战胜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形成的领土国家。特别是当后者开始复制由城市国家发展出来的制度发明之后（Tilly, 1990）。这意味着在新的领土国家内部，这些特殊的“民主的”城市政治结构逐渐被压制——逐渐成为成长中的领土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官僚阶级的下级机构——而且那些仍然处于这些领土国家边界外的城市必须通过多次的战争来保持自身的独立，而大多数城市最终也会屈服。

一个悖论：税收、经济增长和国家的规模

这些观察有助于解释关于国家形成、税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在 De Long 和 Shleifer 的论文中做出了研究，他们分析了包含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类型和城市规模的信息的数据。他们可以证明在“专制主义”（absolutist）国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的城市的增长受到了抑制，而在城市国家，城市一直在持续增长：“受到强大的‘专制’王子统治的西欧国家，在每个世纪里，这些国家的城市人口大约都会降低 180000 人，人口超过 30000 人的城市的数量与同时同地不存在专制统治的区域相比，数量大概下降了 1.5 倍。”（De Long and Shleifer, 1993; De Long, 2000）这很明显可以证明专制统治不会导致经济发展。

De Long（2000）对此的解释是专制政权将税负比例最大化，而非专制政权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受到代表的限制。他认为专制国家的税率将会比商人可以影响政治过程的政权的税率更高。但是他没有提供证明这些观点的证据。事实上，通过回顾这些可以得到的证据，我们发现与此相反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Hoffman and Norberg

(1994, 第 299 页) 在查看这些证据后得出“在专制国家, 例如西班牙和法国, 税收比率相对较低”, 而在“代表制度较强大的国家, 例如荷兰和 18 世纪的英国……税收却非常重”。相似的结论可以从关于 15 和 16 世纪欧洲政权的税制的比较作品中得出: 在城市国家中, 税收压力比大的领土国家更重。但如果我们相信对 De Long 和 Shleifer 得出的证据的分析, 那么结论显示这些城市国家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中心, 而专制政权却不能产生相似的经济增长。

De Long 的潜在假设是所有的税收对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事实上, 很多学术作品都倾向于认为国家只会索取, 不会付出任何回报。公民权的概念使解释“de Long 悖论”相对容易。在城市国家中, 公民支付相对较高的税收是希望得到他们期望的公共品, 因为他们多少可以监测政治过程。而且, 这些公共品——从财产权的保护到教育和卫生服务——可能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作用(参见 Putnam, 2000, 第 19 章)。他们支付的高税收似乎都转化成了能够扩大增长的(公共)的投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欧洲早期, 经济发展都集中在欧洲大陆中赋税较高的区域。

在 19 和 20 世纪之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种类似的悖论式的发展。18 世纪最后 25 年的“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之后, 公民身份在国家范围内被重新定义。在本质上这个概念还是相同的: 公民要求参加政治过程的权利及一定程度的民主和透明, 作为回报, 他们准备保卫国家政府(例如, 通过征召)和缴纳他们应付份额的税收(Levi, 1997)。从长期来看, 这并没有导致税收水平的降低(像 De Long 预想的那样)。相反, 议会民主的出现和传播导致国家和公民的复杂的交易成本降低, 这样一方面使得公共品的供应出现显著提高, 另一方面上交国家的税收总份额也急速上涨。同时, 经济的增长加快也增加了更多更好的公共品, 例如教育和医疗服务的

投资。^[6] 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在 1775 年后的根本性改变可能和同时期的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改变一样重要。 215

案例研究：荷兰共和国

在两个充满活力的公民权之间的时期，即 1050—1350 年的中世纪自治体和 19 和 20 世纪之间的国家政府之间的很长一段时间，^[7] 公民权处于衰退过程中，对大部分的西欧国家的政治过程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荷兰共和国，印度和德国的城市国家以及瑞士联邦（Swiss Eidgenossenschaft）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两个时期的差距。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初期，从规模经济获利的领土国家，远远超过大多数的城市国家的力量，他们逐渐有能力合并和 / 或抑制这个“特殊的”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国家得益于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中发展出的新税收来源和新政治理念的实验，特别是意大利。在意大利（16 世纪）、低地国家（1572—1648 年）和德国（1618—1648 年）领土上出现的伟大战争都在城市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的城市带上，这些战争对位于中心的城市走廊的经济活力产生了破坏作用。这些城市带上的一部分区域可以成功地抵抗领土国家的屠杀，其中有一个地方，幸运地位于莱茵河（Rhine）、默兹河（Meuse）和斯凯尔特河（Scheldt）交汇的三角洲的没有道路的沼泽地带，这个国家就是荷兰（Netherlands）。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作为一个

[6]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我们只是提到最近的 Peter Lindert 所强调的：民主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从而引起经济长期增长。这个可能和现代早期有关联。

[7] Hyde（1973，第 178 页及以下页）认为城市生活在经历了 1348 年前的一个世纪的繁荣之后，这个自治体出现了危机或者实际上已经“消亡”了（第 187 页），但是这个城市理想的急剧消亡的情景对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是非常特殊的。

独立的国家起源于两个不同政府结构的冲突。它出现在位于荷兰（Holland）和泽兰（Zeeland）的许多城市开始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privileges）——比如一些相对有效的制度——之时。这些相对有效的制度的创建得益于城市和公民之间的清晰合约，这些制度也用于抗衡一个专制的领土国家，即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Spain）。后者想要摧毁当地的和区域性的基本权利，建立专制制度，以便比“起初脆弱的”城市联盟更容易获得更好的资源。而这些城邦努力争取他们的独立（Parker, 1976; Tracy, 2008）。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建了一种制度非常复杂的国家，这个国家同时展示了城市公民模型（urban model of citizenship）的优势和缺陷。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独立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联合（理论上的），这个联合被证明是稳定的（它持续运转了超过200年的时间），而且可以承受强烈的外部 and 内部（离心）的力量。但是它不能联合新的领土，那些被占领的新土地（组成分子邦 [Generaliteitslanden]*）不能和已经建立的区域受到同等对待（Christ, 1984）。这和休谟分析中所预测的完全一样。

以准独立城市国家的多层级联盟为基础，在逻辑上这种复杂的国家可以出现。领土国家的面积仍然在增加，它仍然在巩固其领土和权力，建立行政制度和引进新的税收制度，并且试图创建

* 共和国时代荷兰是属于七省所组成的邦联，可以说他们的政府是相互独立，各省都有自己的议会制度。平时每个省份自我管理，各省主要的自治首长（并非正式的国家领袖）被称作“议长”（raadspensionaris）。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联省共和国的疆界大致确立，确立组成分子邦统治的地位，分子邦大致上有以下几个：布拉班特邦（今日的北布拉班特省）、弗兰德邦（今日的泽兰省—佛兰德省）、林堡邦（今日马斯特里赫特）、高兰登邦（今日芬洛，在公元1715年成立）。——译者注

一个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这预示了 18 世纪政治一体化 (political unity) 的增长。单独的城市国家则很难和它毗邻的领土国家保持同步。直至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发展出国家公民权的概念之前, 一个稳定的城市国家的联盟是城市国家的一种可行的生存战略。因此荷兰共和国政治经济的实质问题是这个政体如何将小规模的优势 (advantages of small scale) ——例如公民和城市国家的有效的契约, 与大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large scale) ——例如一个人口超过 200 万, 覆盖区域比一个单独的城市国家大很多的政治体结合起来。这些疑问可以简化成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 以 (小) 城市国家模式为基础的公民权契约应该以什么方式扩展大型的共和国政体? 是将所有公民变成新国家的公民, 还是保留城市政治社区 (urban political community) 的最初和最重要的成员? 主权的分裂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参与政治创造了空间, 公民权的利益如何被限制在一个有效的国家机构里?
- 这个 (在理论上) 稳定的独立城市的联盟怎样才能起作用? 怎样才能解决内在的搭便车问题? 怎样限制分裂的主权可能对经济和国家产生的潜在的负面影响?

在荷兰, 或多或少的独立自治政体的稳定联盟中的合作问题已 217
经得到了有效解决。在 15 和 16 世纪, 荷兰已经发展出一种制度,

* 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是指某个人, 认为自己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心理活动。国家认同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概念, 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行为革命时期。——译者注

该制度可以抗衡各个城市对抗中央政府统一力量的独立主义倾向。对于七省联合的荷兰共和国来说，搭便车的问题已经被证明很难解决。不同省份之间的联盟很不稳定，特别是促进团结（close ranks）的外部压力消失之后。正如1713年后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荷兰共和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边缘化（Aalbers, 1980）。搭便车问题对于荷兰在1712年之后的长期成功产生了很大破坏作用，并最终导致其在1795年消失。^{*}与此同时，它不能克服另外一个“市民”模式的局限性，即城市国家被证明不可能像封建国家那样把一个新的区域整合到君主制国家中去。因为他们不能扩展领土，城市国家和像荷兰共和国一样的城市国家联盟没有能力在一个高度竞争的西欧国家体系中生存。^[8]

关于荷兰共和国的成功解释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这里需要强调：它的广泛的税收基础，例如它的公民想要为公共品做贡献的意愿，以及这些公民所获得的公共品，例如用军舰保护其免受侵略和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

* 1795年荷兰被法国人入侵而亡国，直到1815年滑铁卢战争之后，诸国召开维也纳会议，其中确立荷兰由奥伦治家族统治，并确立荷兰王国的建立，然而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兴起，王族的统治受到挑战，在1840—1848年间荷兰逐步建立议会民主的体制，与此同时南尼德兰爆发革命宣布独立。——译者注

[8] 一个相关的讨论为，是否因为荷兰共和国特殊的分散化的结构，而未能执行经济政策。而这个政策可能会阻止其在1670年之后的经济衰落；和其对手法国和英国相比，荷兰没有发展出一系列的商业政策以使其经济利益可以对抗逐渐激烈的国外竞争环境（参见Ormrod最近的讨论，2003）；问题是对于小型的开放型经济体而言，保护主义如何可能；所有产业——农业、渔业、工业和商业，都是高度依赖进出口的；虽然在18世纪出现了关于保护某些关键工业的好处的非常活跃的讨论，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实施。因为主政的精英喜欢自由贸易，而实施保护主义所能得到的收益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相对不是很明朗（参见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第698页对此项战略的分析和事实上的认可）。

公民权的优势：广泛的税收基础

毋庸置疑，17世纪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的财政，特别是荷兰（Holland）的财政非常成功。图26显示，与英国和法国的税收相比，在荷兰共和国存在的第一阶段里，荷兰人均税收有了非常显著的上升。荷兰的人均收入可能比其他国家会高出50%，这种税收上的差距大部分可以反映在工资的差距上，即荷兰的人均工资较高。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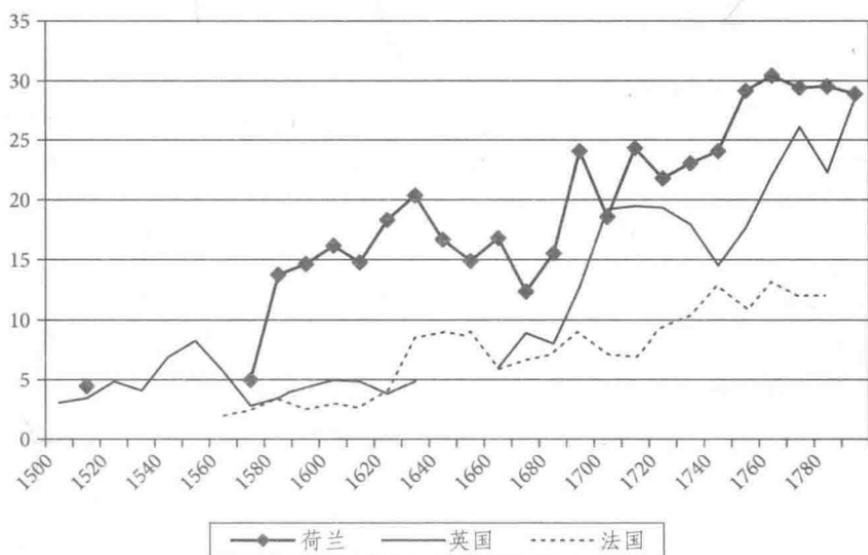


图 26 1500—1800 年间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人均税收
(用建筑业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来衡量)

资料来源：税收收入：荷兰，1514年，Van Zanden (2002b)；荷兰，1570—1800年，数据由 Wantje Fritschy (2004) 提供，并且发表于 <http://www.inghist.nl/Onderzoek/Projecten/GewestelijkeFinancien/>；英国，O'Brien and Hunt (1993)；法国，Bonney (1999)；法国和英国的基本数据都发表于 <http://www.le.ac.uk/hi/bon/ESFDB/frameset.html>。工资：荷兰，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第610—611页)；其他国家，数据 Allen (2001)，发表于 <http://www.economics.ox.ac.uk/Members/robert.allen/WagesPrices.htm>。

在对为荷兰独立战争 (Revolt)* 提供资金的“财政改革”的最近分析中, Wantje Fritschy (2004) 证明荷兰税收的成功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出现在荷兰各县的早期的税收集中心化 (centralization of taxation), 这种制度建立了荷兰各个城市之间的财政和政治合作机制。税收分散化的尝试, 即允许每个城市采用自己的税收制度, 用以支付自己应该承担的为战争提供资金的份额。这种行为在革命早期被压制了。而且, 对消费品和不同种类的财产和“资本”征收的普通税 (common taxes) 被采用, 而且迅速推广开来。对消费品征收一系列的新税收是 1572 年之后“财政改革”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这个被称作“普通税”(common means) 的制度现在已经被引入到了城镇和乡村——1540 年代的税收“革命”被限制在城市里——并提供了国家新收入的大部分份额。这个制度也构成了荷兰国家信用不断扩展的基础。国家的总收入从 1570 年代的不足 100 万莱茵盾 (guilder), 增长到 1620 年代早期的约 1000 万, 在达成明斯特和约 (Treaty of Munster) (1648)** 之前的那些年份里几乎达到 1800 万莱茵盾。其中 50%—70% 的收入来源于“普通税”; 对面包、泥炭、肉和啤酒所征收的特产税 (excises) 也是极为显著的, 占有较大的份额, 一些曾经不用交税的消费品, 例如纺织品、鲱鱼、葡萄酒、蜡烛和食盐现在也开始被征税 (Fritschy, 2004)。从图 26 上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财政改革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用非熟练工人

* 荷兰独立战争指的是尼德兰在 1566—1609 年期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既是一场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 又是一次尼德兰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荷兰的胜利而结束, 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译者注

** 明斯特和约, 签订于 1648 年, 和约中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正式承认荷兰为主权国家。明斯特和约被视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部分, 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结束的里程碑。获得独立之后, 荷兰发展成为 17 世纪航海和贸易强国。——译者注

的日工资额表示的荷兰人均税负，要大大高于法国和英国。在这一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荷兰在独立战争（Dutch Revolt）（1570年代—1610年代）第一阶段的税收收入取得了快速增长，显得与众不同。

1572年之后急速增加的税收收入是否还可以显示出荷兰的公民拥有很高的税收道德呢？他们愿意作为“好市民”（good citizens）来缴纳他们应该承担的税负份额吗？因为大多数的税收是消费税，人们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特产税还有助于弥补税收的影响。在荷兰，税负更多的是压到了城市人口而不是乡村人口身上。因此，在农村，农民因为没有公民权，所以在税收方面的负担也相对较轻。都市人当然也没有像他们在1572年前反抗西班牙的收税人那样联合抵制这些新税。虽然出现了一些税收的骚乱，但那是非常少的。通过对1600—1795年间的荷兰的公共骚乱的调查，我们知道这些骚乱中只有24起是税收引起的骚乱；其中22起是纯属地方性的骚乱（Dekker, 1982, 第29页）。很显然，衡量税收道德非常困难，即使我们掌握当时的数据，经济学家还是需要先进的技术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多数市民，包括现在的市民比“吓阻理论”（theory of deterrence）预测的更加愿意支付他们的税收份额（Frey, 2002）。* 荷兰的税收收入组织得非常好，而且成果也颇丰，这可能表明市民的税收道德非常好。但有一个论断明显不同意这种看法，即对17世纪的税收道德的过于乐观的解释。该论断声称：强调特产税的税收制度是大幅度的倒退，特别是在1670年代之前。

220

* 吓阻理论是犯罪学中关于（抵制）犯罪动机、在刑事政策中关于预防犯罪的一种理论观点。治乱世用重典属于吓阻理论的产物。吓阻理论指透过正式制度的制裁（即刑罚）以及被官方进行刑事追诉时造成的心理压力，能吓阻人类的犯罪行为。如果刑罚具有迅速性（事发之后迅速追诉）、严厉性及确定性（每个犯罪都被追诉、处罚），则人类在功利主义的思维下，会选择放弃犯罪。——译者注

在现代早期税收制度下，非对称性征税是税收制度的一种通行方法，在英国体现得特别明显。1800年前的税收制度是以消费税（基本消费品）占主导，这一制度提高了穷苦劳动者的生活成本，而各种各样的财产大部分都没有征税。这样一个倒退的税收制度符合一个掠夺性国家的通常情况，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以国王和统治精英为一方，而居民为另一方，两方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为基础。例如，O'Brien 证明间接税收占英国收入的份额经常超过 60%（O'Brien, 1988, 第 9 页）。在荷兰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荷兰的总收入中“普通税”也是占这样的比例。因此，这种与英国税收结构的相似性不支持荷兰的统治精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愿意为国家的服务支付税收的观点。

然而，1670 年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基本的问题是增加间接性税收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因此，税收慢慢地向奢侈消费品税和资本税（包括对公共债务支付的利率的强制性降低）转移。大约 1670 年后，这一政策取向导致累进税的份额逐渐增加。反之，占人口比例 70% 最穷的人所支付的税收在 1650—1750 年间“仅仅”增长了 20%，而富人缴纳的税收增长超过了三倍（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第 112 页）。从图 26 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革命”的第二阶段，在 1670—1770 年间人均财政收入大约增长了一倍，这一现象的出现归因于富人缴纳税收政策的采用和税负幅度的增加。

在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荷兰就已经开始对财产实行累进税制，这种税对于荷兰的大多数城市来说是一种紧急情况下才需要征收的税种，但是从 1599 年之后这个税种在全省内推广。这对独立战争那些年税收收入的增长有些许贡献——平均增加不超过 120 万莱茵盾。后来针对这项税收荷兰实施了改革，经过短暂的中断然后重新启用，

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征税成本很高 (Fritschy, 2004)。1672 年对财产征税之后, 人们还有几次尝试开始对收入征税。从 1715 年之后, 对收入也开始适用累进税 (Oldewelt, 1950)。其他省份, 如泽兰、乌得勒支、上艾瑟尔省,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遵循了荷兰的范例 (Dirksen, 1966)。

1715 年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还是较温和的, 收入超过 600 莱茵盾, 征收 1% 的税, 超过 2000 莱茵盾, 征收 2% 的税。1742 年, 人们做了一个相似的实验, 即做了设定了更高程度累进税率的实验, 税率从 600 莱茵盾的 1% 到 2000 莱茵盾的 1.6%, 然后到 10000 莱茵盾的 2.5%, 甚至更多 (Oldewelt, 1950)。这些税率显示荷兰的精英已经愿意为自己交税, 因为毫无疑问他们是支付税率最高的人群之一。但是, 这些实验从长期来看并不成功, 主要是因为征税和维护税收登记系统的成本过高。所得税仍然作为应对财政困难和政治情势的紧急税收, 而不是持续税收的稳定基础。

对于累进税率, 其他省份在观念上很难接受。上艾瑟尔省, 这是一个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特点的土地大省 (它的乡村由拥有大多数土地的大地主贵族主导), 也在 1750 年引入了所得税, 但是税率却出现了倒退: 收入少于 200 莱茵盾的穷人缴纳超过他们收入 3% 的税收, 而收入超过 3000 盾的富人只缴纳收入 1.8% 的税收 (Van Zanden, 2001b)。累进所得税制度似乎是一个适合城市的观念, 上艾瑟尔省的贵族似乎十分厌恶这种制度。

1795 年之后, 累进所得税成为革命者最喜欢的一种制度, 这些革命者得到了法国支持, 占据着荷兰共和国, 并且将国家公民权概念引入。在相同的年份中, 在他们的邻国——法国和英国也出现了多次使用累进所得税资助大型战争的重要尝试 (Gross, 1993)。累进所得税在早期形式消失之后, 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 并且提高

了税收，这一税制的传播也可以作为民族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改变的一个证明，而荷兰则是先驱者。

或许，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特殊关系的更加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自于荷兰共和国的公债发展故事。最初，对于从独立战争中产生的政体的持续性和生存能力的信任程度非常有限，所以需要支付高利率来吸引城市精英的资本。许多早期贷款实际上都有强迫的成分，因为税收是“分配”给城市的收税员（征收普通税）的（Fritschy, 2004）。直到40年之后的1611年，养老金（renten）的利率才重新回到1572年前的水平，而且只有到了共和国最终稳定的1684年，公债的利率才下降到了低于5%的水平，从而让荷兰共和国比邻国有了一个明显的优势（同前，表3）。虽然在1620年代之前公债的利率相对较高，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荷兰可以借到大量资金：普通税和特产税可以提供大量相对稳定的资金；其他税收，即对于广义的“资本”和特定的“固定资产”（土地和房屋）的税收在紧急时刻是一个更加具有弹性的资金来源，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比迅速扩大的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的方式更具有弹性。而且，荷兰的借款越多，它就越容易变成制定利率的买家垄断者。

公债的利率可以看成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的代理变量。North and Weingast（1989）和 Epstein（2000，第18—25页）将公债支付的利率水平作为他们评价不同政府机构治理效率的基准。特别是 Epstein，他揭示出由于相对较低的公债利率，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城市国家比领土国家收益更多，这可以解释成这些不同国家类型的特定政府治理结构之间的差距。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部分的论述，城市国家发现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国家代理问题的方法，而领土国家则没有解决这个困境。Epstein 认为城市国家和领土国家的差距在现代早期逐渐降低，到18世纪时已完全融合。

然而，来自 18 世纪荷兰的资本市场的数 据却呈现了一个略微不同的故事。当时阿姆斯特丹是主要的国际资本市场，它为欧洲的所有主要城市 和许多小城市提供贷款。通常荷兰自己的公债利率是 2.5%（而且偿还义务直到 1780 年也是以 2.5% 的价格交易）。英国公债的收益在 1690 年代出现显著下降，利率在 7%—14% 之间，在 1710 年代变成 5%，而到 1730 年代以后降到了不超过 3%（Riley, 1980, 第 129 页）。奥地利在 1760 年代和 1770 年代债务的年利率在 3.5%—5% 之间，当时，阿姆斯特丹的利率处于最低水平（Riley, 1980, 第 129 页）。在相同的年份，丹麦王室（Danish crown）的贷款利率是 4%—5%，瑞典和俄国王室的贷款利率是 5%，而西班牙支付的利率是 6%，而法国贷款的估计利率（主要是终身年金）大约在 6%—6.5%（Riley, 1980, 第 111、139、165 页）。因此，在 1760 年代—1770 年代的现代早期阶段，共和国（republics）和君主政体王国（monarchies）的贷款利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美国的特点与共和国的模式相一致，所以可以迅速获得信任，结果公债的利率在 1790 年代早期从超过 10% 下降到 4%（Riley, 1980, 第 191 页）。

Hoffman 和 Norberg 还注意到在 18 世纪，由于受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延迟偿还公债利息的传统的影响，法国国王的“风险溢价”比英国国王高出两个百分点。英国王室总结说：在整个 18 世纪，“这是一个较大的风险溢价，而且法国国王个人可能为他的风险贷款要支付更多的溢价”（Hoffman and Norberg, 1994, 第 308 页）。因此，来自荷兰资本市场上的证据表明，这两种国家制度的公债利率仍然存在高达 50% 的巨大差距。

荷兰投资者对产生这个差距的原因十分清楚：他们不相信君主，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受到代表制度的约束。例如莱顿的百万富翁 Pieter de la Court van der Voort，就建议购买英国的股票，因为该股票有议

会的保证。同时，他非常怀疑其他的君主能否实践自己的承诺。他说，高利率只能戏弄无知者，对于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只是一个警告，因为只有骗子才会提供高利率。当一个人遇到那些用圣经证明他们的可信度的人，或者当他们跟君主交易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相信君主的书面承诺的人发现他们很容易被出卖”，de la Court 这样告诉他的妻子和继承人（Prak，1985，第137页）。

直到17世纪末，对于“共和国”征收的利率比“君主政体”国家支付的利率要低很多。这种差距在18世纪开始缩小，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可以从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角度来加以解释，但不能从君主政体的效率提高角度来解释。因为，从玩国际金融的游戏中学习很多并不等于他们内部的组织会变得更有效率。因此，公债利率的发展数据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君主制国家的代理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欧洲资本市场，“共和国”和1688年后适用共和国宪法的君主制国家，例如，英国，相对于其他君主国家来说具有显著的优势。

公共品：国家做了什么？

公共品是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期间产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忠诚西班牙王室的那些人和反对菲利普二世的那些人之间的内战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抗击敌人毋庸置疑是荷兰这个国家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公共品。像现代早期的其他国家一样，战争费用占据了荷兰共和国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在1641年占了总花费的90%（Hart，1993，第62页）。在17世纪，公债支出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荷兰，公债最初仅仅是作为平衡战争支出的一种工具而已。

战争上的花费，有其自身的“破坏”性，因此可能经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开支项目。但是从荷兰共和国的观点看，一个很小的国家试图在霍布斯的适者生存的斗争里存活下去，战争和防卫都是公民自身所需求的公共品。荷兰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维持波罗的海非常重要的海上航线的和平，这条航线提供了荷兰共和国所消费的大部分谷物。在16世纪，荷兰已经致力于在那里建立一种荷兰和平（Pax Hollandica）。因为厄勒海峡（The Sound）的战略重要性^{*}，丹麦国王关闭该航道是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16世纪，由于当时查理五世（Charles V）^{**}出于战略考量有时会支持丹麦国王，荷兰的部分外交政策导致它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内部关系变得很紧张，但是在施派尔协约（the Peace of Spiers, 1544）之后，荷兰在这个区域的利益优势被参与各方接受了^{***}，厄勒海峡（更宽泛的称呼为波罗的海航线）对于荷兰贸易而言变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航道。现在这个航线的保护费用由荷兰来支付（和其他各省），船长和商人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更有效地运输和交易他们的货物。

* 厄勒海峡是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主要通道（船只从波罗的海驶往北海，也可通过丹麦南部洛兰岛以南的费马海峡经大贝尔特海峡或小贝尔特海峡，然后经厄勒海峡以北的卡特加特海峡、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因此，厄勒海峡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译者注

** 查理五世是哈布斯堡王朝生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一世与卡斯蒂利亚的女王胡安娜（疯女胡安娜）之子，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的外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的孙子，生于根特，在低地国家被抚养长大。从父方来看，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但他不是纯粹的德国血统。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也是他的帝国的核心，但他在西班牙却经常感到自己是个外来者。他的母语是法语，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低地国家”（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贵族们通用的语言。查理五世为天主教奉献了全部忠诚乃至狂热。他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并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天主教帝国”。1521年，查理五世以皇帝身份传唤马丁·路德参加沃尔姆斯宗教会议（许诺保证路德的人身安全）。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1521年沃尔姆斯教令）。——译者注

*** 1544年，丹麦同神圣罗马帝国签订施派尔协约，表示在克里斯蒂安三世在位期间丹麦将对神圣罗马帝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这使得开发更有效的船舶——著名的槽型船和快速平底船成为可能。这些船的特点是没有防御工具（特别是大炮），而且，人均运载能力非常之大。这些船舶是在保护良好的波罗的海航线中发展出来的最为合适的高效船舶，它们在下一个阶段的商业扩张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商业扩张的这个阶段荷兰占领了许多航道（Unger, 1978; Van Tielhof and Van Zanden, 2008）。

对于16世纪的荷兰来说，保护其在波罗的海的商船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公共品，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商业利益，而且关系到各省所依靠的食物来源。1572年后创建的荷兰共和国也有相似的目标。1579年乌得勒支同盟首先是一个军事联盟，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军事联盟，它联合反抗的各省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共和国联省议会（the States General of the Republic）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战争和准备战争。它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抵抗西班牙的国外武装对其领土的侵略和1648年后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偶然性的侵扰，例如法国或者明斯特（Munster）主教。1580年后，当葡萄牙变成西班牙皇室的一部分时，低地国家被切断了从里斯本供应殖民地产品的来源，这次战争的对抗基本上影响到了全球范围。其中最好的例子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VOC），该公司成立于1602年，目的是为了发展与印度的直接贸易，同时对西班牙的帝国造成尽可能大的伤害。^{**}成立于1621年的西印度公司也有相

* 乌得勒支同盟是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荷兰北方诸行省于1579年1月23日在乌得勒支的牧师会大礼堂缔结的同盟条约。乌得勒支同盟被看作是荷兰共和国成立的基础。而西班牙国王直到1609年与荷兰签订12年休战协定的时候方才承认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3月20日，1799年解散。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200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只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25000名员工、12000名船员。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的主要原因在18世纪时，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不断，两国在1780—1784年间的战争，由于国内对亚洲货品的需求

似的双重目标：获取利益和损害敌人。而且经常使用舰队和军队进行“常规”的军事行动，也使得战略商业利益显得非常突出；可能最著名的战争当属八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1600年的尼乌波特（Nieuwpoort），目的是为了扫清敦刻尔克的海盗。

在与西班牙长期冲突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是重商主义的，因为他用武力保证商业精英的利益。大多数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商业精英的利益，这也被认为是维持国家利益的最理想方式。其中和英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1652—1654年间）是在1651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之后，这次战争很明显是一场“重商主义”战争，目的是为了控制海洋和被海上航线控制的商业帝国。^[9]

“中央”政府，例如联席会议（States General）几乎只负责战争和公债的管理，以及为这些官僚机构提供适当的资金。而其他公共品的供给被分散化了，这些事情由城市或者城市中的私人机构执行。18世纪，一个典型的城镇兹沃勒（Zwolle）的公共消费显示出国家为居民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这些服务包括防御和安全、基础设施的维护、卫生护理和教育，还有关于时间的信息（国家维护着公用时钟）。但是教育方面的费用很少，这显示出了城镇账目的问题：许多公共服务不是由城镇委员会直接负责，而是由其他机构使用它们自

226

量大减，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出现危机，终于在1799年12月31日宣布解散。——译者注

* 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 or Dutch Revolt）发生于1568—1648年，是荷兰（即尼德兰联邦，荷兰只是联邦七省之一，不过多数以荷兰称呼之）清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该战争也是荷兰的独立战争。与西班牙不同，荷兰所属尼德兰本为松散联邦，为了此战争，联邦出现前所未有的团结，而领导者为尼德兰总督威廉。——译者注

[9] 传统观点认为，荷兰共和国是一个非重商主义国家，因为它不保护自己的工业，而且不关心它的收支平衡和银条的外流，但以我的观点看，这种解释对重商主义概念的理解太过狭隘（参见Ormrod, 2003）。

己的收入流进行采购。在社会福利这方面，私人团体（私人资助的学校，穷人的救济，寡妇和儿童的照顾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市政府只是在私人运行失灵的时候才会介入。城镇委员会的成员也在慈善委员会任职（McCants, 1997）；荷兰公民很自豪地给这些机构的男女管理者画了画像，这些画像被放到公共场所展示以强调精英的公德心（public-mindedness）。

公民身份和英国 1640—1688 年工业革命前的历史

为什么英国与低地国家的起点如此不同，却能收敛于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个政治经济制度中，执行部门的行为被强大的议会严格控制，公民身份逐渐变得很重要，国家变成了城市精英控制的促进商业和帝国目标的工具。英国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延续一个由拥有土地的精英主导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逻辑发展过程。在集权国家中，正如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国王的权力成为“专制主义者”的权力。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对比来看，英国抵制集权主义上升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有效，什么可以解释这一点呢？

我们已经解释了荷兰独立战争的目的，即是为了反抗大型领土国家逐渐增加的专制主义，在这里大型领土国家就是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它试图否决城市国家的“特权”（privileges）——这一“特权”是组成荷兰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个冲突也包含了很强烈的宗教因素，但这些因素也都和政治有关。这些城市反抗菲利普二世是因为他不允许城市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区域贸易共同体——一个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教徒或者英国的安格鲁人（Anglicans）进行交易的共同体——观点看，宗教宽容是一个理性的政策。相反地，宗教冲突在管理维度上也存在一些紧要问题：谁是

宗教的管理者以及解释宗教规范和行为道德的解释者，是位于罗马的中央统治集团管理还是按照教会发展出来的模式管理？正如加尔文教派（Calvinists）*和门诺教派（Mennonites）**一样，教会可以根据12世纪发展出来的联合体（*universitas*）模式由他们自己亲自来管理。这一改革具有真正的“民主”含义，新教（Protestantism）的各个派别都有草根阶层的支持，即有来自（低层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如工匠、渔夫和劳动者的支持。^[10]

很显然，这一局面与17世纪的英国所发生的事情类似，那时英国发生了政治和宗教的抗争，也产生了一系列相似的有争议问题：关于安格鲁教会（Anglican Church）的管理问题、宗教少数派（minority religions）的信仰自由问题、议会的角色问题以及上升的专制主义风潮，后者代表着斯图尔特（Stuart）国王更加明确的野心，他想以欧洲大陆的榜样来型塑英国。同样在当时的英国，反对派的“左翼人员”的社会基础也是下层的中产阶级，包括工匠和临时工。同时，这里还有原始的机构——议会，它是联合体对抗皇家

* 加尔文教派，又称“归正神学（Reformed Theology）”或“改革宗神学”，是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和实践及其教派其他人的主张和实践的统称。加尔文主义出现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主要流传于法国、意大利、尼德兰交通要道的日内瓦。该教派由长老治理教会，长老由教徒直选，牧师由长老聘任。反对天主教的圣餐“质变说”，也反对路德的“同质说”，主张信徒透过信心可以领受到属灵却不可见的实体圣餐。国家从属于教会，为教会差遣。加尔文教派主张发财致富，支持商业和高利贷，崇尚节俭、主张克制欲望，鼓励积累资金。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为了灵魂的得救。——译者注

** 门诺教派（Mennonites），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他们的宗教教训源自16世纪欧洲的重浸派（Anabaptist）。门诺派信徒坚持自己与非门诺派团体完全分离。他们不配带武器，也不宣誓。他们按字面意思解释《圣经》，并且严格服从《圣经》的教训。门诺派是重浸派两个主要团体之一。教派名称取自荷兰改教家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他曾经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后来成了荷兰重浸派的领袖。——译者注

[10] 历史的嘲讽是，新教徒——至少在更为激进的版本中——想按照联合体的模式管理教会，将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这是从中世纪盛期发展而来的，这个事件和其他原因一起导致了这个时期的教廷革命（Papal Revolution）（参见第二章）；然而，天主教不能适应这个变化，而且强烈反抗。这一反抗强化了政府管理机构所包含的等级因素。

对其冒犯的主要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荷兰独立战争时期的庄园相似。而且，在英国，商人也分化成了不同的部分，富有的和拥有特权的伦敦商人经常支持皇家的事业，就像阿姆斯特丹在荷兰起义时所做的一样。因为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阿姆斯特丹通过经济扩张比荷兰北部的任何其他城市获得利益都多，而其他少数的商人，因为没有从皇家保护中获益，所以他们强烈支持议会（Brenner, 1993）。

由于低地国家存在非常强大的市民自由和城市特权的传统，所以这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制度之间发生冲突可能就不会使人惊讶。在英国，城市的地位从传统上来说也不是很强，但是在16—17世纪之间，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在大约1540—1640年间，欧洲大陆的市民自由逐渐被压制，而英国则见证了强大的“社团体制”（corporate system）的逐渐增强和稳固（Withington, 2005）。自治镇（incorporated towns）的数量从1500年的仅仅38个增长到1640年的181个。这一情况反映了市场化乡镇在这段时间的增加，而更加重要的是，人们更加习惯于从市民权利和特权的角度看这些乡镇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这与以往不同。正如在低地国家，行会和学徒工制度在草根阶层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ithington（2005，第29—30页）已经证明了，特别是学徒工制度，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城市本身的增长速度。在1540—1640年间，由“市民（citizens）、自由人（freemen）和自治镇选出的议员（burgesses）”组成的阶级急速增加，他们有能力管理他们的乡镇事务，并且用和我们对荷兰公民权相似的词汇解释他们的权力和职责，而且，他们越来越有浓厚的兴趣管理英格兰共和国（English commonweal）。

在这一潮流中，地方和高层政体之间的联结纽带是议会，自治

镇（自治的镇，borough）向议会派出的代表也逐渐增多，他们的人数从1584年的74名发展到1641年的128人，当时52%的国会议员（MPs）都是社团体制的代表。而且，自治镇代表大多都想成为议员或者想把议会和国王分开（Withington, 2005, 第41页）。因此，针对国王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社团体制在1641年的议会中的强硬立场所导致的结果（由此引起的改变导致了内战）。^[11]

Withington的书有助于解决内战和光荣革命（它用某种方式结束了“革命”的17世纪）同时发生在英国的矛盾，因为在英国早期解决那样一个重大的冲突的社会政治基础非常薄弱。商业的内驱力（市场化乡镇的增加）以及商人和手艺人中产阶级的增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6和17世纪早期出现了社团体制。

Stone在他的一篇关于“英国的受教育水平和读写能力”的开创性论文（seminal paper）中提出，1530—1640年间的识字人数的提高和17世纪的革命冲突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大众文化水平的发展和解放下层人对上层精英的知识依赖有直接的关系”。文化水平的第一次增长为17世纪中期小册子著作提供了市场，这使得大众开始阅读圣经和圣诗集（Psalter），从而创造了强烈的宗教热情，没有此过程，就根本不会出现针对旧制度和价值观的激进挑战乃至革命。如果我们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它显示西方发生的三次大型的现代化革命，即英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它们都发生在男性识字人数的数量达到人口总数的1/3—2/3之间那一时期，不多也不少（Stone, 1969, 第137—138页）。另外一个他可以补充加以说明的案例是荷兰的独立战争，这一战争也发生在识字人数中的

[11] Withington (2005, 第41页), 还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内战。他认为自由人、议员和市民在政治文化上的非常多的提议和参与引发了英国的动乱”。

男性比例从 1/3 快速增加到 50% 的时间里（见图 23）。根据 Stone 的观点，英国革命是识字人口的剧增推动的，他所暗含的意思是，1640—1688 年间的政治巨变所带来的制度变化改变了英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最近的（理论）文献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制度改变之间的正向反馈的研究也表明了相同的观点（Glaeser et al., 2004）。

识字水平的增长、市场化乡镇的发展和“社团体制”创造了这个基础，在这里我们想指明的是英国政治经济与荷兰模式的趋同性，即按照荷兰的模式在发展。在英国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新型的公民身份模式在英国出现，这种模式的基础不再是市民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比荷兰共和国更进一步的是，国家变成了合约的“另一方”。这一可以预见的发展只能在 1789 年之后才会会在西欧其他国家发生，只有到那时，欧洲所有的公民权才会在国家的规模上重新定义（Prak, 1997）。

结论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 2005) 在他们的关于“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开创性论文中，认为“小分流”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迅速扩张，商业的扩张引发了大西洋国家巨大的制度变迁，这些变迁由强大的新型商人团体所推动，他们大力支持限制君主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 behaviour）的制度。在本章中，我们对这些变化所暗含的机制以及制度和社会—经济改变之间的互动做了详细的分析。本章的中心观点是公民权在这些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公民权是一组指导公民行为和“他们的”国家的规定，它理论上解决

了国家的合作和承诺两个问题：一个是强大的国家可能会冒犯它的公民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公民的搭便车的问题。公民权的规定可以导致国家（公共品的提供者）和它的公民（公共品的消费者）以及纳税人之间的相对有效的交换。这种模式，最初出现在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然后出现在中世纪的西欧，随着城市公社（communes）的发展而出现（1050年之后），从1770年代开始到1780年代以及之后的时间里，这种模式又扩展至欧洲大陆和美国，当然公民权在国家水平上被重新定义，而后，渐次成为19世纪国家的关键制度。

这一被现代早期的荷兰所使用过的概念提高了国家和公民之间交易的效率；因此，我们不同意 Greif 关于荷兰共和国的“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便向其他地方发动有效的战争”的观点（Greif, 2005, 第 773 页）。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荷兰共和国在和更加大型的西班牙帝国的战争中不可能生存下来，也不可能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存在很长时间。相反，如图 26 所显示的那样，荷兰共和国，特别是荷兰，其人均可使用的资源较少，但它的发展说明它比周边的领土国家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然而，它也确实相对较小，而且这样一个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国家确实确实也存在许多缺陷。它建基于一群有特权的公民，而且只有到了 19 和 20 世纪，这一公民权的概念才拓展至民族国家的全部人口。那些不属于这个集体的人不能享受市民才能享受的特权。在这种特别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既定安排下，它很难和其他集团——或者地区——合并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因此，它不可能像现代早期的其他欧洲领土国家那样从相同的规模经济中获益。因此，发展出这种模式的城市国家就要被迫抵御大型的逐渐增强实力的领土国家的侵犯。

231

荷兰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领土国家和城市国家两种不同的治

理结构相互竞争的“偶然”结果。它是独立的城市（理论上）之间的多层合并结构，这些城市是具有主权的独立省的一部分，最初是为了共同的战争目的——抗击西班牙军队——而联合起来的。在荷兰内部，这些问题在省的范围内可以被有效地抑制，因为省一级有相对较强的制度，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和位于海牙的中央政府之间有着长期合作的传统。但是，省与省之间的合作问题却比较大。搭便车问题从长期来看，削弱了荷兰共和国的活力。1790年代的革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而解决了这些问题（Van Zanden and Van Riel, 2004, 第 32—51 页）。

这种政体的“产品”——如同中世纪欧洲其他早期的城市国家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占国家主导地位的公民中的商人精英的需要和利益。荷兰独立战争之后出现的军事财政国家是这些精英扩展其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例如通过保护其船舶和保卫其主要的贸易通道来获利。荷兰北部的经济在这段时间充满活力的拓展与重商主义国家（mercantilistic state）的产生有一定联系。在北海的另一边所爆发的内战，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就是模仿荷兰的案例。英国内战见证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军事财政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将会在几十年的时间中在军事和商业方面超过荷兰（O'Brien, 2001）而且，英国在 17 世纪创造出了公民身份的概念，这一概念逐渐避免了独特的“城市”模式的局限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其在 16 和 17 世纪之间快速的商业扩张。从 17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逐渐向荷兰模式靠近（收敛），最终变成了一个同样的重商主义强权国家。

此处所论证的原理还有助于澄清许多具体的问题。它为这样一种悖论提供了解释，那个悖论就是“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的国家的居民一方面缴纳更多的税收（Hoffman and

Norberg, 1994), 而与此同时他们在经济上似乎也更加成功(根据 De Long and Shleifer, 1993)。它也解释了在 19 和 20 世纪民主化过程中——在国家范围内对公民身份重新定义, 其根源在荷兰共和国以及英国, 特别是在英国内战——导致了政府花费和税收的急剧增加。它还显示了公民身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套制度, 这一制度可以显著降低国家和其居民之间高度复杂的交易成本。

导言

现代经济增长在西欧出现的准确时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1〕}通常来说，这一发展被认为是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紧密相连的，但是关于英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研究显示，实际收入水平在18世纪前半期就开始增长，尽管很缓慢。Crafts和Harley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研究中，不能证明在18世纪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提高的迹象，当时人均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也仅在0.3%。尽管当时的产出增长率可能在1780年后有点加快，但与此同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在提高，这导致人均增长与18世纪前半期保持在同样的水平（Crafts，1985，第45页，Crafts and Harley，1992）。而且，大多数此类研究

〔1〕 在此我们使用Simon Kuznets（1966）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即现代经济增长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的起点都是著名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 该“政治算术”由 Gregory King^{*}提出, 研究显示,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伴随着高水平的结构转型(46%的GDP来自于非农产业), 这也说明即便在1690年代之前, 经济增长率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 现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 为什么会出现? 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们是否找错了研究对象,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一下荷兰共和国, 英国到底是不是“第一个现代经济体”, 正如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所认为的那样, 从1580年代到1670年代英国产生了第一波的现代经济增长?

与这一问题息息相关的是, 我们应该从全球的视野来审视西欧的经验。例如, Pomeranz (2000) 宣称1750年后英格兰的经济增长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之相关的事实是, 英国可以获得便宜的煤炭资源并拥有大的海外帝国。它可以从海外帝国获得食物和原材料, 从而可以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约束(Malthusian constraints)。^{**} 这一假设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的起源相联系; Pomeranz 的观点依赖于如下想法, 即认为增长开始于1750年之后, 但这个想法可能是错误的。

234

本章的首要关注点是重建长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序列, 这种重建基于从其他作者的著作中所获得的几个基准估计值。然后, 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 将这些估计值与模拟程序联系

* 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 1648—1712), 英国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系谱学家, 政治算术学派学者。最早的统计学源于17世纪英国。其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 代表作《政治算术》。政治算术学派主张用大量观察和数量分析等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主张, 为统计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其被称为“无统计学之名, 有统计学之实”。——译者注

** 马尔萨斯陷阱, 以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命名, 认为对大部分人类历史来说, 收入停滞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与发现仅仅造成人口的增加而没有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只是在180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革命才使得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 同时他们也跳出陷阱。——译者注

起来，从而估计出人均 GDP 的年增长率。接下来，本章第一部分所呈现的结果将与我们在前几章学到的关于西欧不同地区在 1500—1800 年间的制度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情况相联系。

争论：19 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增长还是停滞

关于现代早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的争论肇始于 1990 年代。争论以 Graeme Snooks（1990；1994；1995）撰写的几篇关于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论文为开端。在这些论文中，他认为从 1086 年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撰写开始到 1800 年的这段时期，英国的人均 GDP 增长了将近八倍。事实上，按照他的观点，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和 1780 年后一样快。一系列关于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相同问题的研究论文都认同了 Snooks 在出版物中所持的论点。这些论文在 1994 年米兰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经济历史大会上被 Maddison 和 Herman van der Wee 整合到了一块儿。他们的结论相对比较保守：1500—1800 年的增长要比 1800 年后慢很多（Blomme and Van der Wee, 1994；Malanima, 1994；Yun, 1994；Van Zanden, 1993）。除了一到两次的快速增长（例如在荷兰黄金时期）外，这个调查发现人均年增长是比较慢的（在比利时）或者根本不存在（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我尝试综合了这些研究结果，并得出结论：西欧的人均 GDP 在 1500—1800 年间至多增加了 20%—30%，因为人均劳动投入可能已经出现了显著增加，但劳动生产率可能没有什么变化（Van Zanden, 2001a）。

235 这些有点悲观的结论不同于 Angus Maddison（2001）在最近所做的关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近 1000 年的经济增长的概览和测算。在《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中，Maddison 对欧洲经济在 1000—1820 年（以及之后）间的经济增长的数值进行了估计。根据 Maddison 的观点，西欧人均 GDP 在 1000—1820 年间增加了 3 倍，从而导致了收入水平在 1000—1500 年间增加了将近 2 倍，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3 个世纪中又增加了大约 56%。Giovanni Federico（2002）在对 Maddison（2001）的书进行了仔细的审视之后，指出在这些估计中存在一些问题。Federico 认为，按照 Maddison（2001）的估计，中世纪时期的人均 GDP 水平将是不切实际的低（仅仅在生存水平之上）。而且，1500—1800 年间的增长率似乎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估计不尽一致。

在这一章中，我们给出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关注与北海接壤的国家：英格兰和荷兰。我们还会简单讨论对其他几个国家的研究成果：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关于这些国家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检验。我们试图确定对于人口、实际工资和实际租金的发展的可靠估计能否与 1800 年之前数个世纪中的人均 GDP 的发展的基准估计相一致。因此，我们假设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的世界（固定规模报酬和替代弹性为 1），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模型来检验人均 GDP 的估计是否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要素价格、人口水平和人均劳动投入的估计相一致。^{*}这也意味着，实验必须把不同的变量带入生产函数，必须使用用于

*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Y = A(t)L^\alpha K^\beta \mu$ 。式中 Y 是工业总产值， $A(t)$ 是综合技术水平， L 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 K 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作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就用亿元作单位）， α 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β 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μ 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 $\mu \leq 1$ 。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 α 和 β 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1) $\alpha + \beta > 1$ ，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2) $\alpha + \beta < 1$ ，称为递减报酬型，表明按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得不偿失的。3) $\alpha + \beta = 1$ ，称为不变报酬型，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译者注

投资的 GDP 的份额（这一份额决定了资本存量的长期增长），必须使用每年的工作天数，必须指明有没有技术进步，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使用。这将促使我们对欧洲经济在工业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的长期发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观察我的估计（参见 Van Zanden, 2001a）与 Maddison 的估计的差别（2001；2003）。

英国：1086—1688 年

236 关于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中的经济增长的现代研究开始于 Deane 和 Cole（1962）的开创性探索，他们对大不列颠在 18 世纪的经济增长进行了估计。他们的结果被 Crafts（1985）和 Harley（1993）做了拓展和修正，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对 1688 年以来 GDP 发展的估计，这些估计已经被广泛接受（Crafts and Harley, 1992）。Snooks（1990；1994；1995）最近在他的关于 1086 年世界末日书的论文中率先提出了 1688 年之前的国民收入估计。他根据关于领地之外的部门收入的估计（这些估计资料很可贵），例如来自于乡镇的收入，巧妙地填补了关于“领地收入”（demesne income）的数据。这些估计数值还是很保守的。例如，它假设农民的消费水平停留在温饱线上。然后，Snooks 将他对于 1086 年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估计结果与 Craft 对 Deane 和 Cole 的 1688 年以来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合并，这些结果在某些时期包括几个估计值。结果就是得出了一组从 1086 年到 1688 年间的经济增长估计值，这些估计值相当高，令人惊奇，人均 GDP 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0.29%，并且持续了 600 年，以至于实际人均收入在这 600 年间翻了 4 倍。在其中的一些时期（特别是在 16 世纪上半叶），他甚至发现年均增长率能达到 1.5% 甚至更多。这些结果表明，从 1086 年到 1688 年间的增长速度不比 18 世

纪低多少，18世纪的（1688—1760年）的年人均增长率是0.31%。16世纪上半叶的增长幅度仅仅和1830—1870年间的增长幅度相当。

Snook的乐观结果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许多研究者发现了他对1086年水平估计的错误，这个估计值似乎被低估了很多，事实上他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他是怎么把1086—1688年的总体增长额分配到不同的世纪之中的，而且，也没有解决1086—1688年间的通货膨胀问题。他的估计被几个研究者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Nicholas Mayhew（1995）和Bruce Campbell（2000，第406—410页）。后者仔细地将Snook的数值和他自己更加详细的关于可耕土地的产出（数值较低）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根据我们关于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知识，Snook的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系统地低估了“农民生存成本”，并且他也没有虑及“对于非自由的人来说可支配的剩余的生产”。对于1086年的估计，Campbell同意Mayhew得出的较高估计值，Mayhew更正了Snook著作中的诸多错误。

在最近的其他研究中，Campbell（2007）得出了更为详细的关于1290年代的国民收入的估计值，这个估计值可以与经过Lindert和Williamson（1982）修正过的Gregory King类似的估计值做个对比（参见表9）。这些估计值显示，从1290—1688年每一户家庭的实际收入都增加了110%；因为家庭的平均规模降低了，所以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大约150%。这个结果也可以和Campbell对于1086—1300年（或者1290年代）间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增长作一对比，Campbell估计这一时期的增长为10%。因为1290年代之前人口增长非常快，所以总GDP在1086—1300年间的增长幅度大约在130%—150%之间（Campbell，2000，第409页）。 237

表 9 根据 Campbell 和 Lindert & Williamson 的研究得出的 1290 和 1688 年的英国的收入水平和结构的估计值（百分比）

	1290 年代的 家庭份额	1688 年的 家庭份额	1290 年代的 收入份额	1688 年 收入份额	1290—1688 年间 家庭实际收入 的增长
地主、贵族、 乡绅、高级 神职人员	2.3	2.9	15.8	22.0	132
佃户、小佃农	41.8	16.4	43.6	22.4	175
佃农、(农村) 劳动者、游民	36.2	37.9	19.4	9.1	-6
非农产业 (商业、自由职 业者、手工艺 人等)	19.8	42.8	21.2	46.4	112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10
总人口(百万)	4.32	4.9*			
总 GDP(时价, 百万英镑)			3.67	54.44**	

* 根据 Lindert 和 Williamson (1982); 更近的估计值一般而言略微偏高, 可达 506 万。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Maddison (2004) 给出的是估计值为 5404 万。

资料来源: Campbell (2007)、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2]

238 这一比较显示农村收入分配呈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 在 1290 年代仍然占农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佃户 (tenants) 和小佃农 (smallholders), 无论从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急剧下降, 而地主的收入份额却大幅度上升, 从占 GDP 不到 16% 的份额上升到 22%, 或者说从占农业增加值的大约 20% 上升至大约 50%。而且, 农业劳动者 (和佃农, cottagers) 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尽管仍然是人均 GDP 的 2 倍还多一点。最后, 非农产业活动占 GDP 的份额在

[2] 假定: 1290 年代到 1688 年间的价格增加了 5 倍 (根据 Campbell); 同时也假定 1688 年三分之一的劳动者是非农劳动者, 其他的都是农业劳动者。

这 400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2 倍多。非农产业的雇佣人数从 1290 年代的不到 20% 上升到 1688 年的 43%，收入占的份额也得到了相似的增长。这些数据可能仍然低估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增长，但是由于原始工业活动（proto-industrial activities）在乡村出现，佃户、小佃农、佃农和农村劳动者的非农产业收入的比例肯定也出现了增长。Craft 估计农业占 GDP 的比例在 1700 年低至 37%（在 1800 年降至 26% [Crafts, 1985, 第 16—17 页]），反之在 1290 年代这个估计值肯定超过 70%。

然而，通过对比 1290 年代的估计值和 1688 年的社会表格（social tables）中给出的详细的重构数值，我们发现数值之间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个由 Mayhew 和 Campbell 给出的估计值仍然是非常粗略的，它没有和关乎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的其他数据做比较。Lindert and Williamson（1982）的主要贡献就是更正了 Gregory King 的数据，Gregory King 数据对总收入的估计大约高估了 25.1%。这就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历史国民经济核算的首要法则”（first law of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的案例：我们对前现代社会知道得越多，我们对历史的国民经济核算就会越详细，人均收入看起来就会显得越高。换句话说，对于历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值的重大修改几乎总是导致对人均收入的强烈高估，我们可以从 Mayhew 和 Campbell 对 Snook 的数据修改中看到，或者也可以从 Lindert 和 Williamson 对 Gregory King 的数据的修改中看到。^[3]

因此，对于 1290 年代的“第一代”估计值和对于 1688 年的非常详细的和修正过的“第二代”估计值之间作一对比，可能导致高 239

[3] 事实上这仍然正确：即使是最接近的国民经济核算的修改结果也是正向调整 GDP 水平，这个数据可能高达 10% 甚至更多；在这些例子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更加详细的信息和改良的估算方法几乎总是导致正向的修正。

估这两个时期的增长率。^[4]但是这个时期是英国经济急剧变化的时期，同时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从图 9 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这一点。在附录 1 中，我们解释了如何将 1290—1688 年的增长分配到不同的世纪，这一话题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讨论。

1000—1800 年间的欧洲经济增长

2001 年，我发表了一个关于欧洲六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波兰——人均 GDP 估计值的汇编，这些数据是来自于不同作者的案例研究。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没有出现增长，而且在 1800 年前的三个世纪中其他方面的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更进一步，即便是出现了增长，也仅仅发生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这也就是说，增长被限制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Van Zanden, 2001a）。从 2001 年开始的这一新的研究倾向于证实以下这些结论：

- Olle Krantz 对 1571 年的瑞典国民收入做了一个详细的重构，结果显示“尽管边界不是很确定，但是通过合理推导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6 世纪的人均 GDP 和 1800 年的大致相似。”因此，瑞典像其他边缘国家一样在 16 和 19 世纪之间经济发展是处于停滞状态的（Krantz, 2004）。

[4] 另外一个论点是 1688 年的修正值是如此之好，以至于得出的结论是在 1700—1830 年间没有增长；这是由 Lawrence Officer 就相同的问题所做出的研究结果，可以在经济史网站上得到这一结果，<http://www.eh.net/hmit/ukgdp/ukgdpstudy.pdf>。另外，人均家庭收入比人均收入少很多，因为家庭的人数从 1290 年的 4.4 下降到 1688 年的 3.5；Lindert and Williamson（1982）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 1688 年的英国人口数，这个低估可能使我们认识到 1688 年的人均 GDP 可能比估计值还要略低一些。

- Paolo Malanima (2003) 从更长的时段 (从 1300—1861 年) 得出了意大利 GDP 的详细估计值, 这些估计值证明意大利从中世纪盛期到 19 世纪早期收入水平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Albert Carreras (2003) 详细审定了西班牙在现代社会早期的 GDP 的估计值, 并补充上 Yun (1995) 之前发表的关于 16 世纪初期的 GDP 估计值, 从而证明西班牙经济是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的。^[5]
- 最后, 我发表了荷兰在 1510—1514 年间的 GDP 水平和结构的详细估计值 (Van Zanden, 2002b), 这个估算也可以和 19 世纪早期的估算做个比较。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是, 荷兰的表现十分出众: 在这三百年里, 人均 GDP 增加了大约 50%, 其中几乎大部分的增长都集中在 1570—1650 年代; 事实上, 从 1650 年到 1807 或 1808 年, 实际收入水平再次缓慢下降; 还可以参考 De Vries (1984b), Van Zanden (1987; 1992)。

表 10 显示了七个国家的人均 GDP 结果, 这些结果是以 GDP 的详细重构为基础的点估计值, 这些估计值也是可靠有效的。从 Maddison (2001) 那里获得的 1820 年人均 GDP 的相对水平也可以被用来完成类似的尝试, 即量化 1800 年之前的经济增长。

我们在这里可以对比较结果做个简单的总结。第四章中我们讨论过的“小分流”是这些估计的清晰有力证明。外围国家的经济显示了长期的停滞; 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在 1500—1750 年间, 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先是出现了下降, 后来出现了小幅度的回

[5] 当本书结束写作时, 一个由 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 (2007) 撰写的重要论文发表了, 在这个论文中, 他们再次研究了这些证据, 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表 10 1500—1820 年间欧洲六国的人均 GDP 发展的估计 (英国 1820 年 =100)

	约 1300 年	约 1400 年	约 1500 年	约 1570 年	约 1650 年	约 1700 年	约 1750 年	1820 年
英国	29	38	43	43—45	54	69	84	100
荷兰	—	—	58	58	95	94	94	92
比利时	—	—	46	55	53	55	61	62
意大利	71	71	67	65	60	57	61	53
西班牙	—	—	43—48	43—48	39—48	39—44	40—41	48
瑞典	—	—	—	51	—	—	—	、56
波兰	—	—	45—53	42—48	42—49	35—40	30—33	41
平均* (无加权)	—	—	约 51	约 52	约 58	约 59	约 62	约 66
平均* (加权)	—	—	约 54	约 54	约 55	约 56	约 56	约 58

* 不包括瑞典。

资料来源: Van Zanden (2001a); Maddison (2001); Carreras (2003); Malanima (2003); Krantz (2004)。

升（至少在西班牙和波兰）。只有西班牙的人均 GDP 有可能 1820 年比 1570 年高一些，但是由 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2007）给出的更近的估计则是更加悲观的。与欧洲南部和东部的经济停滞相比，北海沿岸国家的经济在现代早期则出现了缓慢的（比利时），或者更快速的增长（英国）。这些估计显示，英国在 1600—1820 年间的人均 GDP 翻了一番，而对荷兰同期 GDP 的估计则显示了略逊一筹的 50% 的增长，比利时的增长可能更小一些。

当然，对于早期的这些估计来说，估计的误差可能较大。在 16 世纪，意大利是最富裕的国家，然后就是低地国家，这种发展序列的推测看来是合理的。至少从国际视野来看，只有英国的收入水平低于预期。人均 GDP 的最低值出现在 18 世纪的波兰和 1300 年的英格兰，大概仅为基年时人均 GDP 的 30%（以英国 1820 年为基年）。 241

从这些数据中发现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种方法加以审视。非常明显的是，长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产产量增加的速度，由此导致欧洲在 1500—1820 年间的人均产量的增加不足 10%。在这一时期（1500—1800 年），这 6 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了 91%。马尔萨斯式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张状态将逐渐增大，然而如果以上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人口的增加很明显地对应着某种程度的产量的大幅增加。但是与之相似的是，乐观主义者的希望也仅仅说对了其中一部分：经济增长，在人均产出意义上的增长，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在 1700 年之前。即使是在很有经济活力的荷兰，在 300 年的时间里也只有一次“增长的喷发”。随后，荷兰的经济增长就部分地被佛兰德斯拖累了，在同一时期，佛兰德斯的经济出现了下滑，所以荷兰的经济增长不快，其时低地国家的经济重心也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作为一种平衡，总体来说，这六个国家的增长确实非常缓慢；加权的人均 GDP 在 242

300 年的时间里增长不超过 10%，而且这个增长主要是因为我们所选择的样本中包括了西欧最有活力的两个国家（英格兰和荷兰）。

而且，欧洲内部的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差异很小。最富庶的地区（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和最穷困的地区（波兰）之间的差别在 1570 年只是最富裕区域水平的 30%。在 17 世纪，由于荷兰的崛起和波兰和西班牙的衰退导致差距迅速扩大，但是由于相对于欧洲平均水平的英国的崛起和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斯的衰落，这个差距被部分地抵消了。在 18 世纪下半期，由于波兰和西班牙的 GDP 的增加和荷兰经济的停滞，国际间的不一致现象得到了缓解。1820 年平均数周围的展布（Spread）甚至比 1700—1750 年间还小，虽然当时英国已经开始领先欧洲大陆的其他各国。

除了和北海接壤的国家之外，1500—1800 年间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相对较慢，但是这对于 1500 年之前的 5 个世纪来说可能不是事实。英国的人均 GDP 在经历了 1086—1300 年间的 10% 的适度增长之后，在中世纪后期的“危机”期间的增长超过了 50%，这似乎是正确的（见表 10）。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知道西欧在 950—1300 年间经历了惊人的繁荣。此处提出的问题是，这段时间的人均 GDP 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方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假定对 1086 年的英格兰 GDP 估计或多或少是正确的，然后看中世纪的英格兰到底有多么典型；例如，有没有一些原因可以导致英格兰在 1086 年的人均 GDP 系统性地高于或者低于欧洲大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于欧洲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英格兰在 1086 年的时候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尽管相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来说这个差距不是很大。而且，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例如佛兰德

斯和意大利北部，在中世纪盛期的发展比英格兰快很多，在 1000—1300 的大繁荣期间，英国主要是提供农产品、特别是羊毛，而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地区却集中于工业和服务活动，这些产业具有很高的附加值。结果就是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更快。因此，Campbell 对英国在 1086—1290 年间人均增长的估计，相对于西欧整体来说可能更显得保守。

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估计一个最低的收入水平（生存水平），在此之下收入不可能下降。一个参考点就是 Maddison 对 1820 年的英国的人均 GDP 的估计：2121（1990 国际元）美元，也就是表 10 的基准。如果用 1990 年的国际元测算，英国的人均 GDP 在 1500 年是 910 美元，而在 1086 年大约是 550 美元。在最近的一项对于大约 1000 年的时候拜占庭（Byzantium）的收入和不平等情况的研究中，Branko Milanovic（2006）估计人均 GDP 的绝对最低水平可能是大约 400（1990 年国际元）美元。这个结果看起来是合理的。英国在 1086 年的人均 GDP 应该是高出最低生活水平的 40%，这个和 Campbell（2000）的耕地产出的附加值的估计占 GDP 55%—60% 的估计一致。^[6] 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其人均 GDP 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高于英格兰，为 550—600 美元。在同样的研究中，Milanovic 还对拜占庭的人均 GDP 做出了估计。他得出的数字是在 640—680 美元之间，这个数值处于欧洲人均收入水平的上限，因为在千禧年更替之际，拜占庭仍然是欧洲最富裕地区的一部分。1500 年前后，西欧的平均水平是 1100 美元（从表 10 中得出），这就意味着前述五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翻了一倍；英国的增长更平稳一些，从 550 美元上升到 990 美元。总之，综合考虑我们在此

[6] 包括家畜部分的总的农业产出肯定会在 GDP 中占更高的比例，可能高达 70%—80%。

处所使用的两个估计——Campbell对1086年的英格兰和Milanovic对1000年拜占庭的估计——都带有极大的推测性。我们可能可以得出这五个国家在1500年前经历了比1500年之后的三个世纪更大的人均增长速度。因此，对于欧洲整体来说，中世纪晚期（1000—1500年）显得比现代早期更加有活力，而现代早期的增长几乎趋于停滞。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模拟：荷兰，1500—1800年

此处所展示的结果有多么正确呢？这些结果与这些年欧洲经济长期发展的其他证据相一致吗？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更有活力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北海地区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为了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了几个实验，从而模拟实际工资、实际租金（当这些数据可以获得时）、人口、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之间的关系。

生产函数通常有三种投入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被认为是同质的，在质量上是不变的（我还会回到其中的一个假设）。我们从荷兰这个经济体开始研究，荷兰在1510—1514年间和1807—1808年间的GDP结构的详细估计我们都可以得到，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估计1510—1514年间GDP的各个部门产值占GDP的份额（土地0.07，劳动力0.60，和资本0.33；来自Van Zanden, 2002b）；所有的模拟结果都会用基期的价格表示。其他的模型的组成部分包括：

- 要素价格：非熟练劳动者每天的实际工资的估计（来自于Allen, 2001）和土地的名义租金和实际租金的估计（每公顷）

(后者与CPI有关,即需要去掉通胀或通缩的影响,来自Van Zanden, 2005a)。

- 要素投入:可耕地、人口和劳动力的年度数值序列(除了每年的工作天数的改变之外,假定劳动力和人口之间的比例为固定值,即保持在40%)。^[7]
- 假定基期,即1510—1514年间的资本存量具有12%的平均利润率(利息率),另外还有占比33%的GDP转化成资本,从而导出资本存量在基年的估计值;此外,我们再假定资本存量的年折旧率是2.5%;用GDP的占比表示投资,投资的结果就是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所以,资本存量在 $t+1$ 年的值等于资本存量在 t 年的资本存量值的97.5%再加上 t 年的总投资额)。

可能影响模拟结果的变量有:

245

- 每年用于投资的GDP的份额(此处的起点水平是5%);^[8]
- 希克斯的中性技术进步*,例如对所有要素的贡献影响是相同的,在起点时,我们认为没有技术进步;
- 每个劳动者的工作天数,对于荷兰来说,这个变量在1560年

[7] 这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和另外一个旨在重构荷兰在1500—1800年的国家统计数据的项目是相关的,参见<http://www.iisg.nl/nationalaccounts/>。

[8] 改变折旧率当然可行,折旧率现在是定在2.5%,通过改变投资比重的试验,我们发现不同的折旧率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似的影响。

* 希克斯(Hicks)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在劳动—资本比(L/K)不变的条件下,当技术发生了变化,而并没有使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替代率(dK/dL)发生变化,那么就定义为发生了中性技术进步。反映到生产函数上,如果技术进步属于希克斯中性。那么生产函数就由 $Y=F(K, L, t)$ 演变为这样的特殊形式: $Y=A(t)F(K, L)$ 。很显然, $A(t)$ 就是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产生的。希克斯中性表明,这种形式的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效率获得同步提高,即劳动的边际产量(dY/dL)和资本的边际产量(dY/dK)之比保持不变,而使产出得到增长,因此,称为“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译者注

之前是 200 天，以后逐渐增加，在新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和实际工资下降的影响下，到 1660 年工作天数变成 250 天（根据 Noordegraaf, 1985, 第 58—61 页；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第 616—617 页）。

这一模型能够阐明两个影响实际工资长期增长的原因：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如同这个模拟所显示的那样，再投资份额总体上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仅产生有限的影响，这种影响受到资本在 GDP 中的份额的限制：人均资本存量的加倍将会导致人均 GDP 增长至少 33%。更清晰地说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直接转化成了 GDP 和实际收入的同比例增加，因此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引致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这一模拟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欧洲国家在何时开始出现了持续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发生在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之后，还是在 1750 年前就开始了呢？例如，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的特点是“现代”生产力的提高吗？如同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1997）所一贯坚持的那样，抑或只是一种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所导致的经济增长？

246 第三个工具变量，即劳动投入和人口之间关系的改变，使得我们可以弥补实际工资的发展和人均 GDP 估计（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解释的那样）之间可能出现的差距。我们还尝试检验 Jan de Vries（1994）所提出的假设，即“勤勉革命”拉开了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序幕。他假定人均劳动投入出现极大的增长，由于男人、女人和儿童每年的工作的天数和时间都比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更长。

我们用下面的方法进行估计：将由模型模拟出的实际工资与 Allen（2001）所估计出来的实际工资相比较，或者更确切地说，与

二次多项式估计出的近来的实际工资的长期模型序列相比较。工具变量是被控制的，以便模拟的实际工资的发展几乎可以用估计的二次多项式加以识别，当然，在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刻画实际工资曲线自身的上下波动，因为许多不稳定的供需变化都会导致曲线有巨大的波动。图 27 显示了这一结果。

Allen 的序列显示，实际工资从 1500 年到 1570 年代中叶出现了下降，然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这一上升持续到大约 1710 年；在 18 世纪后半期，实际工资又开始下降。这一模型是使用了不同的投资比例和不同的技术进步率组合加以模拟的。这个模型很容易地能够“预测”实际工资在 16 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是下降的，当时的投资占 GDP 的份额保持在 5% 不变；人均资本存量和耕地的小幅下降解释了实际工资的下降。1570 年代之后，人口增长加速，但是实际工资也开始增长；这明显表明，在这些年份里经济发展出现了突破，这个突破被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分析为荷兰的“起飞”(take off)。在假定可耕地的增加比较缓慢时，我们可以说，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只能由物质资本的积累和 / 或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的提升的大量出现来解释。^[9] 导致了人口增加和实际工资增长的投资比例和生产率增长的不同组合是：12% 和 0%，10% 和 1%，7% 和 0.25%，以及 5% 和 0.35% (前面为投资比例，后面为生产率)。因为投资比例和技术进步率在这些年份里似乎经历了同时的增长，我们在这里选取一个出于范围中间的组合来进行模拟，即选取 7% 的投资比例和 0.25% 的生产力增长率。而且，这一模拟方法很难影响人均 GDP 的增长路

247

[9] 而且，劳动力可能比人口增长的更快，因为在这段时期，有大量的从荷兰南部和其他地区过来的移民 (参见 Gelderblom,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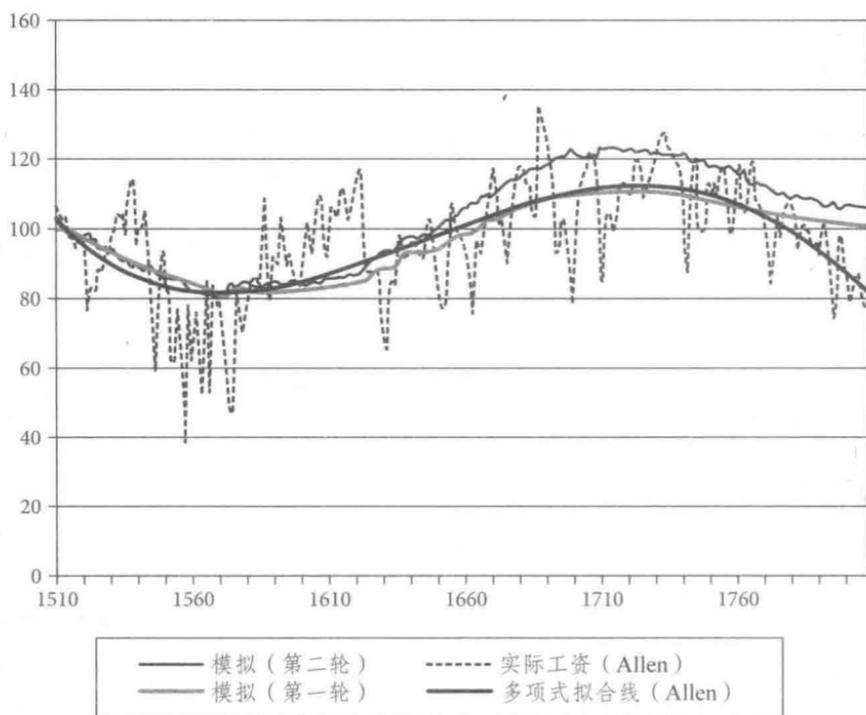


图 27 荷兰的实际工资：估计值和模拟值，1510—1805 年
（指数 1510/1514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径，因为工资收入占 GDP 的比例是固定的，而且劳动供给也假定是外生的，因此实际工资曲线直接决定了 GDP 的增长（见图 27）。

下一个转折点——这在文献中是经常被提及的——发生在 1660 年代和 1670 年代之间，当时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变得平缓，与此同时，快速的人口增长结束了，荷兰的人口甚至开始下降。如果假定技术进步停止了（在 1670 年），投资比率从 1670 年的 7% 下降到 1750 年的 4%，在此之后其一直保持不变，上述的这个趋势就可以被模拟出来。

下一个步骤使得我们可以从模拟中得出对 GDP（总的和人均）的发展的估计。图 28 显示了对荷兰的人均 GDP 发展的模拟估计以及 Van Zanden（2001a）数据库中给出的点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加以比较。根据“第一轮”的模拟，我们可以看到，人均 GDP 在 1510—1805 年间仅仅增长了大约 30%，这一结果低于通过基准估计而得出的 50% 的结果。人均 GDP 的长期发展显示了同样的模式。而且，这个模拟也“预计”了人均 GDP 在 16 世纪所出现的下降（和点估计的停滞相比），也“预计”了随之而来的黄金时期（1580—1670 年），这一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当然，这一“预计”比点估计所显示的更加急剧。

点估计和模拟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控制另外一个工具变量来弥补，即每年的工作天数。这个工具变量会尝试同时表示劳动力的量变和质变。从定量的角度看，通过延长工作周数人均的工作时间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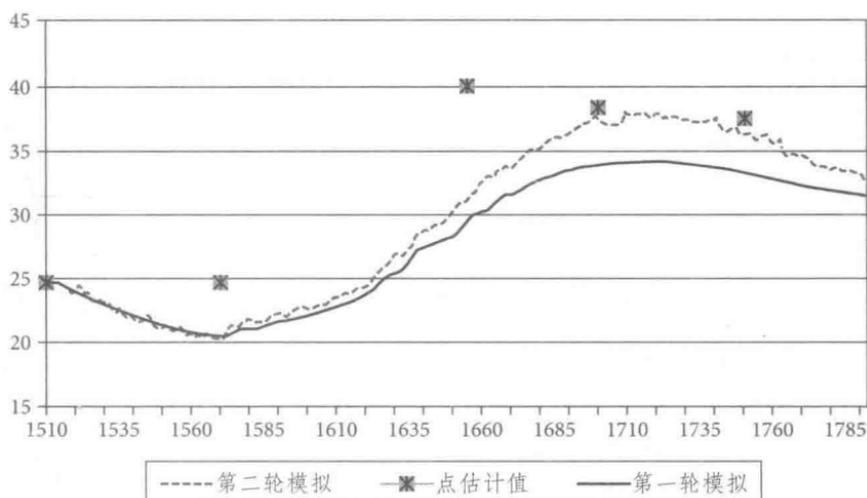


图 28 荷兰的人均 GDP: 点估计值和模拟值, 1510—1805 年 (1510/1519 年的莱茵盾)

资料来源: 参见正文。

量有了实际的增加，例如，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后出现的对节假日的废除，或者按照 De Vries（1994）所说，增加儿童和妇女的劳动贡献率。事实上，模拟的人均 GDP 好像比我们预期的增长要慢一些，而我们的这个预期是以这段时期的实际工资发展为基础的，上述的这一事实可以被认为是肯定了我们的假说。

249 然而，质变也必须考虑进去。劳动力的平均质量在现代早期肯定是增加了；例如，从事服务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份额从 1510—1514 年的 22% 上升到 1807—1808 年的 42%，而且增长的大部分都由收入很好的、具有较高技能的人员构成，这些人包括专业人员、商人和政府雇员。支付给这些专业人员的工资也可能相对上升了（Van Zanden，1995）。在工业部门中，技术工人的所占份额可能也上升了，反之，主要使用非熟练工人的部门（渔业、挖煤业和农业）的规模却相对下降了。劳动力构成上的这些改变是为什么以建筑工人的工资为基础的实际工资指数不能完全可靠地代表工资收入长期发展变化的原因之一。比较理想的是，我们最好有一个对劳动力从业的所有部门的加权的平均工资。假设劳动力的平均质量增加大约 20%—30%（当然这个可能仍然是低估了的），将会导致这两条曲线（模拟的人均 GDP 曲线和人均 GDP 的点估计线）更加接近。

这个模型的另外一个局限性是它假定了一个封闭的经济，而荷兰很明显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在 16 世纪初期，大部分的食物供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谷物，而且，在此后的 150 年间还有较大的增长。从波罗的海进口的物品数量是很好地表示这些改变的指数：这些数量从 10000 拉（last）迅速上升（大约相当于 2 吨），* 约占 16

* 拉 [英国重量及容量单位，约 4000 磅]。a last of wool 1 拉羊毛（= 4368 磅）。a last of corn 1 拉麦（= 80 蒲式耳）。——译者注

世纪的头十年总的谷物供给量的 25%，从 1610—1650 年，这一数量变为 50000 拉，或者超过总供给量的 70%——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重新出口（Van Tielhof，2002）。作为对这些土地密集型进口品的回报，荷兰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西欧在现代早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一事实——荷兰和后来的英国获得了很多来自于海外殖民地的“幽灵土地”（ghost acreages）（参见 Pomeranz 在 2000 年的讨论，但是 Vries 在 2001 年对这些看法提出了批判性的评论），尽管事实是食物主要从波罗的海进口。此处展示的模拟提供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通过观察实际租金的现实发展和模拟的租金变动之间的差距，来量化这些“幽灵土地”的重要性，实际租金会受到国际贸易流的影响，模拟的租金变动数值来自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定经济体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是，模拟的租金比实际的租金增加很多（见图 29）；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实际租金将会在 1500—1700 年间增加大约 250%，但是实际上只大约增加了 50%。18 世纪人口下降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减少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在 1800 年左右，尼德兰作为整体已经几乎再次变为自给自足，但是荷兰仍然是一个谷物的纯进口者。

250

为了能确定这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使用重新估计的土地投入序列来进行第二次模拟，在这个过程中“幽灵土地”以实际租金和从第一次模拟中得出的模拟租金的差距为基础做了切实的估计；换句话说，一个新的土地投入序列被以这样以一种方式重新做了估计，即 1500—1800 年间的租金的实际发展符合模型模拟的租金水平。这导致了以新的、较大面积的土地投入为基础的对 GDP 和实际工资的第二轮模拟。在图 27 和图 28 中的第二轮模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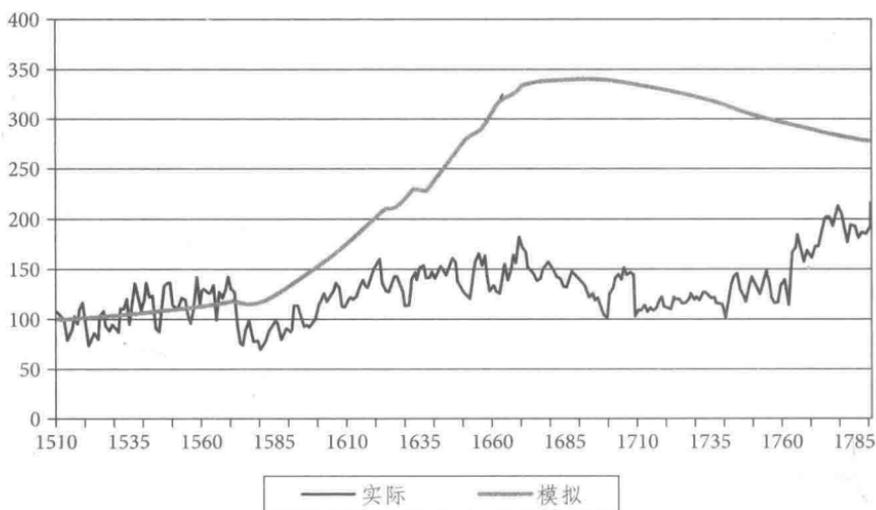


图 29 荷兰在 1510—1514 到 1800 年间的实际租金：实际发生值（开放型经济）和模拟值（封闭型经济）（指数 1510/1514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我们可以看到，“幽灵土地”在最高峰的时候对人均 GDP 的影响大约为 10%。

一言以蔽之，当我们假定从 1580—1670 年间，荷兰经济拥有大致固定的生产率增长（每年为 0.25%），而且 1580—1670 年间的投资比之前和之后的都大时，这个模型可以复制荷兰经济的长期发展，也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在 1590 年代—1660 年代之间的著名转折点。为了能够得到符合我们在上一章讨论的对 GDP 的基准估计以及 Allen 的实际工资系列的人均 GDP 增长，我们需要假定人均的劳动投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比我们在此处假定的 25% 还要高出很多（每年的工作日从 200 天增加到 250 天）。劳动力质量的改变以及工作日的大幅增加可能解释了这个差异。这个模型在具体表现荷兰经济的开放性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实际租金不能被正确地模

拟，但是这个实验也部分地提供了“幽灵土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方面的深刻洞见。我们得出结论，他们的影响最多也就是 GDP 的 10%。

英国，1500—1800 年

我们对英国的数据进行了同样的模拟。很显然，不同要素投入对 GDP 的贡献与荷兰不一样。我们估计的结果是：土地对 GDP 的贡献为 20%，资本对 GDP 的贡献为 30%，劳动对 GDP 的贡献则为 50%。^[10] 我们再次以 Allen 给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系列作为起始点。人口的估计值由 Wrigley et al (1997) 提供，我们假定可耕地的增长速度是每个世纪大约增长 10% (Campbell and Overton, 1996)，我们假定 30% 的 GDP 转化成资本，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为 12%，据此，我们得到 1500 年的资本存量。

图 30 显示了模拟数值与实际工资的序列估计的契合程度，实际工资序列来源于下述的工具变量控制方法：在 16 世纪的投资比例我们设定为 4.5%，而且假定没有技术进步。这种控制方法导致了实际工资的缓慢下降，因为人均资本存量，特别是人均土地供给下降了。在 1590 年代，实际工资开始朝好的方面发展：实际工资的下降结束了，但人口的增加还在继续，这个组合与之前的工具变量的值不一致。如同荷兰一样，投资比率增加和生产力增长的不同联合可以产生在 1600—1610 年左右出现的模式。在此处展示的模拟

252

[10] 土地的份额数据来自于 Clark (2002)，基于 King 给出的国民收入结构做出的粗略估计，这一估计被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做了重新修正：假定每年的工作日为 250 天，参加率为 40%，非技术劳动的工资率为 14 盾，正如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所估计的那样，工资总额占全部国民总收入的 50%。

中，我们实验了不同的变量，这些变量可以从18世纪后半期的增长的会计研究中得出，这个研究显示：1) 人均资本存量大略保持着一致性；2)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每年0.25%—0.30%（总体情况请参见 Crafts, 2004）。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我们假定同样的变量——从1590年以来的投资比率为6.5%，从1615年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以0.25%的速度持续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几乎完美的对于17和18世纪的实际工资增长路径的模拟。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变量在这段时间后期也没有发生变化，就会产生1600年代早期的转折点，模拟的实际工资从1610年到1750年代增长了大约50%，在18世纪后半期，实际工资趋于稳定，其时人口增长已经再次加速。1750年之后，Allen给出的数据系列变得很令人沮丧；为了得到同样的结果，我们必须假定投资比率的下降或技术进步的持续下降。Feinstein更加全面的数据系列显示，1750—1800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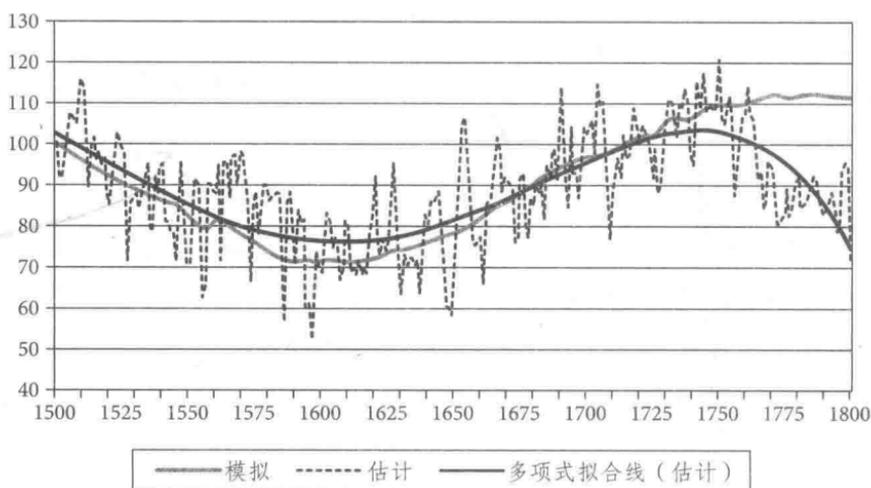


图 30 英国：实际工资和模拟以及预计的工资，1500—1800 年
（指数 1500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实际工资趋于稳定，与我们在此处得出的模拟结果相似（Feinstein, 1998）。

这两个变量——1600 年左右投资比率的上升和从 1615 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每年 0.25% 的增长——使得我们可以对实际工资的发展变化做出模拟（图 30）。为了获得与可得的点估计值相一致的人均 GDP 的增长数据，我们需要假定人均劳动的投入是急速增加的。假定工作日从 1500 年的 200 天直线上升到 1800 年的 350 天，我们进行模拟，图 31 显示了部分模拟结果。^[11] 必须再次指出的是，这一增加具有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内容。英国似乎是 Jan de Vries 所言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核心地区。在这一地区，由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投入迅速增加（除了其他方面），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比总人口的增加速度还要快。结果就是 19 世纪早期英国的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率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英国大概是 45%，荷兰是 41%，美国是 35%）。这也再次证实了这一发现：儿童和妇女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比在欧洲大多数的其他国家工业化中都要大的作用（Humphries and Horrell, 1995）。^[12] 当然，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的比重从 1500 年的 70%，降到 1700 年的 55%，1800 年又下降到 35%（Allen, 2000）。应该与我们所讨论的荷兰的情况一样，这一结构上的变化对劳动力的质量产生相似的影响。

[11] 这个假设对实际工资的模型有一定影响；我们在上一段中所讨论的工具变量的发展（1590 年之后投资比率不断增长，从 4.5% 上升到 6.5%，1615 年之后生产率以 0.25% 的速度持续增长）是源自同样的模拟条件，即假定工作日从 200 天增加到 350 天。如果这个假定不成立，而倾向于假定工作日从 200 天增加到 250 天，在这种假定下，若要得到正确的实际工资增长，我们需要设定 6% 的投资率和每年 0.2% 的生产率的增长（从 1590 年代以来）。

[12] 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在 17 和 18 世纪的大幅度增长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 18 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文化水平出现了停滞，与英格兰的人均 GDP 的基础相比，英格兰当时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参见 Crafts, 1985, 第 61—64 页）。

这些模拟数据显示，如果实际工资是宏观经济表现的可靠的指引，那么英国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就不是发生在 18 世纪，而是发生在 1590 年代—1620 年代的某一个时间点，其时，它基本上从一个没有技术进步的曲线，变化为一个高投资水平和生产率以大致固定的比率不断增加的曲线。这一进步与荷兰经济“起飞”发生在同样的年份，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主要的不同点是英国经济的生产率持续增长到 18 世纪，甚至超出了 18 世纪，而荷兰在 1670 年之后生产率增长就停止了，只有到了 1820 年才再次开始。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在 18 世纪并没有加速，这个发现与 Crafts（1985，第 81 页）的发现一致。18 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好像是从 17 世纪上半叶开始的经济增长趋势的延续。

除了图 31 之外，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对 1500—1800 年间的 GDP 增长的模拟，这是为了理解增长的另外一个努力，这次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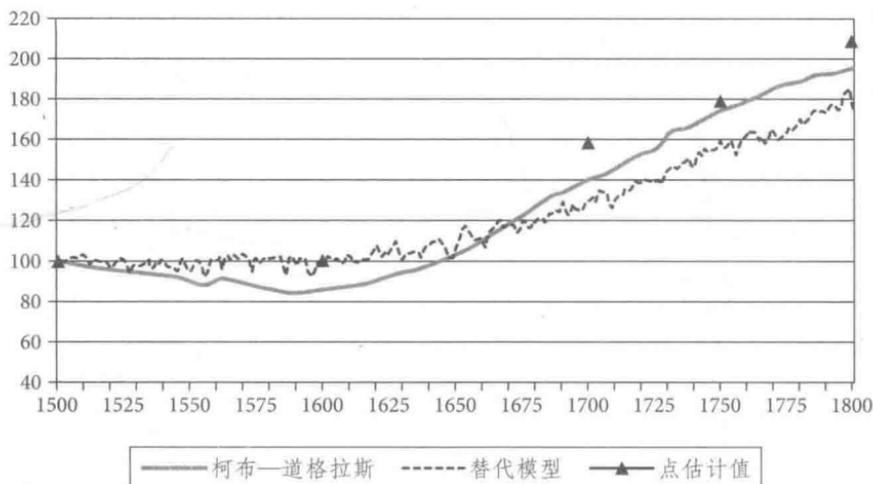


图 31 英国的人均 GDP：点估计值和模拟值，1500—1800 年
(指数 1500 年=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用实际工资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程度作为独立的自变量而做了回归模型（Van Zanden，2005b 中描述的）。这个替代模型的结果显示现代经济增长很早就出现在英国——大约在 1610—1630 年间的某段时间。

同样清楚的是，从上述的长期观点来看，英国经济毫无疑问地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并一直领先到 1800 年，尽管在 1800 年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还可以参考 Wrigley，2000）。²⁵⁵ 具有嘲讽意义的是，提供经典的工业革命——从一个停滞的农业社会到一个有活力的工业经济的决定性突变——范例的国家，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其经济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似乎不是一个偶然，如同 Crafts 曾经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Crafts，1977），而是对前一个世纪英国经济出乎意料的充满活力的发展的合理延续。

英国是否也从“幽灵土地”中获益？图 32 比较了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拟得出的实际租金序列值和 Clark（2002）所提供的序列估计值。从长期来看，这两个序列显示了相似的增长率。在 1550—1650 年间，真实世界的实际租金增加超过了模型的预测值，而这个差异在 1650—1750 年间消失了，当时，虽然有农业保护主义（第一个谷物法可以追溯到 1689 年），*但实际租金的增长低于预期。直到 18 世纪中期，英国一直都是一个农产品的出口国，但这些出口相对于荷兰的供给或者需求来说都是很小的一部分（Ormrod，2003，第 207 页及以下页）。这种情况在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改变，²⁵⁶

* 一般而言，谷物法指英国 1815 年制订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实施该法后，谷物价格骤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外国也提高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1846 年，该法被废除。——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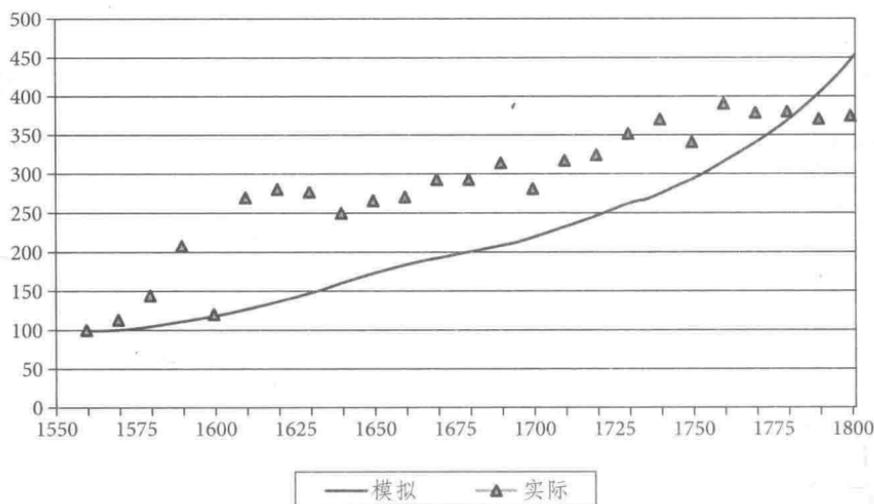


图 32 英国的土地租金：实际发生值（开放的经济）和模拟值（封闭的经济），1550/1559—1790/1799 年（以固定价格计算，1550/1559 年=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当时荷兰变成了一个大的谷物净进口国（从波罗的海进口）和一个大的殖民地产品——例如从殖民地来的糖和茶——进口国。而且在 1780 年之后，还大量进口来自美国的棉花。这些发展都准确地在模拟和实际租金的比例中显示了出来，因为后者在 18 世纪中期之后比前者增长得缓慢。因此，这个对比增加了此处发明的方法的可信度。

从 18 世纪中期——当时的农业贸易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到 1800 年，模拟租金和实际租金的比率提高了大约近 40%，这个可看成是英国从“幽灵土地”（可以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获利多少的一个指数。农业在 GDP 中的所占份额在 1800 年只有 26%（Crafts, 1985, 第 17 页），土地占 GDP 的份额不会超过总额（10%—13%）的一半，因此，通过这种方式缓解土地的制约而

导致的额外 GDP 肯定少于 4.5%。当然，正如荷兰的例子一样，这是一个上限的估计，这是假定存在国际贸易的一个结果，是假定这些国家获得了额外的土地作为“免费的午餐”的结果。因为，我们只是简单地将“幽灵土地”作为投入加入了生产函数（或者说，事实上我们只是对增大了的土地要素投入进行了模拟，这一方式使得模拟的租金下落到实际租金水平）。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额外的土地的使用是通过出卖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到土地丰富的国家和殖民地而换来的。^[13]生产这些产品需要一些土地（只是要供养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这些产品是用以交换食物和原材料，而原材料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幽灵土地”进口的。结果就是，从这些进口中获得的净收益比到目前所展示的估计值要低很多。

结论：早期现代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到目前为止，本章已经介绍了一系列关于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一些欧洲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的最新研究，并试图确定这些估计是否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实际工资、人口、劳动投入、土地投入和实际租金的变化证据（更加详细）是否一致，假定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我们的总的结论是，这些假定确实与我们的这些证据相符，虽然在一些例子中，我们必须假设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人均数量方面都有实质性的增加，以便与实际工资

[13] 而且，如同 Vries (2001) 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农业进口不是来自海外的殖民地，而是来时爱尔兰、尼德兰、普鲁士和俄国，因此应该说进口不是凭借有获得某些原材料和食物的特权完成的，而是（多多少少）“自由的”商业交换的结果。

序列数据和 GDP 估计值相一致。^[14]

在附录 1 中，我们讲述了更多的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模拟的实验，也得出了 1300—1800 年间意大利的人均 GDP（与 Malanima 估计一致），英国在 1300—1500 年间的人均 GDP，以及欧洲在 100—1800 年间的人均 GDP 的粗略估计。这些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的实验的结果在图 33 和表 11 中进行了总结。^[15] 在图 33 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意大利和英格兰的长期对比曲线。从比较中，我们看到，1550 年前，意大利的收入水平高于欧洲其他部分很多，即使到了 1600 年左右，意大利仍然比英格兰富有很多。英国在 17 世纪上半期经历了向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转变，而欧洲的其他部分，除了荷兰之外都陷入了停滞。

从实验结果看，我们能够识别出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在黑死病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意大利和英格兰都发生了这种情况。英国 1610 年代之后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情况（在 1615—1800 年间发展速度没有变化），荷兰在 1590 年代—1670 年代之间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情况。^[16] 欧洲的其他部分在 1500—1800 年间人均 GDP 没有提高；事实上，收入水平也仅

[14] 根据 Maddison (2001) 所发表的估计值进行估计，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么也肯定是更加困难的，因为 Maddison 的估计总体上都显示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例如，对于欧洲整体来说，Maddison 估计从 1500 至 1820 年间的人均 GDP 增长了 56%，这个估计与同一时期的实际工资的下降趋势不相一致（我的更加适当的 10%—25% 的增长率的估计可能还在实际工资数据相符的范围内）。同样，如果采用 Maddison 的假设，在同一时期，荷兰（尼德兰）的收入水平增加了 140%（而我的估计是 50%）；特别是在 1500—1600 年间，人均 GDP 的增长接近 2 倍，这很难与那一世纪的实际工资（以及接近稳定的实际租金）的下降趋势相符。

[15] 我以意大利和英国的平均工资为基础，增加了对于欧洲作为整体在 1300—1500 年间的猜测估计（参见附录 1）。

[16] 一种相似的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发生在 1350—1450 年间的荷兰，参见 Van Bavel and Van Zanden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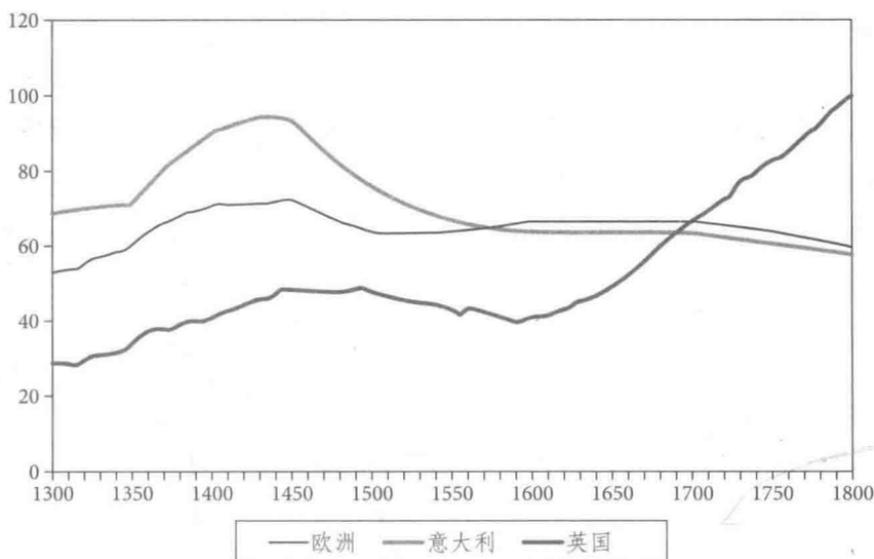


图 33 模拟的人均 GDP：欧洲、意大利和英国，1300—1800 年
(英国 1800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表 11 欧洲 1300—1800 年间 GDP 和人均 GDP 的增长的预计
(平均年增长率)

	1300—1350	1350—1450	1450—1600	1600—1700	1700—1800
意大利 GDP	0.07	0.06	0.01	0.00	0.23
意大利人均 GDP	0.09	0.27	0.25	0.01	0.09
英国 GDP	0.25	0.20	0.29	0.71	0.91
英国人均 GDP	0.37	0.34	0.11	0.49	0.41
欧洲 GDP	0.04	0.14	0.14	0.09	0.28
欧洲人均 GDP	0.27	0.18	0.06	0.00	0.1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仅是因为人均劳动投入的增加在勉强维持着。

258

这个模拟实验也证明了“幽灵土地”对环北海的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于英国来说，在 1750 年之前它是一个农产品的

净出口国家，所以“幽灵土地”不是增长的重要源泉。只有在1750年之后，农产品（食物和棉花）的进口才减轻了其所受的土地的限制，但是对整体GDP的影响也不大，仅有几个百分点而已。对于荷兰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国际贸易，特别是从波罗的海进口的食物和建筑材料对于其发展来说是必需的。对荷兰的例子来说，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在17世纪的后半期，在此地区的经济出现顶峰时，“幽灵土地”对GDP水平的增长的贡献可能达到了10%，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模拟。实际上，这一影响非常有限，因为在我们的方法中（即在此处我们所用的模型），这些额外的进口都被认为是“免费的午餐”，但是荷兰（和英国）必须为完成这些进口而出口服务以及殖民地所需要的商品和工业产品。因此，“幽灵土地”在经济发展中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对比中最突出的是北海地区（荷兰和英格兰）和欧洲其他部分的鲜明对比。英国持续强劲的表现可能是最显著的成果，但是同样地，欧洲其他部分的停滞也需要作出解释。从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视角看，为什么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在1500—1800年间不能系统地改善他们的制度、技术和要素投入的质量？为什么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激励（如同它在中世纪出现一样）没有产生一个系统的对更有效的方法的探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探索的成就是如此之微薄呢？或者这样一个模型正常吗，还是像其他处于高度发达的前工业社会，例如中国、印度或现代初期的奥斯曼帝国那样陷入了“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这个“正常”的模型被称之为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参见 Bin Wong, 1997）。它的特点是人口和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被市场的扩大以及相关的专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推动，但是没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有质量的飞跃，这种增

长和飞跃出现在黑死病之后的欧洲部分地区和 17 和 18 世纪时的北海地区。换言之，斯密型增长，通常在 1800 年前的发达的（城市化的，面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出现，斯密型增长可能也在印度和中国出现过，正如它曾经出现在西欧一样，斯密型增长只是让生产沿着生产可能性曲线而移动。而曲线本身的移动，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加看起来是非常特殊的，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出现。我们仅仅看到，在 1350—1450 年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是人口下降所引致的，人口下降的外部冲击导致了相对价格的迅速变化，相对价格的迅速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新（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例如印刷机，但是这一结果不是事先确定的。这个情况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讨论过了，在那一章我们对比了西欧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发展历程。而且，更为显著的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外推式的发展也出现在 17 和 18 世纪的北海地区，此阶段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

第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欧洲国家在 1450 年后的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不论在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在人均 GDP 方面都出现了停滞？部分答案是实际工资从长期来看正在下降，因此发展节省劳动的技术装置的现实激励不存在了。但是为什么实际工资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中都出现了下降，而在北海地区却保持了平稳状态呢。在第二部分，我们在微观层面上指出了他们的不同发展历程：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在北欧的出现是发展新的策略来应对新出现的市场环境的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些新策略包括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自身可能有助于解释差异出现的部分原因：简单说来，可能在北海地区的逐渐有文化的劳动者比欧洲其他部分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更有生产力，因此赚取的实际工资更高。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更加完全的面向市场，依靠市场的经

济是北海地区区别于欧洲其他部分的显著特征：这个区域的特点是有规模较大的超过人口 30%—60% 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对市场的高度依赖，^[17] 以及发展良好的资本市场。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市场的发展程度很低，也很薄弱，这些地区的市场制度与环北海国家相比，效率明显很低（参加第一章和第五章）。而且，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当市场利用率越高，它就会变得越可靠，而活跃度不高的市场则更容易形成地方垄断，更容易被国家和其他扭曲的因素所操控。因此，欧洲其他部分的经济停滞可能还与家庭不愿意参与市场有关，因为这一市场并没有为发展新的节省劳动的技术提供激励。

西欧其他部分的实际工资的下降还对需求的水平和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部门是实现生产率快速发展的部门。生活水平下降意味着大部分的预算被用在了农产品和基本的食物方面，但这些产品的供给受到了土地短缺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有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相对价格的改变——农产品价格显示了强烈的上涨趋势，而工业（和来自殖民地的）产品价格则相对下降（Van Zanden, 1999）——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对于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吸引力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下降的，但是由于家庭为了生存而把大部分的预算都花在了食物上，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也只能被取消了。实际工资的下降还限制了结构转型，例如，非农产业活动雇佣的增加。欧洲其他部分因此被锁定在了农业，而农业的生产率增长非常缓慢。而且，即便是出现了生产率增长也主要是由于单位土地上使用劳动数量的增加。在研究印尼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文献中，这一过程

[17] 这是一个本书不得不忽略的一个主题，但是可以参见 De Vries（1974）的关于荷兰的农业市场导向的研究；但是最近的研究指明，向市场进行转变的时间要比 De Vries 所提出的早一些（Van Bavel and Van Zanden, 2004）。

被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 (Geertz, 1963; Huang, 1990)。我们在西欧大部分地方也发现了这个线索,从意大利北部,在那里以单一的玉米/玉米粥(maize/polenta)为基础的乡村经济出现在波河河谷(Po Valley)**,到爱尔兰,在那儿,土豆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在19世纪中期的数十年中,工业化冲击了原始工业活动(proto-industrial activities),使得大量从事原始工业活动的人员失业,这一因素再加上农业的歉收,这些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这个危机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受到工业化的外部冲击的结果。在西欧的部分地区,实际工资的下降导致了一个和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似的经济道路(参见 Allen et al., 2005, 对亚洲和欧洲的工资水平的对比)。在欧洲,对于那些“人口过剩”地区的长期解决方法通常就是向美洲移民,通过移民来减缓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且移民进程在1840年代的危机之后进一步加速(Williamson and O'Rourke, 1999);而在中国和印度,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选择这样做。

1450年之后经济出现停滞的另外一个解释更加富有推测性:在 262
充满活力的中世纪之后是否有一个制度的“后冲”(backlash)?大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例如西班牙和法国确实压制了在中世纪发展良好的城市的“特权”(privileges)。有好几个指标都显示,这些大型

* 内卷化(又称过密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译者注

** 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一条河流。位于意大利北部,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地区,向东在威尼斯附近注入亚得里亚海,全长652公里,流域面积71000平方公里。横贯国境北部,冲积成波河平原。流经都灵、皮亚琴察等城市。波河平原是意大利的主要农业区,也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地带。——译者注

国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在第七章中，我们讨论了 De Long and Shleifer (1993) 的看法，他们通过对城市发展的测量，指出专制主义国家确实限制了经济增长。我们还证明了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他们需要为公债支付很高的利率。与之相似的是，只是在欧洲的新教地区才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通过书籍产量来加以测量）在现代早期持续迅速扩大的情况；这就暗示了，天主教对人力资本形成有负面的影响（第三章）。路德教和天主教的关于婚姻和家庭建构的政策没能进一步普及更加民主的欧洲婚姻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中世纪末期曾经一度繁荣（第四章）。

这些对于中世纪中期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制度在现代早期变得不那么“进步”了。城市发展成了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有时候（例如在托斯卡纳和佛兰德斯）以压制经济转变的方式控制了他们的现金（*contado*）。城市化早期的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充满活力的互动为特点的情况变成了一种以城市对乡村的统治为基础的单向关系。城市中的精英人士试图尽可能大地开发乡村资产，因此令人沉闷的经济转变过程，可能以牺牲城市的利益为代价（Epstein, 1991; Van Bavel, 2003）。最后，我们可以认为，行会——中世纪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的一项资产——为交换而创造的稳定和灵活的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变成了一个负债，特别是当它们成为旨在重新分配而不是增长的大型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之后（参见 Ogilvie, 2007）。总之，现代早期的制度发展的道路，在其转向专制主义和父权制之后，已经和中世纪的民主遗产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将西欧的大部分带入了相似的制度中，这些制度曾经在欧亚的其他地区非常典型。

只有环北海地区的国家逃脱了这种命运。但是，这主要归因于他们自己的“反叛”（*mutinies*），不论是在国家的层面（第七章）还

是在家庭的层面（第四章），都出现了这种“反叛”。在16世纪和17世纪转换之际，一个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开始在英国出现，并且毫无征兆地“泛滥”（overflowed）成18世纪的工业革命。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而带来的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开始于17世纪的北海地区，更加明确地说，开始于英国。在英格兰这个过程贯穿了18世纪，而在荷兰却停止了。在荷兰，经济突发式增长伴随着商业国家的出现，这绝非偶然现象，商业国家强硬地在边界内外保护其商人的利益，一般是利用其武力保护其商业精英的利益。一个相似的国家转型在17世纪的英国发生——其中内战时期是转变最为激进的一段时期——并结束于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是以商业和国家的“联姻”而结束的（O'Brien，2001）。

正如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1997）对荷兰经济的研究和Wrigley（1967）对17世纪英格兰经济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经济的结构转型——非农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是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以当地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廉价资本和技术的充裕供给为基础的出口工业的出现，在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出现之前的数个世纪里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国家的重要贡献就是宣示使用其武力增加其在国际贸易和运输中的份额——在荷兰的案例中，其最初是作为反抗西班牙武力的斗争的一部分（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的主要目标就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帝国进行最大的伤害）。就英国来说，讽刺的是它是为了跟荷兰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个过程（航海法案 [Navigation Acts] 就是证明）。有效的制度、熟练（非熟练）劳动者的充分供给、廉价的资本以及商业国家，这些因素一起导致了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繁荣，而这又促进了城市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出口工业，总体上推动了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进程。这些产业中每个工人的劳动附加值比农业中高出很多，而且，快速增长的城市所带来的逐渐增加的需求刺激了这些部门的生产力提高，这样就更加促进了经济增长（De Vries, 1974; Grantham, 1999）。

此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而是开始于更早的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即使我们从对英国人均 GDP 发展的粗略观察也使得这个观点变得非常明显，英格兰经济在 17 世纪前半期开始，在此之后一直在持续。当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个动力过程的根本原因的时候更加确定了。Bob Allen（2004）建议用一个新的方式解释工业革命。推动这个过程的机制是替代（substitution）：英国在 18 世纪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工资经济体，至少从国际的标准来看，这就促进了对节省劳力的新技术的探寻（还可以参考 Broadberry and Gupta, 2005）。这个过程非常容易，因为能源和资本品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很容易得到煤，技能溢价和利率都较低。因此新技术在纺织业、矿业、炼铁工业以及一般用途的技术，例如蒸汽机，都被发明了，这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使用大量的能源和资本。因此，工业革命发生在一个已经是“高工资的经济体”的社会里，而且，出现在那里的新技术可以维持其持续发展的道路。^[18]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工业革命是一个在 17 世纪前半期就出现的趋势的继续。就经济增长率而言，1760 或者 1780 年之后的这

[18] 工业革命的不同是因为它启动了一个累积的和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而在 17 和 18 世纪的增长，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将会逐渐消失，这种论断只是部分正确。过程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工业革命本身，因为工业革命包含了一系列相关的技术——蒸汽机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相关技术的长期影响可能不是无限的，从长期来看增长也可能急剧消失，如果没有被出现在 1880 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所取代的话。

段时期经济并没有出现较之 1630—1760 年间的增长记录的彻底突破。其中可能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引起增长的潜在原因不同：在 1760 年后的这段时期，工业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关于 1760 年前的知识来判断它的部门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其构成。^[19] 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和熊彼特型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是由专业化过程推动而后者的基础是技术创新，这两者在此处可能是相关的，可能进一步的研究会证明在 18 世纪后半期经济增长转向了熊彼特型增长。两个过程都会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强劲增长，然而，模拟显示英格兰和荷兰的人均 GDP 的增长如果不假定有一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很难解释。

然而，在其中某一方面，工业革命非常不同。新技术变得非常有效以至于在经过一段时滞（time lag）之后，新技术在大不列颠群岛之外还能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当然在此之前只有英国的生产者拥有了符合新技术要求的正确的要素成本以及拥有了能获得收益的禀赋，即能利用新技术获益。大约 1800 年之后，新技术开始蔓延到英国的边界之外，到了比利时、瑞士、美国、法国、德国和荷兰。而荷兰黄金时期的 17 世纪，对西欧其他部分只产生了很有限的推动力，而且，在荷兰发展起来的新的节省劳力的技术对其他地方的生产力只有微小影响，例如，模仿风车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因为这是和特定区域荷兰的地理环境条件相关，而蒸汽机，一旦其燃油的效率超过了特定的门槛，它将胜利地进军全球。工业革命的不同之处是它很快就扩展到了西欧的最遥远角落，甚至更远。这可能是

[19] 一群研究者（Stephen Broadberry, Bas van Leeuwen, Bruce Campbell, Mark Overton and myself）最近开始对荷兰和英国在 1850 年前的几个世纪的长期经济增长记录进行一项新研究，这一研究有望为此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

1815年后欧洲其他部分增长进程的扩展，这也有助于解释在1820年代—1830年代发生在英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的加速。

266 因此，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而是开始于17世纪上半叶北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的转型，尽管带有迅速和根本的特点。这个，正如Allen（2004）指出的那样，是以高水平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和有弹性的低价格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供给为特点的增长曲线的延续，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选择新的节省劳力技术、选择新的使用资本和能源的技术变得更加合理。在这个过程中，幽灵土地只是起到了很有限的作用。这一解释很明显和Pomeranz对工业革命的原因的分析不相一致，但更加接近于传统观点的解释，即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中世纪（后期）以来长期转型的结果。

第五部分

两次大分流

本书开始于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当时欧洲是世界经济体中相对落后的地方。欧洲很明显落后于其他文明中心，例如中东，伴随着伊斯兰教及其对该区域的快速统治，使得该地区出现了新一波的经济繁荣。在中国，宋朝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毋庸置疑，八百年之后的西欧已经变成世界经济体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但是它比中国和日本更加繁荣吗？“大分流”只是发生在1800年后吗？欧洲经济超过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确切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到目前为止，在本书中，我们都是在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去研究制度、人力资本构成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第一章中，我们分析了制度有效性的各种衡量方法，此方法使我们可以识别欧亚范围内各种特定的模式：西欧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拥有一系列相对有效的制度，而南亚和东南亚的制度则相对效率较低（例如，这些地方的利率水平很高，而市场融合的水平较低）。然而，到

了17和18世纪之间，日本和（南部）中国在市场融合水平的某些方面已经赶上了西欧，他们的表现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欧。在对两种人力资本构成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在第五章中，我们通过分析全球的技能溢价模式发现，能够测量人力资本供给效率的技能溢价水平从中世纪后期以来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水平都已经相当低。另一方面，南亚和东南亚的技能溢价的水平很高，但是在中国南部，技能溢价跟西欧的水平一样低（中国北方不是这种情况），而且日本的水平也可能在下降。在第六章中，我们通过分析书籍产量，也发现了相似的模式：西欧的书籍产量非常高而且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在北海地区）。与之相似的情况是，中国的明清后期，以及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的书籍产业也经历了富有活力的发展。但是人均书籍的消费量可能比更加发达的西欧要低。在南亚和东南亚，几乎没有书籍的生产和消费。总结这些证据，我们可以说，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已经明显领先于另外两个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市场导向型的并且非常有活力的两个地区，即中国南部和日本，尽管这两个地区可以发展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但是在某些方面，例如家庭参加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日本和中国南部继续落后于北海地区，这是由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使得当地的经济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更加具有市场导向。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制度和社会政治构成与西欧有很大差异，这两个国家自身能够发展出一套制度体系，能够让市场交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能够让人力资本形成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将会在本章结束的时候继续回到这一观点。

首先，我们会关注不同的制度体系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西欧的经济表现和其他两个地区——中国和中东——的经济做一个比较吗？这两个地区在第一个千年结束时的经济水平

显然高于“西方”。如果确实如此，那西欧是在什么时候超越这两个地区的。当然一些最近的著作显示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很有限。

西欧之外的长期经济增长：阿拉伯世界

我们有几个表示阿拉伯世界长期发展的指数，可以帮助我们将其表现和西欧做一个对比。阿拉伯世界的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改变。随着伊斯兰教在 8 和 9 世纪的广泛传播，伊斯兰经济制度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Cordoba）一直延伸到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由伊斯兰统治阶级主导的巨大贸易区，虽然还有大量的基督教、波斯教和犹太教等统治的少数地区。中东地区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泛伊斯兰教贸易区（pan-Islamic trading zone）和新引入的伊斯兰制度的结果，抑或还是城市化的古老传统和发展的结果，这仍然有待讨论。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pre-Islamic）（而且经常是基督教诞生以前的 [pre-Christian]）制度的延续性在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地区都非常强，地中海东部盆地可能提供了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制度的延续性的最好事例，古典时代的制度传统指的是希腊和罗马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甚至是更古老的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发现的制度和传统。前古罗马帝国的这个部分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公元前 5 世纪经历了政治制度的衰败和经济改变。

271

很明显，拜占庭（Byzantium）是这种延续性的最好例子。在第八章中，我们看到根据 Milanovic（2006）的估算，拜占庭的人均 GDP 在世纪交接的时候比西欧高出 20%。这个估算可以和 Sevket Pamuk 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在 1500—1820 年间的人均

GDP 做出的估算相比较（图 34）。^[1] 1500 年时，奥斯曼帝国与西欧的差异已经很明显：奥斯曼帝国的人均 GDP 大约是西欧的 60%。这一差距在 1500—1800 年间继续扩大，但是这个差距没有特别严重，因为奥斯曼帝国像西欧大部分国家一样都处于停滞状态（图 34）。在 1820 年，这个差距增加了大约 5 个百分点，上升至 45%，这个差异仅仅是因为北海周边的经济的扩张。虽然不可能对这两个估算值做一个确切的对比，因为 Milanovic 对拜占庭的估算只占了中东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一对比不能证明在 1000—1500 年间西方的人均 GDP 高于中东。

272 但是如果更加准确的数据，我们可能会确认这个观点。在最近的研究中，Borsch（2005）证明，西欧（例如英格兰）和中东（例如埃及）对 1347—1348 年间的黑死病导致的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同。西欧的反应是众所周知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八章中看到的，1350 年后的一个世纪中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同时伴随着利率下降、经济从资本稀缺型（capital-scarce）转为资本充裕型（capital-abundant），奢侈品的消费增加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改变。这些变化总体上是对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中劳动力稀缺状况的一个典型适应，这些变化也都有助于开始于 1600 年的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

Borsch 指出在埃及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在黑死病之后的数个世纪中，实际工资和人均 GDP 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大减使得维持复杂的灌溉设施变得非常困难。灌溉系统的老化启动了一个崩溃的累积过程，这对农业产出和生产率产生了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但是衰退的全部特征更加复杂：

[1] 关于这一估算的最新结果是 Sevet Pamuk 善意赠与，因为研究成果还未出版。

英格兰的劳动力/土地比率的改变增强了农民的地位，导致了庄园制度（manorial system）的消失，从而由“自由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代替。在埃及，完全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在强大的马穆鲁克（Mamluk）*中央集权的支持下，地主的权力增加了（Borsch, 2005, 第48页）。当然，英国的地主试图做同样的事情，并且也得到了相对强大的政府的支持，但是英格兰的农村社区的谈判地位比埃及要强大很多。在英格兰，相似的法令被大型的起义运动，例如1388年的农民反抗运动（Peasant Rebellion）压制或者废止。**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的反抗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挽救”了市场经济，并阻止了“第二次的农奴制”（second serfdom）在埃及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出现。^[2] 而且，Borsch认为英国的农民有离开的选择——迁往城市——但这种选择权利埃及农民没有（Borsch, 2005, 第49页）。结果，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它广泛的政治经济“决定了其结果和大多数（关于西欧）历史研究得出的预测差距很大”。埃及的

* 马穆鲁克（Mamluk、Mamluke、Mameluk、Mameluke，又名马木鲁克、马木留克、马木路克），中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后来，随着哈里发的式微和阿尤布王朝的解体，他们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建立了自己的布尔吉王朝，统治埃及达三百年之久（1250—1517年）。——译者注

** 农民反抗运动指的是1381（正文为1388年，疑有误）年发生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 Wat Tyler's Rebellion, or Great Rising），它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也是欧洲中世纪后期民变浪潮的一个组成。虽然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被后世视为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开始走向终结的标志。起义的背景是1348年到1350年肆虐的黑死病，削减了大量英格兰的劳动力。由于劳工短缺，庄园释放出更多的耕地和牧场给农民，后来幸存的劳动者得以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而权贵们希望尽快恢复到瘟疫前的状况。1351年，爱德华三世召开议会，通过了对自由劳动力进行约束、激怒农民的《劳工法令》。为了筹集海外军事行动的经费，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于1381年第三次征收人头税，且这一次的税率是前两次的3倍（第一、第二次分别于1377和1379年征收）。农民们不满税收的征收，揭竿而起。——译者注

[2] Robert Brenner (1989) 对于东欧和中欧“第二次农奴制度”的出现给出了相似的解释，例如农民中间“长期的团结传统和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缺失使得地主可以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巩固他们的权利，并以此迫使农民变成农奴身份，参见 Brenner (1989, 第44页)，也可以参见 Kochanowicz (1989)。拜占庭在黑死病后的人口下降时期，也导致了通过强迫劳动的增加和大型庄园的出现而迫使农民变成农奴 (Laiou, 200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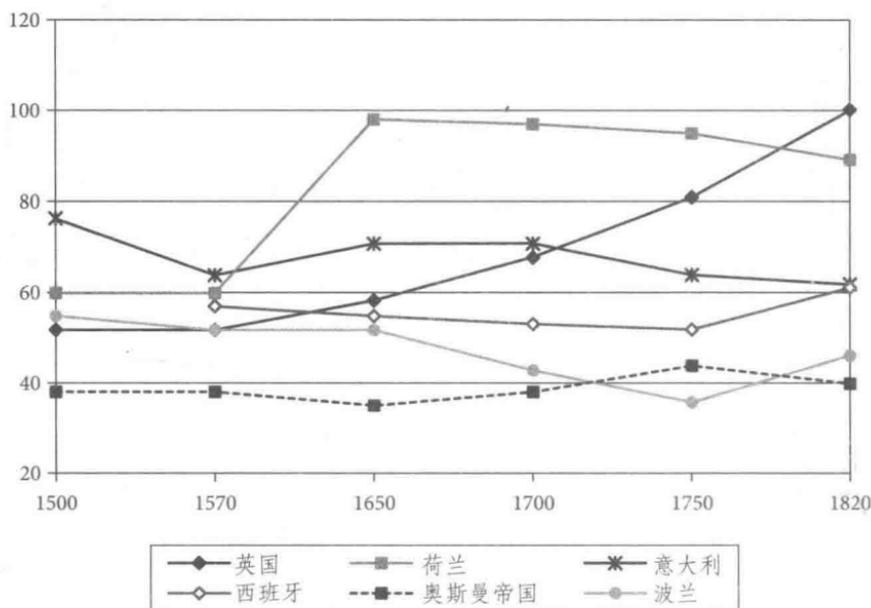


图 34 1500—1820 年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人均 GDP 指数
(英国 1820 年 = 100)

资料来源：Van Zanden (2001a) 和 Sevket Pamuk 的未完成的研究。

租金上涨、谷物价格上升、工资大幅下降、人均收入下降，并且土地制度保持完整。埃及的产出较低，与英国的产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Borsch, 2005, 第 113 页)。这也再次说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更加平衡和“离开”的巨大可能性在英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西欧在黑死病之后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实际工资的异常，也可以从 Walter Scheidel (2008) 得出的一组实际工资估计中得出。他使用了大量的资源，得出了从公元前 20 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到公元后 12、13 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包括许多关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和公元 1 世纪的罗马“黄金时代”的估计。图 35 将他的估计和 Clark (2005) 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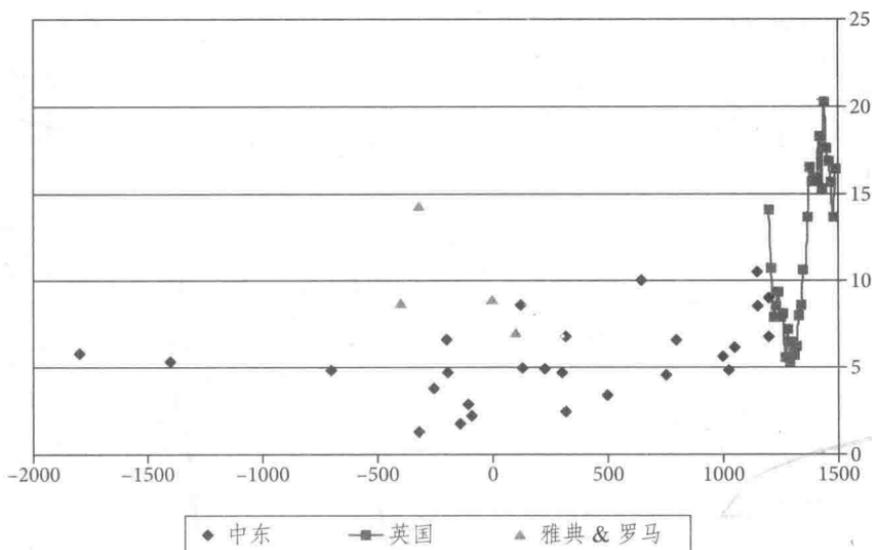


图 35 中东、雅典、罗马和英国 1500 年前的以升小麦计量的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Scheidel（2008），和 Clark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价格和收入组织（<http://gpih.ucdavis.edu/>）。

英国的小麦工资的研究做了对比。^[3] 此图显示英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在中世纪后期非常显著，但是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差异不大，包括其他可能产生相同情况的其他国家（Allen, 2001；Van Zanden, 1999）。雅典和罗马在它们的全盛时期也实现了相对高水平的工资，阿拉伯世界在 800—1200 年间的繁荣时期经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对比还揭示了，与 Borsch 的看法相一致，只是到了 1350 年后，欧洲的实际工资才高于其他地区，尽管 13 世纪前期经济也相对繁荣。 274

Borsch 的研究指出有一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中东和西拉丁美洲的分流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差异。现在认为这就是全部原因还为

[3] 参见 Scheidel（2008）；如果他报告了最大估计和最小估计的某种边界，我将会使用这两个数值的平均数；我没有包括他对中国的估计。

时尚早——即使是黑死病之前的地中海的北岸（特别是意大利北部）似乎也比曾经充满活力的阿拉伯世界更加具有活力。而且，解释了埃及灌溉经济的相对衰落的某一个因素并不能解释这个地区的其他部分的停滞。^[4]

关于 1000—1800 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即这段时期内的中国经济的相对表现和绝对表现如何。可能最有影响力的论断是 Mark Elvin（1973）的经典解释，即中国经济在宋朝（从 960 年到 1279 年）经历了“中世纪经济革命”（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然后进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状态。转折点发生在 14 世纪，在此之后人均 GDP 陷入停滞状态。例如，Angus Maddison（1998）也认为（部分成果基于 Perkins（1969）的研究）人均 GDP 从 1280—1700 年间保持着不变的状态。与这种看法多少一致的解釋是 Liu（2005）最近的对于从 12—18 世纪的人均 GDP 的发展情况的估算，他估计实际上人均收入从宋朝（1120）到明朝（1550）年间大幅下降，而到了明朝晚期（1600 年）的时候再次回升，在此之后出现了停滞状态。根据他的估算，明朝（大约 1775 年）的人均收入比宋朝时期略微低一些。^[5]

[4] 对于可能涉及的深层制度因素的讨论请参见第二章和 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5] Liu (2006) 的估算在某些方面是有问题的，因为误差范围非常大，而且他只估算了通过市场交换而得到的收入（他的估算的基础是从费希尔等式 [Fisher equation] 开始的货币供应、价格水平和人口）。他对明朝初期的下降的重构可能也指出了市场交换被非市场交换替代了，对于这点，有很多的证据。

这个正统的解释最近受到主要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学者的批评：例如，李伯重强调了当时出现的持续的经济扩展的过程。李对宋朝改革以及随后的明清停滞的范式的批评非常严厉，他指出他的关于江南农业部门发展的研究显示了持续的“农业技术和土地开发的变化”，揭示了“从宋朝到清朝的逐渐提高和扩散的长期连续的过程”（Li, 2003, 第 175 页）。其他的修正主义学者（revisionist）没有表达很强烈的关于清朝之前的长期人均收入和产出的发展，但是可能同意李伯重所说的观点，即人均收入没有出现长期的下降，甚至没有出现停滞，而是（缓慢的）增长，（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特别是 Ken Pomeranz（2000）持有的重要观点，即我们倾向于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和西欧最发达的地区，例如英国做比较，这种比较是有偏误的。在比较时，我们应该将中国和西欧都作为一个整体（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 1500—1800 年间没有出现大的扩张），然后进行对应的数据比较，或者是，将长江三角洲和北海地区（或者英格兰）的数据进行比较。 276

专家不仅对于中国在宋朝和清朝之间的人均 GDP 的发展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对于清朝和西欧的实际收入水平的对比也有不同意见。特别是 Pomeranz（2000）认为中国在 1750 年的收入水平可能和欧洲相当，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可能也与欧洲最发达的地区（英格兰和荷兰）的繁荣程度相当。但是 Maddison（2003, 第 249—251 页）反对这种观点。Maddison 以 1990 年代的购买力平价（PPP）比较为基础，从 1820—1990 年期间的人均 GDP 的时间序列中得出了中国 1820 年的人均 GDP 的估算基准。Maddison 方法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低质量的历史国民统计数据。因为 1912 年前没有任何严肃的研究，而且 1912—1949 年间的增长的证据，甚至是 1949 年后的证据都不是非常可靠（Maddison, 1998）。由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Second World War）和 1949 年新政权建立后时间序列数据的不连续，以及 1949 年之后的数据的不完整都使我们对连接 1990 年的估算基准和 19 世纪早期的基准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准确性产生怀疑。^{〔6〕}

可以与另外一个国家进行可靠一些的对比，因为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国家的可靠的 GDP 估算。通过对 19 世纪上半叶的爪哇（Java）和荷兰的收入水平以及 PPP 条件进行仔细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 Maddison（2001）对这两个地区在 1820 年的收入差距的估算大体上是正确的：荷兰的人均 GDP 大概是爪哇人均 GDP 的三倍（Van Zanden，2003）。但是 Maddison 估算 182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低于印尼是不可能的。从爪哇的（和南亚其他国家）的角度看，以输入企业家精神、熟练劳动力、技术、资本以及制造品方面为衡量标尺，中国很明显是一个更加发达的经济体。因此，中国的人均 GDP 应该比爪哇高出很多，当然也比 Maddison 建议的低水平（英国 1820 年的人均 GDP 的 35%）要高。

附录 2 列举了很多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估算中国和长江三角洲下游的相对的人均 GDP 数据。结果显示：

- 根据李伯重对该地区经济绩效的相对乐观的估计，可以得出长江三角洲下游的人均收入在 1620—1750 年间可能没有增长，而是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
- 中国经济体的一个显著的方面是它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边际的）高于工业和服务业，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这一时

〔6〕 参照 Debin Ma（2008）和 Fukao, Ma and Yuan（2007）的最新的著作，这一著作将会有可能让我们获得战前中国的确实的估计基准。

期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低速的结构转型，因为它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的激励非常不足。在西欧，荷兰在1800年之后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即有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率，结果就是导致了缓慢的转型过程（Van Zanden and Van Riel, 2004, 第188页及以下页）；

- 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和整个西欧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却明显低于北海地区；根据Allen et al. (2005)的详尽研究，在实际工资方面也遵从同样的模式：在18世纪，日本和中国的实际工资和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实际工资大体相当，但是英国、荷兰和佛兰德斯的实际工资却比别的地方高出很多。

这些结果是否和我们所知道的欧亚大陆这两部分的长期发展情况相符呢？假定中国1750年的相对收入水平是英国1800年水平的50%—55%（在第八章我们使用的标准）并且在1000—1800年间大致保持不变。这个假说与在前一章中我们所讨论的欧洲人均GDP的估算能够良好地匹配，欧洲的人均GDP从1000年占标准（1800年的英国水平）的38%，增长到1500年的54%，再增长到1700年的56%。经过了中世纪的突发式的增长之后，欧洲在现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是从15世纪到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欧洲加速增长之后，都和中国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假说大致上与Pomeranz (2000) 对大分流的解释相符。

下一个问题是：江南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和英格兰和 278
尼德兰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相同呢？一种分析方法是观察工资和价格结构。欧洲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名义（实际）工资的地区性结构。正如Van Zanden (1999) 和Allen (2001) 展示的，在欧洲有一个清楚的名义工资的区域性结构，它在现代早期开始出现：低地

国家和英格兰的名义工资比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这不仅引起了实际工资的“小分流”，而且在名义工资方面也表现得更加显著。在18世纪后半叶，伦敦、英格兰南部（牛津）和阿姆斯特丹的非熟练劳动者的银币工资高达8.3—11.5克/天（grammes per day），而在其他地区3—5克/天是正常的水平（从克拉科夫的2.9到马德里的5.3）（Van Zanden, 1999）。英格兰和荷兰的企业家能够支付这些工资，因为北海沿岸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他们必须那样做，否则将会丧失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企业家所具有的竞争性地位，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就会萎缩。实际上，相比西欧的其他地区，正是这些高工资国家得到了发展。因此，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出现在西欧的名义（银币）工资的区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布局。

如果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那么相似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名义工资水平将会出现。五位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资料收集，其中的部分资料已经在第五章讨论中国18世纪的技能溢价时作了展示，但是这些资料并没有证明长江三角洲具有高于其他地区的名义工资水平。关于建筑业的工资水平的最好调查是1769年的《物料价值则例》*，在《物料价值则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即南方的工资总体上低于北方的工资（直隶、东北和蒙古）。最低工资出现在

* 《物料价值则例》是由乾隆时期政府实施，发动全国各省督抚将各地的物料价值搜集呈报到工部，工部将其汇总，编修成书并刊刻出版，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文献。《物料价值则例》一书二百二十卷，记载的是当时修建衙署、城垣、庙宇、仓库等官方建筑所用物料价值、工价和运价，其规模巨大，数据丰富，是了解清中叶物产、物料价格以至全国各地的经济状况的难得资料。部分数据可参见 <http://www1.ihns.ac.cn/zeli/index.htm>。——译者注

南方，在福建、台湾和河南，这些地方的几个区域制定的最低工资是非熟练劳动者为 0.020 两 (teal)，对于熟练劳动者是 0.030 两。在南方，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大约 0.040 两，对于工匠更多一些 (0.050—0.060 两) (参见 Allen et al., 2005)。长江三角洲的省份，如江苏和浙江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生产率最高的地方，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却不是那么突出；他们代表了中华帝国南部的整体工资水平。比较而言，北方的名义工资，例如直隶、东北和内蒙古比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要高。^[7]

因此在中国发现的工资区域结构模式和西欧的完全相反，西欧的模式是偏远地区较低，中心地区较高。在西欧，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发展出了高工资的经济，但是中国好像不是这种情况，尽管如 Pomeranz, Bin Wong 和李伯重等认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区域和国际的专业化分工、原始工业化 (proto-industrialization) 和农业集约化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确实促进了长三角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西欧是相似的。这个区域结构的差异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这些过程导致了充足的规模经济和 (或者) 经济的集聚 (agglomeration)，从而产生了工资结构的区域性差异，但是中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取而代之的是人均土地的可获取量 (availability) 似乎仍然对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影响很大。在北方和西方，人均土地的可获取量相对较高，其中东北达到人均 21 亩，工资相对较高；而最低的工资出现在福建，在那里同样有巨大的人口压力 (根据 Wang, 1973，为人均 1.2 亩)。长江三角洲之间的两个省和我们对福建的观察很接近 (人均土地获取量在

[7] 这个被 Allen et al. (2005) 提出的工资的倒退的证据证实了：对于北方 (东北、北京) 来说，模型的系数是正的且显著。而对于其他地方的工资水平却和长江三角洲 (作为标准) 的水平相似。

2—2.5 亩)。但是南北方的工资差距可能还有政治维度的因素：东北，作为清朝管理者的家乡，它维持着相对有利的水平，而且，政府不允许向此地区进行移民。这个地区相对于中国南方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地区”，它为南方供给了大量的大豆和谷物（Yong, 2007）。

281 西欧工资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在环北海的中心地区不仅名义工资非常高，而且实际工资也非常高，虽然实际上这一城市化地区的食物相对较贵。对于中国，我们还不可能估算出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活成本的差异，因此我们的分析将会限制在实际工资的比较上，实际工资是用大米和小麦的公斤数量所表示的，这两个物品可以在帝国不同区域买到。

有几个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在 18 世纪拥有紧密融合的稻米市场，特别是在长江流域（Yangtze River valley）。稻米贸易的主要流向是从流域的上游到长三角洲地区。例如，Chuan and Kraus（1975）估计稻米的价格在 18 世纪上半叶增加了大约 0.030%—0.037%/ 每英里（以苏州的价格为基础）。Shiue（1999）推翻了 Chuan 和 Kraus 的数据，显示 1723—1725 年间长三角地区的稻米价格是浙江 1.43 两 / 石（江苏是 1.23 两 / 石），到湖南下降到 0.94 两 / 石，四川则为 0.85 两 / 石以及贵州为 0.73 两 / 石。南部沿海地区也出现了相似的模式：稻米价格从浙江的 1.43 两 / 石，下降到福建的 1.18 两 / 石，广东的 1.08 两 / 石，以及广西的 0.98 两 / 石。不幸的是我们没有 1769 年左右的类似的数据，我们不得不假定 1769 年的稻米价格区域结构与 1723—1735（或者 1738/1740）—1769 年的稻米价格的区域结构相似。长期来看，只有南方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因为在 19 世纪，广东变成了一个大量依靠进口稻米的地区，因此 1909 年

南方的稻米价格要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价格高一些。^[8] 在北方，小麦和小米是最重要的食物，稻米需要从南方输入，价格相对较高。对于直隶和辽宁（东北）来说，我们有一系列小麦小米的价格，这些价格数据显示在省会城市小麦的价格差不多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稻米的价格一样贵（Li, 1992；还可以参考 Allen et al., 2005）。小米的价格便宜一些，但不同地区的差别较大，小米的相对价格在直隶是小麦价格的 94%，在奉天（辽宁 / 东北）则是 68%。找不到任何关于内蒙古、山东和河南的价格数据（参见 Allen et al., 2005 年对价格数据的讨论）。

表 12 显示的模型与从名义工资数据中得出的模型非常不同。实际上，帝国大部分最发达地区的实际工资相对较低的倾向十分明显，因为长江三角洲下游（和北京）的价格最高。就实际工资而言，北方和西部（四川和云南）比东南沿海要高出很多，福建又一次成为工资水平最低的区域。如果我们考虑到稻米相对于小麦的稍高的营养价值，那么北方和东南的差距可能会小一些，但是这也只能引起很微小的修正。

282

通过与欧洲的相似估算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在全中国所有地区以这种方式测量的实际工资是相对较低的。欧洲的实际工资水平从每天 6 升到 10 升（黑麦或者小麦）不等。在其中几个区域，例如波兰的黑麦价格很低，而在北海地区，名义工资相对较高，在现代早期小麦 / 黑麦工资通常情况下非常高。在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以谷物价格测量的工资要比用“黑麦”或者“小麦”测量的工资要

[8] 由 Wang (1992) 出版的苏州的稻米价格序列开始于 1638 年，苏州可能是中华帝国最大的稻米市场，因此它可以作为长期趋势的很好的代表。我们使用 1767/1772 年的平均水平作为计算实际（稻米）工资的基础。我们还假设 1767/1771 年的名义稻米价格结构和 1723—1735 年的相同（由 Shiue 1999 年修正）；例如，对于广东来说，我们假设其稻米价格是苏州的 88%。

高，并分别为斯德哥尔摩（Stockholm）8.7升、但泽（Danzig）8.5升、奥格斯堡（Augsburg）5.9升、荷兰和巴黎9.9升、牛津8.1升和米兰6.0升（Van Zanden, 1999, 第185页），这些数据比中国各个地区都高。

日本：通往工业化的另外一条路

日本的制度的效率怎么样？在本书中的很多地方都有证据显示德川时期的日本正在发展出一种和西欧较发达地区的制度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十分有效的制度。最能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可以从关于该国不同区域的稻米市场发展的数据中发现。在第一章中，我已经描绘了关于对18—19世纪日本的稻米市场的相对效率水平所进行的研究的轮廓，在我们进一步解释日本制度的显著发展之前，在这里首先讨论一些细节。

Iwahashi（1981）已经分析了从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的14个乡镇市场的稻米价格的发展变化。Miyamoto（1988）和Bassino（2008）使用这些数据展示了它们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尽管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远。图36描绘了1710—1860年间，这些价格在向同一个方向发展的高度一致性。

283

遥远的北方的价格通常是最低的，出羽（Dewa）的价格总是在价格序列的低端，而最高价格出现在市场化的乡镇，例如名古屋（Nagoya），它位于两个大的城市大阪和江户（东京）之间。对此的解释是德川幕府时期的税收体系要求土地税必须部分地以实物支付；稻米必须运到大阪，在那里交给税务机关，这些稻米的一部分要直接船运到江户和东京，以供给那里的皇室。因此，大阪成了稻米交易的中心，当地的价格信息是其他市场化城镇的稻米价格形成

表 12 1769 年建筑业工人的实际（稻米 / 小麦）工资（升 / 天）

	非熟练工人	稻米 / 小麦价格 (两 / 石)	以稻米或小麦的升 表示的实际工资
东北			
辽宁	0.057	1.55	3.79
北方			
直隶	0.062	1.74	3.67
甘肃	0.047	1.35*	3.59
山西	0.054	1.55**	0.057
陕西	0.044	1.45**	0.057
山东	0.045		
中部			
河南	0.037		
江苏**	0.040	1.80	2.29
浙江**	0.040	2.09	1.97
武汉	0.039	1.38	2.92
四川	0.048	1.24	3.97
云南	0.048	1.62	3.04
南方			
福建	0.030	1.73	1.79
广东	0.040	1.58	2.61
平均（人口加权）	0.044		2.86

* 以小米价格为基础。

** 以甘肃和直隶之间的价格差异为基础，假定价格随着距离北京的越来越远而减少。

资料来源：Allen et al., (2005)《《物料价值则例》》和正文中所讨论的价格数据。

的基础。^[9]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Iwahashi (1981) 搜集的 18 世纪的 284 价格通常是番 (Han) 政府机关制定的“官方”价格，这个价格通常用来转换他们稻米和现金，用于结算和付款。Iwahashi 提出，如

[9] 与此相关，在 17 世纪的早期，大阪的商家 (merchant house) 创立了资本市场 (与他们为他们的商业交易提供信贷有关)，这个市场非常复杂，利率相对较低 (12%—15%)。在同样的背景下，稻米的期货市场 (futures market) 也被发展出来了，这个期货市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期货市场，虽然这个说法不太准确。阿姆斯特丹在大阪之前发明了期货市场 (Gelderblom and Jonker, 2004)。

果将适当长度的长期价格做平均，那么平均价格就会使得这些政府制定的价格跟市场价格水平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每年之间的波动很可能被平滑掉了。^[10] 在 19 世纪期间，这些体系变得自由了，结果就是大阪失去了作为市场中心的部分力量，如图 36 所显示的那样，这段时期稻米价格的共变程度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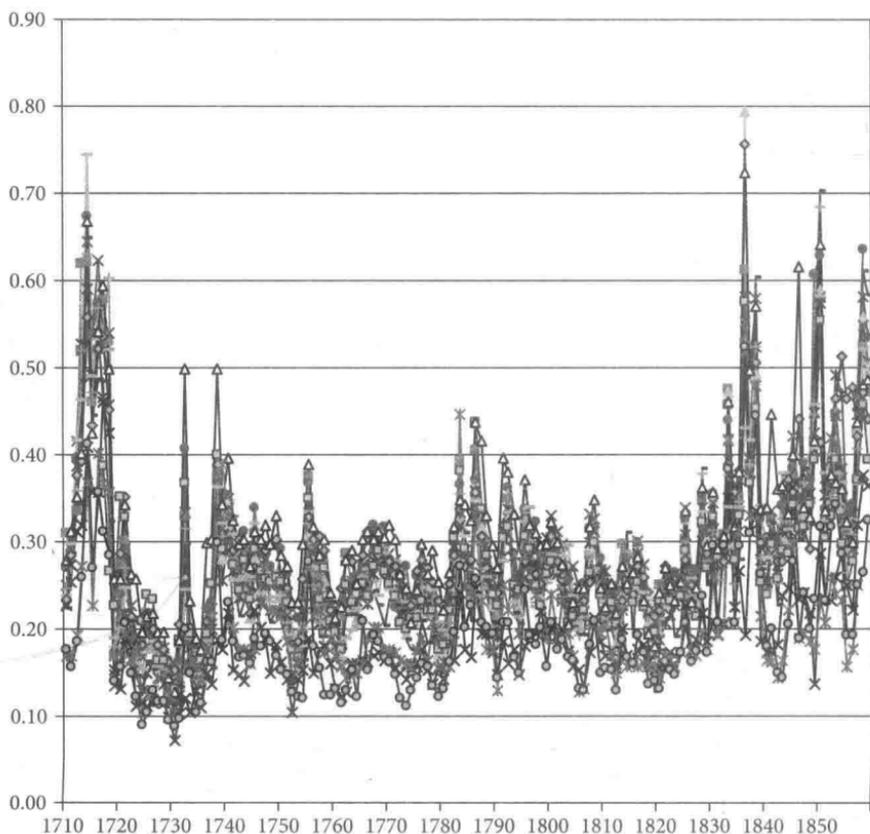


图 36 1710—1859 年间 14 个日本市场的稻米价格（以银计算）

资料来源：Iwahashi (1981)。

[10] Osamu Saito 非常善意地向我指明了这点。

图 37 证实，实际上距离和稻米价格的共变之间的关系在 1710—1759 年间一直处在高水平的平稳状态。这就显示了政府当局对这些价格的影响很大，他们紧跟大阪的价格，并且对此一清二楚。在第二阶段，即在 1760—1809 年，价格波动不如第一个五十年剧烈。我们有这些数据，这些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共变关系的下降。第三阶段的距离和共变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观察到的第二阶段 1760—1809 年很相似，但是价格的波动确实增加很大。为了说明这些变化：大阪市场的价格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从 1710—1759 年的 0.43 下降到 1760—1809 年的 0.28，然后又增加到 1810—1859 年的 0.28（其他市场的变化非常相似）。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给出的证明一样，日本稻米市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很高，比同时期的印度（或印尼）高出很多，和西欧最发达的地区以及中国相当。稻米价格的变异性（variability）相对较高，在 18 世纪早期和 19 世纪上半叶稻米价格的波动有时候非常剧烈，并且比西欧高。其中的一个解释可能就是国际贸易的缺失。国际贸易被德川政府严格管制，而它在大米歉收或者食物供给充裕时都可以平衡稻米市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一个发展良好的市场制度也不能阻止大规模饥荒的发生（Hayami, 2001, 第 46—49 页；Tsuya and Kurosu, 2005）。反之，在北海地区谷物价格和死亡率的相关性已经变得很弱甚至为零（Galloway, 1988；Noordegraaf and Van Zanden, 1995），而类似的联系在日本仍然很强大（Tsuya and Kurosu, 2005）。

在德川时期的日本，饥荒可能还起到了稳定人口发展的作用。日本的人口在 17 世纪开始迅速增长（人口从 1850 万增长到 2700 万）但是在 18 世纪增长突然停止，只有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才恢复了缓慢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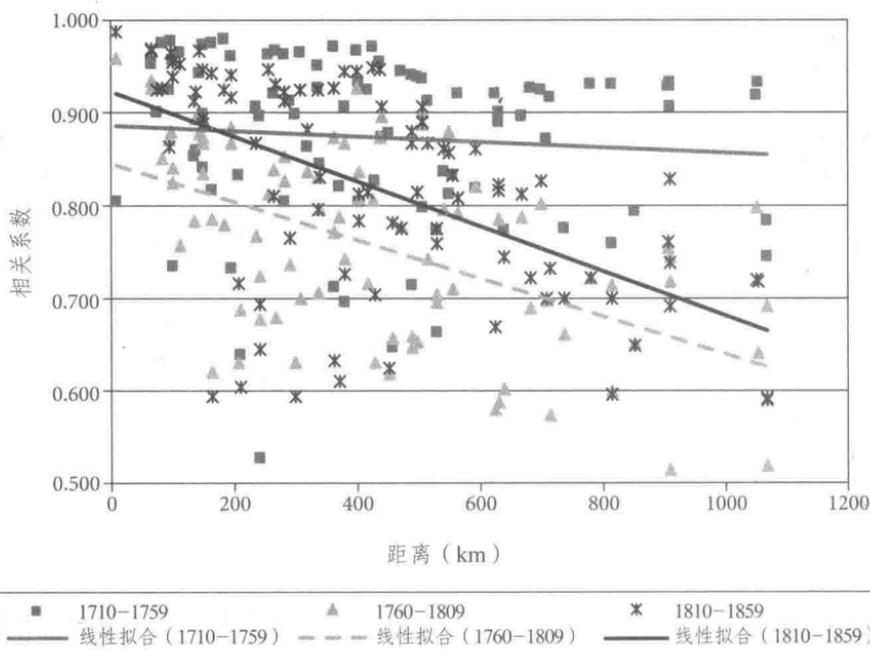


图 37 日本稻米价格共变与距离的关系，1710—1859 年

资料来源：Iwahashi (1981)。

相比而言，有证据显示人均 GDP 在 18 和 19 世纪早期开始增长，虽然具体开始的时间还不是很清楚 (Miyamoto, 2004)。Saito (2005a, 第 86—87 页) 讨论了已有的证据，并且得出实际人均收入在 1700—1870 年间大概增长了 30%；与此同时，实际工资上涨了 18%，这些表现对于一个原始工业经济 (pre-industrial economy) 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根据 Saito (2005a, 第 81—82 页) 的证明，实际工资增长大部分都发生在 18 世纪，而且他认为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实际工资的增长一前一后发生：畿内 (Kinai) 地区 (德川经济的中心) 是 18 世纪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在这段时期末的时候增速变缓。日本可能是世界上仅有的在 1800 年前产生了人均收入长期增

加的经济体之一。

日本的故事是否有人口学的因素呢？大约 1700 年之后，饥荒的发生可能在稳定人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他人口方面的发展可能同样重要。在西欧，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日本的家庭制度与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不同：Arthur Wolf and Susan Hanley (1985) 宣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如同东方和西欧的差异一样是根本的。在日本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比较商业化的西南地区，平均结婚年龄比中国高很多，并且在 18 和 19 世纪的时候大幅增长到了甚至在欧洲都是不寻常的水平（女人在 22—25 岁结婚）(Saito, 2005, 第 169—171 页)。这一婚姻并不是建立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但是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按照欧洲的标准（4—8 岁）来看也算高的，婚姻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只有 2% 的女人不结婚）(Hayami, 2001, 第 107 页)。他们也是婚后在男方家居住，并且三代同堂非常平常；在 Saito 分析的 8989 户样本家庭中，91% 的家庭至少拥有一个成员——祖父 / 祖母或孙子女，这在西方的小的核心家庭中是很难找到的 (Saito, 2005c, 第 168 页)。然而，为什么男女结婚年龄会上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完全清楚。这一现象可能和经济现代化有关，因为结婚年龄上升仅仅发生在日本经历了快速商业化的地方，但正如欧洲的例子一样，其他的制度因素，例如两代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制度同样发挥着作用 (Hayami, 2001, 第 161—177 页；Murayama, 2001)。在日本西部，妇女的地位传统上就比较强，随着平均结婚年龄的上升，家庭构成的“现代”制度产生了。而这些地区正好也是教育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参看 Rubinger 的地图，2007, 第 183 页）。这就说明，人口模式的改变和人力资本形成水平的增加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可以在日本找到。

综上所述，在德川政府的稳定环境背景下，德川时代的日本见证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是日本文献中曾经使用的短语（Hayami，2004）。这些变化再加上人口结构的改变，引起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书籍需求量的急速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在18世纪，日本是唯一的一个除西欧之外实现人均收入连续增长和强劲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地方，特别是在18世纪末，当时的入学率开始快速增长。从这段时期脱颖而出的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去迎接由工业化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世界的挑战。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使用18世纪的人力资本形成的代理变量（技能溢价和书籍产量）预测了19世纪“大分流”时期的增长，日本的例子证实了我们此处提出的方法具有较好的预测质量。日本在19世纪的快速增长符合发现的全球模式。而中国是真正的异常值（outlier），因为它似乎已经差不多跟日本一样准备好从19世纪的新机会中获益了，但是却没有这么做。

结论

我们通过总结关于欧亚大陆其他几个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的长期增长路径的某些证据的简要评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许多不同的道路都可以发展出差不多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实现高水平的市场交换。欧洲道路出现在一个国家（政府）弱小（甚至缺失）的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制度，这可以使分裂的国家制度可以和快速的商业发展相结合。另外一种“替代”的道路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一个帝国，例如清帝国、德川

时期的日本，或许还可以包括罗马帝国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和奥斯曼帝国，他们从直接干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退出，从而创造出足够的空间让“自由企业”出现和繁荣。第二种道路有几个优点：那些帝国知道大量统一的管理交换的制度。有点矛盾的是，这些市场交换有时候是国家干预的结果，比如对生活必需品（稻米、小麦）市场的干预可以保证这些市场正常合理运行，特别是能够确保首都城市的食品供给。通过这种道路走向有效率市场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这些帝国经常使用一种语言，这就使得交易成本降低，而且在他的领土内不会出现关税壁垒。大型的帝国可以提供稳定性，当然前提是帝国必须存在。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谈到的，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制度在1100—1400年间的衰落最初就与它所依靠的帝国的分解有关（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帝国没有创造出某种信任和保护财产权制度，那些制度可能导致非常有效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活跃着占人口比重非常高的劳动力（如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情况一样）。对于西欧这条路和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另外一条路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1000年之前还处在世界经济边缘的拉丁西方（Latin West）可以在中世纪盛期快速赶上。在14和15世纪，那里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已经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地方。这也可能是因为欧洲的市场经济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应对了1347/1348年的黑死病带来的人口下降的挑战，而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人口的灾难可能导致了经济的崩溃。欧洲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刺激是在1370—1470年出现的要素价格的改变。较高

* 阿拔斯王朝是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王朝，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欧洲人称之为“东萨拉森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乃是阿拉伯的黄金时代，历时500余年。——译者注

的劳动力成本和利率的快速下降以及技能溢价的急速跌落使得欧洲走上了以资本使用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例如印刷机）为基础的新增长曲线。

我们在此处的对比还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日本似乎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二种道路”的特例。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发现了微观层面的改变，这些改变使得人力资本形成持续增长、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参与水平不断增加，这些发展和我们在第四章中分析过的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非常相似。但是，在得出确切的结论之前，需要对这些发展做更多的比较研究。这还引起了新的关于中国人口模式的区域性差异的问题。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是否也发展出了新的人口行为模式？如果知道更多关于中国和日本（和东亚其他地方，例如韩国）对黑死病带来的人口下降的反应，那将是非常好的，因为这将会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这些经济体的特点。数据的缺失限制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特别是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的前期），但是最新的研究正在进行，这些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数据和新的关于这些经济体长期发展的新见解。很显然，这会改变我们将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的英国？什么可以解释这段时期在西北欧出现的工业社会的起源？这是本书谈论的关键问题。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达至关键“起飞”所必须的长期序幕是什么。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回到中世纪盛期，去识别当时欧洲经济蓬勃发展并最终引致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从 1780 年工业产出增长的开始加速回溯到 975 年，当时“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运动刚刚开始，这是一个复杂的长篇故事。识别的关键步骤如下：

A. 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这一转型开始于 17 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并且发生在北海地区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在尼德兰（荷兰）。

B. 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背后的驱动力是 16 世纪出现的世界市场。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国家能够迅速扩张是因为它们设法赢得

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贸易、运输和金融）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1]

C. 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拥有高效的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两个国家仿效中世纪的城市国家，都经历了“军事—财政”国家阶段。他们使用国家的武力扩大商业精英的利益。这些新型国家出现在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期间，是在专制王权和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

292 D. 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内在激励，比如对节约稀缺的昂贵的劳动力的渴望，刺激了经济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这种渴望得以实现。实用知识在 1800 年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于西欧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与人力资本的增长有关，该增长开始于中世纪，并且由于制度改善（它导致了低利率）、新技术（印刷）、新教主义（这个和引起新发展的原因同样有效）和快速增长的城市（特别是在北海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中世纪后期加速。实际上，人力资本形成的水平（由技能溢价和 / 或书籍产量衡量）和经济绩效之间有可能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成功地“预测”19 世纪“大分流”期间的各国的表现。

E. 为了解释这些新制度只在北海地区产生的原因，或者实际上，为了解释为什么只有在那里，中世纪的制度革命产生了合理的结果，我们分析了这一地区的潜在的人口结构的转型，例如中世纪晚期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这被看作是人口类型对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过

[1] 参看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 2005): 我不认为我的观点和他们的发现有什么冲突，但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关于大西洋经济崛起的 1500 年之前的根源；也可以参见 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程（或者说是人口结构和市场共同演化的过程）。欧洲婚姻模式反过来又引起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参与的提高以及高水平的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人力资本形成。这个人力资本形成成为了西欧的典型特征。

F. 欧洲婚姻模式和中世纪晚期在北海地区的市场经济的突破共同建立在中世纪中期出现的制度之上。在西欧的其他地方，发生在950—1300年间的制度和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代早期没有能持续下去，欧洲中部和南部的经济在1500—1800年大部分处于停滞状态，或者是像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成为经济下降的牺牲品。这个和中世纪盛期发生的壮观的泛欧洲的经济增长过程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还认为这个欧洲内部的“小分流”，例如，欧洲南部和中部的停滞和制度的失败有关，例如专制主义的出现和欧洲中部的一些地区农奴制度的复归，专制主义压制了中世纪出现的更加“平衡”的制度。

293

G. 我们关于制度和制度改变的分析有许多关于制度效率的量化比较；我们认为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全部都可以用来衡量制度在规范市场交换和保护财产权方面的效率。根据包括这些衡量标准的全球数据或者大量关于这些方法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从中世纪以来，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制度相对来说更加有效，特别是“纵向”制度比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制度更有效。只有明朝晚期和清朝时期的中国以及德川时期的日本才拥有可以和西欧相媲美的制度，特别是横向制度。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开始于17和18世纪英国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是出现在欧洲中世纪晚期那些相对高效的制度。

H. 西欧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它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人。这种“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是下列原因

的结果：1）关于“法治”（rule of law）的“正确的”法律思想（来自于教廷革命及其影响）；2）把书面词汇作为“真理”的最终来源，这是非常重要的；3）借助于“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过程来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其中社团法人（*universtates*）起了关键作用。结果就是权力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ed*），即由书面文字界定和约束，以及可协商化（*negotiable*），是不同参与集团间可能的协商主题，因此也是可分割的（*partiable*）。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权力的概念，与我们在这个时期（以及在古代）的大多数非欧洲社会发现的权力根本不同，这些社会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统一的（*unified*）、自上而下的和整体的（*monolithic*）。

294 I. 这些“自下而上”的制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使西欧的发展路径不同于东亚国家的发展路径，东亚在明朝政府和德川政府统治下也出现了市场经济，但那是两国政府自上而下实施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的结果。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西欧这样一个包含很多差异很大的政治经济体的地区，其“纵向”制度是更加有效的，即导致了非常低的利率，反之，东方的“横向”制度可能比西方的更加优越。这个结论的重要性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强调，即通过近期的研究显示“纵向”制度比“横向”制度更有助于解释长期的经济表现（Acemoglu and Johnson, 2005; Bosker, Buringh and Van Zanden, 2008）。

总结本书内容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观察它的不同层面。首先，我们试图描述制度的起源和长期的曲线，那些制度的大多数都已经在西欧的中世纪盛期开始出现。这样的例子包括法治（rule of law）、合作团体（例如行会）、欧洲婚姻模式（EMP）和公民权的概念。然后，我们分析了这些制度的相对效率（*efficiency*）——它们是怎样

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交换的——通过观察反映制度绩效的相对价格 (*relative prices*)，例如利率、技能溢价、书籍价格以及在要素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depth and breadth*)、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人口的比例。然后，我们尝试证实相对高效的制度是怎样影响在西欧发生的人力资本形成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和知识积累 (*knowledge accumulation*) 过程的。我们使用书籍产量和消费量、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增长以及技能溢价等指标衡量这一过程。证明的最后一步就是将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绩效 (*economic performance*) 联系起来：之后显示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当我们观察欧洲内部的区域模型时，这种联系也存在。我们通过比较北海地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发现了这一联系。当我们比较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时，目的是为了解释 19 世纪的“大分流”。

我们在此处分析的独特的欧洲发展道路，肇始于 950 年之后的那些世纪，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所导致的这个结果，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做了分析。这一发展道路是在一个国家相对软弱或者不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波制度创新出现了，正是这些创新为那些至今仍然管理着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我们的这个方法的新颖之处是天主教 (*Catholic Church*)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会也有助于奠定“百万个反叛”这一长故事的第二阶段的基础。当时教会已经开始鼓吹婚姻应该建立在夫妇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和代际之间的财产转移的特殊制度发展，共同导致了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因为代际之间的财产转移制度对于西欧西北部的“日耳曼”女人相对有利，欧洲婚姻模式是一个 14 和 15 世纪以来在北海地区最具特色的一个制度。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欧洲婚姻模式的本质是它相对民

295

主，男女之间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各种权利都出现了平衡。而且，这是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家庭制度，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高度依赖工资的劳动者也与资本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孩子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它比其他的家庭构成制度更为先进的是，它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在结婚前的许多年间，家庭成员都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件大事。我们已经表明，微观层面上这些制度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促使知识经济出现了第二阶段。

中世纪的部分制度传统还包括（城市）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新概念（或者说是更新的概念或者重新定义的概念），这些制度相对有效，并且有助于降低公民和（城市）国家之间一些重要交换的交易成本。这个公民权的概念也构成了重新解释民主国家和其公民之间关系的基础，这一进程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并且构成了1776年后的“大西洋革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于中世纪的民主传统在西欧新的议会制度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从四个层面——微观层面（*micro level*）的家庭，中观层面（*meso level*）的公社、行会和大学，宏观层面（*macro level*）的国家以及更高层面（*meta level*）的法律来看，发源于中世纪盛期的相对民主的制度至少有一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的过程的结果。10—13世纪的一波大的制度设计浪潮发生在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 empire*）分解后的政治真空时期，或者更宽泛的说，是发生在早期的希腊—罗马传统衰微的时候。欧洲的制度建构是由成立公社的公民、创办大学的学者和学生、设计出行会的商人和工匠以及创立了共有地（*commons*）的农民（和领主）的集体行为共同推动的。这里有一个不间断的民主传统，从11世纪的公社运动开始，经过了意大利13世纪的人民政权（*reign of the Popolo*）、1302

年之后的低地国家出现的行会运动、16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荷兰独立战争，一直到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都体现了对民主的诉求。最显著的特征是，即便后来的革命最初使用的也是中世纪制度——国会（States General）——来组织它集体行动的特定形式，正如1789年之前的所有主要革命所做的那样。

为什么民主的制度相对有效呢？本研究给出的答案要点是这些特别的“纵向”制度使得保护没有权力的人的财产权成为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民主的程序，不论是在合作的团体如行会和公社，还是在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国家中，民主程序都提供了一种透明的方式以改变“博弈规则”（rules of the game）。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经常关注于如何发展高效的制度，但是可能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发展有效的路径去改变不理想的博弈规则。经济的发展暗示制度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与此同时，制度总是有利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这可能不利于其他人；每一次博弈规则的变化都有它的失败者和胜利者。一个社会需要元规则（meta-rules）来改变制度，这些元规则必须透明，并且能让所有人都接受。民主的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在原则上可以被所有人接受，它们可以在原规则的稳定性和具有规则的灵活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对它们自己来说，这种平衡可能是最优的选择，或者说，相对于其他制度来说，这种平衡是次优的（sub-optimal）。在这种情况下，引用丘吉尔的名言是非常有用的：“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

“自下而上”的制度创造了对经济长期扩张有利的制度的论断被暂时的区域性发展模式所加强。中世纪中期被认为是1800年之前

最具活力和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当时几乎西欧的所有地方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改变的过程。它作为一个在10世纪还相对落后于世界经济的部分，在13世纪开始改变。西欧开始成为最有活力的区域，而其他核心区——特别是中东或许还包括中国——经济都贴上了滞胀的标签。当然，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也没有能保持住经济的活力。特别是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和中部（德国），这些在中世纪本来非常有活力的地区发现自身也很难保持进步。这些地区在现代早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不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可能还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衰退。在900—1300年间的这几个世纪，增长的过程出现在泛欧洲地区，但是1500年之后，增长则被限制在北海地区。只有这个地区保持、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的民主传统。在欧洲的南部和西部，1500年之后出现了一些斗争，旨在保护这一传统。我们已经分析了父权制的复归，从新教的德国到天主教的西班牙，这些地区都显示了强大的复归态势。强大的领土国家和专制主义的发展压制了民主传统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对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独立城市来说，这一压制非常明显。从泛欧洲的角度来看，现代早期几乎可以被描述成充满活力的民主的中世纪和Hobsbawm所言的1789—1848年“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之间的停滞阶段。在“二元革命”时期，新定义的民主和经济制度开始出现并推动了另外一个长期的强劲经济增长。连接这两个欧洲经济扩张阶段的是北海地区在1400—1800年间的发展，在那里制度变化是继续的，不论是在微观层面的家庭还是后来宏观层面的国家，而且增长都一直持续着。

当然，将现代早期视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停滞显然是夸张了。或许，用“斯密型的增长”（Smithian economic growth）这个术语描述——一个由城镇化、人口增长和专业化推动的增长过程——

可能更为准确。这样的解释暗示着技术进步相对缓慢，也暗示着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工资的下降，对劳动节约型的技术的强劲需求不存在，所以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我们还见证了进行中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过程和农业领域的博塞洛普型（Boserupian）增长^{*}，这一增长导致了高产出，但可能不能导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也见证了规模经济和某些关键行业的学习效应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例如造纸、印刷、炼铁、造船行业的进步，然而这些进步过程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北海地区，在这个地区之外，没有什么有效的制度可以产生真实的人均收入增长。

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长期经济变化曲线的特点是中世纪的突然扩张，随后是长时间的稳定期，即便不是“高水平”的经济停滞，这一路径也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或者中东的经济发展道路没什么显著的区别，虽然中国和中东的经济鼎盛时期比西欧来的要早。只有北海地区在现代早期保持了持续的扩展，而且，这使得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有了不同之处；“小分流”最终导致了“大分流”。 298

对于各种不同的制度效率指标和人力资本形成指标的分析显示出日本和中国是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不同的。从中国清朝后期和日本的德川时期开始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里有繁荣的书籍贸易，同时书籍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尽管从人均数量上来看还赶不上西欧；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里有逐渐复杂的市场交换和高水平的市场融合；在中国还有相对较低的技能溢价，可能在日本也是如此；

* 美国考古学家博塞洛普（Boserup）在1965年提出。他认为，由于冰后期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气候变暖、冰雪融化，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扩大，世界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采集和狩猎的强度逐渐上升，加上狩猎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动物的过度捕猎，导致其数量下降，使食物出现了短缺。人类就不得不转向新的食物来源，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在新食物来源中就有一部分植物的种子。于是出现了驯化植物的农业。这种观点被学界称为“人口压力说”。——译者注

而且，这里的资本市场的进步让利率迅速降低。在中国和日本，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相关关系，即制度效率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这让我们感到欣慰。在 19 世纪，日本的发展超过了我们的理论的预期：它的高效的制度和高水平人力资本使得它可以迎接西方带来的“开放”的挑战，并且，还能让它迅速复制西方的技术和一些有活力的制度。中国，起点稍微有些不尽如人意，结果是非常不成功，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似乎就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它的发展比我们预期的要慢很多。可能关键的不同点是，日本的改革者在 1860 年明治维新（Meiji Revolution）之后运用国家来进行关键的改革，反之中国的政府在 19 世纪没有起到相似的作用。^[2]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我强调从中世纪以来的西欧的独特发展可以作为它长期成功的解释，但是日本和中国的例子证明还有另外一条通往“现代”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高效率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为特征的。在西欧自下而上的过程和制度起到了主要作用。在日本和中国，现代制度的出现，是国家从直接对经济的干预中退出并决定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得来的，正如在中国的明朝后期和清朝时期以及日本的德川时期所发生的那样。

在引言中我们研究的其他问题之一就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人力资本形成在促进现代经济增长转变上所起到的作用。一些理论家预测人力资本形成的增加与不同的人口体系（demographic regime）的起源相连，这个人口体系可能会导致后代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在第四章中，我们确实识别了在人口体系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欧洲婚姻模式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出现。此外，它的基础在中世纪中期已经建立了。而且，我们看到书籍消费的增

[2] 这个故事可能更加复杂，正如丝织品工业所证明的那样，参见 Ma（2004）。

长对民族国家的出现有显著影响 (Baten and Van Zanden, 2008)。在同一个时期, Davin Chor (2005) 也同样指出较低的技能溢价引起了相对高水平的实际工资, 并且再次指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新经济增长文献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中的技术变化, 它是人力资本持续形成的一个原因。印刷机的发明, 对大众图书市场的扩展具有长期影响 (因为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 印刷机的发明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 这个突破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劳动的生产率。印刷机的发明还导致了在经济中对这个部门的投资的增加, 导致了 17 世纪科学革命的累积, 而此正是 18 世纪工业启蒙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的基础 (Eisenstein, 1979)。这些过程导致了北海地区人力资本形成的累积增加以及该地区的经济扩张。

本书提出的最后一个是更有效的制度和逐渐增加的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而这反过来又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这种观点最近受到了 Glaeser et al. (2004) 的批评, 在他对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的批评性评论中指出, 人力资本可能导致增长和随后的制度改善, 这就意味着西北欧更加有效的制度可以被看作是之前的人力资本形成的结果, 而不是其他的因素。人力资本形成和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知道, 发生在低地国家和英国的现代早期的两个成功革命可能并非巧合。这两个国家是证明 Glaeser 等宣称的联系的好例子: 一个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和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需要成功反抗现有政权的革命和发展更加民主的制度。荷兰独立运动和英国革命正是讲述西欧 (特别是北海地区) 复杂的寻找更加有效的制度的案例。这一追寻相对成功, 因为这一制度框架为“自下而上”的投入提供了很大便利。

300

我们的结论使我们重新考虑工业革命的开始。按照 Allen 的观点，作为这个过程的关键特征的“小发明潮”，需要在 18 世纪英格兰特定的要素成本和相对价格的背景下解释。这里的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相对较高，而资本品的成本和能源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原因是较低的利率、相对熟练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以及便利的煤矿获取条件。另外，我们可以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许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显著特征——在 17 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开始，这个时间比工业革命的“正式公认的”开始时间早了一个半世纪。发生在 18 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经济转型已经经历了超过 150 年连续的生产率提高，而它的最终基础是男男女女、工匠和商人、农民和劳动者的“百万个反叛”，这一反叛创造了一种导致西欧走向工业革命之道路的制度。

附录 1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进一步 实验：意大利和西欧

301

我们对意大利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也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实验。对于意大利，我们有 Malanima (1998, 2003) 提供的 GDP 和人口的点估计。因为他的估计主要是针对北部意大利的，所以我们在此涉及的是相对城市化的社会，土地的作用相对于英国来说比较小。意大利在食物方面或多或少也可以自给自足，这表示我们可能不会碰到在荷兰的例子中所遇到的困难。我假定在 GDP 的份额中土地贡献了 15%，劳动贡献了 60%，资本贡献了 25%，同时我们也在模型中试验了完全不同的份额数值（分别是土地占 25%、劳动占 40% 和资本占 35%），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估计对于这个模型假定的敏感程度。耕地在 1300—1800 年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劳动投入随着人口增加而增加（而且我试验了如下数据，即 1350—1450 年间工作天数从 250 天下降到 200 天，然后在 1500—1600 年间又从 200 天上升到了 250 天），而且资本存量在 1300 年由它占 GDP 的份额所决定，这一份额是 25%（或者 35%），

资本的利率我们假定为 20%。对于 14 世纪的前几十年,Allen(2001)的工资序列数据(开始于 1326 年)可由 Malanima(2004)发表的工资序列数据加以补充。

图 38 显示了模拟结果:实际工资在 14 世纪后半叶和 15 世纪前半叶平均增长了 60% (小于英格兰),在大约 1450 年之后开始下降,而且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 1750 年左右,其增长速度才慢下来,而且在 18 世纪后半叶又开始加速(根据 Malanima(2004)的看法,Allen 高估了 1750 年后的下降)。这一模式可以在以下这些假设的前提下用模型进行匹配:1)最初的投资率是 4.5%;2)1348—1400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连续每年增加 0.40%,这一速率在 1400—1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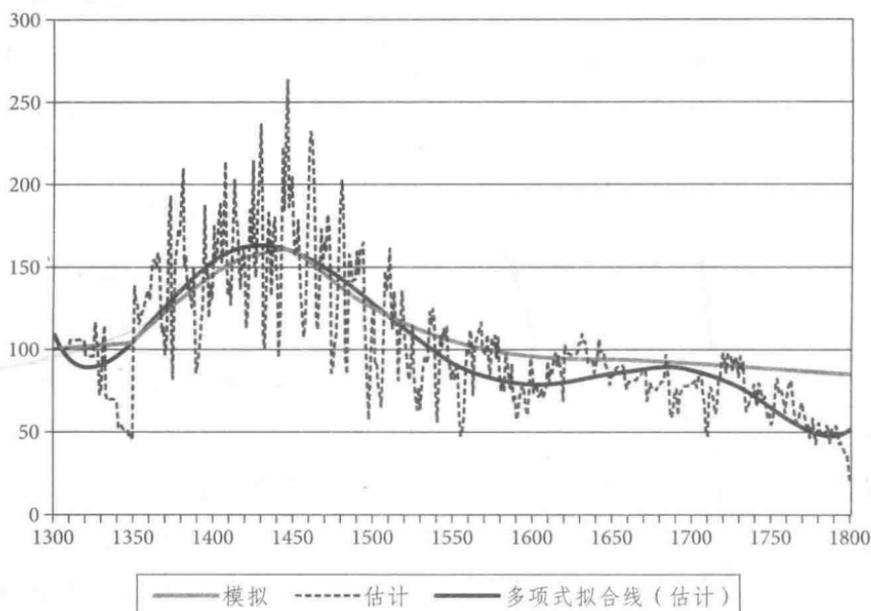


图 38 意大利:模拟的和估计的实际工资,1300—1800 年
(指数 1300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年间持续下降直至为零；3）1450年之后，投资份额也下降到仅占GDP的1%，这个较低的投资份额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期（如果模拟要反映出1750年之后的实际工资的急速下降，那么投资的下降幅度肯定会比我们假设的1%还要小，但是在此处显示的结果是投资率仍然保持在1%的结果）。

另外一个以相同的假定进行的实验（劳动在GDP中的所占份额更小），但是在1340年之后需要一个比较合适的技术进步率（1349—1420年间的这一进步率是0.20%）和一个1450年后的稍高一点比重的总投资（每年为2%）。第二个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图39描述了（这两个实验的）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从长期来看，两组估计好像比较一致，但是两种情况的模型都预测在黑死病之后的60—80年经济有强劲的增长。在1450—1550年间，Malanima的估计和柯布—道格拉斯模拟的结果再一次趋于一致，在现代早期的其他时间，这两种方式也呈现了多多少少相似的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模拟更加严格地遵从Allen的估计，即1750年之后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那么人均GDP的下降将会比Malanima [2003] 估计的大很多）。这个模拟结果与同时期的英国差异是非常显著的：那里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很高（但是人口下降的程度也很大：与意大利不足30%下降水平相比，英国几乎下降了60%），直到16世纪的前25年，实际工资都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而意大利在1450年之后的下降很厉害。这一情况也可以从不同的人均GDP的曲线中反映出来：英国在1350—1450年间的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收入长久的较高水平，而意大利的收入水平在1450年之后则不是很稳固。很显然，在黑死病发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意大利（北部）的经济非常有活力，生产率连续增长了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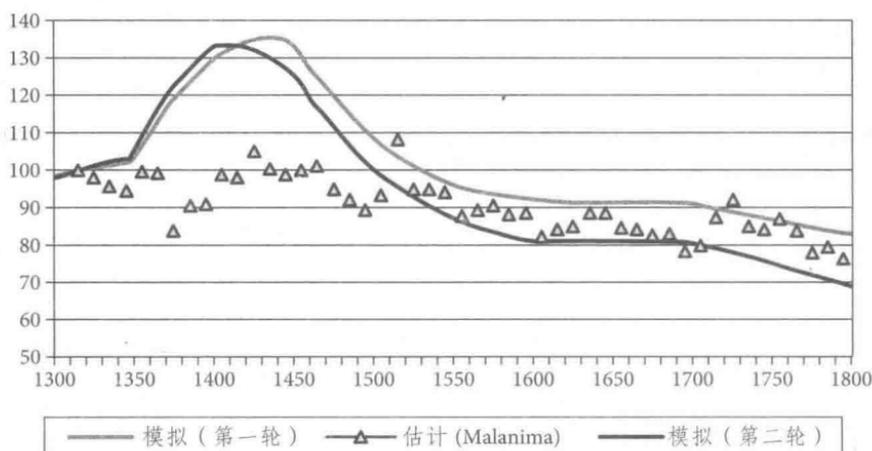


图 39 意大利：模拟的和估计的人均 GDP，1300—1800 年
(指数 1300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100 年的时间，但是这种活力在大约 1450 年之后完全消失了。相比之下，英国经济长期以来始终保持着活力，人均增长“只是”由于 16 世纪的人口激增才被打断。大约 1600 年之后英国（和荷兰）恢复了之前的活力（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看），而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本附录中关注的三个国家都非常特殊：意大利因其长期强劲的下落而被关注，荷兰和英格兰是因为其有活力的发展而被关注。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之间的是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在 1500—1800 年间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原则上，这个实验可以应用到所有国家，因为我们拥有那些国家的实际工资和人口估计的长期序列数据。但是为了使说明简单化，我仅以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进行了实验。Allen（2001）已经估计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德国、波兰、低地国家和大不列颠（首都）的实际工资的发展数据，通过将这些数据用各自国家的人口进行加权

就可以得出整个欧洲的实际工资序列数据。为了进行估计，我们在这里做了如下的标准假设：劳动占 GDP 的份额为 60%、资本和土地则各占 20%，耕地每个世纪增加 5%，资本存量的估计以 1500 年的资本存量为基础，且假定利率为 12%，人均工作日从 1500 年的 200 天上升到 1800 年的 300 天。

这一估计结果显示在图 40 中。此模拟假定了非常低的投资率（仅有 2%），并且假定没有技术进步。模拟的总体模式与估计的实际工资序列模式很相似：16 世纪经历了急速下降，1600—1750 年间则保持稳定，大约 1750 年之后开始了再一次下降。欧洲工资水平的长期发展过程似乎遵循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拟的路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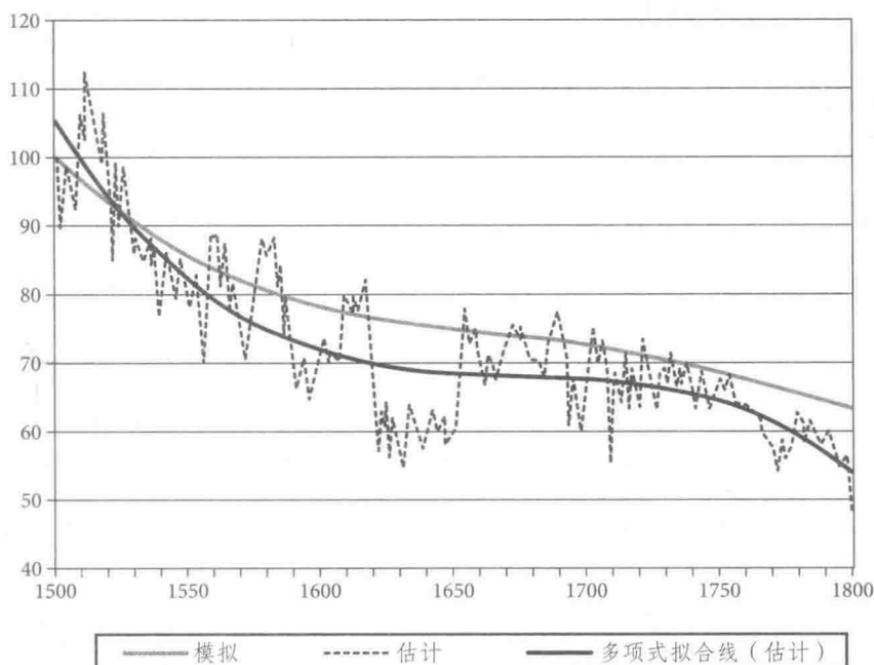


图 40 欧洲：实际工资、估计工资和模拟工资，1500—1800 年
(指数 1500 年 = 100)

资料来源：参见正文。

假定没有技术进步和新的资本形成非常低的前提下。人口增长的不同阶段（16世纪和1750年之后）产生了 Allen 所估计的模式。另外一个很明显之处是荷兰和英国实际工资的差异化发展——在荷兰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在17世纪开始上涨，这种差异化对欧洲平均工资的影响有限。影响不大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总体人口非常少，尽管占欧洲总人口的份额从1500年的不足6%轻微增长到1800年的9%。

从这个实验中得出的对欧洲人均GDP发展的总体估计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假设在整个1500—1800年间，年平均工作日增加50%，从长期来看得到的几乎是一条平坦的曲线（见图40），16世纪有一些下降，150年后略微有所恢复。为了得到较低的人均增长（与表10的估计相一致），我们必须假定人均劳动投入出现了更大的增长，然而这个假定似乎不可能发生。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让用来估计工业革命前欧洲的人均 GDP 的模型也适用于中国（或者中国部分地区）。通过将关于劳动力结构的数据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数据代入到这一模型，我们就可以估计出 1500—1800 年间的人均 GDP 发展水平（参见 Van Zanden, 2005b）。Allen（2011）曾经对 1750 年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行了估计，这个估计显示中国人的工资水平是英国的 82%。由一个学者团队完成的更加详细的研究得出了更加悲观的结论：他们估计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大约仅是英国的一半（Allen et al., 2005）。为了可靠起见，我们将使用这两种估计中的较高水平的那个估计值，结果就是我们可能会高估了中国的人均 GDP。另外，我们需要估计 GDP 和 / 或劳动力的结构。在 19 世纪初期，Rozman（1973）估计农业对 GDP 的贡献约为 70%，这个可以作为对中国整体水平的粗略估计。更加详细的估计可以从对长江三角洲的估计中得出，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发达和最繁荣的地方。Jack Goldstone（2002）使

用了李伯重 (Li, 1998) 所做的对江南 (长江三角洲的一部分) 农村经济结构和规模的详细估计, 从而得出了一组中国 1620 和 1750 年的原始工业人口和农业收入水平的估计。估计中缺失的部分是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 (李伯重估计非农人口大约占农村人口的 10%) 和城市人口 (在 1620 年大约占本地区总人口的 15%, 在 1750 年大约占总人口的 20%) 的收入水平。如果假定非农人口的收入水平是普通农民的 2—3 倍, 这个假定可能也是合理的, 那我们可以得出对江南 GDP 和劳动力结构的估计。1620 年的估计结果和 1750 年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 这两年的农业对 GDP 的贡献分别为 55% 和 65% (取决于对非农人口的相对工资水平的假定)。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约占总的劳动力投入份额较小, 例如 51% (1750 年) 或者 54% (1620 年)。这些估计点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稍微) 高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1]

将这些估计数值代入适用于欧洲的模式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 (英格兰 1800 年的指数 =100): 中国在 1750/1800 年的人均 GDP 是基线水平 (base level) 的 53%, 假定实际工资是英格兰水平的 82%, 农业劳动力的所占比重为 70%。这一结果和欧洲 1750 年的水平相似 (欧洲为 56%), 比英国 1750 年大约低 35% (英国的水平是 80%)。江南在 1750 年 (实际工资是英格兰水平的 82%, 51% 的劳动力在农业中) 的水平是 68%, 这个水平比欧洲整体的水平要高, 并且只比英国同期水平低 15% (如果估计的工资水平仅为英国水平的 50%, 那么将会使这一比率下降到 60%, 60% 的水平也就比西欧

[1] 这个是李伯重和 Jack Goldstone 两个人的估计的直接结果, 在这个估计中, 女性一个工作日相当于男性的半个工作日; 1620 年和 1750 年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可能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发展道路, 特别是较慢的结构转型过程, 因为较高的农业生产率意味着劳动者从农业领域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激励非常不足。

的水平略高)。这些结果正好在 Pomeranz 和 Maddison 所认可的差距范围内。

使用现有的估计收入水平的方法和 PPPs 将中国和欧洲做更多直接比较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价格信息非常稀少。^{*}避免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用大米作为比较的标准。从李伯重和 Jack Goldstone 所做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江南地区的人均 GDP 相当于 1750 年的 650—790 公斤稻米的水平，如果用 1620 年的稻米计算，可能又增加了一些，即变成 680 公斤和 800 公斤。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伯重的乐观估计并不意味着从明朝后期到清朝，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经济出现了增长，他的估计似乎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从 1620—1750 年的收入水平处于稳定状态（再次说明，这依赖于对非农业领域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的估计；如果收入在 1620—1750 年间出现大幅度的增长，结论可能会有所改动）。爪哇的人均 GDP 从 1815—1835 年平均相当于 490 公斤大米，这就说明在“不发达的”爪哇和“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之间人均 GDP 存在巨大差距。如果我们用一篮子消费品来测量，那么这个差距可能更大，因为中国出口工业产品和服务，而爪哇出口的是大米。根据 Van Zanden (2003) 308 的观点，爪哇的人均 GDP 大约为欧洲 1820 年的水平的一半，因此，欧洲和江南的估计的差距应该非常小——或者可能不存在。这再次显示 Maddison 对于中国 1820 年的人均 GDP 的估计值（比印尼的人均 GDP 还低）可能太低。

* 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称 PPP) 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但是，这种理论汇率与实际汇率可能有很大的差距。——译者注

参考文献

- Aalbers, J. (1977). Holland's Financial Problems (1713–1733) and the Wars against Louis XIV. In: Duke, A.C. and Tamse, C.A. (ed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vol. VI. *War and Socie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Aalbers, J. (1980). *De Republiek en de vrede van Europa. De buitenlandse politiek van de Republiek der Verenigde Nederlanden van de vrede van Utrecht (1713), voornamelijk gedurende de jaren 1720–1733*. Groningen: Wolters-Noordhoff.
- Abkoude, J. van (1788). *Naamregister van de bekendste en meest in gebruik zijnde Nederduytsche boeken*. Rotterdam: Arrenberg.
- Acemoglu, D. and Johnson, S. (2005).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no. 5, 949–995.
-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issue –5, 1369–1401.
-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2002).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NBER 9378.
- . (2005).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issue 3, 546–579.
- A'Hearn, B., Baten, J. and Crayen, D. (2006). Quantifying quantitative literacy: Age heaping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capital. *Universidad Pompeu Fabra Economic Working Paper No. 996*.
- Alderson, A.S. and Sanderson, S.K. (1991). Historic European household structures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6, 419–432.
- Allen, R.C. (2000). Economic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 1300–18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4, 1–27.
- . (2001).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 and pric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411–447.
- . (2003). Progress and Pover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 no. 3, 403–443.

- . (2004). Science, Economics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per for *GEHN conference Leiden 2004*.
- Allen, R.C., Bassino, J.P., Ma, D., Moll-Murata, C. and Zanden, J.L. van (2005). Wages, Prices, and Livings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 Paper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research/jvz-wages_prices.pdf.
- Anderson, C., Bowman, A. and Bowman, M.J. (1976). Education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tone, L. (ed.), *Schooling and Socie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20.
- Ashtor, E. (1969). *Histoire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dans l'Orient medieval*. Paris: S.E.V.P.E.N.
-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ailey, M. (1996). Demographic declin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some thoughts on recent researc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9, 1–19.
- Bairoch, P., Batou, J. and Chèvre, P. (1988). *La population des villes Européennes de 800 à 1850*. Genève: Librairie Droz.
- Bange, P. and Weiler, A.G. (1987). De problematiek van het clandestiene huwelijk in het middeleeuwse bisdom Utrecht. In: Boer, D.E.H. de, and Marsilje, J.W. (eds.) *De Nederlanden in de late Middeleeuwen*. Utrecht: Het Spectrum, 393–408.
- Bardsley, S. (1999). Women's work reconsidered: gender and wage differenti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Past & Present* 165, 3–29.
- . (2001). Reply. *Past & Present* 173, 199–202.
- Barro, R.J. and Lee, J.W. (2000). International Measures of Schooling Years and Schooling Quality,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research/growth/ddbarle2.htm>>.
- Barro, R.J.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no. 2, 407–443.
- . (1999).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Cross-Section Regression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6, no. 2, 237–277.
- . (2003).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 no. 2 (November), 231–274.
- Barron, C.M. (1989). The 'Golden Age' of Women in Medieval London. In: Bate, K. *Medieval women in Southern England*. Reading: University of Reading, 35–58.
- Bartlett, R. (1993).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London: Penguin Group.
- Bassino, J.-P. (2008). Market Integration and Famines in Early Modern Japan, 1717–1857. Working pape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paris-jourdan.ens.fr/ydepot/semin/texte0708/BAS2007MAR.pdf>).
- Bateman, V. (2006). Market Integration in Early-Moder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s 2006 annual conference*. available at: <http://www.ehs.org.uk/ehs/conference2006/Assets/BatemanNRIA.doc>.
- Baten, J. and Zanden, J.L. van (2008). Book Production and the Onset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3, no. 3, 217–235.
- Bavel, B.J.P. van (2003). Early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The importance and nature of market-oriented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side in Flanders and Holland, c. 1250–1570.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81, no. 4, 1109–1165.
- . (2006). Rural wage labour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Low Countries: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ortance and nature of wage labour in the countryside of Holland, Guelders and Flanders. *Continuity and change – A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law and demography in past societies* 21, 37–72.
- . (2008). The organization and rise of land and lease markets in northwestern Europe and Italy, c. 1000–1800. *Continuity & Change* 23, no. 1, 13–54.
- Bavel, J.P.B. van and Zanden, J.L. van (2004). The Jump-start of the Holland economy during the late Medieval crisis, c. 1350–c. 15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 Baxter, R. (1998). *Bestiaries and their uses in the Middle Ages*. Thrup: Sutton.
- Bayly, C.A. (1983).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G.S., Murphy, K. and Tamura, R. (1990).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2-37.
- Bennett, J. (1981). Medieval peasant marriage: an examination of marriage licence fines in Liber Gersumarum. In: Raftis, J.A. *Pathways to medieval peasants*.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193-247.
- Bennett, J.M. (1996). *Ale, beer and brewsters in England: women's work in a changing world, 1300-1600*.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man, H.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hardt, K. (1999). *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telli, C. (1998).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ooks in late Antiquity. In: Hodges, R. and Bowden, W. (eds.) *The Sixth Century.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Demand*. Leiden: Brill, 41-61.
- Beveridge, L. (1955-1956). Westminster wages in the manorial er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18-35.
- Billier, P. (2000). *The Measure of Multitude: Population in Mediev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rge, B. (2003). Women and Confucianism from Song to M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trilineality. In: Smith, P.J. and Glahn, R. Vo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2-240.
- Bischoff, B. (1998). *Katalog der festländischen Handschriften des neunten Jahrhunderts (mit Ausnahme der wisigothischen)*. Wiesbaden: Harrasowitz.
- Bischoff, B. and Ebersperger, B. (2004). *Katalog der festländischen Handschriften des neunten Jahrhunderts (mit Ausnahme der wisigothischen); Teil II: Laon-Paderborn*. Wiesbaden: Harrasowitz.
- Bisson, T.N. (1994). The 'Feudal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142, 6-42.
- Black, A. (1984). *Guild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Methuen.
- Bloch, M. (1961). *Feudal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omme, J. and Wee, H. van der (1994). The Belgian economy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Maddison, A. and Wee, H. van der.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over the long run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ed national accounts*. Elev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Milan 1994, session B 13.
- Blum, U. and Dudley, L. (2003). Standardised Latin and medieval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7, no. 2, 213-239.
- Bogaers, L. (2008). *Aards, betrokken en zelfbewust. De verwevenheid van cultuur en religie in katholiek Utrecht, 1300-1600*. Utrecht: Levend Verleden.
- Bonney, R. (1999). France, 1494-1815. In: Bonney, R. (e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 1200-18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3-176.
- Boomgaard, P. (1986). Buitenzorg in 1805; the role of money and credit in a colonial frontier society. *Modern Asian Studies* XX, 1, 33-58.
- . (1990). Why work for wages? Free labour in Java, 1600-1900.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2, 37-57.
- . (1996). Geld, krediet, rente en Europeanen in Zuid- en Zuidoost-Azië in de zeventiende eeuw. In: Davids, C.A. et al. (eds.) *Kapitaal, ondernemerschap en beleid*. Amsterdam: Neha, 483-511.
- . (2005). *Labor, Land, and Capital in Pre-Modern and Early-Modern Southeast Asia*.

- paper for conference *The Ris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ctor Markets*, Utrecht.
- Boone, M. and Prak, M. (1995). Rulers, patricians and burghers: the Great and Little traditions of urban revolt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Davids, K. and Lucassen, J. (eds.). *A Miracle Mirrored. The Dutch Republic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9–134.
- Boone, M. and Prak, M. (eds.) (1996). *Statuts individuelles, statuts corporatifs et statuts judiciaires dans les villes européennes (moyen âge et temps modernes)*. Louvain/ Apeldoorn: Garant.
- Borsch, S.J. (2005). *The Black Death in Egypt and Englan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oschma-Arnoudse, C. (2003). *Tot verbetering van de neeringe deser stede: Edam en de Zeevang in de late Middeleeuwen en de 16de eeuw*. Hilversum: Verloren.
- Bosker, M., Buringh, E. and Zanden, J.L. van (2008). *From Baghdad to London. 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 Europe and the Arab world, 800–1800*.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Bossenga, G. (1997). Rights and Citizens in the Old Regim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 217–243.
- Boswell, J. (1988).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the abandonment of children in Western Europe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Boswell, J.E. (2004). Expositio and Oblatio: the abandonment of children and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family. In: Neel, C. *Medieval families: perspectives on marriage, household, and children*. Toronto/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34–272.
- Botticini, M. (1999). A Loveless Economy? Intergenerational Altruism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a Tuscan Town, 1415–1436.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9, 104–121.
- Botticini, M., and Siow, A. (2003). Why dow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No. 4, 1385–1398.
- Boulakia, J.D.C. (1971). Ibn Khaldûn: A Fourteenth-Century Economis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 No. 5, 1105–1118.
- Bowie, F. (1989). *Beguine spirituality: an anthology*. London: SPCK.
- Bozzolo, C. and Ornato, E. (1980). *Pour une histoire du livre manuscrit au moyen âge*. Paris: CNRS.
- Bozzolo, C., Coq, D. and Ornato, E. (1984). La production du Livre en quelques pays d'Europe occidental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Scrittura e Civiltà* 8, 129–159.
- Brady, T.A. (1985).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R. (1989).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in Light of Developments in the West. In: Chirot, D. (ed.)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53.
- . (1993).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London/New York: Verso Books.
- Brenner, R., and Isett, C. (2002).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2 (May), 609–662.
- Britnell, R.H. (1996).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Local trade, remote trade: institutions, inform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1270–1330. In: Canaciocchi, S. (ed.) *Fiere e Mercati nella integrazione delle economie Europee secc. XIII–XVIII*. Prato: Le Monnier.
- Broadberry, S. and Bishnupriya, G. (2006). 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 Wages, Pr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Asia, 1500–180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9 (1), 2–31.

- Brown, P. (2003).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Oxford: Blackwell.
- Brundage, J.A. (1990).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igues, J.M. (2003). Evolución global de la producción. In: Infantes, V. et al. (eds.) *Historia de la edición y de la lectura en España 1472-1914*. Madrid: Fundación Germán Sánchez Ruipérez, 303-317.
- Burgers, J. and Mostert, M. (2003). Oorkondenvervalsing in Holland? De revalidatie van het 12^{de} en 13^{de}-eeuwse Hollandse oorkondenwezen. *Holland, Historisch Tijdschrift* 35, 3, 134-151.
- Buringh, E. and Zanden, J.L. van (2006).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rom the sixth through eighteenth centuries, working paper IISH.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bibliometrics/books500-1800.pdf>.
- . 2009.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rom the sixth through eighteenth centurie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Buringh, E. 2009. *On Medieval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the Latin West, Explorations of a global database*. To be published by Leiden: Brill.
- Burke, P. (2000).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mpbell, B.M.S. (2000).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Benchmarking mediev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ngland, Wales, Scotland, and Ireland, c. 129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0, 1-50.
- Cant, G.D. (2003). *A world of independent women: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The Flemish Beguinages*. Riverside, CT: Herve van Caloen Foundation.
- Carreras, A. (2003). Modern Spain. In: Mokyr, J. et al.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4, 546-5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erutti, S., Descimon, R and Prak, M. (eds.) (1995). Cittadinanze, special issue of *Quaderni Storici* 30.
- Cervellati, M. and Sunde, U. (2005).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no. 5, 1653-1672.
- Chia, L. (2003).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Smith, P.J. and Glahn, R. vo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84-328.
- Chojnacki, S. (1975). Dowries and Kinsmen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5, 571-600.
- Chor, D. (2005). Institutions, Wages and Inequality: The Case of Europe and its Periphery (1500-189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2, 547-567.
- Chow, K.W. (2004).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 M.P. (1984). *De Brabantsche Saecke. Het vergeefse streven naar een gewestelijke status voor Staats-Brabant, 1585-1675*. Tilburg: Stichting Zuidelijk Historisch Contact.
- Chuan H.-S. and Kraus, R.A. (1975).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ipolla, C. (1969).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Clanchy, M.T. (1979).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Edward Arnold.
- Clark, E. (1982). 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7, 307-320.
- Clark, G. (1988). The cost of capital and medieval agricultural technique. *Explorations*

- in *economic history* 25, 265–294.
- . (2002). Land rental values and the agrarian economy: England and Wales, 1500–1914.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6, 281–309.
- . (200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1209–200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6), 1307–1340.
- .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The Long March of History: Farm Wage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ngland 1209–186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0, 97–136.
- Cockx-Indestege, E. et al. (1968–94). *Belgica Typographica*. IV Volumes. Nieuwkoop: De Graaf.
- Coleman, E. (2004). Cities and communes. In: Abulafia, D. (ed.)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58.
- Cooper, J.P. (1976). Patterns of inheritance and settlement by great landowner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Goody, J., Thirsk, J. and Thompson, E.P. (eds.) *Family and inheritance: 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2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327.
- Corcia, J. di (1978). Bourg, Bourgeois, Bourgeois de Paris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0, 207–233.
- Cornell, L.L. (1987). Hajnal and the household in Asia: a comparativist history of the famil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1600–1870.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2, 143–162.
- Cottineau, L.H. (1939). *Répertoire topo-bibliographique des abbayes et prieurés*. 2 vols. Macon: Protat Frères.
- Cowdrey, H. (1970). The Peace and the Truce of Go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46, 42–67.
- Crafts, N.F.R. (1977).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some thoughts on the question “Why was England Fir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0, 429–441.
- . (1985).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rafts, N.F.R. and Harley, C.K. (1992). Output Growth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estatement of the Crafts-Harley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5, 703–730.
- Crawcour, E.S. (1961). Development of a Credit system in 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1, 3 (September), 342–360.
- Crawford, K. (2007). *European Sexualities,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ijpers, P.M.H. (1998). *Teksten als koopwaar: vroege drukkers verkennen de markt*. Nieuwkoop: De Graaf Publishers.
- Dale, M.K. (1933). The London Silkwome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 324–325.
- Darnton, R. (2002). Book production in British India, 1850–1900. *Book History* 5, 239–262.
- Davis, N.Z. (1986). Women in the crafts in Sixteenth-Century Lyon. In: Hanawalt, B.A. (ed.) *Women and work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67–197.
- Deane, P. and Cole, W.A. (1962).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ane, P. (1965).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kker, R. (1982). *Holland in beroering. Oproeren in de 17de en 18de eeuw*. Baarn: Ambo.
- Derville, A. (1984). L’alphabétisation du peupl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Revue du Nord*, LXVI, 759–772.

- De Soto, H.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 Descimon, R. (1993). Bourgeois de Paris: les migrations d'un privilège, XIV-XVIII siècle. In: Charles, C. (ed.) *Histoire sociale, histoire globale?* Paris: MSH, 173-182.
- Deursen, A.Th. van (1994). *Een dorp in de polder. Graft in de zeventiende eeuw*. Amsterdam: Bert Bakker.
- Dirksen, W. (1966). Enige opmerkingen over de belastingheffing in 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 in de 17de en de 18de eeuw. In: *L'impôt dans le cadre de la ville et de l'état.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pa 1964*. Pro Civitate, 235-261.
- Divekar, V.D. (1989). *Prices and Wages in Pune Region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1805-1830*. Pune: Gokhal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Duby, G. (1974).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Warriors and Peasants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 (1978).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s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upont, G. (2001). Van Copkin over Coppin naar Jacob. *Naamkunde* 22, 2, 111-217.
- Dyer, C. (1989).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 1200-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How urbanized was medieval England? In: Duvosquel, J.M. and Thoen, E. (eds.) *Peasants and Townsmen in medieval Europe*. Gent: Snoek Ducaju & Zoon, 169-183.
- . (1998).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 1200-1520*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yke, P.A. van (2005).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Eastman, L.E. (1988).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brey, P.B. (2003).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Edlund, L. and Lagerlöf, N.-P. (2006). Individual vs. Parental Consent in Marriage: implications for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growth. *Working paper Columbi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columbia.edu/~le93/LoveWPJan23_06.pdf.
- Eisenstein, E.L.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vin, M.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5 vols, ninth edition, reprint 1898. Edinburgh: Black.
- Engelen, T. (2005). The Hajnal hypothesis and transition theory. In: Engelen, T. and Wolf, A.P. (ed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Hajnal hypothesis*. Amsterdam: Aksant, 51-73.
- Engels, F. (197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ed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Epstein, S.A. (1991). *Wage Labor and Guilds in Medieval Europ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Epstein, S.R. (1991). Cities, Regions and the Late Medieval Crisis: Sicily and Tuscany compared. *Past & Present* 130, 3-50.
- . (1998). Craft Guilds, Apprenticeship,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684-714.
- . (2000). *Freedom and growth: 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00-1750*. London: Routledge.
- . (2001). The late medieval crisis as an 'integration crisis'. In: Prak, M. (ed.) *Early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5-51.

- Epstein, S.R. and Prak, M., (eds.). (2008). *Guilds, Innovat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14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bvre, L. and Martin, H.J. (1976). *The coming of the Book*. London: Verso.
- Federico, G. (2002). The world economy 0–2000 AD: a review article.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6, 111–121.
- Feinstein, C.H. (1998). Pessimism perpetuated: 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during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625–658.
- .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illiamson curv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699–729.
- Finnane, A. (2004).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öldvari, P. and Zanden, J.L. van (2006).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onvergence, 1800–2000. paper for session 116 A *Global Hist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XIV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Helsinki, 21–25 August.
- Fossier, R. (2000).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Reuter, T.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II, c. 900–c. 10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63.
- . (2004). The Rural Economy and Demographic Growth. In: D. Luscomb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c. 1024–11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46.
- Fox, H.S.A. (1996). Exploitation of the Landless by Lords and Tenants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In: Razi, Z. and Smith, R.M., (eds.). *Medieval society and the manor court*, 518–569. Oxford/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 Frank, A.G.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eeman, R.B. and Oostendorp, R. (2001). The Occupational Wages around the World Data Fil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0, no. 4, 379–403.
- French, K.L. (2007). *The Good Women of the Parish: Gender and Religion After the Black Deat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rey, B.S. (2002). The Role of Deterrence and Tax Morale in tax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Jelle Zijlstra Lecture 1*, NIAS: Wassenaar.
- Fritschy, W. (1996). *Gewestelijke Financiën ten tijde van de Republiek der Verenigde Nederlanden. Deel I Overijssel (1604–179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geschiedenis.
- . (2004). A ‘financi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public finance in Holland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1568–164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 Fukao, K., Ma, D. and Yuan, T. (2007). Real GDP in pre-War East Asia: A 1934–36 Benchmark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omparison with the U.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3, 3 (September), 503–537.
- Furet, F. and Ozouf, J. (1977). *Lire et écrire: alphabétisation des Françaises de Calvin à Jules Ferry*.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Furubotn, E.G. and Richter, R. (2000).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allman, J.M. (1984). Relative Ages of Colonial Marriag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4, 609–617.
- Galloway, P. (1988). Basic Patterns in Annual Variations in Fertility, Nuptiality, Mortality and Prices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opulation Studies* 42, 275–303.
- Galor, O. (2005). 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 In: Aghion, P. and Durlauf, S.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Elsevier 171–293.
- Galor, O. and Moav, O. (2002).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1133–1192.
- Galor, O. and Weil, D.W.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the

- Malthusian Regime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806–828.
- Gates, H. (2001). Footloose in Fujian: economic correlates of footbinding,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3, 130–148.
-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lder, H.A.E. van (1982, orig. 1918). *De levensbeschouwing van Cornelis Pieterszoon Hoof, burgemeester van Amsterdam 1547–1626*. Utrecht: Hes Publishers.
- Gelderblom, O. (2000). *Zuid-Nederlandse kooplieden en de opkomst van de Amsterdamse stapelmarkt (1578–1630)*. Hilversum: Verloren.
- Gelderblom, O. and Jonker, J. (2004). Completing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The Financ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Rise of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595–161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 no. 3, 641–672.
- Gibson, Alex J.S. and Smout, T.C. (1995). *Prices, food and wages in Scotland 1550–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es, F. and Gies, J. (1989).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London: Harper & Row.
- Gilmont, J.F. (ed.) (1998).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ook*. Aldershot: Ashgate.
- Glaeser, E.L.,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and Shleifer, A. (2004).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271–303.
- Glick, T.F. (1979). *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P.J.P. (1986a). Female labour, service and marriage in the Late Medieval Urban North. *Northern History* 22, 18–38.
- . (1986b). Marriage, Migration, Servanthood and Life-cycle in Yorkshire Towns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me York Cause Paper Evidence. *Continuity and Change* 1, 141–169.
- . (1992a). *Woman is a worthy wight: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c. 1200–1500*. Wolfeboro Falls (NH): Alan Sutton.
- . (1992b). *Women, work, and life cycle in a medieval economy: women in York and Yorkshire, c. 1300–15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2004). *Youth in Middle Ages*. York: York Medieval Press.
- Goldstone, J. (1996). Gender, work and cultur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e early to England but late in Chi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9, 1–21.
- . (2002). 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A Comparison of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and Imperi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UCLA.
- Goldthwaite, R.A. (1990). *The Building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oody, J. (1976).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The oriental, the ancient and the primitive: systems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of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The European Family: an historico-anthropological essay*. Oxford: Blackwell.
- Gorman, M. (2002). Manuscript books at Monte Amiata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Scriptorium* 56, 225–293.
- Gottlieb, B. (1993). *The family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industrial age*.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ntham, G. (1999). Contra Ricardo: on the macroeconomics of pre-industrial economie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3, 199–233.

- Greif, A. (2000).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exchange: a research agenda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4, 251–285.
- . (2005). Commitment, Coercion, and Markets: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Institutions Supporting Exchange. In: Ménard, C. and Shirley, M. (eds.)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ordrecht: Springer, 727–786.
- .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if, A., Milgrom, P. and Weingast, B.R. (1994). 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the merchant gui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4: 745–776.
- Greven, J. (1912). *Die Anfänge der Begin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Volksfrömmigkeit und des Ordwesens im Hochmittelalter*. Munster Westfalen: Aschendorff.
- Grever, J.H. (1981). Committees and Deputations in the Assemblies of the Dutch Republic 1660–1668. *Parliaments, Estates and Representation* 1, 13–34.
- Groenveld, S. and Leeuwenberg, H.L.Ph. (eds.). (1979). *De Unie van Utrecht: wording en werking van een verbondsacte* Geschiedenis in veelvoud, vol. 6.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Groenveld, S. (1990). *Evidente factiën in den staet. Sociaal-politieke verhoudingen inde 17^e-eeuwse Republiek der Vernigde Nederlanden*. Zeven Provinciën Reeks vol. 1. Hilversum: Verloren.
- Gross, J.P. (1993).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ast & Present* 140, 79–127.
- Gustafsson, B. (1987). The rise and economic behaviour of medieval craft guilds. An economic-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h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nd Economy and History* 35, nr. 5, 1–4.
- Haider, N. (2007). Structure and Movement of Wages in the Mughal Empire: 1500–1700. In: Lucassen, J. (ed.) *Wages and Currency; Global Compariso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n: Peter Lang.
- Hajnal, J. (1965). European marriage in perspective. In: Glass, D.V. and Eversley, D.E.C.,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 . (1982). Two k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449–494.
- Hamaker, H.G. (1876). *De rekeningen der Grafelijkheid van Holland onder het Henegouwsche Huis, II*. Utrecht.
- Hanawalt, B. (1993). *Growing up in medieval London: the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in history*.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awalt, B.A. (1986). *The ties that bound: peasant families in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ley, C.K. (1993). Reassess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okyr, J. (e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171–226.
- Harris, M.H. (1976).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Metuchen, NJ: Scarecrow.
- Hart, S. (1976). *Geschrift en Getal*. Historische Vereniging Holland: Dordrecht.
- Hartman, M.S. (2004). *The household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a subversive view of the Western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tcher, J. and Bailey, M. (2001). *Modelling the Middle Ages.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ng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tcher, J. (2001). Debate: Women's Work Reconsidered: Gender and Wage Differenti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Past & Present* 173, 191–198.
- Hayami, A. (2001). *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Pre-Moder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 (2004). Introduction. In: Hayami, Y., Saito, O. and Toby, R.P.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600–1990. Volume I: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600–18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6.

- Hayami, A. and Kitô, H. (2004). Demograph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Hayami, Y., Saito, O. and Toby, R.P.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600–1990. Volume I: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600–18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3–247.
- Hellie, R. (1999). *The economy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Russia 1600–172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nley, D. (2008). Capital scarcity and indebtedness: reflections on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Southeast Asia. In: Henley, D. and Boomgaard, P. (eds.) *Credit and Debt in Indonesia, 860–1930: From Peonage to Pawnshop, from Kongsi to Cooperative*. Singapore: ISEAS.
- Herlihy, D. (1985). *Medieval households*. Cambridge (MA)/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rlihy, D. and Klapisch-Zuber, C. (1978). *Les Toscans et leur familles*. Paris: EHESS.
- (1985).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 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rzog, T. (2002). *Defining Nations. Immigrants and citizens in Early Modern Spain and Spanish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ilton, R.H. (1975).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the Ford lectures for 1973, and related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obsbawm, E.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Hoffman, P. (2004). *Why is that Europeans Ended Up Conquering the Rest of the Globe? Pric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Western Euro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 Paper conference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Utrecht, 19–21 August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globalhistory.php>.
- Hoffman, Ph.T. and Norberg, K. (1994). Conclusion. In: Hoffman, P. and Norberg, K. (eds.) *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450–17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99–310.
- Homer, S. and Sylla, R. (1996).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Hooft, P.C. (1925). *Memoriën en adviezen van Cornelis Pietersz. Hooft*. ed. by van Gelder, E. vol. 2, *Werken uitgegeven door het Historisch Genootschap*. Utrecht: Kemink & Zoon.
- Hoppenbrouwers, P.C.M. (1985). Maagschap en vriendschap: een beschouwing over de structuur en functies van verwantschapsbetrekkingen in het laat-middeleeuwse Holland. *Tijdschrift Holland* 17. 69–108.
- Houston, R.A. (1988).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 Howell, M.C. (1998). *The marriage exchange: property, social place, and gender in cities of the Low Countries, 1300–1550*.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ang, Ph.C.C.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ff, T.E. (1993).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Islam,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ghes, D.O. (1978). From brideprice to dowry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62–296.
- Hume, D. (1748). 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 In: Hume, D.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Available at <http://www.constitution.org/dh/humannat.htm>.
- Humphries, J. (2003). English apprenticeship: 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aul A. David and Mark Thomas (eds.). *The Economic Fu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3–103.
- Humphries, J. and Horrell, S. (1995). Women'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 Transition to the Male Breadwinner Family, 1790–1865.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VIII, 89–117.
- Humphries, J., Horrell, S. and Voth, H.J. (1998). Statur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13, 73–115.
- Hyde, J.K. (1973).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Italy: the evolution of civil life 1000–1350*. London: McMillan. ILO. (1938–1955). *Year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Geneva: ILO.
- Impens, G. (1965). Lonen in de Plantijnse drukkerij (16^e–18^e eeuw). In Verlinden, C. et al. (eds.) *Dokumenten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prijzen en lonen in Vlaanderen en Brabant (XIV^e–XIX^e eeuw)*, II, De Tempel, 1057–1236.
- Indisch Verslag, 1878–1896* (Colonial Reports of Indonesia). Den Haag: Staatsdrukkerij.
- Isa, Z. (1972).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Indonesia: 1602–1970*.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 Israel, J.I. (1979). The Holland Towns and the Dutch-Spanish Conflict, 1621–1648. *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94, 41–69.
- Iwahashi, M. (1981). *Kinsei Nippon Bukka-shi no Kenkyu*. Tokyo: Ohara Shinseisha.
- Jacks, D. (2004).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North and Baltic Seas, 1500–180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33 (3), 285–329.
- . (2005). Intra- and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y, 1800–191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2, 381–413.
- Jansson, A., Palm, L.A. and Söderberg, J. (1991). *Dagligt bröd i onda tider: priser och löner i Stockholm och Västsverige 1500–1700*. Göteborg: Institutet för lokalhistorisk forskning.
- Jarrick, A. (1999). *Back to Modern Reason: Johan Hjerpe and other Petit Bourgeois in Stockholm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P. (2003). Age, gender and the wage rate in Britain, 1830–1930. In: Scholliers, P. and Schwarz, L. (eds.) *Experiencing Wages.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Wage Forms in Europe since 15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29–251.
- Jones, E. (1987).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C.I. (2001). 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 *Advances in Macroeconomics* 1, 1–43.
- Jones, P. (1997). *The Italian City-State: from commune to signor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ong, M. de (1982). Monniken, ridders en geweld in elfde-eeuws Vlaanderen. *Sociologische Gids* XXIX 2, 279–296.
- Jun, S.H. and Lewis, J. (2007). Wages, Rents, and Interest Rates in Southern Korea, 1700 to 1900.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24, 217–283.
- Karant-Nunn, S.C. and Wiesner, M.E. (2003). *Luther on women: a source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lly, J. (1984).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nnedy, H. (2002). Military pay and the economy of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Historical Research* 75 (2), 155–169.
- Kennedy, L. and Dowling, M.W. (1997). Prices and Wages in Ireland, 1700–1850.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XXIV, 62–104.
- Ker, N.R. (1964). *Medieval Libraries of Great Britain, a list of surviving books*. London: Office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nd edition.
- Kirshner, J. and Molho, A. (1978). The Dowry Fund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Early Quattrocento Flore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0. 403–438.

- Kishner, J. and Mayali, L. (eds.) (2002). *Privileges and Rights of Citizenship.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Berkeley: Robbins Collection.
- Klapisch-Zuber, C. (1985).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lapisch-Zuber, C. (1986). Women servants in Florence during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 In: Hanawalt, B. *Women and work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56–80.
- Knotter, A. (1984). De Amsterdamse bouwnijverheid in de 19e eeuw tot ca. 1870. Loonstarheid en trekarbeid op een dubbele arbeidsmarkt.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10, 123–154.
- Kochanowicz, J. (1989). The Polish Economy and the Evolution of Dependency. In: Chirot, D. (ed.)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2–131.
- Koepke, N. and Baten, J. (2005). The biological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last two millennia.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9, no. 1, 61–97.
- Kok, J. (1990). The moral nation. Illegitimacy and bridal pregnancy in the Netherlands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7–37.
- Kokken, H. (1991). *Steden en Staten. Dagvaarten van steden en Staten van Holland onder Maria van Bourgondië en het eerste regentschap van Maximiliaan van Oostenrijk (1477–1494)*. The Hague: Stichting Hollandse Historische Reeks.
- Kornicki, P. (2001).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 Kowaleski, M. (1998). Singlewome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In: Bennett, J.M. and Froide, A.M. *Singlewomen in the European past, 1250–18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38–81.
- Kowaleski, M. and Bennett, J.M. (1989). Crafts, guilds, and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fifty years after Marian K. Dale. In: Bennett, J.M. *Sisters and workers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38.
- Krantz, O. (2004). An estimate of Swedish GDP in 1571. In: Heikkinen, S. and Zanden, J.L. (eds.)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Aksant, 105–131.
- Kreager, P. and Schroeder-Butterfill, E. (2005). *Ageing Without Children: European and Asi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Kremer, M. (1993).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681–716.
- Kuijpers, E. (1994). *Leren lezen en schrijven. Onderwijs en alfabetisering in Amsterdam in de 16^e en 17^e eeuw*.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 Kuijpers, E. (1997). Lezen en schrijven. Onderzoek naar het alfabetiseringsniveau in zeventiende-eeuws Amsterdam.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23, 490–523.
- Kuijpers, E. and Prak, M. (2002). Burger, ingezetene, vreemdeling: burgerschap in Amsterdam in de 17^e en 18^e eeuw. In: Kloek, J. and Tilmans, K. (eds.), *Burger: een geschiedenis van het begrip 'burger' in de Nederlanden van de Middeleeuwen tot de 21^{ste} eeuw*.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13–132.
- Kuran, T. (2001).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Islamic Law: Origins,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Waqf System. *Law and Society Review* 35, (4), 841–897.
- . (2003). The Islamic commercial crisis: institutional roots of economic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3, 414–447.
- Kuznets, S.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even, A.H. (1992). The Frankfurt and Leipzig book fai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utch book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Berkvens, C. et al. (eds.) *Le Magasin de L'Univers. The Dutch Republic as the centre of the European book trade*. Leiden: Brill, 185–199.
- Laiou-Thomadakis, A.E. (1993). *Consent and coercion to sex and marriag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 Laiou, A.E. (2007a). Political History: an outline. In Laiou, A.E.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9–31.
- . (2007b). The Agrarian Economy, Thirteenth–Fifteenth Centuries. In: Laiou, A.E.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311–377.
- Landes, 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 Laslett, P. (1977).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 essay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2). Family and household as work group and kin group: areas of traditional Europe compared. In: Wall, R., Robin, J. and Laslett, P. (eds.)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13–563.
- . (1988). Family, Kinship and Collectivity as Systems of Suppor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a consideration of the nuclear-hardship hypothe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3, 152–175.
- Latzko, D.A. (2005).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economies of scale',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http://www.personal.psu.edu/faculty/d/x/dx131/research/articles/military.pdf>>.
- Lee, J.Z. and Feng Wang (1999).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Cambridge (MA)/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euwen, B. van (2007).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Indonesia and Japa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1890–2000*. PhD thesis Utrecht University.
- Leroy Ladurie, E. (1976). Family structures and inheritance custom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In: Goody, J., Thirsk, J., and Thompson, E.P. Past & Present. *Society, Family and inheritance: 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2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70.
- Levi, M. (1997). *Consent, Dissent, and Patrio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B.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 (2003). Was there a 'fourteenth-century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 land, technology, and farm management. In: Smith, P.J. and Glahn, R. Vo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5–75.
- Li, Lillian M. (1992). Grain Prices in Zhili Provinces, 1736–1911: A preliminary study. In Rawski, E.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9–100.
- Lindert, P.H. and Williamson, J.G. (1982). Revising England's social tables 1688–181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 385–409.
- Lindert, P. (1998). Poor relief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 Britain versus the Continent, 1780–188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 101–141.
- Lindert, P., Allen R.C., Devereux, J., Hellie, R., Hoffman, P.T., Jacks, D.S., Ma, D., Mironov, B.N., Pamuk, S., Zanden, J.L. van, and Ward, M. (2002). Preliminary Global Price Comparisons, 1500–1872. Paper at session on World Living Standards since thirteenth century. *XIIIth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Buenos Aires.
- Lindert, P. (2003). Voice and Growth: was Churchill righ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3, 315–350.
- Liu, G.W. (2005). *Wrestling for Pow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 China, 1000–1770.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Long, J.B. de and Shleifer, A. (1993). Princes and Merchants: European City growth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0 (2), 671–702.
- Long, J.B. de. (2000). Overstrong against thyself: war, the state, and growth in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Olson, M. and Kähkönen, S. (eds.). *A not-so-dismal science. A broader view of economics and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8–168.
- Lopez, R.S. (1976).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rd, B. (1955–1956). Westminster wages in the manorial er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18–35.
- Lowe, A.E. (1934–1971). *Codices Latini Antiquiores, a palaeographical guide to Latin manuscripts prior to the ninth century*, 1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ucas, Robert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 Lucas, R. (2002).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ucassen, J. (2005). Proletari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India: concepts and methods, Paper for the workshop *The Ris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ctor Markets*, Amsterdam.
- Lydon, G. (2007). A ‘Paper Economy of Faith’ without faith in paper; A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Islamic institutional stagnation. Paper conference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trecht 2007.
- Lynch, K.A. (2003).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Europe, 1200–1800: the urban foundations of west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 D. (2004). Why Japan, Not China,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Sericulture, 1850–193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369–394.
- . (2008).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in 1911–1937: 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8, no. 2, 355–392.
- MacDonald, K. (1999).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Human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1, 2, 223–246.
- Macfarlane, Alan (1986).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1300–1840: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ddison, A.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 .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 . (2003).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OECD, Paris.
- . (2004). Macromasurement before and after Colin Clark. Working paper at <http://www.eco.rug.nl/~Maddison/articles/colin_clark.pdf>.
- Malanima, P. (1994). Italian Economic Performance, 1600–1800. In: Maddison, A. and Wee, H. van der (ed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over the long run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ed national accounts*. Elev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Milan 1994, session B 13.
- . (1998). Italian cities 1300–1800.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XIV, 2, 91–126.
- . (2003). Measuring the Italian economy, 1300–1861.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XIX.
- . (2004). Labour, Productivity, Wages in Italy 1270–1913. Paper for conference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Utrecht 2004.
- . (2005). Urbanisation and the Italian economy during the last millenium,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9 (1), 97–123.
- 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ker, G. (1982). Russia and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notes and observations, *Slavic Review* 41, 266–284.
- Marmé, M. (2005). *Suzhou, where the Goods of all, the Provinces Conver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H.-J. (1982). La Révolution de l'imprimé. In: Martin, H.-J. and Chartier, R. (eds.),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I, Promodis, 145–163.
- Mayhew, G. (1990). Life-cycle, service and the family unit in early modern Rye, *Continuity and Change* 5, 201–225.
- Mayhew, N. (1995). Modelling medieval monetisation. In: Britnell, R.H. and Campbell, B.M.S. (eds.), *A commercialising economy. England 1086 to c. 130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55–78.
- Maynes, M.J. and Waltner, A. (2001). Childhood, youth, and the female life cycle. Women's life-cycle transitions in a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mparing marriage in China and Europe.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2, 11–21.
- Mazundar, S. (1998).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Harvard Asia Center.
- McCants, A.E.C. (1997). *Civic Charity in a Golden Age: Orphan Care in Early Modern Amsterdam*. Urbana/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Closkey, D. and Nash, J. (1984). Corn at interest: the extent and cost of grain storage in medieval Engl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74–187.
- McCormick, M. (2001).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Dermott, J. (2005). The Ascendancy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In: Brokaw, C.J. and Chow, K.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cDonnell, E.W. (1954). *The beguines and beghards in medieval cultur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Belgian scen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McEvedy, C. and Jones, R. (1978).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 McKitterick, R. (1989).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ulen, A.J. van der (1905). *Studies over het Ministerie van Van de Spiegel*. Leiden: Kooyker.
- Miao Y. 繆永禾. (2000). *Mingdai chuban shigao* 明代出版史稿 (A draft history of publish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Milanovic, B. M. (2006). An estimate of average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Byzantium around year 1000.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2 (3), 449–470.
- Mitch, D. (2004). Education and skill of the British labour force. In: Floud, R. and Johnson, P.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ume 1, Industrialisation, 17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terauer, M. and Sieder, R. (1981). *The European family: patriarchy to partnership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 Miyamoto, M. (1963). *Kinsei Ōsaka no bukka to rishi*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in early modern Osaka). Tokyo: Sobunsha.
- . (1988). *Kinsei Nihon no shijō keizai*. Tokyo: Yuhikaku.
- . (2004).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okugawa Economy. In: Hayami, Y., Saito, O. and Toby, R.P.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600–1990. Volume I: Emergence of economic society in Japan 1600–18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85.
- Molho, A. (1998). Reception and marriage strateg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case of woman's ages. *Renaissance Quarterly* 41, 193–217.
- . (1994). *Marriage alliance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ll-Murata, C. (2003). Maintenance and Renov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City God Temple and the Peking City Wall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 Moll-Murata, C. (2004). Chinese Price and Wage Data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vailability and Problems. Paper conference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Utrecht.
- . (2005). Working for the State: The Chinese Labour Market for Manufacture and Construction, 1000–1900. Paper GEHN/Utrecht conference *The Ris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ctor Markets*. Utrecht.
- . (2006). Chinese Guilds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An Overview paper for conference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Utrecht University, 5–7 October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return-guilds.php>.
- Moll-Murata, Christine (2008). *State and Crafts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abilitationsschrift Tuebingen.
- Mokyr, J. (1985). *Why Ireland Starved: An Analytical and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y, 1800–1850*. London: Allen & Unwin.
- Mokyr, J. (1990).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or, G. de (2000). *Lonen en prijzen in het Cisterciënzinnenklooster Leeuwenhorst bij Noordwijkerhout*. Amsterdam: Amsterdamse Historische Reeks.
- Moor, T. de (2008). The silent revolu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ence of Commons. Guilds and other forms of Corporate Collective Action in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3, 179–212.
- Moor, T. de, and Zanden, J.L. van (2005). Girlpower.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 and Labour Markets in the North Sea Region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 Paper for the workshop *The Ris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ctor Markets*, Amsterdam.
- Moor, T. de, and Zanden, J.L. van (2006). *Vrouwen en de geboorte van het kapitalisme*. Amsterdam: Boom.
- . (2008). 'Van fouten kan je leren. Een kritische benadering van de mogelijkheden van 'leeftijdstapelen' voor sociaal-economisch historisch onderzoek naar gecijferdheid in het pre-industriële Vlaanderen en Nederland'.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5, no. 4, 55–81.
- Moor, T. de, Zanden, J.L. van, and Zuijderduijn, J. (2009). Micro-Credit in Late Medieval Waterland. Households 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markets in Edam en De Zeevang, 1462–1563. *Paper Prato Conference*, 2008. To be published in 2009.
- Moore, R.I. (2000). *The First European Revolution, c. 970–1215*. Oxford: Blackwell.
- Mostert, M. (2006). Forgery and Trust. In: Schulte, P., Mostert, M. and Renswoude, I. van (eds.) *Strategies of Writing: Studies on Text and Trust in the Middle Ages: Papers from "Trust in Writing in the Middle Ages"* 13. Utrecht Studies in Medieval Literacy. Utrecht/Turnhout: Brepols, 37–59.
- Moran, J.A.H. (1985). *The growth of English schooling, 1340–1548: learning, literacy, and laicization in Pre-Reformation York Dioce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örke, O. (1997). 'Stadholder' oder 'Staetholder'? *Die Funktion des Hauses Oranien und seines Hofes i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Republik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im 17. Jahrhundert*. Münster: Niederlande Studien
- Munro, J.H. (2007). The usury doctrine and urban public finances in Late-Medieval Flanders: Annuities, excise taxes and income transfer from the poor to the rich. Working paper 288,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Murayama, S. (2001). Regional Standardization of the age of marriage. A compar-

- tive study of preindustrial Germany and Japa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6, no. 2, 303–324.
- Murray, J. (1998). Individualism and consensual marriage: some evidence from medieval England. In: *Women, marriage, and family in medieval Christendom: essays in memory of Michael M. Sheehan*. (ed.) Kalamazoo (MI): 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21–151.
- Nader, H. (1990). *Liberty in Absolutist Spain. The Habsburg Sale of Towns, 1516–170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 Nagata, Mary Louise (2006). *Brotherhoods and Stock Societies: Guilds in Pre-modern Japan*. paper for conference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Utrecht 5–7 October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return-guilds.php>.
- Neal, L. (1990).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ddermeyer, U. (1996).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einer Quantitativen Bestimmung der Buchproduktion im Spätmittelalter. *Gazette du Livre Médiéval* 28, 23–32.
- . (1998). *Von der Handschrift zum gedruckten Buch*. 2 vols. Wiesbaden, Harrasowitz.
- Needham, J. (1970).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l, C. (1989). The origins of the beguines. In: Bennett, J.M., (ed.) *Sisters and workers in the Middle Ages*, 240–260. Chicago (Ill)/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cholas, D. (1985). *The domestic life of a medieval city: women, children, and the family in fourteenth-century Ghent*. Lincoln/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Nishikawa, S. (1978). Productivity, subsistence, and by-employmen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oshu.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69–84.
- Nogal, C.A. and Escosura, L.P. de la (2007). The decline of Spain (1500–1850): conjectural estimate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 319–366.
- Noonan, J.T. (1973). The power to choose. *Viator* 44, 414–434.
- Noordegraaf, Leo, and Zanden, J.L. van (1995). Early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id labour benefit from Holland's Golden Age?. In: Davids, K. and Lucassen, J. (eds.) *A miracle mirrored. The Dutch Republic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0–437.
- Noordegraaf, L. (1985). *Hollands welvaren? Levensstandaard in Holland 1450–1650*. Bergen: Octavo.
- North, D.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C. and Weingast, B.W. (1989).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803–832.
- O'Brien, P.K.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 1660–18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I, 1–32.
- O'Brien, P.K. and Hunt, P.A. (1993). The rise of a fiscal state in England, 1485–1815. *Historical research* 66, 129–176.
- O'Brien, P.K. (2001). Fiscal Exceptionalism: Great Britain and its European Rivals. Working Paper LSE no. 65/01.
- Ó Crónín, D. (1995). *Early Medieval Ireland 400–1200*. London: Longman.
- Ogilvie, S. (2007). 'Whatever Is, Is Right'?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0, 4.
- Oldewelt, W.F.H. (1950). De beroepsstructuur van de bevolking der Hollandse stemhebbende steden volgens de kohieren van de familiegelden van 1674, 1715 en 1742.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24, 80–162 and 25 (1951), 167–249.
- Oldfield, A. (1990). *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Ormrod, D. (2003). *The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65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ourke, K.H. and Williamson, J.G.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Orthwaite, R.B. (1995). *Clandestine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50*. London/Rio Grande: Hambledon .
- Overton, M. and Campbell, B.M.L. (1997).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dans l'agriculture anglaise, 1086–1871. *Histoire et Mesure* 11, 255–297.
- Ozment, S.E. (1983). *When fathers ruled: 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 Cambridge, (MA)/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Özmuçur, S. and Pamuk, S. (2002). 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1469–1914.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LXII, 293–321.
- Palacios, F.Z. (1994). *Fluctuaciones económica en un período de crisis: Aragón en la baja edad media (1300–1430)*.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 Palmer, R.R. (1959).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Volume 1: The Challe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muk, S.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 3, 289–317.
- Parker, C.H. (1998). *The Reforma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Welfare and Calvinist Charity in Holland, 1572–16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er, G. (1976). Why did the Dutch Revolt last so long?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ifth series XXVI, 53–72.
- Pedersen, J. (1984). *The Arabic Boo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rdue, P.C. (1992). 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Rawski, E.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9–100.
- Perkins, D.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 Persson, K.G. (1988). *Pre-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 Persson, Karl Gunnar (1999). *Grain Markets in Europe, 15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eghem, P.P.J.L. van (1988). La notion de ville impériale aux Pays-Bas.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Deventer en tant que "ville impériale". In: Nève, P.L. and Moorman van Kappen, O. (eds.) *Conservare Jura*. Devnter: Kluwer, 115–137.
- Pfeil, T. (1998). *Tot redding van het vaderland'. Het primaat van de Nederlandse overheidsfinanciën in de Batafs-Franse Tijd 1795–1810*. Amsterdam: NEHA.
- Phelps Brown, H. and Hopkins, S.V. (1981). *A perspective of wages and prices*. London: Methuen.
- Pirenne, H. (1922). Mahomet et Charlemagn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1, 77–86.
- Pomeranz, K.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May), 539–590.
- Poos, L.R. (1986). The pre-history of demographic regions in traditional Europe. *Sociologia Ruralis*, 26, 228–248.
- . (1991).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stan, M. (1950). 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II, no. 3, 221–246.
- Posthumus, N.W. (1908).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eidsche Lakenindustrie*. I. De Middeleeuwen. 's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 Poynder, N. (1999). Grain storage in theory and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ird Conference of European Historical Economics Society*, Lisbon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poynder.pdf>)
- Poynder, N.J.T. (2003).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Direct Demesne Management*. Unpublished thesi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 Prak, M. (1985). *Gezeten burgers. De elite in een Hollandse stad: Leiden 1700-1780*. Dieren/Amsterdam: De Bataafsche Leeuw.
- . (1992). 'Een verzekerd bestaan'. Ambachtslieden, winkeliers en hun gilden in Den Bosch (ca. 1775). In: Vries, B. de, and Tijn, T. van (eds.) *De kracht der zwakken: studies over arbeid en arbeidersbeweging in het verleden opstellen aangeboden aan Theo van Tijn bij zijn afscheid als hoogleraa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aan de Rijksuniversiteit Utrecht*. 448. Amsterdam: Stichting Beheer IISG.
- . (1993). Identité urbaine, identités sociales: Les bourgeois de Bois-le-Duc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SC* 48, 907-933.
- . (1994). Goede bureu en verre vrienden. De ontwikkeling van onderstand bij armenzorg in Den Bosch sedert de Middeleeuwen. In: Flap, H. and Leeuwen, M.H.D.v., (eds.) *Op lange termijn: verklaringen van trends in de geschiedenis van samenlevingen*, 147-170. Hilversum: Verloren.
- . (1994). Ambachtsgilden vroeger en nu. *NEHA-JAARBOEK Voor Economische, Bedrijfs-En Techniekgeschiedenis* 58, 10-33.
- . (1995). Cittadini, abitante e forestieri: una classificazione della popolazione di Amsterdam nella prima eta moderna. *Quaderni Storici* vol. 30, n. 89, 331-357.
- . (1997). Burghers into citizens: Urban and national citizenship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era, *Theory and Society* 26, 403-420. Reprinted in: Hanagan, M. and Tilly, C. (eds.) (1999). *Exte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7-35.
- . (2001). 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 citizenship and religion in the Dutch Republic (seventeenth-eighteenth C.). In: Hsia, R.P. and Nierop, H. van (eds.) *Calvinism and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9-175.
- . (2003). Guil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Market during the Dutch Golden Age. In: *Simiolus: Netherlands Quarterly for the History of Art* vol. 30, no. 3/4, 236-251.
- Priester, P. (1998). *Geschiedenis van de Zeeuwse landbouw circa 1600-1910*. Wageningen: Landbouwwuniversiteit Wageningen, afdeling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 Putnam, R.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ed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nsel, D.L. (1988). *Mothers of misery: child abandonment in Russia*. Princeton, N.J.; Guild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ppaport, S. (1989). *Worlds within worlds: structures of life in sixteenth-century Lon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wski, E.S. (1979).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azi, Z. (1980). *Life, marriage and death in a medieval parish: economy, society and demography in Halesowen 1270-14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ed, C.A. (2004).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eis, J. (2005). Economic growth,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In: Allen, R.C., Bengtsson, T. and Dribe, M. (ed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27.
- . (2007).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tlantic Periphery: The Efficiency of the Portuguese Machinery of Justice, 1870-1910 paper conference *Law and*

- Economic Development*, Utrecht,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papers/lawreis.pdf>.
- Reher, D.S. (1998). Family ties in Western Europe: persistent contras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 203–234.
- Reynolds, S. (1984). *Kingdoms an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900–13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1994).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ley, J.C. (1980).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ngstad, V. and Løyland, K. (2006). The demand for books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consumer survey data.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30, 141–155.
- Rogers, J.E.T. (1866–1902).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1259–1793*, edn. London.
- Romer, P.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1002–1037.
- Rommes, R. (1998). *Oost, west, Utrecht best? Driehonderd jaar migratie en migranten in de stad Utrecht (begin 16e–begin 19e eeuw)*. Amsterdam: Stichting Amsterdamse Historische Reeks.
- Rouse, R.H. and Rouse, M.A. (2000). *Manuscripts and Their Makers: Commercial Book Producers in Medieval Paris 1200–1500*. London: Harvey Miller.
- Rowen, H.H. (ed.) (1972). *The Low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s*. New York: Harper & Row.
- . (1978). *John de Witt, Grand Pensionary of Holland, 1625–167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zman, Gilbert (1973).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binger, R. (2007). *Popular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ussell, J.C. (1972). Population in Europe: In Cipolla, C.M.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 The Middle Ages. Glasgow: Collins/Fontana, 25–71. Sahlin, P. (2004). *Unnaturally French: Foreign Citizens in the Old Regime and After*.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llares, R. (1991).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edn.) London: Duckworth.
- Saito, O. (1978). The Labor Market in Tokugawa Japan: wage differentials and the real wage level'.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84–101.
- . (2005a). Wages, inequality and pre-modern growth in Japan, 1727–1894. In: Allen, R.C., Bengtsson, T. and Dribe, M. (ed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7–99.
- . (2005b). *Factor markets and their institutions in traditional Japan: Labour*, paper for conference *The Ris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ctor Markets*, Utrecht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factormarkets.php>.
- . (2005c). The third pattern of marriage and remarriage: Japan in Euras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Engelen, T. and Wolf, A.P. (ed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Eurasia*. Amsterdam: Aksant, 165–193.
- Saito, O. and Settsu, T. (2005). *Factor markets and their institutions in traditional Japan. A note on capital markets*, paper for conference *The Rise,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ctor Markets*, Utrecht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factormarkets.php>
- Santoro, M. (1994). *Storia del Libro Italiano*. Milano: Editrice Bibliografica.
- Scheidel, W. (2008). Real wages in Early Economies: Evidence for Living Standards from 2000 B.C.E. to 1300 C.E. Working paper SSRN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14424.

- Schmidt, A. (2001). *Overleven na de dood: weduwen in Leiden in de Gouden Eeuw*. Amsterdam: Prometheus Bert Bakker.
- . (2001). 'Touching inheritance'. Mannen, vrouwen en de overdracht van bezit in Holland in de 17^e eeuw. *Holland, historisch tijdschrift*, 175–189.
- Schoengen, M.A.J. (1941a). *Monasticon Batavum (i) De Franciskaansche orden*. Amsterdam: 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 Maatschappij.
- . (1941b). *Monasticon Batavum (ii) De Augustijnsche orden*. Amsterdam: 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 Maatschappij.
- . (1942). *Monasticon Batavum (iii) De Benedictijnsche orden*. Amsterdam: 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 Maatschappij.
- Scholliers, E. (1959). Prijzen en Lonen te Antwerpen (15^e en 16^e eeuw). In: Verlinden, C. (et al.). (ed.) *Dokumenten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prijzen en lonen in Vlaanderen en Brabant (XV^e–XVIII^e eeuw)*, I. Brugge: De Tempel, 464–467.
- Schwetschke, G. (1877). *Codex nundinarius Germaniae literatae continuatus: der Mess-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Fortsetzung, die Jahre 1766 bis einschliesslich 1846 umfassend*. Halle.
- Seccombe, W. (1992). *A millennium of family change: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Northwestern Europe*. London/New York: Verso.
- Selm, B. van (1987). *Een menigte treffelijke Boecken. Nederlandse boekhandelscatalogi in het begin van de zeventiende eeuw*. Utrecht: HES Uitgevers.
- Sheehan, M.M. (1978). Marriag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ciliar legislation and diocesan statutes of medieval England, *Mediaeval Studies* 40, 408–460.
- Sheehan, M.M. and Farge, J.K. (1996). *Marriage, family, and law in medieval Europe: collected Stud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hih, J.C. (1992).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ake Tai area, 1368–1800*. Berkeley: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 Shiue, C.H. (1999). Market Arbitrage and Transport Routes: Evidence from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Paper 1999 *CLIOMETRIC SOCIETY ASSA SESSIONS*.
- Shiue, C.H. and Keller, W. (2007).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4, 1189–1216.
- Sickenga, F.N. (1864). *Bijdrage tot de geschiedenis der belastingen in Nederland*. Leiden: P. Engels.
- Simons, W. (2001).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mith, A. (1776/19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mith, R. (1979).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vidence for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in England. In: Harris, C. (ed.) *The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new directions for Britain.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28, 74–112.
- . (1981). The structural dependence of the elderly as a recent development: some skeptical historical thoughts. *Ageing and society* 4, 409–428.
- Smith, R.M. (1986). Transfer incomes, risk and security: the roles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llectivity in recent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 In: Coleman, D.A. and Schofield, R.S. (eds.) *The State of population theory: forward from Malthus to modern times*. Oxford/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88–211.
- . (1986). Women's property rights under customary law: some development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 165–194.
- . (1991). The manorial court and the elderly tenant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In: Pelling, M. and Smith, R.M. *Life, Death, and the Elderl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33–51.
- . (1992). Geographical diversity in the resort to marria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work, reputation and unmarried females in the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Europe. In: Goldberg, P.J.P. *Woman is a worthy wight: women*

- in *English society c. 1200–1500*. Wolfeboro Falls: Allan Sutton, 16–59.
- Smith, R. (1999). Relative prices, forms of agrarian labour and female marriage patterns in England, 1350–1800. In: Devos, I. and Kennedy, L. (eds.) *Marriage and rural economy: Western Europe since 1400*. Turnhout: Brepols, 19–48.
- Snooks, G.D. (1990).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4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 (1994). Great wave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nooks, G.D. (ed.)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London: Routledge, 43–79.
- . (1995). The dynamic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nglo-Norman economy and beyond, 1086–1300. In: Britnell, R.H. and Campbell, B.M.S. (eds.) *A commercialising economy. England 1086 to c. 13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7–55.
- Söderberg, J. (2004). *Prices in the Medieval Near East and Europe*, paper GEHN/Utrecht Conference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Utrecht,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hpw/papers/soderberg.pdf>.
- Solow, R.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No. 1, 65–94.
- Spufford, M. (1995). Literacy, trade and religion in commercial centres. In: Davids, K. and Lucassen, J. (eds.) *A miracle mirrored. The Dutch Republic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9–284.
- St. Clair, W. (2004).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P. (1999).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s, W.B. (1990). Literacy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1500–190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0, 545–571.
- Stephenson, C. (1933). *Borough and Town. A study of urban origins in England*. Cambridge (MA):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 Streng, J.C. (1997). 'Stemme in staat'. *De bestuurlijke elite in de stadsrepubliek Zwolle 1579–1795*. Hilversum: Verloren.
- Stone, L. (1969).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 Present* 42, 69–139.
- Studer, R. (2007). India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ain Market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Oxford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umber 68.
- Stuurman, S. and Akkerman, T. (1998). *Perspectives on feminist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an history: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Temple, Sir W. (1972, orig. 1673). *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ed.) Sir George Clark. Oxford: Clarendon.
- Takatsuki, Y. (2007). The formation of a market mechanism in Tokugawa Japan. No. 07–19,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from Osak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Osak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OSIPP).
- Thane, P. (2000). *Old Age in English History: Past Experiences, Present Issu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 Hart M.C. (1989). Public loans and moneylender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1, 119–139.
- . (1993). *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 War, politics and finance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 (1994). Intercity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Dutch State. In: Tilly, C. and Blockmans, W. (eds.) *Cities and the rise of states in Europe, A.D. 1000 to 180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 (1995). The Dutch Republic: the urban impact upon politics. In: Davids, K. and

- Lucassen, J. (eds.). *A Miracle Mirrored: The Dutch Republic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98.
- . (1997). The merits of a financial revolution: public finance, 1550–1700. In: 't Hart, M., Jonker, J. and Zanden, J.L. van (ed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6.
- Tielhof, M. van (2002). *"The mother of all trades": the Baltic grain trade in Amsterdam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 Tielhof, M. van, and Zanden, J.L. van (2007). Productivity changes in shipping in the Dutch Republic: the evidence from freight rates, 1550–1800. *paper IISG*,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research/productivity-shipping.pdf>. To be published 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 Tierney, B. (1959). *Medieval poor law: a sketch of canonical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illy, C.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Evans, P.B., Rueschmeyer, D. and Skocpol, T.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191.
- .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 (1995).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0 (supp. 3), 1–19.
- . (1992). Child abandonment in European history: a symposium.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7, 1–23.
- Tracy, J.D. (1985). *A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 Renten and Renteniers in the County of Holland, 1515–15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0). *Holland under Habsburg Rule 1506–1566. The Formation of a Body Polit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8). *The Founding of the Dutch Republic. War, Finance, and Politics in Holland, 1572–15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ien, T.-H. (1985). *Paper and Printing*. In: Needham, J. (ed.).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itz, E. (1990).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medieval women in towns & cities*. Mount Kisco (NY): Moyer Bell Limited.
- Unger, R.W. (1978). *Dutch Shipbuilding before 1800*. Assen: Van Gorcum.
- . (2006). Investment and Risk: Ship Design and Investment in Port Infrastructure. In: S. Cavaciocchi (ed) *Ricchezza del Mare*. Firenze: Le Monnier, 317–334.
- Vaquero, Q.A., Martinez, T.M. and Gatell, J.V. (eds.) (1972–1975). *Diccionario de historia eclesiastica de España*. (4 vols + supl. 1). Madrid: CSIC Instituto Enrique Florez.
- Verhulst, A. (1989). The origins of Town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Pirene thesis. *Past & Present* 122, 3–36.
- . (1995).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McKitterick, R.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I, c. 700–c. 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81–509.
- . (1999). *The Rise of Cities in North-We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Loren van Themaat, L.M. and Dokkum, H.W. (1983). *Oude Dordtse lijfrenten: stedelijke financiering in de vijftiende eeuw*. Amsterdam: Verloren.
- Voet, L. (1972). *The Golden Compasses. A histo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the Officina Platiniana*. II. Amsterdam: Van Gendt & Co.
- Voigtländer, N. and H.-J. Voth (2006). Why England? Demographic factor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 319–361.
- Volkov, V. (2002). *Violent entrepreneurs.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making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ries, J. de (1978). *Barges and Capitalism.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Dutch Economy (1632-1839)*. Utrecht: Hes Publishers.
- . (1984a).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London: Methuen.
- . (1984b).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Dutch economy 1675-1900. In: Saxonhouse, G. and Wright, G. (eds.). *Forms and methods in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N. Parker*, Greenwich, 149-189.
- . (1994).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249-270.
- Vries, J. de. and Woude, A van der (1997).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ries, P.H.H. (2001). 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 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 Number 2, 407-446.
- Wall, R. (1983). Does owing real property influence the form of the household? An example from rural West Flanders. In: Laslett, P., Robin, J. and Wall, R., (eds.).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379-4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 (1973). *The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2).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 In: Rawski, E.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5-69.
- Wayne, Ph.T.B. (1989). *Regents and Rebels.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Dutch City*. Oxford: Blackwell.
- Weir, D.R (1984). Life under pressure: France and England, 1670-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27-47.
- White, L. (1962).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ickham, C. (1997). Debate. The 'Feudal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155, 196-208.
- Wiesner, M.E. (1999). Having her own smoke. In: Bennett, J.M. and Froide A.M., (eds.) *Singlewomen in the European past, 1250-18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2-216.
- Williamson, J.G. (1985). *Did British Capitalism breed inequality?* Boston: Allen & Unwin.
- Wilson, K.M. (1987). *Women writer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Athens (GA)/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Withington, P. (2005). *The Politics of Commonwealth: citizens and free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lf, A.P. (2005). Europe and China: two kinds of patriarchy. In: Engelen, T. and Wolf, A.P., (ed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Hajnal hypothesis*. Amsterdam: Aksant, 215-241.
- Wolf, A.P. and Hanley, S.B. (1985). Introduction. In: Hanley, S.B. and Wolf, A.P.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4.
- Wong, R.B. (1997).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oude, A.M. van der (1980). De alfabetisering. *Algemen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VII, Bussum, 257-264.
- Wrigley, E.A. (1967). 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 *Past & Present* 37, 44-70.
- . (1988).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Davies, R.S., Oeppen, J.E. and Schofield, R.S. (1997).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ruction, 1580-18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The Divergence of England: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10, 117-141.
- Xu, D., Wu, C. and Curwen, P.I. (1999). *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 Basingstoke:

- Macmillan.
- Yong X. (2007). A "fertilizer revolution"? A critical response to Pomeranz's theory of "geographic luck". *Modern China* 33, 195–229.
- Youngs, D. (2006). *The life cycle in Western Europe, c. 1300–c. 15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Yun, B. (1994). Proposals to Quantify Long Term Performance in the Kingdom of Castile, 1550–1800. paper Sessio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Milan, 1994).
- Zanden, J.L. van (1987). De economie van Holland in de periode 1650–1805: groei of achteruitgang? *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102, 562–609.
- . (1992).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olden Ag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IV*, 5–26.
- . (1993).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Holland's economy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labour marke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Trac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Kuznets curve: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VIII*, 643–664.
- . (1999).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Europe, 1500–18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 175–197.
- . (2001a). Early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1500–1800 In: M. Prak (ed.) *Early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69–87.
- . (2001b). Industrialisatie en inkomensverdeling in Overijssel 1750–1875. In: Trompeter, C. and Zanden, J.L. van (eds.) *Over de geschiedenis van het platteland in Overijssel (1500–1850)*. Kampen: IJsselacademie, 113–129.
- . (2002a). The '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 and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an assess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 619–641.
- . (2002b). 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for Holland in 1510/14.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6, 131–165.
- . (2003). Rich and Poor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Jav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0, 1–23.
- . (2004). Simulating early modern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IISH, available at <<http://www.iisg.nl/research/jvz-simulating.pdf>>.
- . (2004). On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Rice pr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v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 no. 4, 1028–1055.
- . (2005a). What happened to the standard of living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Netherlands. In: Allen, R.C., Bengtsson, T. and Dribe, M. (ed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3–195.
- . (2005b). Una estimación d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en la Edad Moderna. *Investigaciones de Historia Económica* 2, 9–38.
- . (2005c). De timmerman, de boekdrukker en het ontstaan van de Europese Kenniseconomie.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en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2, 105–121.
- Zanden, J.L. van and Riel, A. van (2004). *The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 Stat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anden, J.L. van, and Prak, M. (2006). Toward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citizenship. The Dutch Republic between medieval communes and modern nation state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0, no. 2, 111–147.
- Zuijderduijn, J. (2007). *Medieval Capital Markets. Markets for Renten Between State Formation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Holland (1300–1550)*. PhD thesis, Utrecht University.
- Zurndorfer, H.T. (1999).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主题索引*

absolutism 专制主义, 213-214, 226-227

age heaping 年龄集聚, 86-88, 88*t*

agency, state 代理, 国家, 208

agriculture 农业

Britain 英国, 99, 237-238

GDP share of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 237-238, 249

labour markets 劳动力市场, 167-171, 169*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技术进步, 41-42

Alexander III (pope) 亚历山大三世(教皇), 106*n*8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222

Antwerp 安特卫普, 96

apprenticeship system 学徒制度, 160-

161, 165-167, 227-228

Austria 奥地利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1*t*

monasteries 修道院, 僧侣, 44*t*

urbanization 城市化, 40*t*

Banten 万丹, 23

Belgium 比利时

book demand 图书需求, 195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41, 88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40-242, 241*t*

literacy 识字率, 193*t*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79, 81*t*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索引页码系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索引页码后的字母*f*表示“图”, *t*表示“表”, *n*表示“注释”。图表位置请查阅“图表目录”所标示的页码。——编者注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40*t*
- Bengal 孟加拉, 23
- Black Death 黑死病 (1348)
- and book production 和书籍产量, 76–78
- interest rates decline following 随之而来的利率下降, 25, 29–30, 162
- and labour markets 和劳动力市场, 96
- labour markets and marriage patterns following 劳动力市场和婚姻模式随后的, 115, 121
- Middle Eastern reaction to 中东的反应, 271–274
- skill premium decline following 随之而来的技能溢价的下降, 162
- Bohemia 波希米亚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1*t*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40*t*
- book production 书籍生产 (产量)
- about 关于, 40–41, 69–71, 88–91
- after printing press 印刷机之后, 184
- book as maturing innovation 书籍作为一个成熟的发明, 80–81
- datasets and estimates 数据库和估计, 71–75
- demand 需求, 84–85, 85*f*
-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rinting press 印刷机发明的经济后果, 178–187, 181*f*, 183*f*, 185*f*
- literacy increase 读写能力的增加, 190–195, 191*f*, 193*t*
- long-term patterns 长期的模式, 75–80, 79*f*
-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absolute numbers 手写本生产的绝对数量, 77*t*
- and monasteries 和修道院, 43–44, 82–84, 83*f*
- outside Europe 欧洲之外, 187–190
- per capita per annum 每人每年, 81*t*
- prices 价格, 180–182, 181*f*, 183*f*, 194–195
- and printer skill premiums 和印刷工人的技能溢价, 163–164, 164*f*
- social and economic roles 社会和经济角色, 186
- Britain. *See* England 英国, 参见英格兰
- Buitenzorg 茂物, 23
-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66, 271
-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137
- canon law 教会法规, 46, 47
- Canton Trade 广交会, 24
- capital markets 资本市场, 131, 222–223
- capitalism, and Christianity 资本主义和基督教, 35
- Carolingian Empire 卡洛林帝国
- book production in 书籍产量, 70
- disintegration of 瓦解, 33, 35, 43, 56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9, 40*t*
- Carreras, Albert 卡雷拉斯, 阿尔伯特 40
- Catholic Church. *See* Church, Catholic 天主教堂, 参见教堂、天主教
- celibacy rates 独身比率, 125–126
- Central Europe 中欧
- frères* in 兄弟情, 112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2, 77*t*, 79*f*, 81*t*
- patriarchy 父权制, 297
- second serfdom in 第二次农奴身份, 273*n*2, 293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48, 154*f*, 155*t*, 156

- stagnancy 1500-1800 停滞 1500-1800, 292
- Charlemagne 查理曼, 33
- Charles V 查理五世, 224
- child welfare 儿童福利, 133-134
- China 中国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188-189
 - child welfare in 儿童福利, 133-134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269-270, 275-282, 280f, 288-290, 298-299
 - economically surpassed by Europe 在经济方面被欧洲超过, 32
 - guild system in 行会制度在, 165-166
 - interest rates 利率, 22, 23-24
 - labour market 劳动力市场, 117, 119, 140n62
 - lite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识字水平和经济增长, 199
 -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融合, 26, 27f
 -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108, 123, 128-129
 - Ming period 明朝, 33, 117
 - nominal construction wages 名义建筑工资 1769, 174t
 - printing economics 印刷经济, 179-180
 - Qing period 清朝, 29, 33, 165-166, 188-189
 - skill premium 技能溢价, 172, 172f, 173f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58-159
 - Sung period 宋朝, 32
 - women and labour markets 女性和劳动力市场, 141n62
- Christianity, as normative system 基督教, 作为标准化的系统, 35. *See also* Church, Catholic 还可以参考教会, 天主教
- Church, Catholic 教会, 天主教, 294-295
- and book production 和书籍产量, 82-84, 83f, 89
 - and Carolingian Empire 和卡洛琳帝国, 43
 - and fragmented political and legal structures 和分散的政治和法律结构, 49-50
 -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制度框架, 35, 66
 - and marriage patterns 和婚姻模式, 105-110, 137
 - monastery growth 修道院的增加, 43-44, 44t, 56
 - "Peace of God" movement "上帝的和平" 运动, 45, 50
 - 'top-down' pacification by "自上而下" 的和解通过, 36
 - vs. kin groups 对比血缘群, 59
- citizenship 公民权, 295-296
- about 关于, 205-213
 - case study of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案例研究, 215-226
 -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革命前的英国, 226-230
 - public goods 公共品, 224-226
 - tax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税收和经济增长, 213-215
 - taxation base 税收基数, 217-224
- city-states 城市国家
- citizenship 公民权, 209-212
 - Dutch Republic case study 荷兰共和国个案研究, 215-226
 - leagues 联盟, 212
 - self-governing status of 自治状态, 51-52, 54-55, 63-64, 67

- Clark, Alice 克拉克, 爱丽丝, 135n56
- Cluny reform 克吕尼改革, 43, 84
- commerce, and state formation 商业和国家形成, 230-232, 263
- commons 下院, 17
- communal movement 公社运动, 294
- in Arab world 在阿拉伯世界, 62
- development of 发展, 50-53
-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53-55
- endures in early Modern period 在现代早期的忍耐, 57-58
- construction workers 建筑工人
- return on human capital of 回归人力资本, 160-165
- skill premium in Europe 1300-1914 欧洲的技能溢价 1300-1914, 153-157, 154f, 155t
- skill premium in mid-20th cent. 20世纪中期的技能溢价, 151-153, 152f
- skill premium outside Europe 1300-1914 欧洲之外的技能溢价 1300-1914, 157-159, 158f
- wages 1769 工资 1769, 174t, 280f, 283t
- Cordoba 科尔多瓦, 39, 40t
- Coromandel 科罗曼德, 23
- corporate bodies (*universitates*) 法人团体, 52-55, 294
-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marriage patterns 反宗教改革和婚姻模式, 136-137
- craft guilds 手工业行会, 53-54
- cultural homogeneity 文化同质性, 55
- de la Court van der Voort, Pieter, 223
- debt, public 债务, 公共, 210, 221-224
- Decretals of Gregory IX 格雷戈里九世教令, 106
-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民主制度, 296-297
- Domesday Book 末日审判书, 236
- dowries 嫁妆, 110-114
-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225
-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 215-226
- early modern period 现代早期
-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rinting press 印刷的经济后果, 178-187, 181f, 183f, 185f
-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人力资本形成, 148f
- institutional similarities to Middle Ages 中世纪的制度相似性, 57-58
- literacy increase 文化水平的提高, 190-195, 191f, 193t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53-157, 154f, 155t
-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23
- Eastern Europe 东欧
- agricultural wages 农业工资, 168
-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 人力资本形, 148
-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104, 127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53-157, 154f, 155t, 167
- stagnation 停滞, 240
- economic growth, modern 经济增长, 现代, 294
- in China 在中国, 275-282, 280f
- citizenship and taxation 公民权和税收, 213-215
- emergence of modern economic 现代经济的出现

- growth 增长, 234-236, 256-266, 258f
- in England 1086-1688 在英国 1086-1688, 235-239, 237t
- in England 1500-1800 在英国 1500-1800, 251-256, 252f, 254f, 255f
- in Europe 1000-1800 在欧洲 1000-1800, 239-243, 241t
- in Holland 1500-1800 在荷兰 1500-1800, 244-251, 247f, 248f, 250f
-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和工业革命, 264-266
- in Islamic civilizations 在伊斯兰文明, 269-274, 272f, 274f
- in Japan 在日本, 282-288, 283t, 285f, 286f
- and literacy 和读写能力, 197-199, 198f
- before 19th cent. 19 世纪前, 234-236
- educational investment 教育投资, 195-196
- elderly care 老年人护理, 130-131, 140
- enclosures 围栏, 17
- England 英格兰 (英国)
- apprentice system in 学徒制度, 166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41, 82f, 88, 184, 185f
- cause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工业革命的原因, 291-294
- citizenship and English Revolution 公民权和英国的革命, 226-230
- economic growth 1086-1688 经济增长 1086-1688, 235-239, 237t
- economic growth 1500-1800 经济增长 1500-1800, 251-256, 252f, 254f, 255f
-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40-242, 241t, 258f
- growth divergence from Europe 欧洲增长分流, 95-100, 97f, 98f
- guilds and communes 行会和公社, 53
-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人力资本形成, 129-130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1-192, 191f, 193t, 194
- literacy and education 读写能力和教育, 129, 199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1t
-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115, 122-123, 137-138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political unity 政治联合, 37
- population 人口, 38
- population and skill premium 人口和技能溢价, 167
- reaction to Black Death of 1348 针对 1348 年黑死病的反应, 271-274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9, 40t
- women's labour status 女性的劳动状态, 135
-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 欧洲婚姻模式 (EMP), 31, 295
- access to labour market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 115-121
- average age of women 平均的女性年龄, 122-125
- celibacy rates of women 女性的单身率, 125-126
- consensus vs. parental authority 一致同意对比父权制, 105-110
- distinctive features 明显的特征, 121-126
- emergence 出现, 105-121
- Hajnal thesis Hajnal 理论, 102-105

-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的含义, 126-134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两代间的转移, 110-114, 139-140
-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参与劳动力市场, 126-130
- marriage, and Church doctrine 婚姻和教义, 59, 105-110
- patriarchy 父权制, 134-138
- summary 总结, 138-141
- excise taxes 特种消费行为税, 219-220
- famine 饥荒, 285-287
- fertility 人口出生率, 123-124
- feudal law 封建法律, 47
- "Feudal Revolution," "封建革命" 34, 36
- feudalism 封建主义, 55-57, 67, 98, 212-213
- Flanders, communal movement in 佛兰德斯, 公社运动, 51
- Florence 佛罗伦萨, 167-168
- France/French regions 法国 / 法国地区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41, 88
 - communal movement in 公社运动, 51
 - guilds and communes 行会和公社, 53
 - inheritance 遗产, 110-111, 112
 - literacy 读写能力, 86, 193*t*, 194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79, 80, 81*t*
 -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137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政治分裂, 37
 - population 人口, 3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9, 40*t*
-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 in Byzantium 在拜占庭, 271
- in China 在中国, 275-277
- in Egypt 在埃及, 272
- emergenc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234-236, 256-266, 258*f*
- in England 1086-1688 在英国 1086-1688, 235-239, 237*t*
- in England 1500-1800 在英国 1500-1800, 251-256, 252*f*, 254*f*, 255*f*
- in Europe 1000-1800 在欧洲 1000-1800, 239-243, 241*t*
- in Holland 1500-1800 在荷兰 1500-1800, 244-251, 247*f*, 248*f*, 250*f*
- in Japan 在日本, 286
- in Ottoman Empire 在奥斯曼帝国, 272*f*
- Germany 德国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41, 88, 184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3*t*, 194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79, 80, 81*t*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population 人口, 3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9, 40*t*
-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18
- government policy, and literacy 政府政策和读写能力, 196
- grain markets 谷物市场, 19-20, 25-28
- Great Divergence 大分流
- debate 辩论, 18, 146, 171
- Great European Famine of 1315-1317 欧洲大饥荒 1315-1317, 30
- Gregory IX (pope) 格列高利九世 (教皇), 106
- Gregory VII (pope) 格列高利七世 (教皇), 106

- 皇), 46
- Greif-de Moor hypothesis Greif-de Moor 假定, 36, 50-55
- guilds 行会, 17, 295-296
- as 'bottom-up' institutions 像“自下而上”的制度, 35-36, 50
- and commune movement 和公社运动, 50-53
- and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y 和发展市场经济, 53-55
- and economic stagflation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262
- efficiency of apprenticeship system 学徒制度的效率, 160-161, 165-167
- Gutenberg, Johannes 古腾堡, 约翰尼斯, 178
-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34, 224
- Hajnal thesis Hajnal 论点, 101-102, 102-105
- Hand-Press Book File 《手工印刷书籍档案》, 74n5
- Heyndericx, Janne, 101-102
- Holland 荷兰, 99; *See also* Dutch Republic economic growth 1500-1800 也可以参见荷兰共和国的经济增长 1500-1800, 244-251, 247f, 248f, 250f
-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40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29
-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122-123
-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33
-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人力资本形成, *See also* knowledge economy and book production 也可以参见知识经济和书籍生产, 85-88
- causes of high level of formation 高水平的形成的原因, 148f
- children's education 儿童教育, 195-196
-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影响, 171-173, 172f, 173f
- efficiency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培训机构效率, 165-167
- and guilds 行会, 53, 69-71
-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制度发展, 294, 299-300
- as investment linked to interest rates 投资联系利率, 159-165, 161f, 164f
- link to agricultural labour markets 连接农业劳动力市场, 167-171, 169f
- neo-locality vs. patri-locality 婚后新地方居住 VS 婚后男方方居住, 128-130
- remuneration of 报酬, 149-151
- skill premium in Europe 1300-1914 欧洲的技能溢价 1300-1914, 153-157, 154f, 155t
- skill premium in mid-20th cent. 20 世纪中期的技能溢价, 151-153, 152f
- skill premium outside Europe 1300-1914 欧洲之外的技能溢价 1300-1914, 157-159, 158f
- as stepping stone to industrialization 像迈向工业化的跳板, 199
- Hume, David, 211-212
- Iberia 伊比利亚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41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1t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population 人口, 3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8-39, 40*t*, 41
- income taxation 收入税, 221
- India 印度
- interest rates 利率, 23
-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融合, 26-27, 27*f*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57, 158*f*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57
- Indonesia 印尼, 27, 27*f*, 157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264-266, 291-294
- “industrious revolution,” “勤勉革命” 245-246
- infanticide 杀婴, 133
- inheritance rights 遗产权, 110-114, 139-140
- institution-building 制度建设
- communal corporate bodies efficient for 高效的共有的法人团体, 54-55
- European compared to Arab 欧洲对比阿拉伯, 60-64
- guilds as ‘bottom-up’ institutions 行会作为“自下而上”的团体, 35-36
- individualism and 个人主义, 58-59
-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s core issue of 财产权保护作为关键的事情, 65-66
- summary, in Europe 总结, 在欧洲, 66-68
-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制度的效率, 294, 296-297
- development of factor markets 要素市场的发展, 20-21
- and economic stagflation 和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262
- efficiency effects 效率影响, 17
- efficiency research 效率研究, 17-18
- extent of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融合的程度, 20
- as integrated whole systems 综合的整体的制度, 18
- property rights and trust issues 财产权和信任问题, 19
- Western Europe in medieval period 中世纪的西欧, 22-29, 23*f*, 27*f*
- interest rates 利率, 19
- decline after 1350 1350后的下降, 29-30
-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人力资本投资, 159-165, 161*f*, 164*f*
- medieval period 中世纪时期, 22-25, 23*f*
- public debt 公债, 222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两代间的转移, 110-114, 139-140
- investiture conflict investiture 冲突, 46-49
- Ireland 爱尔兰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88
- kinship ties and feudalism 血缘关系和封建主义, 59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3*t*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9
- skill premium 技能溢价, 172, 172*f*, 173*f*
- skill premium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技能溢价和经济融合, 170-171
- Islamic civilization 伊斯兰文明, 32
-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60-64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269-270, 269-274, 272*f*, 274*f*, 288-290
- Islamic conquest 伊斯兰征服, 38-39, 58, 269
- kinship ties 血缘关系, 58

- printing press in 印刷机, 187
- Italy 意大利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82f, 184, 185f
-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39, 240-242, 241t, 257, 258f
- guilds and communes 行会和公社, 52, 167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3t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78-79, 80, 81t
- marriage dowries and inheritance 婚姻嫁妆和遗产, 111-112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population 人口, 38
- population and skill premium 人口和技能溢价, 167-16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9, 40t
- Italy, Northern 意大利, 北部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41, 184
- communal movement in 公社运动, 50-51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80
-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政治分裂, 37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40t
- Jacopsz, Adriaen 雅各布, 阿德里安 101-102
- Jambi 占碑, 23
- Japan 日本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188, 189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269-270, 282-290, 283t, 285f, 286f, 298-299
- guild system 行会制度, 166
- interest rates 利率, 24-25
-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融合, 26-27, 27f
- skill premium 技能溢价, 172f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57-158
- Tokugawa period 德川幕府时期, 29, 166, 282, 287-288
- Java 爪哇, 157, 158f
- King, Gregory 国王, 格里高利, 233
- kinship ties 血缘关系, 59-60
- knowledge economy, *See also*
-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知识经济, 294. 也可以参见人力资本形成
- birth of 出生, 145-148, 148f
- causes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crease 人力资本形成增加的原因 148f
- Korea 韩国, 24, 157, 158f
- Krantz, Olle, 239
- labour markets (wage) 劳动力市场 (工资)
- agricultural, and human capital 农业和人力资本, 167-171, 169f
- efficiency 效率, 57
-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和人力资本形成, 126-130
- in late medieval period 中世纪晚期, 120-121
- and marriage patterns 和婚姻模式, 104, 105, 115-121, 126-128, 130-134, 139
- in medieval period 中世纪时期, 28
-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28
-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技术发展, 179
- women's labour status and patriarchy 女性的劳动状态和父权制, 134-138
- legal systems, emergence of 法律制度, 出现, 45-49, 65, 294
- life annuities 终身年金, 131

- literacy 读写能力, 32, 36, 43-44, 69, 85-88
 and economic growth 和经济增长, 197-199, 198f
 and educational investment 和教育投资, 195-196
 and emancipation of lower classes 和下层的解放, 229
 increase 增加, 178, 190-195, 191f, 193t
 Middle East 中东, 187
 in North Seas area 在北海地区, 129
 and printing press 和印刷机, 196-197
 and skill premium 和技能溢价, 196
-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annuities in 养老金, 131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82f
 growth divergence from Europe 欧洲的增长的分流, 95-100, 97f, 98f
 guilds and communes 行会和公社, 53
 labour markets 劳动力市场, 117
 literacy 读写能力, 86-88, 88t, 129, 192, 194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80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政治分裂, 37
 population 人口, 38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9, 40t
- Luther, Martin 路德, 马丁, 107n10, 136-137
- Maddison, Angus 麦迪森, 安格斯, 235
- Magna Carta 大宪章, 48
- Magyar invasion Magyar 入侵, 34
- Malanima, Paolo, 239
- Mann, Michael, 35
- Mann-Berman hypothesis Mann-Berman 假定, 43-50, 44t
- manorial law 庄园法律, 47
- manorialism 庄园制度, 36, 55-57, 67, 98
- market exchange, development of 市场交换发展, 53-55
-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融合, 20, 21-22, 25-28, 27f
- marriage. Se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 婚姻, 参见欧洲婚姻模式 (EMP)
- Medieval period 中世纪时期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农业技术 improvement 提高, 41-42
 Black Death (1348) 黑死病 (1348), 25, 29-30, 76-78
 Church and fragmented political and legal structures 教会和分散的政治和法律结构, 49-50
 cities' status 城市状况, 51-52, 54-55, 63-64, 67
 communal movement and guilds 公社运动和行会, 50-53
 development of communal movement 公社运动的发展, 50-58
 feudalism 封建主义, 55-57, 67
 grain markets 谷物市场, 25-28
 guilds 行会, 35-36, 50-55
 institution-building summarized 制度建设总结, 66-68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制度的效率, 22-29, 23f, 27f
 interest rates 利率, 22-25, 23f
 labour markets 劳动力市场, 28, 120-121
 manorialism 庄园制度, 36, 55-57, 67
 market exchange development 市场交换发展, 53-55

- monasteries and manuscript production 修道院和手写本的产量, 82-84, 83f, 89
- monastery growth 修道院的增加, 43-44, 44t, 56
- political fragmentation/unity 政治的分裂/结合, 43-57
- population boom 人口暴增, 32, 38
- prosperous period from 950 to 1300 从950年—1300年的繁荣时期, 32-68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2, 38-40, 40t
- written word authority 书面文字权威, 44, 48-49, 51, 62-63, 65-66
- merchant guilds 商业行会, 50-53
- Middle East. *See also* Islamic civilization 中东, 同样可以参见伊斯兰文明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187
- reaction to Black Death of 1348 对1348年黑死病的反应, 271-274
- military economies of scale 大规模战争经济, 205-206
- mills, development of 磨坊, 发展, 42
- modern economic growth. *Se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现代经济增长, 参见经济
- growth, modern 增长, 现代
- monasteries 修道院
- growth and reform 增长和改革, 43, 44t, 56
- and manuscript production 和手写本产量, 82-84, 83f, 89
- monopolization, market 垄断, 市场, 17
- neo-locality vs. patri-locality 婚后在新的地方生活 VS 婚后在男方生活, 128-130
- Netherlands 荷兰, 23
- book prices 书籍价格, 181f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184, 185f
- lack of feudal legacy in 缺少封建遗产, 57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1-192, 191f, 193t
- lite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读写能力和经济增长, 199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0, 81t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skill premium 技能溢价, 172, 172f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40t
- North Sea area 北海地区, 297
- cause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的原因, 291-294
- GDP per capita 人均GDP, 240-242, 241t, 258f, 259-260
- growth divergence from Europe 从欧洲开始的增长分流, 95-100, 97f, 98f
- labour markets and marriage 劳动力市场和婚姻, 115-121, 138-139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29
-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融合, 27
- marriage patterns 婚姻模式, 101-102, 104-105
- poor relief systems 穷人救济制度, 133
- women's labour status 女性劳动状况, 135
- Northern Europe, skill premiums 北欧, 技能溢价, 154f, 155t, 156
- Northwest Europe, labour markets 西北欧, 劳动力市场, 28
- nuclear household 核心家庭, 31
-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34, 271, 272f

- Papal Revolution 教廷革命, 46-47, 48, 105
- parental authority 父母的权威, 59
- inheritance practices 遗产实践, 110-114
- and marriage 和婚姻, 105-110, 124, 128-129
- patriarchy 父权制, 134-138, 297
- Pax Romana 罗马和平时期, 33
- "Peace of God" movement "上帝的和平"运动, 45, 50
- Philip II 菲利浦二世, 227
- Plague of 1348. *See* Black Death (1348)
1348 年瘟疫, 参见黑死病 (1348)
- Poland 波兰, 193*t*, 240-242, 241*t*
- political fragmentation/unity 政治分裂 / 结合
-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和经济发
展, 33-34, 37-43
- feudalism and manorialism 封建主义
和庄园主义, 55-57
- Greif-de Moor hypothesis Greif—
Moor 假设, 50-55
- Mann-Berman hypothesis Mann—
Berman 假设, 43-50, 44*t*
- poor relief institutions 穷人救济制度,
132-133
- population 人口
- EMP and 欧洲婚姻模式和, 123
- medieval boom 中世纪繁荣, 32, 38
- and skill premium 和技能溢价, 167-
171, 169*f*
- power,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权力,
的宪法化, 49, 66
- prescriptive knowledge (λ) 规范性知识
(λ), 146
- price convergence 价格集中, 20
- price variation 价格变化, 19, 20
- printing press 印刷机
- and book production 和书籍产量, 190-
195, 191*f*, 193*t*
-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经济后果,
178-187, 181*f*, 183*f*, 185*f*
- and literacy 和读写能力, 196-197
- progressive taxation 累进制税, 221
-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17, 19, 65-
66, 110-114
-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Ω) 描述性知识
(Ω), 146
- Protestantism 新教主义, 136-137,
227*n*10
- public goods 公共品, 207, 214, 224-
226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136-137, 186
- regressive taxation 回归税收, 219-220
- religion and behavior 宗教和行为, 60
- reputation mechanisms 名誉机制, 21
- Roman Law 罗马法, 46, 47*n*9, 138
- Roman marriage dowries and inheritance
罗马婚姻嫁妆和遗产, 111-112
- scientific inquiry 科学研究, 61-62
-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革命, 186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9
- in Europe 1300-1914 在欧洲 1300-
1914, 153-157, 154*f*, 155*t*
- link to agricultural labour markets 连接
农业劳动力市场, 167-171, 169*f*
and literacy 和读写能力, 195-196
- in mid-20th cent. 在 20 世纪中期 151-
153, 152*f*
- outside Europe 1300-1914 欧洲之
外 1300-1914, 157-159, 158*f*
and return on human capital 和回归到
人力资本, 160-165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145, 160
- Snooks, Graeme, 234
- social relief institutions 社会经济制度, 132-134
-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Mann) 《社会权力的来源》(曼), 35
-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in medieval period 中世纪的制度的效率, 22-29, 23f, 27f
 - interest rates 利率, 23
 - thin markets/high interest rates 薄弱的市场 / 高利率, 21
- Southern Europe, skill premiums 欧洲南部技能溢价, 153-157, 154f, 155t
- Spain 西班牙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88
 -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40-242, 241t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3t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9
- state formation 国家形成, 57, 67-68, 295-296
- about 关于, 205-207
 - case study of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案例研究, 215-226
 - citizenship 公民权, 207-213
 - citizenship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英国革命前的公民权, 226-230
 - public goods 公共品, 224-226
 - tax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税收和经济发展, 213-215
 - taxation base 税基, 217-224
-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96
- subsistence production 生活用品生产, 20
- Surat 苏拉特, 23
- Sweden 瑞典
- book demand 书籍需求, 195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184, 185f
 -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39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3t, 194
 - lite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读写能力和经济增长, 199
 - women's labour status 女性的劳动状态, 135
- Switzerland 瑞士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94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1t
 - monasteries 修道院, 44t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40t
- taxation 税收
- and citizenship 和公民权, 217-224
 -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和经济发展, 213-215
- tenure 土地使用期限, 17
- Thailand 泰国, 23
- transaction costs 交易成本
- measurement of 测量, 17-18
 - reduction, in medieval boom 减少, 中世纪繁荣, 42-43, 65-67
- Truce of God 上帝的休战, 45
- trust. *See* reputation mechanisms 信任, 参见声誉机制
- Unayyad empire 乌迈雅德帝国, 33
- Union of Utrecht 乌得勒支同盟, 225
- universities 大学, 61, 63
- urban law 城市法, 47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32, 38-40, 40t
- and book demand 和书籍需求, 84, 90
 - in Low Countries 在低地国家, 99

- Utrecht 乌得勒支, 132
- Viking invasion 维京入侵, 34
- wage labour. *See* labour markets (wage) 工资劳动者, 参见劳动力市场(工资)
- wages 工资
- in China 在中国, 278-282, 280f
 -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1769 1769 年的建筑工人, 174t, 280f, 283t
 - in England pre-Industrial Revolution 英国工业革命前夕, 251-252, 252f
 - in Holland pre-Industrial Revolution 荷兰工业革命前夕, 246-248, 247f
 - North Sea area vs. Europe 北海地区 VS 欧洲, 96-98, 98f, 260-263
 - skill premium in Europe 1300-1914 欧洲技能溢价 1300-1914, 153-157, 154f, 155t
 - skill premium in mid-20th cent. 20 世纪中期的技能溢价, 151-153, 152f
 - skill premium outside Europe 1300-1914 欧洲之外的技能溢价 1300-1914, 157-159, 158f
- Waqf 瓦克夫, 61-62
- war expenditures 战争费用, 224
- Western Europe 西欧
- book production 书籍产量, 82f
 - economic development vs. Arab world 经济发展 vs 阿拉伯世纪, 60-64
 - economic growth 1000-1800 经济增长 1000-1800, 239-243, 241t
 - 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258f
 -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制度的效率, 18
 -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in medieval 中世纪的制度效率
 - period 期间, 22-29, 23f, 27f
 - literacy 读写能力, 85-88, 88t
 - manuscript production 手写本产量, 77t, 81t
 -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政治分裂, 33-34, 37-43
 - skill premiums 技能溢价, 153-157, 154f, 155t
 - stagnation post-1450 1450 年后的停滞, 260-263
- women. *See also*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 女性, 也可参见欧洲婚姻模式 (EMP)
- average age at marriage 平均结婚年龄, 122-125
 - celibacy rates 独身率, 125-126
 - and labour market 和劳动力市场, 115-121, 138-139
 - labour status changes 劳动状态改变, 134-138
-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ial Perspective* (Maddison) 《世界经济千年史》(麦迪森), 235
- written word, authority of 书面文字, 权威, 44, 48-49, 51, 62-63, 65-66
- Zeeland 泽兰, 101-102, 122, 135

范赞登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把西欧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

——李伯重，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近些年，关于工业革命起源或西欧于1800年左右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崛起的书籍一直在定期涌现，但很少有书像本书一样丰富、扎实和可读。

——Christopher Dyer，《美国历史评论》书评

在经济史中或许没有哪个问题比“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更为重大了。与这样一个重要的疑问相应的是，它也不缺乏解释。很多有见解的人甚至相信这些解释中的若干种。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聚焦到了“大分流”之前的两个世纪。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中，范赞登努力将我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拉回到历史深处。事实上，回溯得很远，回到了900—150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一个富有启发和裨益的贡献，它向读者开启了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无论他之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信念是什么。

——Noel

上架建议：经济史

ISBN 978-7-308-15524-3



9 787308 155243 >

定价：6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 1000-1800年

作者=(荷)扬·卢滕·范赞登著

页数=404

SS号=13957364

DX号=

出版日期=2016.01

出版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